三联生活周刊®

2014.2.3－10
2014年第5、6期合刊
www.lifeweek.com.cn

2014年5、6期合刊



现代婚姻中重建亲密关系

天上的爱情 人间的婚姻

772

9 771005 360000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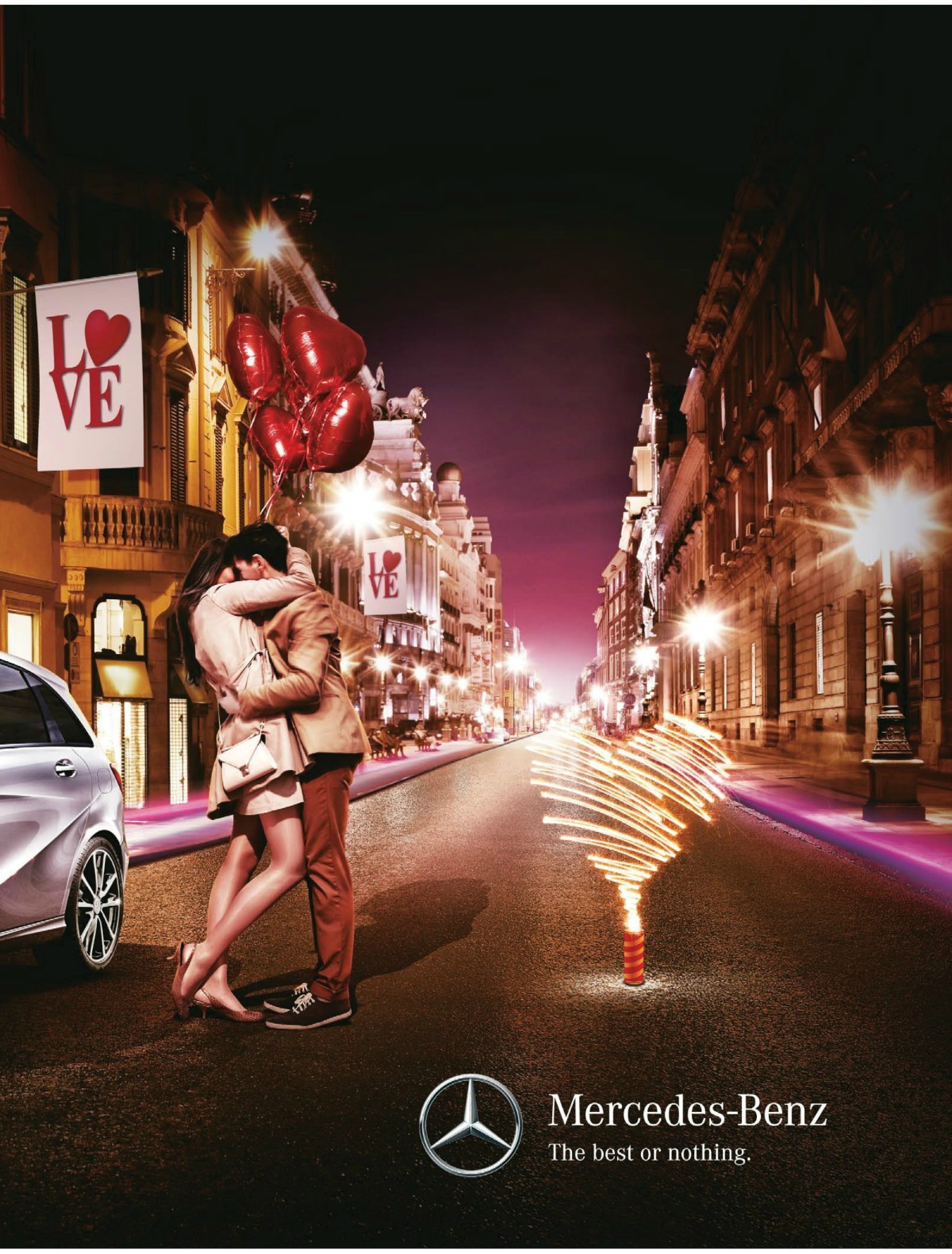
生活周刊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24元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爱你，更多
梅赛德斯-奔驰B级运动旅行车，与挚爱相约情人节
为爱而行，伴爱始终。梅赛德斯-奔驰B级运动旅行车，以1547升超大载物空间，为爱的旅途注入更多幸福；全景式滑动天窗，让暖阳和繁星一路忠实相伴；智能的注意力警示系统配合预防性安全系统(PRE-SAFE®)，极致主动安全，任爱驰骋，安心无忧。越是不易察觉的悉心思量，越能带来体贴备至的呵护；让旅途，始终坦途，只因，爱你更多。
购车即享三包保障，周全服务尽享安心。更多详情，敬请莅临梅赛德斯-奔驰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8-1188。
www.mercedes-benz.com.cn
B-Class



LOVE
LOVE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www.kingandwing.com



博物馆级英国家具展藏

British Museum-standard
Furniture Collection

KING AND WING 嘉英軒
KING&WING GALL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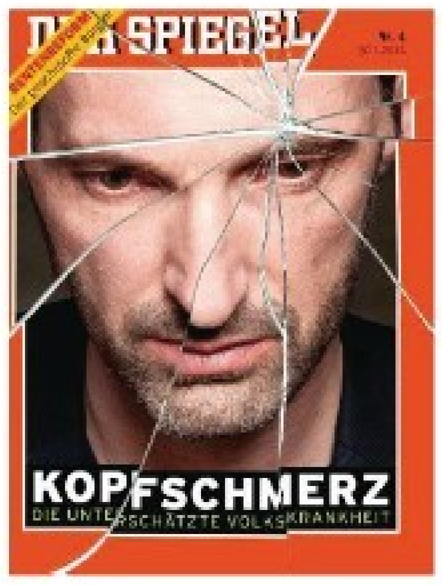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8 号中粮广场 C 座 3 层
(86)10 65262328



《时代》2014.1.27

谁能阻止希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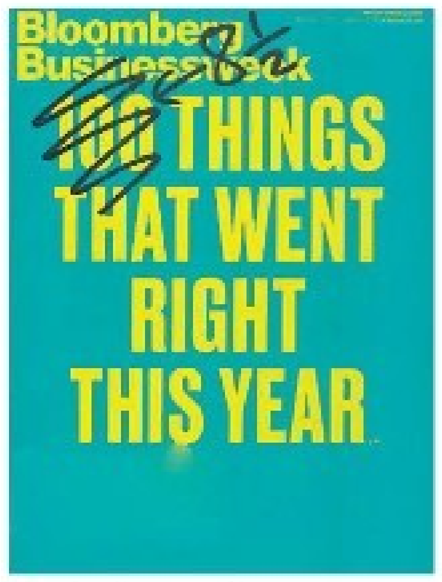
希拉里尚未决定是否再次参选总统，这是因为一个确凿的决定只会使得她的步子变慢。眼下，她可以拥有更为灵活的行程，用不着对网络上的争论做出回应，共和党反对派也没有理由聚集起来煽风点火。美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即使算不上空前，也该是罕见的政治现象。希拉里的声名已享誉全球，她作为普通公民和作为候选人的生活已很难区别。



《明镜》2014.1.20

头痛：被低估的大众疾病

超过 66% 的德国人被不同程度的头痛所困扰，这种症状难以准确找到根源，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并且涵盖了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人。近年来，由于工作压力的不断加大，头痛在年轻患者中的发作比率呈上升趋势。由于难以确诊，医生一般不会拿轻微的头痛当回事。这种大众疾病要求持续并且正确的疗法，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应当承担起责任。



《彭博商业周刊》2014.1.13

2013 年做对的 8½ 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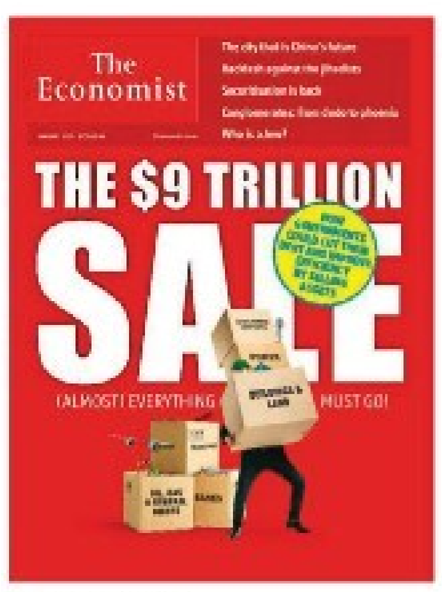
年终美国国会停火了，预算协议在两院顺利通过；医疗费用连续第三年增长低于 2%；妇女撑起半边天——珍妮特·耶伦即将掌舵美联储，通用汽车提名玛丽·巴拉做下任 CEO，默克尔再次当选德国总理，朴槿惠成为韩国总统；石油峰值还未到来，太阳能成主流；没有爆发新的战争；欧元区复苏并增长；美联储对紧缩政策谨言慎行；中国的改革。



《巴伦周刊》2014.1.6

不一样的空间基金

空间基金绝对与众不同。它的资产规模达 3320 亿美元，过去 15 年它旗下的基金有 75% 超过同类型的基准指数，而过去 5 年是 80%。它的策略简单又可复制，但没有一家公司试图效仿。它的所有投资策略都基于经济学家尤金·法玛于 1965 年提出的有效市场理论：通过选股很难获得高于市场的收益，要想连续获得更加不可能，然而可以利用其他方法战胜市场。



《经济学人》2014.1.11

9 万亿美元的大买卖

经合组织国家的政府拥有的可出售的房屋土地价值多达 9 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全部债务的五分之一。但它们对此都非常犹豫，部分因为私有化总会面临阻力，特别是涉及土地买卖。然而对于认真考虑匹配收入和支出的政府而言，私有化是有用的工具。政府可以削减债务并提高信用等级，这样就能减少支出，通过引进竞争提高经济效率。



武夷老号
实甲天下
一杯茶汤见真情
合益和·十六年陈藏大红袍
本品通过德国莱茵检测认证机构370项农残及4项重金属检测
确保每一泡茶的安全、健康
十六年老茶存世稀少，仅售4500元/盒
高山名枞
春采開面
自然萎凋
看青做青
双炒双揉
复焙炖火
合益和·鸿韵大红袍
统一零售价1650元/盒
合益和·红印大红袍
统一零售价850元/盒
合益和茶业
订购专线: 400 088 2271 订购网址:www.teahyh.com

封面故事

P42

现代婚姻中重建亲密关系
天上的爱情 人间的婚姻





56 爱情婚姻纠缠史

106 匹配爱情：条件、感受、关系规范

114 一件神圣礼服的今生前世——婚纱 300 年

136 爱情不说话

146 历尽沧桑，天真依旧

150 一个苹果

156 弗洛伊德和玛莎：完美关系

164 弗里达和里维拉：“既已如此，终将如此”

176 爱丽丝·门罗的主妇之爱


www.koreanair.com
苍穹之上, 一切由您
您的期待，是大韩航空日臻完美的动力。
我们从细致入微至面面俱到, 从娱乐到服务,
美味佳肴，还有值得收藏的美好回忆。在这里,
为您提供极致体验, 这是我们坚守的承诺。
Excellence in Flight
KOREAN AIR
大韩航空
KOREAN AIR


P246


P274


P282

2014年第5/6期合刊　总第772期　2014年2月3~10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184 婚姻变革
194 越痛苦越要爱
200 纯粹浪漫批判
222 法国电影里的那些爱与疯
232 福柯、《性史》与生活的艺术

社会

246 逝者：沙龙谢幕

经济

262 商业：宝马如何快些跑
264 商业：曲面屏幕能否成为 UHD TV 竞赛杀手锏
266 商业：国航春运：无人陪伴儿童的温馨之旅
269 商业：健康家电与美的净水攻略

文化

274 话题：《自由引导人民》不再走出卢浮宫？
278 音乐：另一种钢琴少年，另一种声音
282 吃喝玩乐：波尔多葡园中的枪炮玫瑰
290 时尚：陨石面手表的归宿
300 思想：弗洛姆的生活艺术
302 书与人：《我们是姐妹》：来自德国下莱茵区的家族小说

专栏

28 邢海洋：采棉工的未来
296 袁越：转基因鱼油
298 张斌：金牌的代价
299 宋晓军：空军对你撒了谎

2 环球要刊速览
12 读者来信
14 观察
16 天下
30 理财与消费
32 好消息・坏消息
33 声音
34 生活圆桌
38 好东西
294 健康
304 个人问题

hada valley
哈达谷®

喜马拉雅，
这里，是地的极限，天的开始。

——

这里，正是
传说中的喜马拉雅森林蜂蜜哈达谷的诞生地。

苍穹之下，仅限于唯一的蜜蜂蜂种——喜马拉雅蜜蜂酿制，
极少量出产于喜马拉雅东南麓，
世界珍稀高原森林蜂蜜。和您相遇的几率，还不到七十万分之一，
自然珍贵非凡。



2014年——春，首发哈达谷年度尊享卡，仅限8000张。

每月定期寄送一罐新鲜森林蜂蜜到您的府上，供您和家人能够享用这大自然绝妙和珍贵的能量。

尊享卡A：12罐520克特级森林甜蜜，2罐特级高原苦蜜,按月分十二次寄送。￥16,800.00

尊享卡B：12罐520克特级高原苦蜜，2罐特级森林甜蜜,按月分十二次寄送。￥22,800.00

另有精美礼品赠送，凭卡号购买其他哈达谷产品即可获尊享折扣。

PS. 苦味蜜是某些特定高原区域的出产，因当地植被中含有高原药用植物，故有苦味口感。苦味蜜口感独特，清咽利嗓，更加稀有。

欢迎垂询品鉴 尊享热线：400-609-6900 更多资讯，请登录官网：www.hadavalley.com

哈达谷注册商标，及哈达谷年度尊享卡细则解释权，归属迪庆哈达谷蜂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扫瞄二维码，轻松从手机平台获取哈达谷资讯。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樊希安 Fan Xi'an
副总编辑 Associate Publisher
潘振平 Pan Zhenping
主编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舒可文 Shu Kewen　苗炜 Miao Wei　李菁 Li Jing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阎琦 Yan Qi　李伟 Li Wei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吴琪 Wu Qi　袁越 Yuan Yue

主笔 Editor
尚进 Shang Jin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曾焱 Zeng Yan　王鸿谅 Wang Hongliang
王恺 Wang Kai　陈晓 Chen Xiao　朱步冲 Zhu Buchong
王星 Wang Xing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i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魏一平 Wei Yip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黄燕 Huang Yan
李晶晶 Li Jingjing　蒲实 Pu Shi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庄山 Zhuang Shan　曹玲 Cao Ling　杨璐 Yang Lu
何潇 He Xiao　徐菁菁 Xu Jingjing　黑麦 Hei Mai
陆晶靖 Lu Jingjing

记者 Reporter
李东然 Li Dongran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贾子建 Jia Zijian
王珑锟 Wang Longkun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邹珊 Zou Shan　杨聃 Yang Dan
朱鱼 Zhu Yu　张若凡 Zhang Ruofan　王玄 Wang Xuan
阿润 A Ru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设计总监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雷雯 Lei Wen　黄罡 Huang G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n Liu　陈哲 Chen Zhe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新媒体发展中心 New Media Development Center

总监 Director
孙艳娜 Anna Sun
副总监 Vice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产品部 Products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桂礼白 Gui Libai　袁媛 Yuan Yuan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罗启宏 Amy luo
内容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康晰 Kang Xi　王晶 Wang Jing　孙铭楷 Sun Mingkai
薛芃 Xue Peng　王文哲 Wang Wenzhe
广告部 Commercial Department
张维 Zhang Wei　史超 Shi Chao　孟佳 Meng Jia
技术部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韩雅丽 Han Yal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010)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上海办事处地址：
上海市愚园路 1280 弄 57 号 1 楼　邮编：200050
电话 / 传真：（021）62990559

广州办事处地址：
广州市海联路 6-8 号银珠商务中心 405 室　邮编：510230
电话 / 传真：（020）34283562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24.00 $12.00 港币 32.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雪花
清華大學
Tsinghua University
雪花纯生
匠心营造
雪花啤酒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
2014光影园林
雪花 古建筑
雪花啤酒
MONS
纯生
DRAFT BEER
500ml
大赛主办：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大赛特约合作机构：中国摄影家协会
活动时间：2014年1月5日–6月30日　活动网站：www.archfans.com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发行服务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发行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华南发行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South China
雍江 Yong Jiang
上海发行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Shanghai
罗洪旗 Luo Hongqi
北京发行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Beijing
林琳 Lin Lin
华中区发行经理 Manager of Central China
乔继斌 Qiao Jibin
北方区发行经理 Manager of Northern china
杨雪梅 Yang Xuemei
西南区发行经理 Manager of Southwest China
殷佳婷 Yin Jiating
营销经理 Marketing Manager
肖丽媛 Xiao Liyuan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付新林 Fu Xinlin
李卫红 Li Weihong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潘姮 Pan Heng
发行物流 Logistics
周旭 Zhou Xu
读者服务部 Reader Services
朱静 Zhu Jing
金宇迪 Jin Yudi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或到当地邮局办理
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

上　　海 : 上海办事处（021）62990559
成　　都 : 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 : 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 : 江苏风凰台文化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 : 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 : 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9810
武　　汉 : 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 : 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2100585
昆　　明 : 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 : 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347099
哈 尔 滨 : 志诚远大书刊公司（0451）88341879
青　　岛 : 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 : 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903395
长　　春 : 中外书刊音像经销有限公司（0431）82708592
大　　连 : 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 : 沧海书店（0791）8592810
太　　原 : 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 : 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 :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 : 大河书报刊销售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 : 天津天智书店（022）23683854
河　　北 : 石家庄远大书店（0311）83017749
安　　徽 : 合肥皖新书店（0551）4252409
新　　疆 : 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0991）5582981
内 蒙 古 : 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拍摄二维码直接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手机报订阅 :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SL 到 10655111，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 新浪微博 weibo.com 鳳凰網 ifeng.com 腾讯网 QQ.com YOUKU 优酷
新浪网官方微博 : 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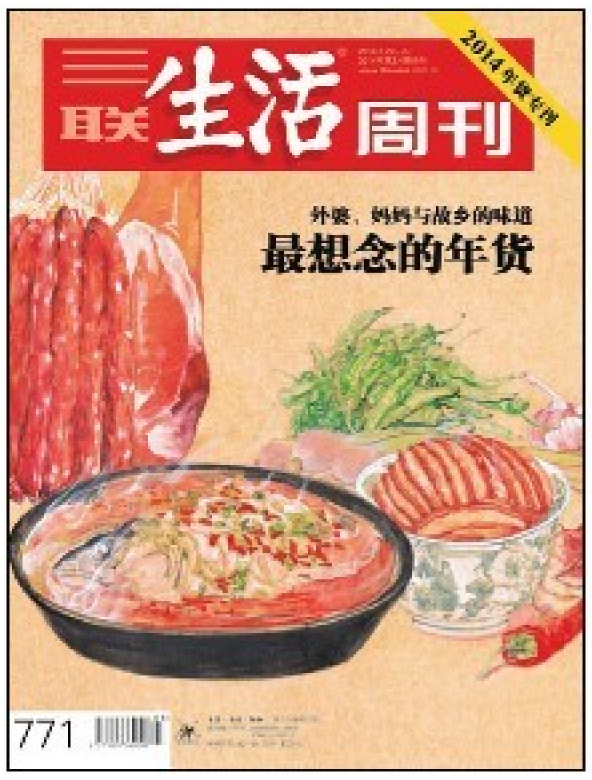
本期广告目录

封面拉页 · 梅赛德斯 – 奔驰
封二 ~ 扉 1 · 嘉英轩
3 · 合益和
5 · 大韩航空
7 · 哈达谷蜂蜜
9 · 雪花啤酒
11 · 百度地图
25 · 三井珠宝
27 · 暇步士
29 · 嘉德拍卖
112~113 · 宝马
139 · 石溪墅
141 · 石溪墅
143 · 石溪墅
151 · 航天传媒
111 · 宝马
145 · 比音勒芬
153 · 联想扬天
163 · 泸州老窖
231 · 周刊征订
281 · 三联新媒体
297 · 书店广告
封三 · 德龙咖啡机
封底 · 朗格

唯思堂

广告总代理 Adcraft
北京唯思堂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电话 :（010）65280118
传真 :（010）65272098
上海电话 :（021）32013813
传真 :（021）32013813
广州电话 :（020）38768563
传真 :（020）38769520-604
深圳电话 :（0755）86129132
传真 :（0755）26478827
杭州电话 :（0571）86070421
传真 :（0571）86070479
成都电话 :（028）85056991
传真 :（028）85054991
南京电话 :（025）84705110
传真 :（025）84715010
烟台电话 :（0535）2602308
传真 :（0535）2602308
西安电话 :（029）85232132
传真 :（029）85232123


春节聚会，见一面不容易啊
千万别迟到！
下载百度地图查路线，快人一步！
路上少花一秒，欢聚就多一秒
著名演员：黄海波
Baidu地图
精彩一步到位
扫瞄下载



No.771 最想念的年货

如同往年，还是在回家的飞机上，2014 年夜饭专刊一路相伴。先圈下几样跃跃欲试的菜品，让团聚多一点新鲜。特别注意到由寻找美食延伸的一个思考，很能体现贵刊的人文关怀特色，即：在我们享受动物美食时，如何关怀那些牺牲。记者们躲不开屠宰场面，其态度也在文字中留下蛛丝马迹，有些颇让人回味。即便餐桌上还离不开肉食，但贵刊提醒众人，至少可以心存感恩，并让它们少受痛苦。

贵州 毛晓风

对生命的尊重

哥嫂去外地办事，小侄待在我家里。半夜零点，哥打电话说他们回来了，让我送小侄回去。我拉着小侄走到马路边，要过一个人行道。此时红灯，我们等在那里。夜是如此的静，马路两端很远望去，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人，只有那闪耀的红灯告诉我这个黑夜还有忙碌。小侄突然摇了摇我的手，对我说："老叔，这么晚了，人也没有，车也没有，我们还用等吗？"小侄的话突然把我难住了。是的，此刻马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我们去遵守交通规则真是显得有些死板，等在这里也像是这个寒夜里的呆傻。但思考片刻后，我却蹲下身子，坚定地对小侄说："孩子，我们要在这里等。""为什么？"小侄有些不解。"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小侄不一定能听懂我的话，但他却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一直到绿灯亮起，我们才走到马路的那一边。我相信我对小侄的教育是对的。我们跨过这条红线，或许命运不会捉弄我们，但在我们生命的长河里不能保准没有意外发生。所以，我想告诉他，对规则的尊重，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昨天父亲打电话过来，让给一个人捐款治病。我以为是哪位亲友病了，可父亲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我却有些愕然。一来，我家与他没有一点亲戚关系，二来他可是我们村里有名的大老板，家里有一个造纸厂。可父亲一说经过，我当即决定捐款。父亲说他家以前开造纸厂，给村里办了许多好事，盖小学、帮五保户盖房……前年，他的造纸厂因为环保不合格被关停。后来，有几位村民得了病，据说是和他们在造纸厂上班有关。他得知消息后立即奔卫生局，虽然卫生局和环保局都没有给出结论，可他认准了这几个人的病都和他的厂子有关，他拿出积蓄让所有工人都去体检，得了病的他全额付医药费，最后把自己的家底全赔光了。前些天，他病得很重，可他却没有了给自己治病的钱，他毅然离开了医院说不再浪费钱。村里人知道这件事后，家家出手相助，不为别的，大家认准他是个好人，好人应得到好报。突然感到，这也是我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我对良心的尊重，良心就是活着的生命。

兰州 程刚

危房重建

姑夫最近挺头疼，这些年好不容易存了点钱，想把自家房子重新翻建一下，却被行政审批卡住了。房子已建成数十年，二层带小院，坐落于县城边上，姑夫爹娘所建，如今娘在爹已去。"文革"前县政府就颁发了房产证、土地证，虽已泛黄，印章却还是红的。当年家里条件所限，钢筋水泥用得少，至今外墙风化、硝化严重，出现一些中小空洞，加上近几年屋旁修公路、挖地基，导致出现不少裂缝，有的还是贯穿性的，靠公路侧的房基也出现沉陷。拉扯孩子长大后，原地重建此房，就成为姑父此生最大理想，但他也听说，近几年县里为了多卖地、多搞开发，县城附近好像不让建私房了。

在子女的帮助下，姑父感觉钱基本凑够了，兴冲冲地去找住建局批手续，楼里工作人员虽多，却都不收建房申请，碰了几次壁，不断询问，才有人告诉姑父在县行政服务中心有住建局窗口，得交到那里。辛辛苦苦觅到那中心那窗口，忙着玩电脑的女办事员把姑父重建申请随手放在一边，说只负责收材料，还得哪天送回局里让领导审批，让姑父回家等消息。可是，好久等不来消息，去窗口再三追问，女办事员开始说要再等等，不愿多解释，后来被问得不耐烦了，才说姑父房子属县城新区规划范围，该区域三年内暂停审批新建住宅，只有 D 级危房才允

许原地原样重建。

何为D级危房？姑父四处打听，了解到根据建设部颁布的《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和《危险房屋鉴定标准》，危房指："结构已严重损坏或承重构件已属危险构件，随时可能丧失稳定和承载能力，不能保证居住和使用安全的房屋。"危房鉴定等级分A、B、C、D四个等级（危险性依次增强），其中，D级危房一般是指"整幢危险且无修缮价值，需立即拆除的房屋"。自己的房子不就是危房吗？交纳不菲鉴定费后，县房管局下设的房屋鉴定所来了两个鉴定员，经过实地勘验、测量、拍照等环节，姑父拿到了鉴定报告，结论里清楚写着"D级危房，建议原地拆除重建"，姑父松了口气，现在都强调安全，专家确定为D级危房了，重建曙光似乎就在眼前。附上鉴定结论，递交了新申请，虽然建设部《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中明令"房屋所有人进行抢险解危需要办理各项手续时，各有关部门应给予支持，及时办理，以免延误时间发生事故"，但数月过去仍得不到任何回音，却看见好几处私宅都在重建，他们如何通过审批？私下打听，姑父知道了大都是有门道或有关系之人。

后来姑父悟出道来，啥手续也不办了，找了施工队开始小规模施工。没两天城管的人就来了，还说要开罚单。姑父按要求停了工，却把腿残的80多岁老母亲用躺椅抬到了住建局的大门附近，一手拿着危房鉴定结论，一手拿着老房产证，不堵路不闹事，只是逢人就说危房不敢住，来申请住房——老人家想着老有所为，不知道多有激情。没几天，姑父就得到口头通知：手续不给办，房子可先原样复建。

湖北宜昌 聂武钢

难办的身份证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近日与民警座谈时指出："一些群众感到办户口办身份证难，合理合法的事也要找人……"要求办事人员"该给老百姓办的事，要顺顺当当、利利索索地办"。并强调："凡是刁难群众的经查实一律停止执行职务。"看过相关报道，我想起了去年遇到的一件事。

一年一度的高中学生国助金评完了，我也松了一口气。一个班可以有15个学生获得资助，评给谁也是件颇为难的事，好在最终获得资助的学生确定后，学生也没有太大的意见。评定之后，学生便带上申请表格到各自所在的乡镇去盖章、要证明材料。每个学生还要新办一个学生资助专用的银行卡，银行新开户必须要身份证。其中一个学生父亲病故，家庭比较困难，评完后，这个学生就跟我说她的身份证正在办理中，可能要过两天才拿得到。

到星期天上晚自习时，我去教室收取学生的表格和证明，这个学生的身份证还没有拿来。经了解，她的身份证早已办好，但还在县公安局。学生家长到乡派出所问，派出所的人说他们没有时间去拿，家长只好自己去县公安局拿，公安局的人回答她，身份证只有乡派出所的人才能拿。因为急着用，家长要求在县公安局先办一个临时身份证。可是人家告诉他，已办了正式身份证，就不能再办临时身份证。家长只好又回到乡派出所，想在那里办一个临时身份证，可是派出所的人又说没有空白的临时身份证了。就这样，转来转去，身份证的事依然没有着落，学生显得很沮丧。

知道这个情况后，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学生家长，让她星期一再去一趟乡派出所，若派出所的人还是不肯去拿，就请派出所出个证明，自己拿着这个证明去县公安局拿。或者想办法去邻近乡镇派出所要个空白临时身份证，再回到她所在乡派出所办一个临时身份证。星期一下午，学生家长打来电话，说乡派出所的人现在不去拿，也不给她出具证明。由于没有熟人，也没有办法弄到空白临时身份证。没有办法拿到身份证，家长说只有不要国助金了，语气里透出无奈。

星期二就是交身份证的最后期限，我也是无可奈何，想起有一个熟人的兄弟就在那个乡派出所工作，就和这个熟人联系了一下，可是不巧，他的兄弟已调走了。由于关系也不算近，就不好多说什么，心里感到很郁闷。中午回到家里，和妻子谈起这件事情。妻子听了后也愤愤不平，说这个学生太可怜了，好容易有这个机会，1500元的国助金可以够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了。过了一会儿，妻子像突然想起什么，说她们单位原来一个同事好像调到公安局去了。妻子便打了个电话，果然和那位曾经的同事联系上了，说了情况后，那人愿意帮忙，让学生下午去公安局找他。果然，下午16点，那个学生就从县公安局拿来了她的身份证。看到学生满心欢喜的样子，我心里也轻松了不少。

放学回到家里，本地电视台正在播放新闻，说我市政府机关不断改进工作作风，为民办实事，还特别报道了市公安局的机关干部为方便群众办事，中午都不休息……可是，这个乡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怎么就不能给群众多提供点方便呢？

贵州盘县 何森

本期截稿时间：1月20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基地”建国：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

记者 邹珊

中 东



伊拉克重镇费卢杰的逊尼派反政府武装人员正在加紧完成对该地区的控制

1月4日，“基地”组织在伊拉克重镇费卢杰宣布建立“伊斯兰酋长国”（ISIS）。数月来，该组织正在稳步收紧对费卢杰所在的安巴尔省的控制，目的是建立一个横跨伊拉克、叙利亚边境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该省首府拉马迪受此影响也发生激战。

目标为何锁定安巴尔？因为这是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省份。萨达姆倒台后，因感到被以什叶派为主的马利基政府排除在了权力之外，逊尼派十分不满。同时，由于与叙利亚、约旦和沙特接壤，当地不仅聚集了大量与“基地”组织相关的恐怖分子，还成为他们深入伊拉克腹地的通道。过去的一年里，逊尼派民众与政府争端不休，“基地”组织便利用这种情绪在这里建立了分支组织。去年的12月30日，在伊政府拆除拉马迪附近的逊尼派反政府抗议营地后，他们大举入驻安巴尔，趁势扩大影响。

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布特（Max Boot）看来，马利基应对此承担重要责任，他说：“马利基对付逊尼派穆斯林的做法十分短视，他对‘安巴尔觉醒运动’（自发对抗‘基地’的当地民间组织）置之不理，也增加了乱局形成的可能性。”

第二次伊战期间，安巴尔曾是美军的重要战场。2006年，美军曾说服甚至收买当地的逊尼部落去对付其派别内的强硬分子，结果非常成功。但逊尼派的命运却从此急转直下。2011年，随着美军撤离，伊拉克教派矛盾立刻凸显：逊尼派官员被逮捕，时任副总统的逊尼派领导人哈希米因此流亡海外。可美国却没有设法阻止事态恶化，反而开始向新政府提供军事援助。“2011年后，奥巴马并未下工夫保持在伊驻军，也就无法左右伊拉克的局面。尤其是美国驻巴格达大使希尔，他对伊拉克的政治变化持袖手旁观的态度。”布特说。

加拿大全球研究中心的纳赞罗亚（Mahdi Nazemroaya）告诉本刊：“眼下，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那些占领费卢杰的民兵在叙利亚境内也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武器和经济援助。其力量的壮大，其实离不开美方的支持与纵容，但伊拉克的安保和军事能力却在上一场伊战中已经被美国破坏了。”这恰如《波士顿环球报》的评论：“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出现了，在这里，没有任何一方有权力或者有意愿来遏制该地区的宗派仇恨。”

“封锁曼谷”：冲突调解机制何时建立

记者 邹珊

1月13日，由泰国反政府组织领导的“封锁曼谷”行动正式拉开序幕。反对派瞄准了该市主要交通枢纽以及国家通信、卫星和广播总部，试图以阻断交通和掐断通信的方式致使政府瘫痪、阻止选举，最终实现让总理英拉下台的目的。

据泰国商会大学预测，若“封城”再持续两周，泰国经济将因此遭受约400亿泰铢（约合12亿美元）的直接损失，约为泰国GDP的0.2%。泰铢持续贬值，创下2010年以来的新低。但反对派领袖素贴却丝毫没有收手之意。他宣称，就算英拉辞职或解散下议院也不会善罢甘休，并发誓要根除“他信体制”。泰国舆论对其态度充满狐疑。泰国《民族报》和《曼谷邮报》认为素贴“毫无章法”，不知他究竟要怎样才会满意。“素贴非常强硬。他有‘保皇派’撑腰，一直寄希望于法庭和军队都支持他。我认为他不会接受2月大选。”泰国清迈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钱伯斯（Paul Chambers）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示威者越发暴力且具进攻性的手段体现了他们的强硬本质，这并非好兆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库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分析说。“示威的目标在于破坏民主进程。反对派旨在创造一个牺牲大多数人来保护少数人利益的政治系统。两个党派极端对立，这预示着更多的政治暴行即将出现，并有可能酝酿为下一场政变的理由。但政变并不能弥合社会的基本分裂或解决政治危机。2006年就是如此，这次能有什么不同？”美国西蒙斯学院东南亚政治学教授阿布扎（Zachary Abuza）这样对本刊说。其实，许多国家在民主转型期间都有过相似经历。那么，为何泰国的政治冲突会频频发生，且军事政变也多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

“泰国虽为君主立宪制，但运作方式却名不副实，君主的权限定义并不清晰。”库兰齐克告诉本刊，泰国政治矛盾的干预向来是由一两个顶级政治人物所操控的。这意味着，该国在政治运作中缺少一种有力的“冲突调解机制”。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建立起可靠的司法系统以及用于监督选举、解决潜在选举舞弊的信任体制，使这套稳定且理性的系统成为国家政治的依托。“不过，日前军方拒绝了素贴要求与其合力向英拉政府施压的请求，这是个积极的信号。”库兰齐克说。

泰国



1月19日，泰国反政府示威者在首都曼谷发动的“封城”行动进入第七天，当天集会现场接连发生两起爆炸，导致至少28人受伤。图为泰国反政府集会领导人素贴（右）在示威游行现场





美国｜**山火袭城**

1月16日，距离洛杉矶市中心东北部约30英里的格伦多拉市发生森林大火。由于当地空气十分干燥，风势较大，火势很快就蔓延开来，覆盖范围达6.5平方公里，当地近2000名民众已被迫撤离，格伦多拉市警方还将挨家挨户地上门联系居民，让该地区5万多名居民尽早离开。



美国 | **冰封天坑**

（左页图）美国阿拉巴马，摄影师艾米·辛克尔进入了“永不沉没”洞穴的底部。该洞穴常年有瀑布在倾泻而下，但由于今年美国受暴风雪侵袭，“永不沉没”洞穴的温度达零下 15 摄氏度，它有史以来首次结冰，洞内出现了冰笋、冰柱和流冰。





巴西 | **暴雨**

1 月 16 日，巴西里约科帕卡瓦纳海滩，渔民们在电闪雷鸣中抢收他们捕到的鱼。根据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发布的数字，暴雨期间共发生超过 4 万次雷电。暴雨还造成地铁线路关闭、城市断电。

澳大利亚 | **战高温**

1 月 15 日晨，阿德莱德的警察将马带入海水中洗澡。近日阿德莱德遭遇热浪侵袭，连续 5 天气温超过 40 摄氏度。





印度 | **桑格拉提节**

1 月 14 日早晨，亚穆纳河，几个孩子坐在船上，候鸟从他们身边飞过。当天是印度传统的桑格拉提节。“桑格拉提”意为“太阳的热力”，印度人认为太阳的热力会令人类愤怒，所以他们在这一天要吃以棕榈树汁提炼的粗糖，使自己的声音变得甜美。



印度 | **驯牛节**

1 月 16 日，印度马杜赖市举行驯牛节。驯牛节是为期 4 天的丰收节的一部分，在丰收节的第三天，人们会举行敬牛仪式，给牛洗澡、染牛角、牵牛游行、驯牛等。



孟加拉 | **砖窑工人**

1 月 12 日，孟加拉国萨瓦尔，一家砖窑释放的大量有毒物质正在严重损害工人和附近居民呼吸系统和皮肤的健康。

南非 | **温柔的猎豹**

（右页上图）德国摄影师克里斯在兹胡库动物保护区工作时，一头猎豹走到他身边。它耳朵竖立着，这表明它在寻找一些猎物当午餐，但好在它没打算把克里斯当作午餐，还爱抚着克里斯的脸颊。

美国 | **峭壁上的帐篷**

（右页下图）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托米·考德威尔和他妻子贝卡都是职业自由登山家，他们敢在美国加州约塞米特蒂国家公园近千米高的崖壁搭帐篷休息。









美国 | **星光阿凡达**

美国科学家对花烟草盆栽植物进行了基因改良。他们将海洋发光细菌 DNA 引入花烟草叶绿体中，培育出了能够在不借助任何涂料或是紫外线照射的情况下自然、主动地持续发光的“星光阿凡达”。

以色列 | **空袭加沙**

1 月 16 日，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查看以色列空袭后的废墟。以色列空军说，当天一个叫萨阿德的极端分子向阿什克伦城发射了 5 枚火箭弹，火箭弹被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随后以色列向加沙发动了空中打击。


北海道海水养殖珍珠
大溪地群岛南洋珍珠
【银色贵族】系列套装
市场价 ¥8590元
三井套装亲情价 ¥1298元
戒指：10mm
吊坠：14mm
耳环：10mm
【金色贵族】系列套装
市场价 ¥8590元
三井套装亲情价 ¥1298元
戒指：10mm
吊坠：14mm
耳环：10mm
【炫彩】系列套装
市场价 ¥9590元
三井套装亲情价 ¥1298元
手链：8mm
项链：10mm
项链：10mm
【红运当头】珊瑚系列套装
市场价 ¥11590元
三井套装亲情价 ¥1598元
耳环：10mm
吊坠：14mm
戒指：10mm
免费贵宾专线
400-706-0272 13552038592
全国所有城市免费送货上门 更多款式登陆三井官网 www.suimit.com.cn
SUIMIT
三井珠宝
不仅仅奉献珍珠





俄罗斯 | **动物朋友**

32 岁的俄罗斯女子埃琳娜·舒米洛娃学的是建筑，毕业后一直在练习绘画，2012 年起开始用专业相机拍摄她的儿子与动物亲密相处的场景。“孩子和动物就是我的生活。我跟两个儿子大部分时间住在农场，所以我经常拍摄孩子们跟狗、兔子、鸭子一起玩耍的照片。我喜欢用自然光，它们能赋予图片视觉和情感深度。”

印尼 | **爬槟榔树**

1 月 14 日，孩子们参加爬槟榔树比赛。比赛用的槟榔树一般高约 5 米，被刨去树皮、涂上一层厚厚的棕榈油，树干的终点挂有衣服、钱等奖品。



Let's Get Together

关注天达华联暇步士新浪官方微博

关注暇步士服装官方微信

采棉工的未来

文／邢海洋

中央电视台的科技频道有一个“我爱发明”的节目，经常介绍发明家制作的机械。这些机器五花八门，有给枣子去核的、有采藕的，还有毛栗子剥壳的。节目的高潮是机器与人工的竞赛，往往十几个熟练工人也比不上机器干得快。直到一期录自新疆的自走式采棉花机的节目，突然让人担忧，那些千里迢迢的河南采棉工，他们会不会就此失业。他们下一个工作机会在哪里？

每年都会有50万左右的外省采棉工人到新疆打短工，形成了一道季节性农民工流动潮。这些采棉工基本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文化，也难胜任重体力活计，是最难在社会分工中找到位置的。每个收获季，除了来往路费，他们能挣到六七千元的收入，和在家乡务农的收入不相上下了，新疆建设兵团一年兑现的拾花报酬就高达上百亿元。刚刚过去的2013年采棉季，又有56万采棉工陆续进疆，可收入却不理想。这既有棉花减产的因素，也有采棉机对人工的竞争。电视节目里自走式采棉机5天的工作量顶得上120位摘棉工干上3个月，为农场主省下15万到20万元的费用。而在新疆的棉农间，机械种植的魅力快速传播，似正处于全面推广的前夜。过去，动辄上百万元的采棉机械和严格的种植管理、化控落叶技术等使机械化种植仅限于大农场，小型机械的出现只是近一两年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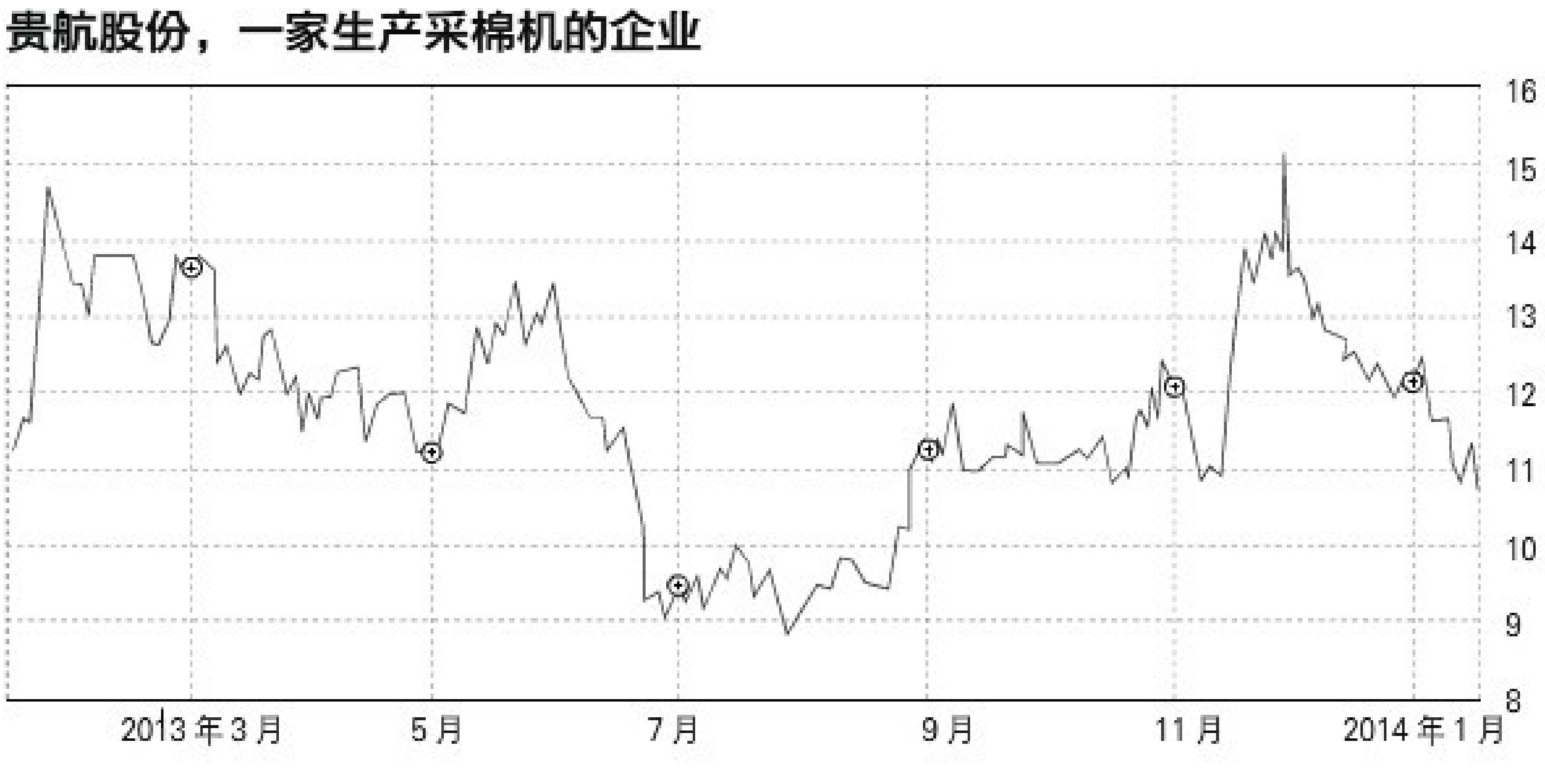
但对棉农，却完全是另一种说法。棉花种植的人工费近年来持续高涨，已到了他们雇不起的程度。如今棉花生产的人工费用已经达到1000元／亩上下，2011年开始人工成本超过了物化成本，而人工成本的一大块又是被人工采摘费用占去的。这个说法得到专家的证实：在长江、黄河流域棉区，人工采棉费用为400～500元／亩；在以新疆为主的西北内陆棉区，这笔费用竟已高达660～1300元／亩。中东部地区，高企的人工费用迫使农民转产，棉花的播种面积连年下降，西北以新疆建设兵团为主的大单位则开始机械化采收。

机械化采棉并非我国先例，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人便发明了挂在拖拉机后面的采棉装置，但直到1953年一种双排式采棉机诞生，美国的棉田里才开始全面实现机械化。凯鲁亚克在他那本“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在路上》里还找到了一份摘棉花的工作，尽管嬉皮士把这段经历看得颇浪漫，但实际上其单调艰苦难以忍受。《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的作者瑞沃莉采访了很多摘过棉花的美国人，典型的回答是“任何人都不应该那样工作或过那样的生活”。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以今天的角度访问四五十年前的年轻人，肯定和当时被迫失业的低端就业者的感受有所区别。好在当时的美国经济起飞，福利制度正处于完善中，就业机会充盈。之后的很长时间，机械采棉美国独有，就因为那里人工贵。

是昂贵的人工迫使机器介入还是技术发明改变了就业，综合美国和中国的棉花采摘，似乎已有答案。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机械装置的发明，人是不会被从各种繁重的体力劳作中解放出来，归根结底，还是技术进步改变了职业状态。工业革命后的200年间，很多职业消失，又有多种职业创造出来，人类从蓝领向白领，从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迁徙。采棉机只是林林总总技术改变就业的一种。对人类整体，采棉工短期失业痛苦却是好事。

可比采棉机严峻的现实却是，人类如今面临的已经不只是取代手工的机器，而是如自动驾驶车一般和人一样思考的机器。

贵航股份，一家生产采棉机的企业



中国嘉德
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CHINA GUARDIAN AUCTIONS CO.,LTD.

選中之選 器美神完

嘉木堂呈献明式家具精品　纪念王世襄先生诞辰百年

主办：今日美术馆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日期：2014.3.13–4.11（周一至周日 10:00–17:00）
地点：今日美术馆 1 号馆 3 层（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 32 号苹果社区 4 号楼）



黄花梨大方角柜成对　明或清前期
105.2 × 52.5 × 175 cm

ipad 客户端　　微信公共平台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18 号恒基中心二座 603 室　010–6518 2315　mail@cguardian.com　www.cguardian.com



阳光私募不敌公募

2013年阳光私募的业绩分化严重，从一年期实现净收益84%到亏损32%，差距117个百分点。整体而言，私募基金全年跑赢大盘近17个百分点，平均回报率13.63%。同期，非指数型的股票公募基金的平均回报率是19.62%，另外，公募基金排名前五的基金的成绩，也要好于私募。公募基金有严格的仓位控制、风险管理措施和强大的研发团队，或从整体上比私募的明星经理更有优势。

栏目插图 | **豆角上台艺术工作室**



人民币升值1.7%

尽管面临美联储缩减QE的不利因素，2014年人民币兑美元仍将缓升1.7%，但低于2013年2.9%的幅度。26位分析师接受了路透社的调查，他们认为人民币兑美元近期料在6.05元附近维稳盘整，3个月之后重拾升值之旅，6个月后升值至6.0元，一年后汇率升至5.95元。2014年中国外贸顺差性失衡压力续弱化、美联储QE逐月缩量，人民币难以继续显著升值。可鉴于中国经济企稳、出口恢复，中美之间巨大贸易不平衡，人民币对美元仍将继续保持小幅升值。





信贷危机?

多种追踪中国股市的 ETF 年初大幅下跌，围绕中国的担忧持续升温。中国似乎正在整顿国内影子银行，利率持续高企，信贷危机一触即发。

但PowerShares人民币点心债券ETF与iShares 7～10年期美国国债ETF的对比却显示，人民币计价债券与美国国债的比率触及相对高位，表现非常强劲。海外投资者虽不认可中国股票，却对政府和企业发行的债券情有独钟，这与中国危机说形成了鲜明对比。

国家级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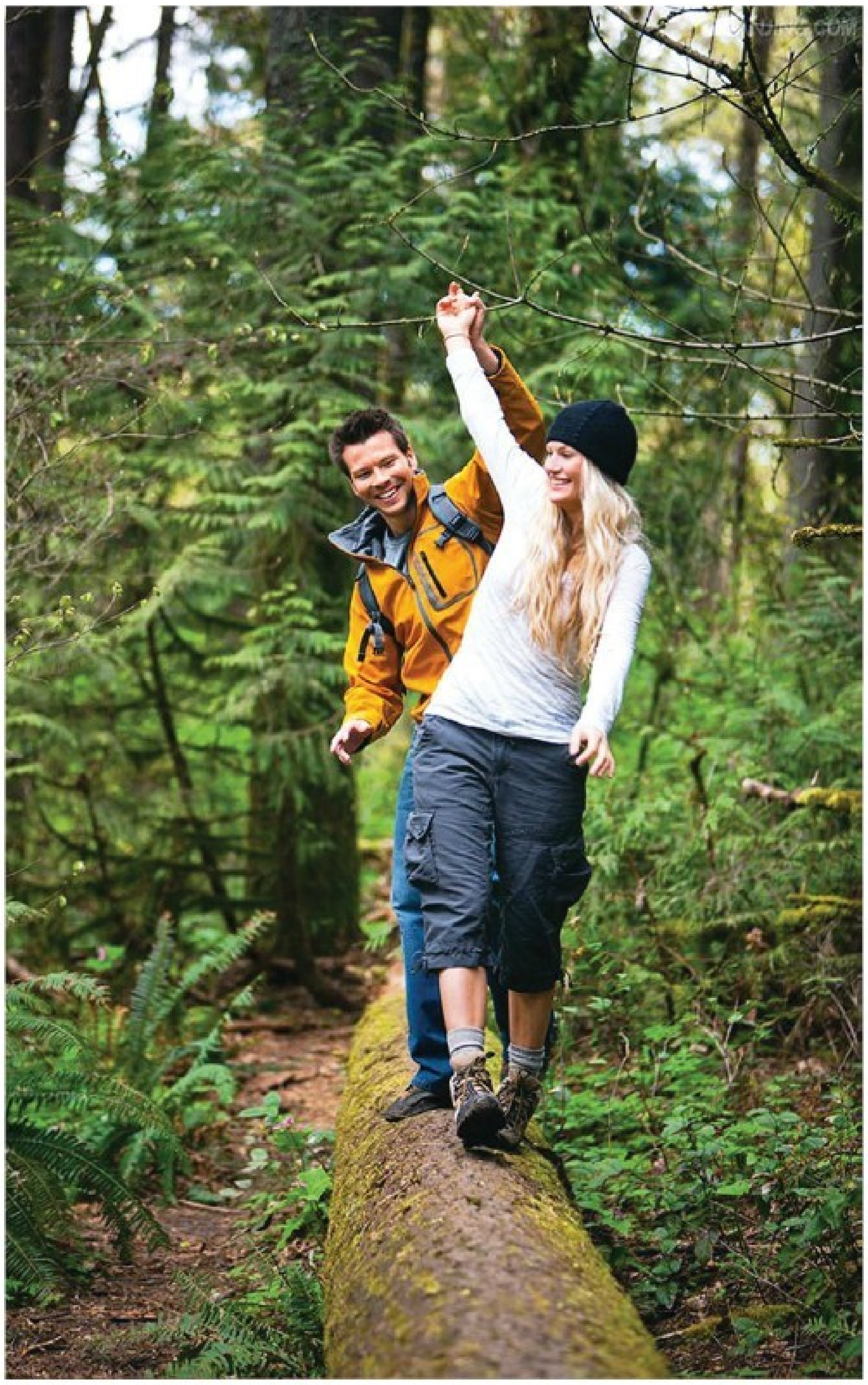
“40K 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研究”获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该奖项 13 年里有 9 次空缺。超导市场的潜在规模达到 2000 亿元，其中核心的超导材料占比 30% ～ 40%。国内的超导材料主要由美日进口，成本高昂。一旦国内走在技术前沿，超导概念有望持续发酵。

A 股市场上，超导概念股包括：永鼎股份、中孚实业、福日电子、百利电气、中天科技、宝胜股份、综艺股份、汉缆股份等。



IPO 首叫停

1 月 10 日，因涉及老股东 31.83 亿元巨额套现，奥赛康药业 IPO 被证监会史无前例地叫停。随后证监会发布三项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创业板新股汇金股份、东方网力、绿盟科技、恒华科技及中小板的慈铭体检也宣布暂缓新股发行或推迟刊登发行公告。暂缓发行有 IPO 发行节奏面临调整的原因，也说明停摆逾一年的 IPO 市重启即遭遇新问题，据测算，套现 31.83 亿元，相当于企业总资产的近 3 倍，如此 IPO 激励，上市后谁还有动力继续奋斗？



38 岁云游四方

一项针对 2000 人的最新调查显示，38 岁被认为是外出休闲度假或从事志愿者工作的最佳年龄。研究指出，人们在将近不惑之年时的职业和经济状况都已相对稳定，不会因为长期休假而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这个年纪的人对到底想要去哪里旅行也有更清晰的想法，从而更能保证自己和家人享受高质量的假日时光。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近半数表示，到 38 岁的时候，他们才拥有足够多的钱将假期的收益最大化。

好消息



24 小时法则

在有孩子的家庭中，妈妈每周工作两三天家庭的幸福感最高。这是澳大利亚家庭研究所对 3.5 万多个家庭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每周 24 小时的工作可保证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超过 35 小时后，负面作用便会超出收益。



海底七彩秀

海底世界远比此前想象得更七彩炫丽。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超过 180 种鱼类可以吸收光线并将其转化为只有在黄色滤镜下才能呈现的生物荧光，从而令不同的鱼群从很远处便能辨识彼此。

坏消息



长命大白鲨

对一头大白鲨的骨骼进行放射性元素定年检测后，美国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的研究小组发现，这种海中猎食者雄性的寿命可长达 73 年，而非以往认为的 30 年。雌性大白鲨寿命较短，但也能活到 40 岁以上。



无用的皱褶

灵长类动物的手指浸泡后会起皱，此前研究指出，这有助于在潮湿环境中抓握物体。然而，一个德国研究小组最新试验显示，泡皱的手与干燥光滑的手在灵敏性上毫无差别，该现象可能只是进化中的偶然。



（路丰山 图辑）



我在韩国的时候，接受过一些访问，他们问我，韩朝的局势如何？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怎么知道？

——齐泽克说

在这冷漠的世界上，无法躲避的邪恶始终包围着我们，从摇篮直到坟墓，对此，善虽然算不上是一种挑战或者一种回应，但却是我们自身独立性的一种证明。它是幽默感对命运悲剧性和荒诞性所做的反驳。

——毛姆

在这个关于人的故事里，主角永远是一摊钱，就像在一个关于蜜蜂的故事里，主角永远是一摊蜂蜜一样。

——冯古内特说

卖得好的都是有卖点的——娱乐性、低劣、浮华，还有各种各样挂在钓钩上的饵料，在全国范围内昼夜不停地对人们进行着腐蚀，让人变得愚钝、堕落、残忍。在这个勾当中表现最成功的当然是电视业，还有广播、报纸、娱乐业。像纠缠在一起的蛇团，不停地分泌毒液。

——引自《拉斯普京访谈录》

喜剧演员比普通人具有“更显著的精神病人格特征”。类似于躁郁症患者的那种“不寻常的人格结构”很可能是搞笑滑稽的根源所在。

——《英国精神病学杂志》一篇研究文章说



出来找乐子的男人，碰上用情太深的女人，犹如钓鱼钓到白鲸。

——英国作家伍尔夫说

数字

10 欧分

自新年始，法国多家报纸涨价，《巴黎人报》从1.05欧元上涨到1.1欧元，《解放报》上涨10欧分，售价1.7欧元，《费加罗报》上调20欧分至1.8欧元。一位编辑透露，价格上涨10%到20%，读者的数量会减少3%到4%。

9.04 亿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成年人有1/4属于肥胖或者超重，肥胖人口数字从1908年的2.5亿增加到2008年的9.04亿，这一数字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吃不饱饭的人数（8.52亿），也超过了西方的肥胖人数（5.57亿）。英国在过去30年，肥胖率增加了近一倍，目前有64%的成年人是超重或肥胖，但印度的肥胖率只上升了两个点，目前是11%。

1.068 万亿

全球科技产品市场在2013年达到顶峰，规模为1.068万亿美元，今年可能会下降1%。全球平板电脑的销量将从2013年的2.42亿台增加到今年的3.4亿台，智能手机将从10亿部增加到12.4亿部，这种增长将依赖“入门机器”。

65 岁

按照2011年的人口统计，印度人的平均年龄为25岁，但立法代表的平均年龄比他们整整大了40岁，为65岁。被罢黜的埃及领导人穆巴拉克82岁，而埃及人的平均年龄为24岁。

布朗尼和其他

文 覃天
图 谢驭飞



当时孙阿姨的店就开在我以前高中的旁边，隐居在胡同里，紧邻繁华的长安街。有时候从这条路回家，会看见里面的人影，看上去很温馨。我努力回想着在那里吃到的第一块蛋糕的名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黑色，酥软。我和她交谈了几句，孙阿姨人很好。我看见冰箱上贴着的从不同地方寄来的明信片。“啊，那些都是朋友寄来的。”她边说边搅拌着什么，“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手写的信。”

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里，音乐在我们之间流淌。大多是令人舒适的轻音乐。从餐桌上通过玻璃门向外望去，是胡同里的阳光。后来我挑了一张好看的风景明信片寄了过去，背后被我写得满满的。既不是思念，也不是旅行吧，顶多是青春过剩的荷尔蒙，又不能和现代诗混为一谈的部分。

在课间，我开始写信，并且坚信这一切都会一直坚持下去，漂亮得就像查令十字街故事的翻版。我把在学校的不合群，喜欢的电影、音乐、书籍、戏剧都写了下来，细致到骑车时风吹过脸庞的感受。有些时候，我去那里并不是为了吃一块现在想不起来名字的蛋糕，而是为了坐下来说说话。孙阿姨的私人生活从来不在谈话内容之内，此刻没有什么能够比我们更加真诚。不可避免，青春期的男孩儿如同我对成熟的女性往往会产生那种介于崇拜和美好爱情之间的憧憬。有时坐在不大的圆形餐桌前、外面的夏日阳光也不会太耀眼的时候，我会观察孙阿姨做蛋糕的动作：把鸡蛋打碎，搅拌，烘烤，转身。我们的故事在信里继续。信纸上孙阿姨说，在闲暇的下午沐浴着窗外的阳光、听着柔软舒缓、懒洋洋的音乐看我的来信是一种享受。此情此景深深地留在我的脑中，幸福感会持续几天。现在想来手机短信都是一种怀念。我们的谈话往往在22点钟之后，我把这样的聊天视作一种慰藉、一种约定：纸上的时光永远不会过去。

终于快到了转折之年，我高三。没有信的夜晚，难以在成堆的卷子、练习间为继。我发了很长的短信，有三四条吧，很晚了，1点。刚刚发完，我按下关机。房间天花板上那手机屏幕照亮的那一点区域陷入黑暗。“以后不要再给我发短信了，这条短信也不用回了。好好学习。再见。”手机的提示灯光亮了很久。

没有再见了。我想，没有人再和我说话了。就这样结束我的高中吧。之后我走在通向孙阿姨糕点店的那条胡同里，夏天已经远去，也没有孩子们的笑声。原来的店面已经被新的商铺取代。自己很久没有写信、很久没有用过短信了。再没有见过孙阿姨了，她过得还好吗？坐在大学附近的咖啡馆想起这些。店里做活动，点咖啡送布朗尼蛋糕，我望向窗外的枯树枝，想起来这就是我第一次在孙阿姨那里吃到的怎么也想不起来的那种蛋糕。

跑步机上的错觉

文 飞车去角
图 谢驭飞



大学毕业后、准确地说是在寝室打了几年电脑游戏后，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十字路口。我家估计是怕我待业久了会愈加颓废继而转换成社会毒瘤，毅然决定送我去当兵。

当兵的两年，新兵时反复的冲刺跑、3000米跑，下连后的早晚一个武装5公里越野、每周一次的武装10公里越野，这对于一个之前天天打游戏的扁平足宅男来说简直就是噩梦。虽然自卑但从没想过要放弃的我好歹跌跌撞撞把这两年跑了下来，并获得了战友和领导评价“不孬”的至高荣誉，继而退伍。回来完成自己骑行川藏线318国道的目标后，退伍后竟然保持了跑步的习惯。但大部分跑步都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我发现跑步机上显示出来的成绩好过我在部队时的成绩，并且觉得压力不大，跑完呕吐、瘫坐之类的事情更是从未发生。

在今年夏天的一个正午，我顶着烈日开始围着一个体育馆的外围跑起来。刚两圈过后，我就开始感觉到久违的难受、疲乏。3000米过后，我选择了放弃。一看时间，比在部队和跑步机上5公里的成绩还差。而且，我当时是徒手跑。45度角仰望烈日的我不自觉地就想到了“温室里的花朵”等矫情的字眼，表情怪异狂躁地跑回了家。

回家后我开始琢磨，会不会是太久没在室外和高温下跑，不习惯了？于是又在早晨和傍晚各进行了一次室外的5000米跑。成绩远比跑步机上差。于是我召唤“度娘”，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找一个答案。就跑步机较室外是否更省力、哪个距离更精准等问题，在一篇博客里有如下段落：“这是一种从视觉过度到心理的错觉，涉及到物理学的一个道理，所谓相对运动。我们设想将跑步机的跑步带延长，延长到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直观地说，就好像你正在向飞机场的候机大厅走去，脚下是滚动的传送带。人们站在传送带上，就会按照传送带的速度前进。而跑步机的原理其实就是：逆着传送带的方向用与传送带同样的速度前进。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你的任何一次抬腿的同时，还必须与正常跑步一样，做出身体前倾，步子向前跨出的动作，否则你会被甩出传送带……”

然后我又看到网友回帖：“跑步是有大量时间滞空的，也就是说，你跑起来以后向前跃起的时候，这个路程是L，而跑步机在这个过程同样前进了L，在你的跑步机计数上则显示了你跑的是2L的路程，而不是你实际跑了的L路程。”看到这里，我开始后悔我当初没有好好读书；看到另外一个哲学系网友的发散性发言，我发现我真的看不下去了：“走路时是我不动而地球表面往后在滑动？”

看得越多，我发现自己变得愈加浮躁。这些又与我何关呢？我用脚把电脑开关踢掉，穿上跑鞋出门跑步。即使爱是回不去的旅行、生活是跑步机上的错觉，我们执意前行。

平凡如他的牛仔

文 小乔公子
图 谢驭飞



那时候，阿春还是刚出校门的学服装设计的学生。出于职业眼光，爱看人穿啥衣服。在一个招聘会上，她发现我们单位招实习生，实习期后如果单位满意即可留用为正式人员。阿春要接受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参加夜宴，并自备旗袍。

夜宴想来是一件很令人炫目的事情，有灯光华服还有美食。那个牛仔就坐在一旁，穿着一身有点儿过时的甚至很土的制服，微笑地看着这一切。虽不太主动和人搭讪，但对来敬酒的人彬彬有礼。他时不时挑动几个老男人自相残杀，顺便给几个小姑娘挡了几杯酒。

照例喝完酒就是卡拉OK，唱了几首歌之后，大家的神经被撩动起来了，于是开始跳舞。没想到大领导直接就走向她，她立时显得无措。大领导穿的是服装史里都有的大牌，但和他的将军肚有些不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肥手开始游离于她的腰部之外的部分，她感到很愤懑，但是又不敢发出声音来。这时，牛仔恰当地走过来了，正如西部片里刚刚好的一枪。他生生地把他架开："喝多了您，来，到沙发上跟我喝茶去。"大领导还想找人跳舞，但是被他牢牢地固定在了沙发里。

这次夜宴后，据说大领导很不尽兴，所有的实习生都没有被留下来。那天阿春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过。他，捧着一件衣服进了不远处的洗衣房。后来，阿春没有离开这里，她应聘了洗衣房洗衣工的职位。人们不解她一个学服装设计的来洗衣房干什么。她说，趁着年轻我想多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在这里，她得知了这位牛仔是个敢于弄事儿的人，所以职务升到一个层次也就不能再升了。据说多年前，有一个人老来这里反映情况，各级领导都避而不见。后来，牛仔得知情况，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每天早晨到最大领导的家门口练双截棍。果然，没过几天，事情就给解决了。阿春发现，他每两周都会洗那件制服，每次他来的时候，阿春都会朝他笑笑，他也礼貌地回应，但好像早已忘了她是谁。那身衣服，在他身上显得那么有样，可是她仔细看了，就是一个不知名的国产品牌。阿春想，难道他只有一件这样的制服吗？于是有一次她就在制服里面做了一个记号。第二次来洗，她发现确实就是那件。

牛仔因胃病去世的消息传到洗衣房，阿春发现他还没有取那刚洗完的衣服。在他的葬礼上，阿春捧着一小束鲜花，走在人群的末端。来这里，她只是想看看牛仔的妻子是什么样子的人，为什么不给他多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当她看到他的女人清新的模样，让你意识不到她在穿着什么衣裳的时候，她好像懂了。洗干净了这件旧制服，她准备把它寄给他的家里。然后，她终于要开始设计师的生活了，就是给平凡如他的牛仔们设计些更像样些的衣服。

大理石地面上的彩虹

文 summer
图 谢驭飞



那天，我们单位的年轻人到新办公楼的大厅练舞蹈，看到保安小官孤零零且严肃地坐在大门里的一张桌子旁。小官原来是机关大院门口岗亭的保安，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人，热情似火，有一次还帮片儿警抓过一个坏蛋。局长带着慰问品和红花来看他，他收了慰问品，戴了红花，但死活不要“见义勇为”这光荣称号，说这是举手之劳更是职责所在，草原人不要整天顶着这虚头巴脑的东西，被人念叨着好累，我又不是嘎达梅林。

就是这么一个好人，也被调离了工作岗位。据说是八月节的前一天下班时，看到某局长在门口和人谈话，他突然想起有人放在岗亭里送给局长的东西还没拿，于是就用他喊内蒙长调的嗓子来了句：“局长，明天不上班了，王处送您的海鲜赶紧拿回去吧，要不该坏了。”当时和局长谈话的好像是个更大的官儿。小官于是被后勤处领导谈话：“遇到这种情况，要么直接扔掉，要不拿回家去自己吃了。本来上面的意思是让你走人，我给你说了点儿好话，你换个地方好自为之吧。”小官感到受到了侮辱，不过他觉着自己没什么错，只是他不适应这个没有长草的地方。

他曾经说：“我哥哥准备在家乡承包一个马场，等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就让我过去，我现在算在这里养养性子。有时候，看到和我一样大的年轻人穿着漂亮的衣服经常在这里练歌曲或者走队列，我也很羡慕。但发觉他们练了一个个复杂的队列、口号和暗号，不是为了更好看，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动作能正对着主席台的位置。他们的表情只有一个瞬间灿烂，就是面对主席台的时候。我感到很可笑，也挺替你们可怜。你们中的很多人，也许今后的几十年每年都要跳这样的舞，我却有回到草原的希望。在草原，头顶只有天空，没有最高的山让你去仰望，只有远方更辽阔的草原。

“现在唯一的好处，就是大多数时候都比较安静。在下午的某个时候，你会看到阳光经过大玻璃门，在咱们大厅的大理石地面上折射出一道彩虹，每逢此时，我嘴里就会突然涌起马奶酒的味道。我的家乡一到雨后，也会有彩虹，但是它们是那么高远，那么有弧度，那么遥不可及。城市里的日子，就是彩虹和草原位置颠倒的日子。每个晴天的中午，我都会把彩虹即将来到的那个地板擦得干干净净。有一天，我欣赏彩虹的时候，我发现一双肮脏的鞋子落在了上面。我感到愤怒，示意他出去，他口口声声说是领导的亲戚，可我就是不让他进去，因为他没有证件。后来，他说了实话，说他也是草原人，想向食堂推销家乡的牛奶。但是我没认这个老乡，我感觉他不配做草原人，草原人办事没这么下作。”

本栏目投稿信箱：mensula@sina.com

阿尔法罗密欧 4C 的改良

只有 895 公斤，在不改变车体刚性结构的情况下，阿尔法罗密欧在 2014 款 4C 上继续优化细节材质。1.8 升涡轮增压引擎重新调教进排气正时，可以达到 240 马力。静止加速到 100 公里只需要 4.5 秒，极限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 250 公里。





50 Cent 的耳机尝试

类似 Dr. Dre 创立的 Beats 耳机，饶舌歌手 50 Cent 推出了 SMS Audio 品牌耳机。增厚的降噪耳罩搭配双层头箍垫层，整个音频调教更偏向动态声响，而不像 Beats 那样迷恋重低音。没有线控音量调节，只设置了麦克风接听按钮，并且附赠一枚航班专用的耳机转接头。

Yuneec 六轴飞行器

借助碳纤维材质骨架式机身，以及高效电磁线圈缠绕技术的均衡马达，Yuneec 新设计的六轴飞行器 Flying Eyes HX3 重量只有 1.4 公斤，留给电池和摄像头的可携带重量可达 0.7 公斤，一次充电持续飞行时间最长可以接近 90 分钟。





挖潜 Elise S Cup R

充分挖掘Elise S车型的潜力，莲花重新设计了全部空气动力学套件，加装侧向扰流板和尾翼，升级推出了新一代的Elise S Cup R。坚持采用机械增压方式的1.8升引擎，最大功率输出217马力，足以驱动924公斤的车体，在4.6秒内从静止状态加速到100公里。



12.2英寸的GALAXY Tab PRO

利用超窄边框的设计，三星在没有大幅扩张Tab Pro平板外形的前提下，将屏幕实际尺寸延伸到了12.2英寸，2560乘1600的分辨率，像素密度247ppi，搭载三星Exynos 5 Octa处理器，内置了9500毫安时的超大容量电池。



42倍的极端变焦

从22毫米的超广角，一直拉伸到924毫米的超长焦端，松下LZ40拥有一个可以实现42倍变焦的整合式光学结构，即便最大光圈只能保持在f3.0到f6.5。采用2000万像素的CCD传感器，具备机身防抖和15种内置滤镜效果。

2014款 Camaro Z/28

作为雪佛兰Camaro跑车的最高配置车款，Z/28依旧保持7.0升V8引擎的大排量特色，372千瓦最大功率之外，匹配六速手动变速箱，可以快速达到637牛·米的超高峰值扭矩。大量采用轻量化材料让Z/28整体重量减少了136公斤，加之采用倍耐力PZero Trofeo R竞赛级轮胎，可以跑出1.05G的弯道抓地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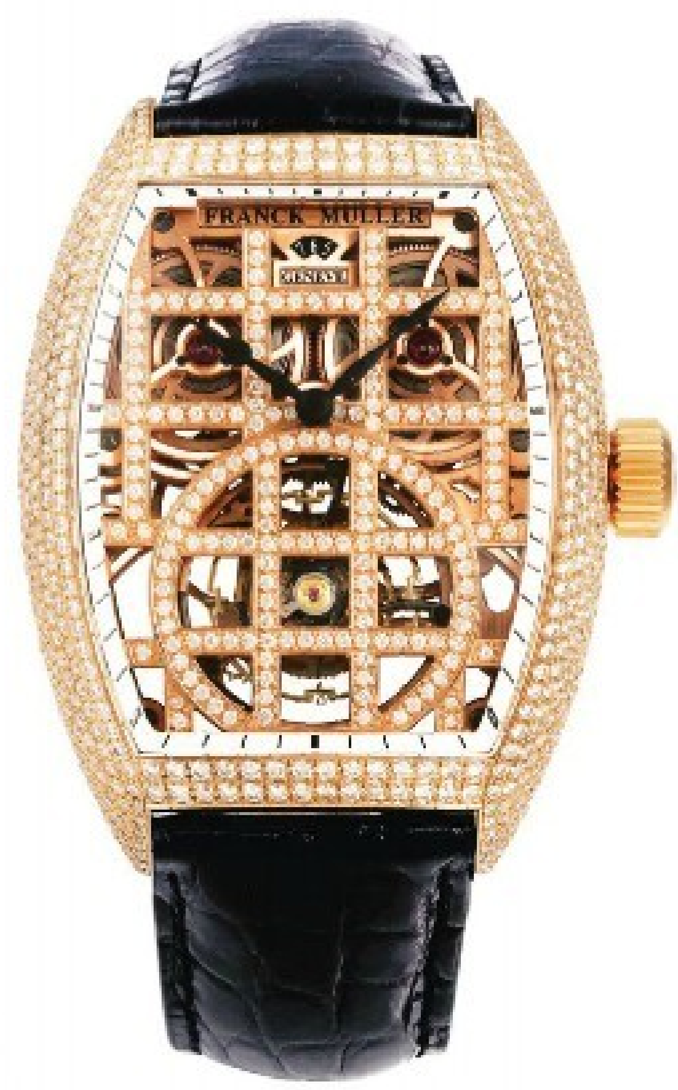
潮流耳机

美国耳机品牌SOUL Electronics的头戴式耳机LOOP，佩戴感舒适，有先进的电路设计和防缠结的耳机线及单一操控按钮，可谓潮流与音效兼备。

动物贴纸

巴黎设计师娜塔莉·勒特(Nathalie Lete)为Domestic设计的动物贴纸，总共27种不同贴纸可以自由组合。她绘制的图案受古董玩具以及花卉、动物的老版画启发，多彩而丰富。





超大陀飞轮

法穆兰的Giga陀飞轮腕表，整个框架镶29颗钻石，由四个发条盒驱动的陀飞轮直径20毫米，占表盘一半面积。成对排列的发条盒直径16毫米，比传统发条盒宽了4毫米。



波普餐桌

Magis 的 Flare 餐桌以“闪光”为名，桌面用亮白色 MDF 中纤板制成，桌腿则是透明聚碳酸酯。大小不一的黑色波点，赋予餐桌复古的波普风格。



秋江吟

艺术品牌“稀奇”与英国 V&A 博物馆合作的丝巾“秋江吟”，从 V&A 的中国古画展参展作品中汲取灵感。丝巾图案由两幅古画拼贴而成，两幅古画一是唐代画家李昭道的《山中访友图》，描绘主人带着仆人探访隐居山中的朋友，二是明代画家仇英的《浔阳送别图》，以浔阳江边诗人白居易登舟探访琵琶女为题材。



国王与王后

宝曼兰朵“国王与王后”吊坠属于 Pomellato 67 系列的复刻产品，一对用纯银制作的可爱小人。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关节可以活动的国王与王后以纯金为材料，曾经是品牌最成功的设计之一。

三个落地灯

出自 Frandsen 的 Dexter 落地灯造型别致有趣，纤细的金属三脚架底座支撑起黑色、白色和橙色的灯罩，像是把三个落地灯随意捆绑在一起。织物灯罩是经典的样式，与混合的现代轮廓形成反差。



现代婚姻中重建亲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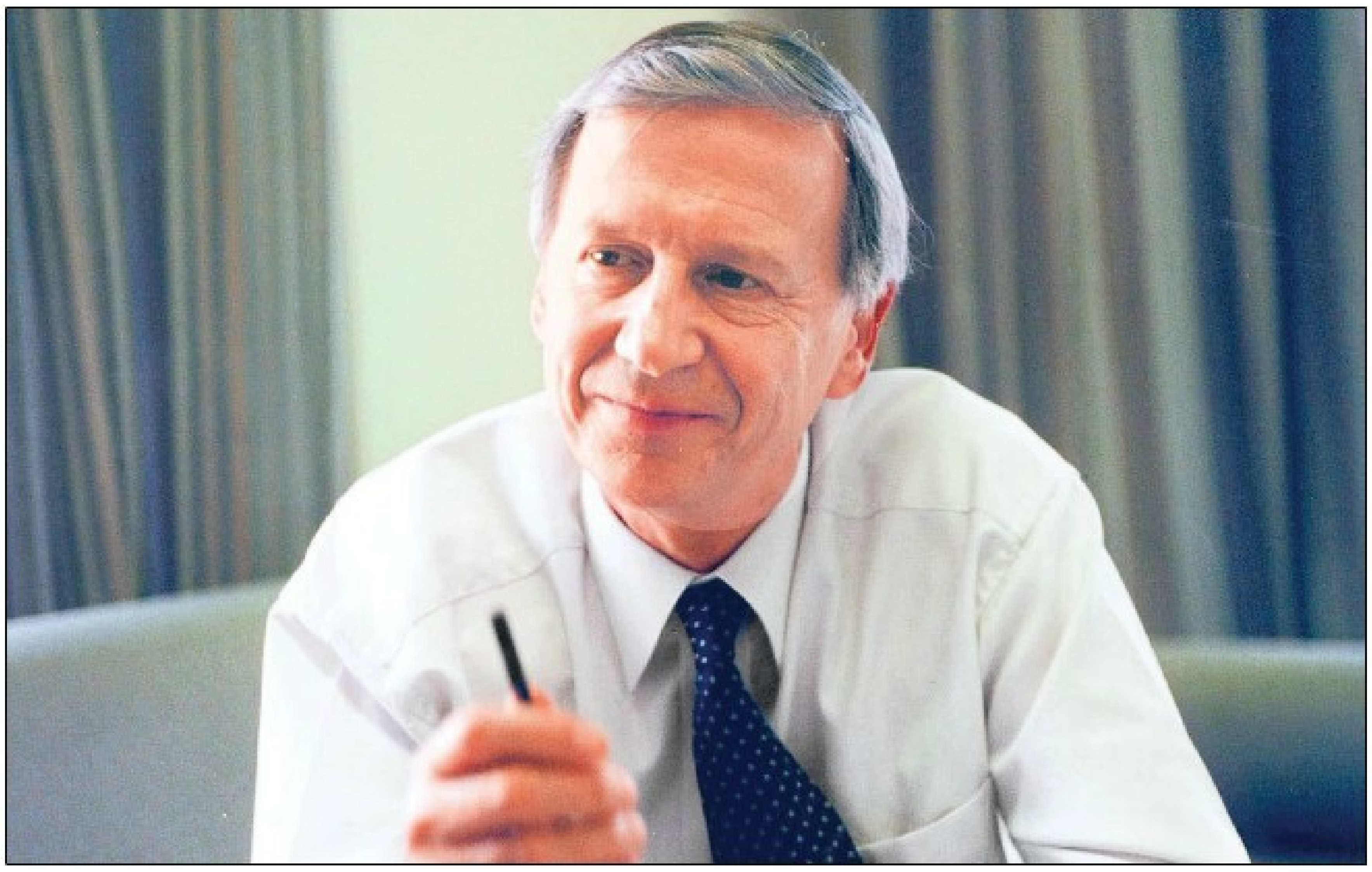
天上的爱情 人间的婚姻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吉登斯作为社会学家，一直主张把婚姻制度当作一种政治制度来观察。他断定，今天的婚姻比经济婚姻、恋爱婚姻远为深刻。虽然经济婚姻、恋爱婚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但随着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的改变，婚姻的主导倾向越来越向私人领域的民主化转化，越来越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形式。

信任、责任和诚恳不再是倾吐情感的手段，而都是作为交往的方式。这种所谓纯粹的亲密关系被吉登斯看作是当代婚姻区别于传统婚姻的根本。

文／志余

任何关于爱情的说明都面临着社会变迁的冲击，面临着不同经验的修改。所以福柯会把爱情看作一种话语对象，它缺少一个如香槟酒、断头台之类的明确的所指。即使不考虑历史过程，任何人在爱情实践中也都可能经历与别人非常不同的感受和经验，同时又有人倾向于拿别人的故事来检验和测量自己的感受。喋喋不休越来越杂乱的陈述反复填充、不断变更着这个“特殊空间”。

婚姻家庭所经历的也不比爱情更顺利，当离婚在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被法律许可后，当妇女的政治自觉意识建立时，当性解放成为新文化先锋时，婚姻经历了一次次的危机。可是直到现在，婚姻家庭依然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最重要的方式存在着。关于婚姻，似乎也有一个反复填充不断变更的空间，虽然法律一直为它提供着保护，但这种保护越来越有限，更多集中在个人权利方面。与此同时，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发现，这个生活空间越来越变成一个自治的领域，这个领域越来越依赖的不是法律而是对社会生活、对私人关系探索开发的愿望和实践程度。

此爱情与彼爱情

卡萨诺瓦当过律师，当过神职人员，当过军官，也是小提琴手、骗子、


欧洲情圣贾科莫·卡萨诺瓦


卡萨诺瓦《我的生平》插图：卡萨诺瓦和凯瑟琳

皮条客、美食家、演员、商人、外交官、间谍、医生、政客、数学家、作家、秘法师，如果加上他偶尔充当的，那就更多了，充当过历法改革家、探矿专家或染料化学家。他究竟是什么，差不多是取决于他想从那捞一把的对象是谁。只有一个身份是不变的，不论他的足迹到哪个地方，“大情人”这个名声一直伴随着他。他写过 20 多部作品，包括戏剧和散文，真正让他留名于世的是 1789 年开始写作的自传《我的一生》。

茨威格在写作《三作家》时，把卡萨诺瓦与司汤达、托尔斯泰并列在一起，从文学成就上看，似乎有点让人不解。茨威格解释说，因为卡萨诺瓦这个在各方面都有才智和好奇心的人，在这本自传里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各种冒险家详细具体的行为举止，“为 18 世纪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作为那个时代著名的大情人，卡萨诺瓦的晚年回首自然少不了这类故事。在卡萨诺瓦的恋爱故事中，女主角各式各样，很难集中在一种偏好趣味上，更别说什么可与之长期相伴所需的相知或尊重。卡萨诺瓦的职业虽然也百变无常，但还是有一个长久确定的方向，就是提高社会地位和发财。但他的恋爱故事无论有多丰富，他投入的热情有多真诚，都不会通向一个更远的方向，就是说这一切都与婚姻毫无关系。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在一向代表那个时代风尚的社会上层阶级中，爱情是充满激情的、区别于日常事务的一种享受或冒险事件，基本不具有 19 世纪浪漫主义爱情的严肃性。

与所爱的人结婚的朴素愿望其实一直存在，但在当时却曾遭到贵族阶层的质疑。蒙田借研究维吉尔的诗，表示过他对爱情婚姻的蔑视：爱情太嫉妒，竟然还卑鄙地想混入婚姻中，如果娶一个像维纳斯那样的妻子，“对于丈夫来说过于激动了”。在他看来，“在婚姻这种圣神的亲属关系中随意放纵，也算是一种乱伦”。蒙田表达了与卡萨诺瓦同样的态度，即爱情只能在婚姻外发生。在那时贵族主导的社会观念里，爱恋自己的妻子是一件有失尊严的事，也是对体面妻子的冒犯。持这种婚姻观念者如蒙田，他坚持认为，婚姻的名义就是出于财产和结盟的种种考虑，更主要是为了生儿育女，所以必须有更为牢固的基础，而“这一切都和爱情的俗套完全相反”。

在物质婚姻中的女性是相对被动的一方，有些女才子以她们的方式选择了与物质婚姻对立的阵营，她们有的人在生完孩子后就与丈夫分居，有些干脆拒绝婚姻。《西方婚姻史》发现，正是在这种爱情与婚姻的对立中，首先在女性中萌生了对幸福的爱情婚姻的希望。在 18 世纪时，教会里有些主教开始支持为爱情结婚的年轻人，甚至有法官愿意帮助年轻人解除没有





法兰西戏剧院大名角塔尔马在枫丹白露宫为拿破仑演出《凯撒》

爱情的婚约，启蒙思想家也来参与论证什么才是得体的婚姻。

在卢梭的论证中，恋爱结婚才是真正“天然的”婚姻，他不是说门当户对不重要，只是说在趣味、脾气、情感和性格方面的般配是更重要的。卢梭在他提供的那个著名的启蒙模型《爱弥儿》中，为了描述他认为得体而不放纵的爱情婚姻，他让爱弥儿既要留心一个性格趣味都能相合的姑娘，又刻意不让他自己去找，而是托人介绍，这个姑娘将在各方面都能符合让爱情产生的条件。

安东尼·吉登斯作为社会学家注意到，虽然这里出现的是同一个词语，但卢梭让爱弥儿寻找的“爱情”与卡萨诺瓦经验的“爱情”是非常不同的。为了把这两种爱情区别开来，他称卡萨诺瓦式的爱情为“激情之爱”，他认为这是一种伴随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既不新鲜也不独特，只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赋予了人文主义的美意，也被那个大冒险的时代赋予了传奇色彩。而卢梭所允诺的爱情，也是19世纪之后被不断推崇的爱情方式，所谓“浪漫之爱”，则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把爱与自由联系起来，也就与社会理想、生活方式联系起来。

宿命似的，在卡萨诺瓦开始动手写作《我的生平》的那一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它确立的自由、平等观念将全面改变那个让他扬名的时代。

现实的改变总会迟于观念，所以即使到了19世纪，婚姻家庭纽带的主要形式依然以对经济价值的考虑为基础，代表先进思想的资产阶级群体的爱情观念更多还是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爱情观正是吉登斯所定义的浪漫之爱，在这种观念的传播中，爱情被赋予一种特殊意义，完全不同于卡萨诺瓦说的“我一直认为我正与之恋爱的那个是最好的”。新的爱情观不仅意味着将他／她识别为一个“特殊的人”，而且还生长出了一种自我审视的方式，例如：“我”觉得对方是这样的，对方会这样看待“我”吗？“我们”的爱情是否足够“深厚”？诸如此类的考量都基于希望这个爱情能为长期生活提供轨道，为婚姻生活提供经济之外的可靠基础。

这种识别和审视方式不仅会塑造新的爱情关系，更重要的是将改变婚姻的质地，因为这种方式总是会把个体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分离开来，才能视之为一个“特殊的人”，于是也就使婚姻关系具有了区别于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殊地位。

并非巧合的是，浪漫爱情观念的传播与浪漫爱情小说的风行几乎同时兴起，所以当时就有保守的人认为，爱情是男人专为对付女性捏造出来的诡计，爱情小说的畅销，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爱情观念在日常现实中被否定的证明。吉登斯对这个问题考察的结果也支持这种流言：浪漫爱情小说及其观念不同于骑士爱情故事，浪漫

故事中的女主角都是能独立思考双方关系并参与创造关系的一方，虽然这在当时确实是反事实思考，但无论如何，这种观念的发展表达了女性权利意识的自觉。尽管如此，吉登斯还是予以了最充分的肯定，因为从19世纪到今天，女性的自觉一直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卷入在整个生活环境的真实改变中。

没人再逼着你发伪誓

不管是哪一种爱情，都还属于一种私人关系，只是当所谓的“浪漫之爱”要进入婚姻这种社会关系后，肯定会让婚姻的质地发生变化。

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福柯不一样，他不太讨论爱情作为一种话语的变更，而是更多考察爱情婚姻观必须依赖的社会条件的变化。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法国大革命确立的人人平等的观念。大革命之后，法兰西戏剧院的一个大名角塔尔马要结婚了，且不说他是为什么结婚以及和谁结婚，但他要结婚这一桩事件闹得就很大。4世纪以后，基督教在各地实行的条例规定，不允许戏子参与任何圣事——新生儿命名礼、婚礼、临终涂油礼作为基督徒人生中的圣事，戏子都不能参加。当塔尔马去找神父时，神父按照教会的条例，拒绝为他主持婚礼，除非他宣誓放弃演员职业。莫里哀也是因为这个职业，在临终时神父拒绝为他行涂油礼。所以通常情况下，演员如果想结婚，就要先承认放弃自己的职业，过了这一关之后再重操旧业。

《西方婚姻史》说，要是在旧社会也就认了，可大革命之后人人平等了，塔尔马不想发个伪誓做那样的妥协了，他要求能享受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公民权。这让国民议会犯了难，就把此事交给了一个由神职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讨论，这个委员会也犯了难。

其中的纠结在于：婚姻到底是一桩“圣事”，还是一个契约？宗教改革运动后，因为在天主教教堂不给新教教徒注册和主持婚姻圣事，法国天主教教区积攒了很多“法外”婚姻。路易十六为解决这种婚姻的合法性问题，发过一道敕令，凑合着让法官为新教教徒补做婚礼。那期间有些地区的人们曾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很多新教家庭祖孙三代一起去做婚姻登记。这个权宜之策被认为是公证婚姻的基础。

塔尔马事件的结果更深远，它促成了一项法律草案，即把婚姻视为民事契约。1791年法国宪法确认了公证结婚，可依照传统心理，似乎还是需要神父这样一个证婚人或送出神圣祝福的人。婚姻虽然被当作一件自然俗事了，但人们抱怨公证结婚过于无声无息，没有创造出一套仪式，所以大革命也没有完全取消宗教婚姻的仪式。于是，1801年之后宗教婚姻和公证结婚并存下来。

到此，塔尔马的婚姻给法国社会的震荡还不算完结。那位公证结婚的受益者、以为结婚就了了终身大事的新娘子没料到的是，不到10年，她又成了公证离婚的受害者。

既然婚姻是俗世契约，离婚的自由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可这项自由还是给那时候的法国新政权带来了一些新的纠结。之所以能把婚姻视为民事契约，它背靠的是民族国家的法理。支持公证结婚又反对离婚自由的议员就提出，不能将一件与民族命运相关的制度完全交付给两个人的意愿，因此要求宪法必须保证公证婚姻的效力，制定能对婚姻有所控制的制度。1816年后果然又开始禁止离婚。

但事情远没有像议员们想的那么简便顺当，围绕婚姻中的宗教、民族性质以及爱情、自由的观念，博学鸿儒们的争论从此未断。

1900年，在一次关于妇女权利的国际会议上，契约自由的原则再次被强调为婚姻的根本依据。这是当时欧洲的左派力量、女权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潮掀开的新篇章。之后一位法学博士的论文表达了另一种立场与之针锋相对。根据他的论证，婚姻不能和别的民事契约相提并论，因为婚姻是人的一种天然联系，不是由法律制造出来的联系，也就不可能被法律所解除。他的结论是说，婚姻一旦成立，是不能离婚的。

法国的司法部针对一直持续的尖锐对立，组织了一个婚姻改革委员会，作家纪德、侦探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诗人皮埃尔•路易、内阁总理普安卡雷，以及一批知名的法官、律师、作家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再次重提了爱情婚姻才是高尚婚姻的理想，以及多项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的建议，比如分有财产的合法性、妇女的民事权利、自愿离婚等，不过在当时还没有足够的支持能写入法律。

虽然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恋爱婚姻观作为现代观念通过文学传播了100多年，婚姻与爱情之间的关系还是一直模糊不清。19世纪时即有小说家把爱情的地位提得至高无上，甚至把爱情定义为“真正的共和主义的品德”，把恋爱结婚当作一种“自由的象征”。中国早期革命者在拿来革命理论的同时，也是把自由恋爱作为一种革命行动来实践的。法国曾有一本公民教育小册子，呼吁：“是爱情重归本色的时候了，爱情应该是夫妻结合的决定性因素和基本条件。只有爱情能够发现或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契合。”同时，怀疑的声音也一直未断，在这种怀疑中，爱情不过是一种自愿的同居，或乔治•桑小说里的通奸。弗洛伊德理论对人的力比多的分析也加深了这种怀疑。在意大利，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墨索里尼逆潮流而行，一度重新让教会掌控婚姻制度，法国也在这时出现了反弹，但这时的社会



“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王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首次在巴黎桑斯公馆办理的公证结婚

状况大局已定，取消公证结婚已无可能，至多是可以自由选择公证注册还是宗教婚礼。无论选择哪种婚姻制度的，伦理依据却没再倒退，即对恋爱婚姻的肯定。

经过这漫长的婚姻观念的变化，到20世纪，金钱婚姻虽然远没有消失，但恋爱婚姻似乎也是无需争辩的事情了。真正为爱情婚姻而抗争的故事高潮出现在30年代，主角是人称“现代国王”的英国爱德华八世，他的现代特征不仅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工党党员，还因为他坚持为爱情结婚，即使退位。

不是不要，是要什么

不管你选择什么婚姻体制，不管是公证注册、上帝见证，还是拜天地，都意味着承认婚姻是一种社会关系，不然可以选择不结婚。那么它就不仅会受到观念的指引，更会被生存条件所规划。之所以人类学家倾向于把婚姻制度视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是因为它与生存状态总是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相关。在不同地区的传统婚姻制度中，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统计发现：除去经济合作的因素，在男女比例大致相等的时候，通常一夫一妻制就广泛实行。历史上往往在战争之后，男性人数减少时，一夫多妻制就被采用，或在贫富不均社会分化明显的地区，一夫多妻现象就很普遍，而同地区的穷

人依然实行一夫一妻。婚姻的功利充分体现，无非是财产、继承人、政治势力的巩固或保障。即使是以一夫一妻为主要婚姻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中，强制性也不是一直一样的，《人类婚姻史》显示，即使在欧洲王室中也没有严格实行，6世纪的爱尔兰国王有两后两妃，查理大帝有两后多妃，重婚现象也并非严格被禁止，路德本人甚至批准过重婚。这还只是出于伦理的理由，比如说“重婚总比离婚可取”。更功利的理由也会时而生效，比如，1650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之后，鉴于30年战争造成的人口锐减，在纽伦堡地区一个县政会议上规定，每个男子可娶两个妻子。婚姻的伦理观念与社会功利的考虑，似乎一直在互相诠释着。

爱情婚姻观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婚姻家庭的这种功利质地还不好说，但吉登斯能够得出的结论是：浪漫爱情是与婚姻家庭制度的变化密切相连的一种现象。

法国大革命后，除了自由平等的观念在宪法上确立，曾经被贵族蔑视为“小市民”的情感趣味，因为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在社会中得到了尊重。另一项必要的条件也已经具备，即资本主义生产带动了生活方式的改变。

因为工业革命，大量的劳动力、职员或创业者都离开了原有的土地和家族生活圈子。新型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环境下，出现了一种家族经济时没有过的时光，“休闲时间”。在大工业工作中，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是截然分割的，工作时间内人们集中在一起，工作之外人群四散，个个形单影只。社交活动在平民社会开始取代家族亲戚、邻里发小儿的交往。与贵族的舞会不同，贵族社交活动是他们生活中躲避不开的责任和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平民社交是可自己安排和可选择的。心理学家认为，不可小看平民社交，它对爱情婚姻的影响至关重要，这样的机会有利于“凝结”某种情感。因为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城市人口结构，为应对新型的城市人口结构，单元房在各地大量兴建。这为单身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私人空间，可以约见某人，可以让两人单独相处。这也被作为有利于滋生出更紧密的关系的社会条件之一。

但是，弗洛姆心理学研究，在分析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的性格结构的塑造时，发现了不利于此的条件。庞大的企业机构中，原来在作坊式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和独立性已经从个人过渡到机构，资本主义方式强化着这种生产结构，越来越多的人依附在这种结构中。企业越大，生产组织方式越集中；分工越细，人越是这个组织结构中的螺丝钉。所以，个性在这种生产中必定会被抑制甚至被打击。在现代生产中需求的是大量能够合作的人，在商业中需要的是大量乐于消费的人。这两方面最需要的都是趣味标准化并且容易被预测的人，总之，是善于适应社会这部大机器的人。他们总能够去做被期望做的事，他们没有领导却又被指挥，没有命令却又被指使。人“独立地”把自己当作一种投资来体验生命的活力，而不是生产者。弗洛姆说，结果人的安全感越来越要依赖一个个群体，在群体中却又很难建立人与人的亲密关系，更多情况下的人际关系是投资、交易、合作的关系。余下的是孤独和休闲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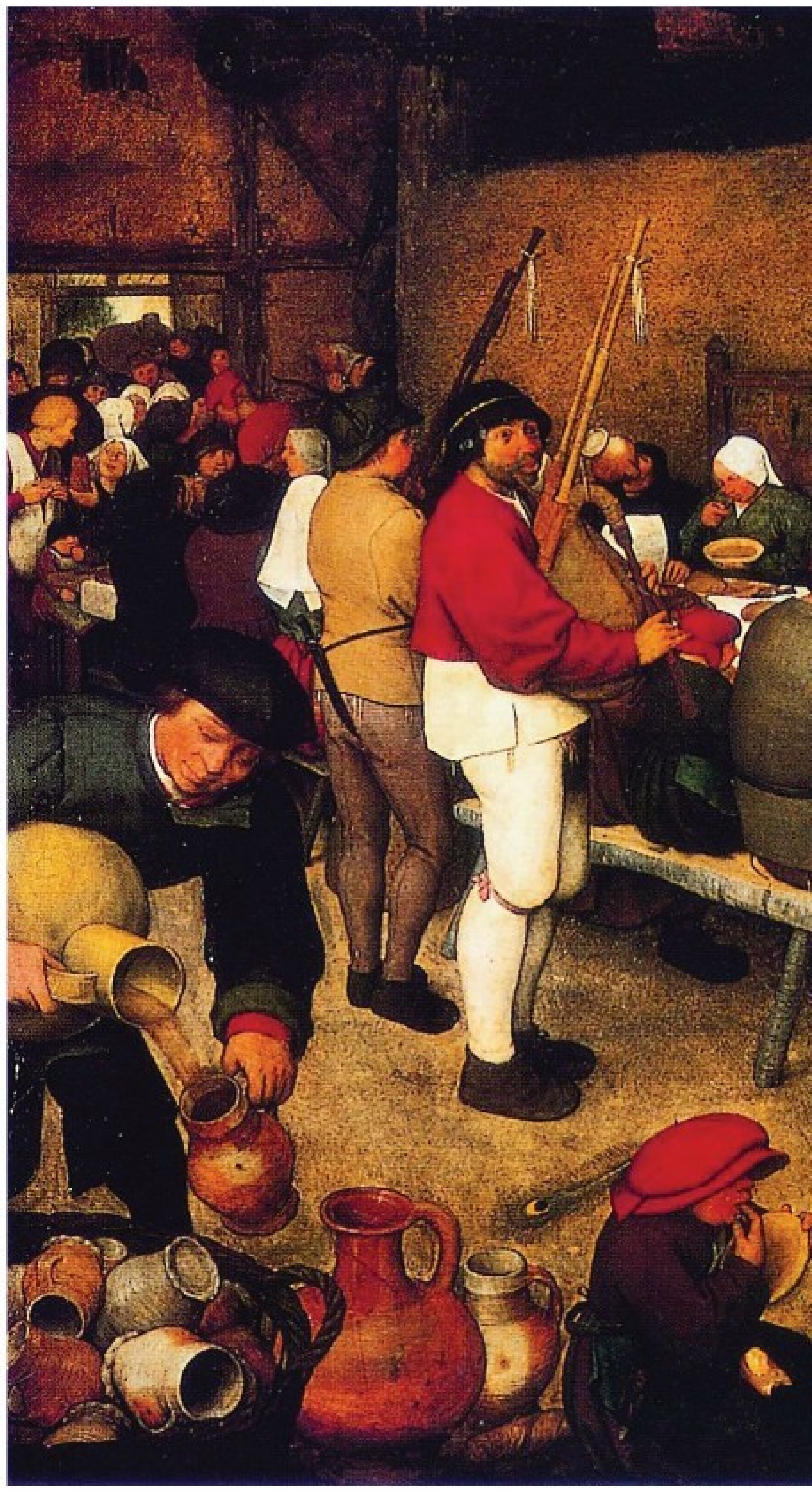
由于经济事务的社会化规模化，家庭很少再承担经济活动，至少不是经济的主要场所（在大企业的大股东的家庭中，它依然保留着经济性质）。因此家庭的私人性质极大增强，单元房也为这种核心家庭提供了可能。爱情婚姻的祈望者本来就倾向于从那些容易与激情产生冲突的生活俗务中分离开来，这种条件下的家庭可能正是一个可以发展个性、培植人与人亲密关系的领域。

到了1975年，连教皇都承认这个时代是爱情文明的时代了，可惜他反应有点慢。当年争取爱情婚姻者据理力争的所有条件看似都具备了：财产与遗产的关系松散了，破产的风险、事业的风险、股市的动荡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经济状况，通过遗产稳固财产的方式在新型经济活动中不那么一劳永逸了；反而，财产与职业的关系紧密了，家庭经济状况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职业成就了；女性有了受教育权利和职业选择的能力，即使与男性的社会差异依然存在，但独立性已经建立，这使女性不必依赖婚姻来为生活提供保障。这一切使爱情婚姻有了更多机会，不必过多地考虑个人情感之外的因素。恋爱婚姻似乎可以像教皇那样宣布历史的胜利了。

在教皇迟钝地宣布爱情胜利之前20年的1956年，弗洛姆已经说到，情况并非如此。他以《爱的艺术》一书，分析了当代社会结构中，婚姻家庭正在变成一个摆脱不安全感、摆脱孤独感、共同对抗外部压力的同盟，却被误解为爱恋，婚姻中的人正再一次与爱情渐行渐远。

为了帮助那些还渴望爱情婚姻的人，弗洛姆提供了一套“艺术方法”：爱，可以作为一种艺术，首先需要约束感，任何艺术（古典意义上的），都是以约束的方式实践的，像学习绘画或练习提琴。只在心情愉快时才做的事情，也许会令人惬意，但它可能成为消遣，不可能成就艺术。约束感虽然在八小时工作中为人所熟练掌握，但自我约束和那种约束完全不同，它不是迫于外界的规则；然后，是专注感。现代文化鼓励一种分心而弥散的生活方式，你要读书看报看电视饭局喝酒听音乐，总之片刻不闲。有了约束感就会引导出专注、耐心和高度关怀，不管下一步的计划，区别于由外界目的，如薪金、升职、名声、地位等被迫的策略，这





《婚礼》，描绘一对新人在教堂举行婚礼的情景（18 世纪意大利画家皮也特洛·隆基绘，约 1755 年）

都意味着完全生活在此时、此地的能力。自身不敏感的人很难专注，就像一个好司机，不用时刻显得小心翼翼，但任何不正常噪音都会被他敏感到；这就要求一种客观立场，而与之相对的自恋，就是只把自身的东西体验为真实的东西，外界对他而言只是从对他有益或有害的观点出发来体验，这就丧失了客观的态度；客观态度背后是一种谦逊；耐性也是必需的。现代文化追求快速成果，大量的技术进步都是为了“快”而设计的。弗洛姆认为，如果不能以这些学习艺术的方式来对抗僵硬的社会结构，顶多成为一个爱情爱好者，不可能真正去实践那样的生活。

弗洛姆之所以像科普作者那样讲解爱的艺术，是因为他认为，“二战”后的欧洲社会结构产生出的时代精神中，“爱已经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不罕见的则是存在主义理论的流传，精神分析理论的推广。这似乎反映出新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种焦虑以及对消除焦虑的思想需求。

终于，社会学家忽然注意到，连法国人都犹豫了，不太好意思说爱了，爱情主题也从严肃的文学作品中退场，成了娱乐文化中消费的主题，或商品推广中的作料。只有一些学者还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政治、社会主题。

婚姻于是遇到了新的危机。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发生的变化，当年阻碍爱情婚姻的障碍一个个被克服后，“从前所说的需要结婚的理由又一个一个消失”：成家立业曾是成熟男人被社会认可的标志，现在男人立足于社会靠的是职业职务和社会地位；婚生子女曾是享有继承权的重要条件，现在未婚生子同样可以成为继承人；避孕术



《农民婚宴》（彼得·布吕盖尔绘，1568 年）

的广泛使用，对生育的控制直接促进了性解放的范围，性问题完全可以不依赖婚姻解决；同居作为个人自由也不再被视为非法或有违伦常。原来必须在婚姻内部解决的生存问题，如今都有了其他解决途径，留给婚姻家庭的似乎“只剩下一种象征性关系”。

没有航标的“日常社会实验”

现代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卸去了政治、经济、后代等负担，婚姻关系越来越明显地从其他社会关系领域突出来，家庭随之变成了一个与其他社会环境判然有别的领域。按福柯的说法，婚姻越少，各种生存策略的负担就越自由。它的价值就集中在建立和维护一种强大和稳定的个人关系，包括共享生活、互相帮助以及道德支持。如果说这种婚姻的起点是因为双方以很文化的方式“凝结”出了某种爱情，那么《伪币制造者》里纪德感兴趣的问题就变成了：爱情是怎样溶解的？即使承认在婚姻中爱情好像有了主导地位，但爱情并不能保证什么，尤其不能保证长久稳定的婚姻。

曾经，公共权力一直充当着婚姻的保护者。福柯发现，婚姻这个私人体制的内部变化总会像公共体制的演变。古罗马时，一整套立法措施表明公共权力一点一点控制了对婚姻体制的评判。比如通奸法的出台其实没有在对事实认定上提出任何新东西，完全照搬伦理评价的传统解释，它的功用只是把原来属于家庭内部的制裁权转让给了公共权力。这种变化一直存在。今天，针对婚姻的公共权力的约束力是历史上最宽敞的，这种宽敞不是来自法律条目，而是现代婚姻内部的约束力变得严格了。他说，越少依赖于经济或社会目的，越会促进夫妻之间发展成一种比以往更紧密的生活方式，这种关系就越有约束力。婚姻问题常常在远远没有触及到公共体制的边界时，内部双方早已调节、斗争、妥协、商讨过，到了需要公共权力来认定时，其实内部的认定已经完成，走个手续而已。公共权力的作用除了可以保护一些经济利益或相关权利，对婚姻本身的保护基本是无效的，公共权力也缺少对现代婚姻伦理的解释。

婚姻的传统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与传统婚姻目标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方既要被更加地推崇为独立自主的另一个人，同时又必须塑造，进而承认与之形成的统一体。在福柯看来，这是现代婚姻家庭的最大的悖论。

因此这造成了新的焦虑和要求，离婚率提高、不婚人群增加或许与之有关。吉登斯究其原因，起自浪漫爱情观念假设的一种心灵沟通，一种特殊的信念。在坚持这种信念的婚姻中，如果爱情结束了，要么征服世俗陈规利益，拒绝和解，离婚；要么在“合法化的道德犯罪”中延续婚姻。这是 1889 年时爱情婚姻倡导者的决绝态度。但是，吉登斯说，因为与子女的关联以及共同生活痕迹的纠缠，这种颠覆性态度一直受到抑制，真爱永存白头

到老的观念也参与了这种抑制。由于这种抑制的存在，两个人原有的那种独特感会有趋同的倾向。但这种趋同并不被感受为趋同，恰恰相反，常常被感受为对方不独特了，两人距离越来越远了，爱情婚姻的过程曾被视为两人共同去创造“一部相互叙述的传记”，这时却又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孤独应对，合作、港湾、保护子女等策略替代所谓的爱情。晚近的变化是，即使保护子女的负担也变得不那么严重了，社会文化还是提供了大量如何照顾单亲子女的方法。

表面上，这种婚姻家庭的维系好像仅仅是传统习俗的因循，但关于婚姻状况的社会调查也有大量的案例并不支持这种表面结论。在婚姻被社会环境一步步纯化的过程中，所有与对方有关的事务都集中于婚姻内部，与社会目标的关联几乎隔断了。在这个彻底的自治领域里，仅限于双方之间的情感关系变得愈加成为首要事务。

这种最纯粹的关系反而是最富可能性的关系，它不可能停留在对“一个特殊的人”的爱情中，而是能创造出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福柯说：“自尊的人不会只是结婚，他必须赋予自己的婚姻生活一种反思的形式和一种特殊的风格。”这种特殊风格，不只是为了指挥对方或管好自己，而是由某种互相塑造的方式界定，“作为特殊伴侣的配偶必须被当作与自我相同的存在，用来形成一个统一实体的成分”。这是婚姻论题中的自我教化，尽管是在福柯所说的“悖论”之中。


20 世纪 30 年代，汽车成了亲密又刺激的新玩具，它强行重写了男女间的距离

所以说，现在的婚姻家庭已经不是传统婚姻那样一种“自然状态”。所谓自然状态就是在没有外在的极端境遇一般会“自然地”持续下去。吉登斯认为：这不仅是婚姻体制的变化，也是社会所经历的变化，现代生活中我们都卷入在一种“日常社会实验”之中，广泛的社会变化迫使人们多多少少要从事这种实验。吉登斯把现代爱情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组织个人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与拓展未来，与自我认同相连，所以它会通向一种两人共同塑造“亲密关系”，婚姻关系能为之提供一个心理环境和实践环境。其中，平等是亲密关系的必要因素，在情感中双方的予取越是平等，婚姻关系的维系越是可能发展出亲密关系。自治的重要性意味着不必依赖于对方的需求，还在于各自尊重不同的发展轨道，并提供反思的环境。

自治和依赖之间能达到平衡不是没有问题的，一定会存在着冲突的余地，因此，没人确切地知道这种平衡以怎样的形态达成，这一点才是显示个人创造能力的平台。英国心理学家艾米丽·汉克柯调查过很多婚姻中的女性，她们所处的婚姻类型不同，遇



到的困境不同，追求的独立定义不同，自救或自我调整的方式也很不同。她发现，把爱和婚姻联结在一起的永恒化态度当作一种“终极状况”，是一种工具主义的、男性世界的意图。所以每当在遇到问题或变化时，男性偏向于工具化解决，外遇、离婚、逃避、愤怒等等。她描述的一些女性则被她称之为“真正的拓荒者”：她们正在穿越没有航标、没有地图的区域，当她们遇到挑战和变化时，她们能标出自我身份如何转向的标记。艾米丽·汉克柯还描述了另一些新的变化：对一些更有独立感的女性而言，婚姻问题已不是浪漫爱情的保有问题，当然也不是找一位伴侣的事情，无论她们是否谈论婚姻，她们都是在探索重建“亲密关系”的道路，以此参与着对私人关系纽带的改进。

吉登斯作为社会学家，一直主张把婚姻制度当作一种政治制度来观察。他断定，今天的婚姻比经济婚姻、恋爱婚姻远为深刻。虽然经济婚姻、恋爱婚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但随着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的改变，婚姻的主导倾向越来越向私人领域的民主化转化，越来越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形式。

这个私人领域的民主化在当代婚姻中已经是一个隐含的性质，虽然不同于公共领域，但其含义可能同样深刻。按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的区分：大多数政治民主的方法之间都存有共同因素，这些因素都旨在稳定个人之间的“自由和平等关系”，从而促进自治的能力、尊重的能力、协商的能力的产生。自治能力成为婚姻的根本，只有非遵从的自治态度才能免受流行时尚、利益交换、公平交易等市场伦理的影响，它意味着自我反思、自我确定的能力，和认知视野的开阔。尤其重要的是在婚姻中已经出现的推心置腹，能够公开各自的关怀，同时适于公开各自的需要，以“反射性的自我规划”，相互发现对方的潜能和个性，并助其实现和开发。其中，信任、责任和诚恳不再是倾吐情感的手段，而都是作为交往的方式。这种所谓纯粹的亲密关系被吉登斯看作当代婚姻区别于传统婚姻的根本。

像在公共领域一样，这种私人关系也很乌托邦。两性之间的心理和依然存在的经济差异还是在起着阻碍作用，但无论如何，改造这种环境的条件正在发生着变化。今天，人们依然选择婚姻建立家庭，除了强大的文化传统为其塑造的严肃感，也是因为婚姻家庭依然是提供个人满足感的领域，向人们提供着情感支持、性满足、生活趣味、记忆的分享，对于无障碍，至少是最少障碍的私人亲密关系，现代的婚姻提供了一个相对的最佳环境。



爱情婚姻纠缠史



1923 年 4 月 26 日，苏格兰贵族小姐伊丽莎白嫁给了当时的国王乔治五世的二儿子阿尔伯特王子（约克公爵）。婚礼后约克公爵夫妇乘坐马车穿过伦敦市中心，接受公众祝福，从而使皇家婚礼第一次成为公共庆祝活动



17 世纪意大利画家卢卡·焦尔达诺描绘的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



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关系经常仿佛天上的星星与白昼：星星从未离去，只是黑夜的到临才凸显出它们的存在。

主笔 ✎ 王星

莫扎特曾经为凯鲁比诺写过一首颇为小清新的歌曲——《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直白的歌词和易于上口、近似小情歌的旋律很容易诱使200多年后的听众忘记：当年像凯鲁比诺这样谈论爱情不完全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是当“爱情”与“婚姻”相联系时。现代人同样容易自诩是自己的时代解放了爱情，但回顾历史，爱情与婚姻间的纠缠是场伴随了人类文明全进程的镜花水月论战。即便不说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也不能不承认古人在这个事关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出的决绝与睿智并不逊于今人。倘若对古人公平一些，与其以胜利者的姿态回溯爱情自何时起进入婚姻，倒不如探究爱情在哪些节点上远离过婚姻。或许是距离产生美，我们总希望爱情在远处有个源头，但我们或许不过是在问一个爱神已经被问腻的问题。

对于地上的猩猩来说，如果确信对现代类人猿的研究可以多少揣测出人类祖先的行为逻辑，从古道尔（Jane Goodall）、加尔迪卡斯（Birute Galdikas）等一批女科学家的田野观察中或许能窥测到“爱情”与“婚姻”最初的平衡点。黑猿（Pan）、褐猿（Pongo）、大猿（Gorilla）是现存的三种大型类人猿。据加尔迪卡斯的观察，褐猿在交配时绝对不会允许另一雄性褐猿在场，虽然未成年褐猿经常三五成群地活动，但群体关系并不密切。大猿一般由一个年长的雄性大猿领头，带领若干头雌性大猿和它们的后代以及一两只年轻雄性大猿组成群体，领头大猿同样不能容忍其他雄性大猿对雌性大猿的占有权，据说曾发现过一个由5个成年雄性“光棍”大猿组成的猿群。黑猿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据古道尔对黑猿群的观察，雌性黑猿可以与雄性黑猿顺次交配，雄性黑猿之间没有发生为了争偶而搏斗的现象，相互之间颇能容忍。雌性黑猿率领其幼仔构成了猿群的“核心”，其中为首的雌性常具有权威性，连年轻的雄性个体都服从它的支配。正是这种和平相处的气氛，使黑猿得以形成拥有上百成员的大群体。

有关类人猿的田野报告似乎表明：雄性猿之间的相互容忍是构成稳定、强有力的高进化水平猿群的前提条件。这一弥漫着原始山野味道的结论其实和现代人类学学者们许多充斥书斋味道的论断殊途同归。法国人类学家比尔基埃（André Burguière）等人编纂的《家庭史》（*Histoire de la Familie*）在开卷就明确提出“家庭”是“天性与文化之间的妥协”：“如果每一个生物性家庭都形成一个封闭的

世界自行繁衍，社会就无法存在。”

关于人类婚姻的历史，曾有两种对立的理论。一种理论以美国人类学家摩根（Thomas Hunt Morgan）为代表，认为人类婚姻曾经历过自低等向高等进化的几个阶段：始自乱婚，继为群婚，最后以一夫一妻制为婚姻本身进化的终极形态。另一种理论以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Edvard Westermarck）为代表，认为人类自始至今都实行着一夫一妻制，将该制度的诞生甚至提前到了高等猿群出现时期。韦斯特马克1891年的著作《人类婚姻史》（*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的主旨即在于论证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古老和永恒性，同时提出婚姻起源于家庭、而不是家庭起源于婚姻。韦斯特马克又被称为“第一位达尔文式社会学家”，他根据达尔文的观点提出：“盛行于类人猿和现代人类各种族中的男性嫉妒足以构成一个强有力的、确定无疑的证据，证明男性嫉妒在人类早期也是存在的，而这将使乱交说失去立足之地。”韦斯特马克对于嫉妒心在维持一夫一妻制时的作用的过分强调经常为后人所质疑，司汤达在《论爱情》（*De L'amour*）中创造出“嫉妒之爱”（Amour par Pique）却被视为风雅流传至今。假如真有在遥远的天际之外冷眼旁观人类的外星人，也许在他们看来，“爱情”不过是人类身上某种无关婚姻的返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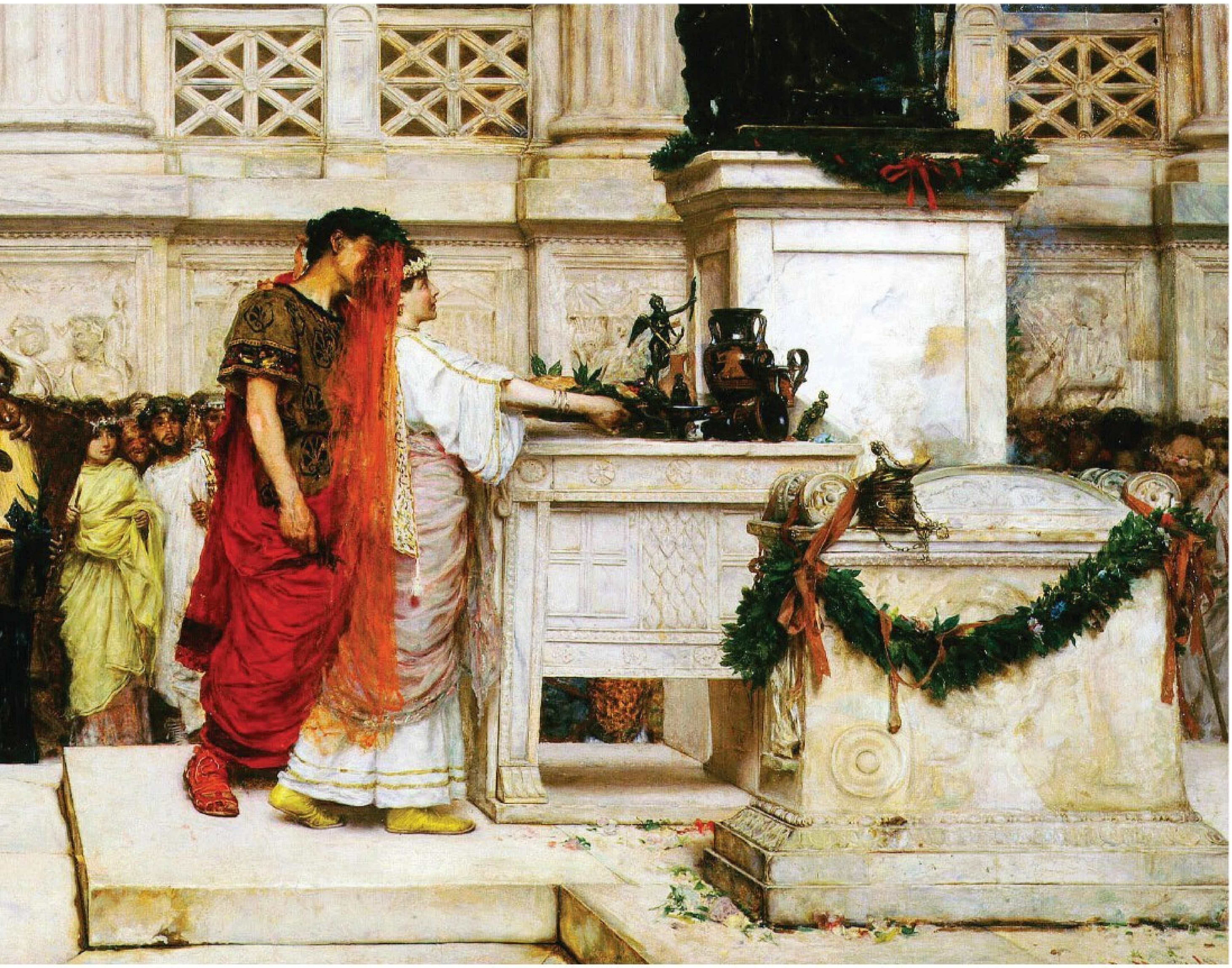
与爱无关的爱之天使

更有可能在冷眼旁观的是天使。21世纪的法国学者布洛涅（Jean-Claude Bologne）在《西方婚姻史》（*Histoire du Mariage en Occident*）的引言中写道：“如果说婚姻在其他文明中有神圣性、由神祇主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特点就似乎是把婚姻的起源完全归为神意，而不是一种开化行为。”布洛涅认为“这件事在婚姻史上并非没有重要意义”，“只承认一种类型的婚姻，只承认可以通过唯一一种仪式把这种婚姻具体化是一项重要革新。强调夫妻之爱是仿照基督对教众之爱的圣事仪式，由此而来的婚姻不可分离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我们至今也还没有从这种观念中完全解脱出来”。

尽管凯鲁比诺的问题在世界各地都存在，深受基督教原罪理念影响的欧洲人显然是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对这个天人问题做过最多穷尽智识乃至自欺欺人到悲壮的尝试。在舞台上“心中翻腾不定”的少年凯鲁比诺被后人视为“情窦初开”的爱情典型，然而“凯鲁比诺”的名字本身就暗藏着一些与爱情无关的吊诡含意。“Cherubino”源自“cherub”，后者如今经常让人想起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笔下那些簇拥着圣母的小天使乃至象征爱情的丘比特（Cubid），而且事实上早在莫扎特的年代之前，“cherub”已经被默认为“小天使”的通称。然而，它的本意却与“可爱”或“爱情”相去甚远，反倒隐藏着“原罪”的味道，预示出西方世界在爱情问题上的纠结来源。

除去“基路伯”、“革鲁宾”、“赫鲁宾”等音译外，“cherub”有一个普遍认可的中文意译名称：“智天使”，属基督教中天使之列。“天使”（Angel）本身的名称源自希腊文“angelos”，意为“使者”。无论后世绘画或雕塑中智天使们的形象与丘比特有多接近，古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毕竟自己就是神祇而不是旁人的使者，此间的阶差本身就暗示了“爱情”地位的变迁。尽管为避免“偶像崇拜”之嫌而极力淡化天使的形象，中世纪期间罗马教会仍认可了依据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总论》（*Summa Theologica*）乃至伪迪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的《天阶序论》（*De Coelesti Hierarchia*）创建的一套天使的阶位体系（Angelic Hierarchy）。这套体系分为三级九等，智天使在其中位列“上三级”的第二位，仅次于最高级的“炽天使”（Seraph）。依照《天阶序论》中的说法，上级天使都立于上帝四周，本身无形无体，与上帝直接沟通，只有“下凡”时才会以某种具象化身出现。由于“相由心生”之类与东方类似的理念，上级天使们在化身芜杂之外还经常与下三级天使团中人们熟知的米迦勒（Michael）、加百列（Gabriel）、





19 世纪意大利油画中描绘的罗马婚礼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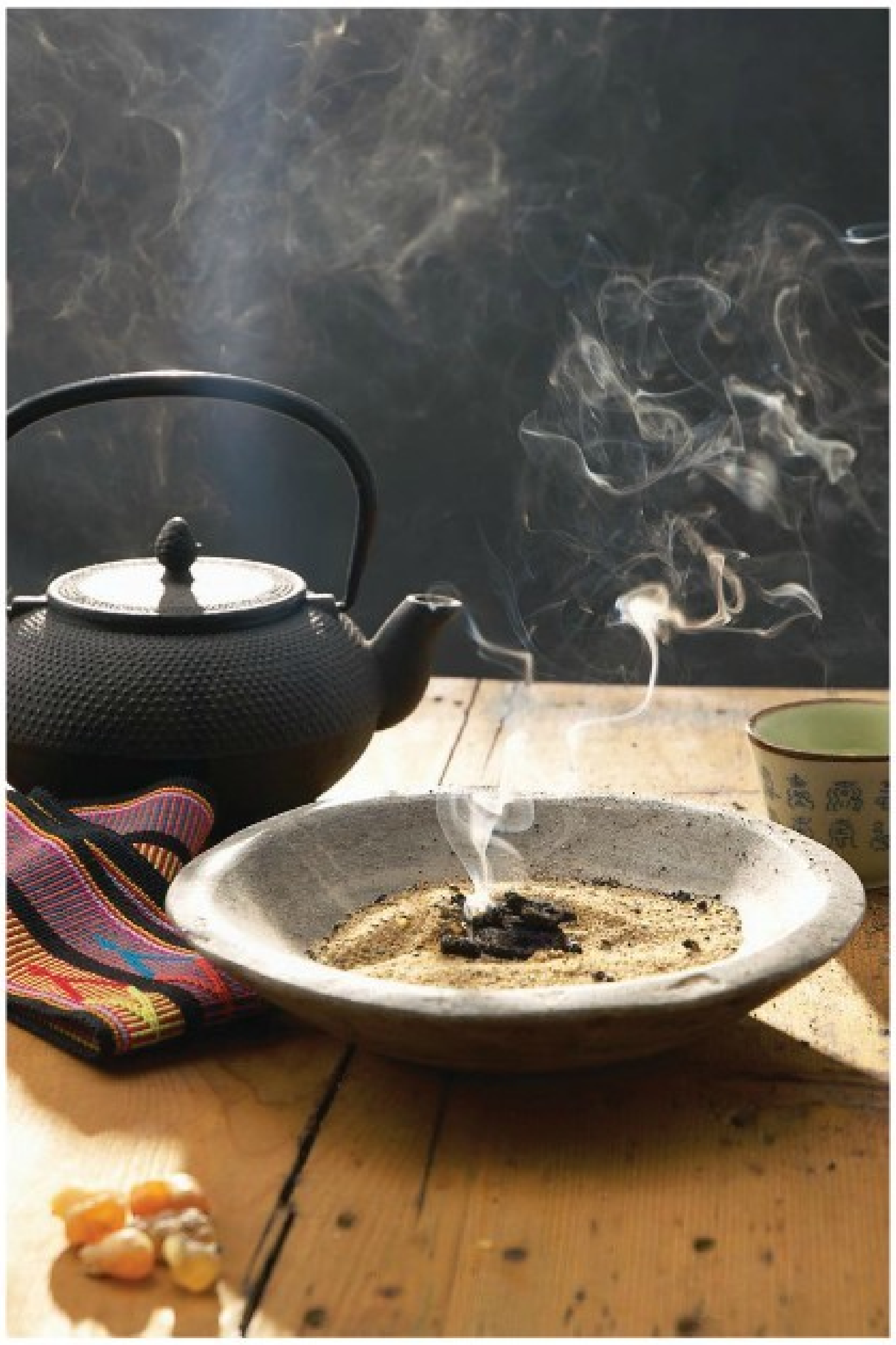
拉斐尔（Raphael）、乌利尔（Uriel）等“大天使”（Archangel）混淆。追根溯源，炽天使和智天使的形象都来自中东两河流域。然而，与如今东方、尤其是相对于欧洲来说的远东地区人们所经常误会的杨柳青年画式天使形象截然不同，炽天使和智天使若现身于凡人面前，往往是多翼多首的毕加索式立体派形象，而且仿佛并不总是和善。

《以诺书》（*Book of Enoch*）是早期犹太激进教派亚森尼派（Essenes）的主要经书之一，记载了亚当第七代孙以诺（Enoch）在大洪水之前与上帝同行 300 年间所见的异象。尽管公元 4 世纪后被罗马教会视为伪经（Pseudepigrapha），书中对天使们的详尽描写流传至今。在《以诺书》中，炽天使被描绘为燃烧的巨龙（Drakones），这似乎解释了“seraph”名称中“seraphim”（燃烧）与“serpent”（巨蛇）的血缘。《天阶序论》中则将炽天使进行了更为“神性化”的重新定义：六翼二首、“面庞为红色、躯体是火焰、长有六只羽翼，其中两只覆盖脸、两只覆盖脚、另外两只用于飞翔”。智天使在《以诺书》中的形象被认为与亚述人的牛身人面有翼神兽（Kirabu）乃至希腊神话中的狮鹫（Gryphos）或斯芬克斯（Sphinx）同源，时至中世纪也获得了与炽天使类似的哪吒造型。不同的是智天使四翼四首，拥有牛、鹰、狮、人四张令人想起福音书的面孔。此外智天使翼下有手，足下有火轮，更重要的是全身布满了眼睛。在《以西结书》（*Book of Ezekiel*）中，智

天使是以“上帝的战车”的形象出现的。直至1420年前后，意大利画家多那太罗（Donato di Niccolò di Betto Bardi）将拉丁文化传统中的小男孩（Putto）形象与广义上的天使相对应，智天使才开始逐渐被“萌化”。18世纪初，西班牙画家提埃坡罗（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笔下那些有着孩童的头部外加翅膀的小天使逐渐被教会指定为“基路伯天童”的形貌，至此智天使完成了自己的“逆生长”。

17世纪末，意大利雕刻家贝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在《圣特雷萨的沉迷》（*The Ecstasy of St. Teresa*）中将一支与丘比特的武器相似的金箭放在一个“putto”扮相的天使手中。在现代人看来，原本全身布满眼睛的智天使就此开始了成为“爱情是盲目的”这一俗谚代言人的转变。然而在当世人看来，自身就有浪子之名的贝尼尼是在有些放肆地玩了场“爱”的理念的双关游戏。特蕾莎原本是16世纪西班牙的一名修女，她自幼罹患癫痫，据说每当病发时就会在昏迷中看到种种幻象，醒来后再将其详细记述。特蕾莎的自述原是本在民间流传的“勾魂销魄”的畅销书，自17世纪特蕾莎被封圣后获得了别样的神圣味道。贝尼尼的雕塑再现了书中的这段幻象：“这支箭已刺穿了我的心，当他把箭抽出时，我感到无限的痛苦和甜蜜，我想把这种痛苦永远地继续下去。”贝尼尼的处理手法赋予这一题材明显的“现代风味”，但在中世纪经院神学的定义里，令圣特蕾莎沉迷或狂喜的金箭代表的是“上帝之爱”，无关“异教神”丘比特所代表的“人间之爱”。

在天使阶位中，与“上帝之爱”直接相关的是位处最高级的炽天使。中世纪经院神学家们认为，上级天使的称号都表明了各自与上帝本质的相似之处。炽天使本名意为“造热者”、“传热者”，以炽热的火焰为象征，是神殿的管理者，由于完全理解了上帝的慈爱而以这爱和理解欣喜地燃烧自己，同时不停地唱着圣歌。弥撒中经常出现的《圣哉经》（*Sanctus*）便典出《以赛亚书》（*Book of Isaiah*）中记载的



与祭祀、圣事相关的乳香

那些三呼“圣哉”的炽天使。14世纪弗兰德斯的神秘主义者扬·范·雷斯堡（Jan van Ruysbroeck）曾宣称：“炽天使不直接过问人间的种种不道德，只有在安息之中、在上帝的无尽的爱中，炽天使才与我们同在。”

相比之下，智天使与凡人的交往远为密切。智天使本名意为“仲裁者”、“知识”。《天阶序论》中将智天使形容为“具有直接凝视上帝之光芒的能力，可以不动情地、纯洁而开放地接受来自上帝的光照”，代表着认知和看见上帝的力量。智天使是在《圣经》中最早出现的天使，但与后世错讹而成的“月老”形象不同，首次亮相是以“伊甸园终结者”的身份出现的：智天使奉上帝之命将偷尝禁果的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并成为“生命之树”的守卫者。倘若说亚当在夏娃诞生时那句“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更富于恋人絮语的味道，两人偷吃禁果后上帝的训斥则直白无误地将亚当与夏娃的关系定义为一场婚姻：“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莫扎特舞台上的凯鲁比诺在疑惑“爱情是什么”，生命之树边的智天使“基路伯”却很明白：上帝照看下的爱情留存在伊甸园中，伊甸园外的人类只享有婚姻。

公元7～9世纪的伪经《亚当的战斗》（*Combat of Adam*）中对这场婚姻有更为详尽的后续描写。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为避免亚当“抵御不了撒旦的攻击”、落入两性关系的陷阱，上帝决定赶紧让他们成婚。此次上帝派遣了炽天使并为亚当带去了黄金和乳香（Frankincense）。在炽天使的安排下，亚当把黄金和乳香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夏娃。在西方传统中，乳香一直与祭祀、圣事相关。古埃及和古罗马的祭司曾大量使用乳香在神庙中制造异香缭绕的神秘气氛，乳香也是犹太教圣殿中所燃的香料之一，现今天主教的重要弥撒中仍常用到乳香。《旧约》前五卷中经常提到乳香，《马太福音》中去伯利恒朝圣耶稣的东方三贤士携带的礼物正是黄金、乳香。如此之多的宗教含意自然使亚当与夏娃的这场婚礼成为一桩宗教圣事。据说亚当与夏娃是以两只右手相击的方式正式确立了婚姻关系，但享受婚姻之前他们还必须斋戒祈祷40天，最终



17 世纪末，意大利雕刻家贝尼尼的作品《圣特蕾莎的沉迷》

礼成是在失乐园后的第7个月零13天。《亚当的战斗》的作者写道：“撒旦反对亚当和夏娃的战斗，就这样结束。”身处21世纪的布洛涅对这个故事的评价是：“以性为天然武器的魔鬼撒旦似乎在婚姻出现之后就已经被彻底打败。从此以后，亚当和夏娃开始联合起来抵抗魔鬼的攻击。”尽管是不被收入正典的伪经，但这个故事似乎仍受到中世纪一些学者的青睐，曾被收入12世纪一部关于婚姻起源的著作中。故事中由象征“上帝无尽的爱”炽天使张罗这场婚姻显然很符合12世纪的口味：炽天使恰好可以与智天使相对应，所谓“知识不曾成就的，由爱来完成”。


法国戏剧家加隆·德·博马舍

婣与礼

有人曾依照《旧约》中的经文推算出亚当被造于公元前4229年，那么他与夏娃的婚礼应当也在这个年份前后。距亚当与夏娃的婚礼大约6015年后，当莫扎特的凯鲁比诺吟唱自己的小情歌时，舞台上也正在热热闹闹地筹备着一场婚礼。凯鲁比诺只是这部涉及婚礼的戏剧里的一个小角色，新郎不是凯鲁比诺，新娘却也不是凯鲁比诺情歌中暗恋的对象。婚礼原本是情歌理想的背景，但全剧更多的是背叛、报复、契约、诉讼。与守护他的名字的无所不知的智天使恰好相反，凯鲁比诺似乎是剧中真正在一无所知地单纯谈情说爱的唯一一人。假如仔细考据，婚礼与爱情之间似乎理所应当但又纠缠不清的亲疏关系甚至体现在这出戏剧“暧昧”的标题上。这部原本出自18世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之笔的名剧有个毫不暧昧的标题：《疯狂一日》(*La Folle Journée*)，另一个标题其实更加家喻户晓，但在不同语言间译名的细微差别却显露出一个事实：即便是在基督教影响下的欧洲，不同地区对“婚嫁”的看法仍然有所差异。

这些差异甚至波及到了200多年后的汉语译名。第一个译本出现在1941年，标题被译为《费嘉乐的结婚》。译者吴达元在1957年修订重印时将标题改译为《费加罗的婚姻》，但在将译文并入1962年出版的《博马舍戏剧二种》时再次将标题修改为《费加罗的婚礼》。虽然一字之差，“婚礼”和“婚姻”在汉语中确实具有不同的含意。“婚礼”意指涉及婚嫁的礼仪，而“婚姻”指的是婚嫁本身。《礼记·昏义》有言：“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更重要的是，“婚姻”在中国传统意义上还涵盖“有婚姻关系的亲戚”，正如《尔雅·释亲》阐释：“壻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谓为婚姻。”《史记》中刘邦可以在鸿门宴上口是心非地与项伯“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新五代史》里耶律德光为赵延寿娶永安公主时，太妃可是实实在在地“至京师主婚礼”。

《费加罗的婚礼》是目前在中国更常见的译名，但追根溯源，博马舍1778年完成的这部五幕“浪漫喜剧”的原标题之一是“Le Mariage de Figaro”，更接近“费加罗的婚姻”。1784年在伦敦考文特花园的皇家剧院上演

时的英语译名也是几乎字对字翻译的“The Marriage of Figaro”。从“婚姻”到“婚礼”的质变发生在1786年，当时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皇帝（Joseph Ⅱ）的宫廷剧作家达·庞蒂（Lorenzo Da Ponte）将它改写为四幕喜歌剧（Opera Buffa）。达·庞蒂本人为意大利裔，歌剧在语言上也跟随当时的潮流选择了意大利语，全剧的副标题因循了“疯狂一日”（La Folle Giornata），主标题却陡然变成了“Le Nozze di Figaro”（费加罗的婚礼）。1790年在柏林上演德语版时，主标题延续了“婚礼”的血脉“Die Hochzeit des Figaro”。似乎出于某种考虑，1793年3月在巴黎上演的法语版同样使用了“婚礼”的概念：“Les Noces de Figaro”。

法语版标题的改变或许并不只是为了与博马舍的原作有所区别。据史料记载，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从剧本完成到正式公演相距6年。1781年剧本就已经被法兰西喜剧院接受，但因没通过审查而被搁置。经过修改的剧本1783年已经获得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认可，在一场宫廷内部演出中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Marie-Antoinette）甚至客串了剧中伯爵夫人的角色，但审查委员会的否决意见使该剧直至1784年4月27日才在奥德翁剧院首演，并将“疯狂一日”用作主标题，如今耳熟能详的“费加罗的婚礼”只是副标题，与1786年5月1日上演的歌剧完全相反。

《费加罗的婚姻》是博马舍的“费加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曾被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热门人物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称为“贵族阶层的终结者”，拿破仑也称它为“法国革命的始肇者”。当年路易十六对这部戏剧有所忌惮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亨特（Lynn Hunt）1984年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所言，1784年间50%的法国作家已经为专业作家，文学市场或作家本身不再受到赞助人的限制，“新词流行，当时的国王也无法采取措施过滤敏感词”，“宪法”、“公民”、“平等”、“自由”等词语成为普通公众的口头禅。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公演后又连续上演了68场，成为18世纪法国票房最高的戏剧。

与许多通俗传记中的记载相反，据音乐学者布罗德（Nathan Broder）考证，约瑟夫二世并没有阻挠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创作，相反，在莫扎特有意谱曲之前，这位终身致力于改革却郁郁不得志的皇帝早已许可了达·庞蒂的脚本。《费加罗的婚礼》公演后在1786年只上演了8场，与日后一年内就上演了100场的《魔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对于身兼城堡剧院经营者角色的约瑟夫二世来说，对演出场次的控制似乎更多出于商业而非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在1789年7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反而再度迎来了上演的浪潮：两年间公演了28场，其中有15场甚至是在1790年2月约瑟夫二世去世、号称“法国大革命最顽固的反对者”利奥波德二世继位之后。1793年1月21日，法语版的《费加罗的婚礼》在巴黎公演前两个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1791年2月，奥地利等国开始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3月底，奥军击败法军直逼巴黎，但这似乎并未影响《费加罗的婚礼》这部来自“敌对国”的作品在巴黎歌剧院上演。

从一部带有革命味道的戏剧到一部似乎无害的歌剧，两部剧本的差别并不只在于幕次的减少、或是以“快乐来自伸出手拥抱冤仇”这样的合唱取代了“贵人长戚戚”这样的嘲讽。标题的更换并非只是文字游戏，如同在汉语里一样，“婚姻”到“婚礼”的用词变化本身已经带来了概念转化，将潜藏威胁的家庭伦理论争装扮成一场爱情玩笑。现代西方婚姻家庭法有三个主要渊源：罗马法、日耳曼法、教会法。欧洲各种语言中对于“婚姻”以及“婚礼”的不同称谓可视为这三种法律的源起与接受史的语源学标本。自从有伊甸园的律法开始，“婚姻”在欧洲历史上原本就是一个以伦理与仪式度量爱情的问题，这三种法律都曾经以自己的方式主宰婚嫁并定义爱情，留下“mariage”、“nozze”、“hochzeit”等等貌似都与“婚姻”有关的词语，但其中“爱情”的比重并不一致。



查士丁尼一世。他组织编纂的《国法大全》是罗马法的重要典籍

父权监管下的婚姻

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在《罗马法的精神》（*Der 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中感慨：“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罗马法”狭义上是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所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缘起自公元前449年的《十二铜表法》（*Lex XII Tabularum*），系统推广开始于东罗马帝国时期，于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us Ⅰ）统治时期达到鼎盛。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法的主体在西欧一度失传超过600年之久。12世纪初，查士丁尼一世组织编纂的《国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抄本在意大利北部被发现，以伊纳留（Irnerius）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尝试以中世纪流行的经文注释方法研究罗马法。这批学者后来被称为“注释法学派”（Glossator），他们为教习罗马法而在博洛尼亚（Bologna）设立的法律专科学校后来成为欧洲最早的大学。欧洲大陆由此掀起了研究、应用罗马法的高潮，史称“罗马法复兴”（Recovery of Roman Law），与“文艺复兴”（Renaissance）、“宗教改革”（Religion Reform）并称为“欧洲三大思想运动”或“三R现象”。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 di Bologna）有“万校之母”（Alma mater studiorum）之称，罗马法也堪称“万法之母”。欧洲大陆的法律基本上都以罗马法为仿效对象，进而形成了欧陆法系的雏形。这一法系被称之为“公共法”（Ius Commune）或者“民法”（Civil Law），被视为整个欧洲文明共有的财富，也成为现今广义上的罗马法。

狭义上的罗马法几乎完全不涉及行政法或者刑法问题，但对所有权、债权、婚姻家庭与继承等私法方面的规范极其详尽。古罗马人相信自己是特洛伊主将之一埃涅阿斯（Aineías）的后代，而埃涅阿斯是爱神的后代，由此衍生出的另外两个信念是：罗马人的英勇源于先天的遗传，同时没有其他民族能像罗马人那样热衷于追求爱情。尽管如此，罗马人在婚姻制度上的管理可远严格于爱神还被称为“阿佛洛狄忒”的时期。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说：“我们本来是完整的，而我们现在正在企盼和追随这种原初的完整性，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如此浪漫的阐释在实际操作上却有些暴力。古希腊作家阿忒纳乌斯的《欢宴的智者》中明确记载：“在雅典，刻克洛普斯第一次实行一夫





鲁本斯绘制的大型连环历史画《玛丽·德·美第奇的生涯》中的一幅，画中记录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与玛丽从肖像相亲到婚礼完成的全过程



15 世纪意大利画家彼埃特罗·万努奇绘制的油画《永恒的祝福》。天使本身无形无体，只有“下凡”时才会以某种具象化身出现



大天使米迦勒

一妻制；而在他出任国王之前，婚姻关系十分松散，男女乱交现象非常普遍。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才认为他有双重天性。在此之前，人们根本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的父亲不可胜数。”希腊的婚姻制度残留很多原始社会色彩。例如在斯巴达等城邦中兄弟可以共有一个妻子，男子还可以要求共享朋友之妻。如果丈夫失去了性能力，必须邀请年轻力壮的人代他生育后代。由于人口过于稀少，古希腊对于娶妻纳妾几乎完全持放任态度。那位“促使千帆齐发”的美女海伦在被拥有爱神眷顾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抢夺之前，早已被另一位大英雄忒修斯诱拐过。《阿提卡史》第十四卷中列出了一份与忒修斯有染的女人清单。作者斐洛考鲁斯强调：“成为忒修斯的妻妾的女人，一部分是因为爱他，一部分是因为遭到了他的强奸，只有一位是因为与他有合法的婚约。”

然而，对于罗马人来说，“婚约”作为“契约”的一种，对于婚姻是至关重要的。现代法律中的契约概念就来源于罗马法中的“合意”(Consensus)规定。罗马法首次提出了契约和侵权行为的不同之处，而之前契约的不履行只被简单地视为一种侵权；与此相关，罗马法还提出了占有（一种事实状态）与所有权（一种权利）的区别，这一区别甚至将影响到婚姻的认定。罗马法中大量关于宗教的规定在现今看来仿佛鸡肋，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却是立法的根本。在以多神教信仰为原则组建起来的罗马城邦中，宗教被视为神与人之间的契约。罗马制定法律一方面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与神的和平。理论上有“神法”(Fas)管辖人与神的关系，另有世俗的“制定法”(Ius)调节市民们在世俗领域的关系，但事实上罗马王执政时期实施的是宗教、法律和道德三体合一的“fas- ius”融合法。罗马王作为城邦大祭司掌控着整个城邦的立法权与解释权，市民家庭中的家父同样作为家族的祭司长获得了对家族成员和家产的绝对支配权。

这种从家族宗教中生成的家父权的支配力显然会扩展到以延续子嗣为目的的婚姻问题上，进入到罗马共和国时代后也未改变。公元 3 世纪的法学家莫德斯丁（Herennias Modestinus）给婚姻下的定义即是：“婚姻是一夫一妻的终身结合，生活各个方面的结合，神法和人法的结合。”在这种婚姻目的支配下，古罗马早期实行的是“有夫权婚姻”(Matrimonium cum

manu)。“cum manu”的字面意思是“携手”，新娘的父亲会在婚礼上把新娘的手交给新郎，意味着将父权交给了丈夫，丈夫变成了妻子的监护人，新娘出嫁后即完全与娘家脱离法律上的亲属关系，加入夫方家族。罗马亲属法认为：处于夫权之下的妻子在家中仅具有与女儿类似的法律地位，甚至会如同被收养人一样发生“人格削减”（Capitis Deminutio Media）等权利丧失状况，丈夫对妻子享有惩戒权等诸多权力，妻子的嫁资（Dos）也归其夫所有。妇女结婚后同样会断绝与娘家家族宗教的一切联系，改祭夫家的祖先，以夫家的亲属为亲属。有夫权的婚姻同时带来了宗教信仰的变更，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德·古郎士（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在1864年的著作《古邦》（*La Cité antique*）中所言：“在古代的希腊罗马社会中，夫妇的结合并非基于情感，而是基于同一崇祀、同一信仰。”“在宗教上和法律上，结婚的结果是由两个共同的宗教的人结合起来，以产生一个第三者，以永传其宗教。也就是说，婚姻是为家族的永久继续而结合的。”

为避免近亲结婚，罗马使用了上溯到共同祖先的办法计算亲等（Consanguinitas）并限制一定亲等范围内的人员彼此通婚。父母与子女之间是一等亲、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是二等亲；旁系血亲则由自己往上数至双方共同的直系亲属即同源人，每经一代为一等亲，因此兄弟姊妹为二等亲、叔侄与舅甥为三等亲。罗马法意义上的“婚姻”同样涉及两个家庭，但在姻亲方面与中国传统上对“姻”的理解不同，配偶的血亲须遵从其配偶的亲等，例如岳父母为妻子的直系血亲一等亲、也是丈夫的直系姻亲一等亲；配偶血亲的配偶同样遵从其配偶的亲等，例如妯娌即以丈夫的兄弟与丈夫的亲等计算，为旁系姻亲二等亲。罗马人将“乱伦”的范围限制到叔伯和姑姨。无论实际执行效果如何，罗马制亲等计算法流传至今，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亲等计算方法。

“婚姻”终究要以“婚礼”的方式呈现，在这一点上西方具有和东方类似的对于“礼不行则上下昏”的信念。在罗马共和时期，有夫权婚姻的缔结主要有三种形式，最简单、也最具原始意味的是“时效婚”（Usus），丈夫或者丈夫的家父因某一妇女与其丈夫连续同居一年而取得对该妇女的夫权，这实际上是罗马法中所有权“时效取得”制度在家庭婚姻关系中的适用，也即将女子视为动产，对其“占有使用”一定时间便取得所有权。“usus”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使用权”、“时效”。在罗马人建城初期抢夺萨宾人（Sabine）的女子为妻时，为使婚姻合法化，以时效婚的形式承认这样的“事实婚姻”是必要的。在涉及婚嫁这类“自然问题”时，拥有爱琴海文明的罗马人并不比太平洋上的美拉尼西亚（Melanesia）部落居民想得更加复杂，后者简单地宣称：“婚姻的目的就是弄到内弟，结果只能到征战对手的部落里去讨老婆。”《家庭史》中对此评价为：“一些所谓原始部族人用明确的语句道出的理论，在西方社会的贵族家庭和王族家庭中，依然极为活生生地存在，这些家庭的联姻政策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无数的例证。”

平民中最经常使用的是“买卖婚”（Coemptio），以“要式买卖”（Mancipatio）的方式达成父权与夫权的转换与交接，这也是“有夫权婚姻”又名“要式婚姻”的由来。“mancipatio”由“manus（手）”和“取（capere）”两层意思合成，是罗马最古老、最典型的即时移转所有权方式，早在《十二表法》以前即已成为惯例。关于要式买卖的具体程序，罗马帝国早期法学家盖尤斯（Gaius）曾做过形象的描述：“使用不少于五人的成年罗马市民作证人，另外有一名具有同样身份的人手持一把铜秤，他被称为‘司称’。买主手持铜牌说：‘我根据罗马法说这个人是我的，我用这块铜和这把秤将他买下。’然后他用铜敲秤，并将铜块交给卖主，好似支付价金。”盖尤斯在这里提到的标的物是奴隶，故而称“这个人”。这种程序和套语只是一种形式，标的物的交付和价金的支付另外进行，铜块也只是被当作价金的象征物，但当时的罗马人非常看重这一仪式，并不认为将它与婚姻相联系有何不妥。在罗马共和国早期物资匮乏之时，“买卖婚”更被视为一种真诚而务实的婚姻仪式。在20世纪以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为代表的人类学家看来，这种婚姻补偿机制符合人类最原始的“有来有往”式婚姻交易体系，而且未必无关爱情。不过，在“聘礼”形式存在的“新娘身价”（Bride Price）补偿体系中，由男方家庭以劳役、实物或金钱的形式支付给女方家庭一笔补偿，“某种程度上，这可以保证回来一个女性配偶，因为让出了自己的姐妹或女儿而收到这笔补偿的兄弟或父亲，可以（甚至应该）立即将其投资进去，以便为自己或儿子找到一个配偶”；但在罗马特有的“嫁资”体系中，则是父系家族要给予一定的嫁资，一是对女儿出嫁后与父系家族脱离关系的一种补偿，二是对结婚后男方因照顾女儿所增加的生活负担给予一定补偿。女儿出嫁必须有嫁妆，开始这只是一种习俗，后来则变成了一种法律规定，罗马法中有许多这样的阐述：“女性要有完整的嫁资方能结婚，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哪里有婚姻的重荷哪里就有嫁资”。

在年代顺序上，“时效婚”和“买卖婚”首先出现，然后才是最隆重也最神圣的“共食婚”（Confarreatio），由于仪式繁杂、耗资不菲，共食婚往往只有贵族家庭才会举行。共食婚与买卖婚同样需要婚约与婚礼上的誓言，最重要的差异是用更具宗教意味

的斯佩尔特（Spelt）小麦糕饼（Libum Farreum）替换铜块作为见证。婚礼前将糕饼供奉于罗马主神朱比特（Jupiter）神位前，以10名以上证人和僧侣为监仪而不是“司称”，新郎和新娘依照一定规程宣告婚誓并共食糕饼，仪式完成后婚姻关系遂成立。

在家父权的鼎盛时期，7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订婚，即便儿子有自己心仪的对象，父亲有权坚持让儿子娶不中意的女子为妻。古罗马法甚至赋予父亲对儿子婚姻的否决权和离婚权，儿子不得拒绝或反对。然而，当罗马进入共和末期后，随着罗马原有多神教的衰落和罗马公民身份的逐步开放，罗马法中一直孜孜以求的与契约相关的“合意”概念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罗马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罗马公民，被称为“公民法”（Jus Civile）。时至共和末年，罗马公民身份的授予已经扩及整个意大利地区，公民法不足以解决新出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因而逐渐形成了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万民法”（Jus Gentium）就此诞生。跟随万民法应运而生的是“无夫权婚姻”（Matrimonium sine manu）。“无夫权婚姻”又被称为“略式婚姻”。罗马法根据转让形式的区别，将物分为要式物（Res mancipi）和略式物（Res nec mancipi）。这一区分为罗马法所独有。依照盖尤斯的定义，“要式物”主要包括公民拥有的土地、房屋、奴隶、可用来牵引或负重的牲畜、乡村地役权等，除此之外的其他物品均以“公共”（nec）的一字之差而被定义为“略式物”。

在无夫权婚姻制度下，女方婚后不脱离娘家，在娘家法律上的地位完全与未结婚前相同：她既是娘家的成员，同时也受丈夫家父权的支配。不过此时家父权已被极大削弱，早期罗马法规定家中子女担任神职即脱离家父权，到万民法时期，僧侣、教士、裁判官、皇室顾问等均可脱离家父权，而且家父如果抛弃婴儿、强令家子与猛兽格斗或使子女卖淫都要丧失家父权。在罗马帝国后期，嫁资已变成妻子带到夫家贴补家用的财产，而不再是单纯的赠予，由此逐渐形成了在婚姻关系解除后丈夫承担返还嫁资义务的制度，女方同时也陆续拥有了离婚权、遗嘱权、子女监护权等权利。尽管“嫁资”一词后来逐渐消亡，但罗马法中由嫁资所体现的夫妻财产分离制度一直保存到现代。更重要的是，作为婚姻仪式的婚礼本身也发生了质变，“郁郁乎文哉”的时代一度远逝。

在古罗马的帝国时期，不必说繁琐的共食婚，时效婚与买卖婚也从仪式上就已衰败。后者是因为“要式买卖”这一繁琐的所有权移转方式本身已经逐渐为其他方式取代、在查士丁尼一世时期被明令废止，前者则是因为“姘合”（Concubinatus）的流行已经不需要如此遮遮掩掩。罗马帝国时期的“姘”并没有中国秦朝李斯《苍颉篇》中“男女私合曰姘”那么强烈的褒贬意味，而是所谓“法不容情”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当时主要基于四种原因：大量外国人不具有公民法意义上的婚姻权，所以选择姘合；不同阶层（如元老院子孙和操贱业者）之间被限制通婚，被迫选择姘合；法律要求女方有嫁资、后期甚至要求男方有婚娶赠予（Donatio Propter Nuptias），迫于经济拮据的男女往往采取姘合；地方议会议员苦于沉重的征税任务，希望避免子孙世袭，故而选择姘合。自由人和女奴的婚姻也是无效婚姻。至于奴隶之间的结合，只被看作一种“同住一顶帐篷的伙伴关系”，甚至双方不被称为丈夫或妻子。在这种背景下，无夫权婚姻逐渐成为以“合意”为唯一必要条件的自由式婚姻，而且成为罗马帝国唯一适用的结婚方式。

查士丁尼一世的功绩并不只在于公元528至534年间组织编纂了由《法典》（*Institutiones*）、《法学阶梯》（*Pandectae*）、《学说汇纂》（*Codex Iustinianus*）和《新律》（*Novellae*）四部分组成的《国法大全》，对于沉浸于世俗爱情中的人们来说，查士丁尼一世比公元3世纪的圣瓦伦丁（Saint Valentine）更切实地赠送了一份礼物。《法学阶梯》中重申：“婚姻是一男一女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合”；“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同意，婚姻不能成立”；“为父者不法地禁止处于父权之下的子女的嫁娶，那么，子女有权通过行省执政官强迫为父者同意他们缔结婚姻和给予女儿以嫁资”；“任何人既不能被强迫缔结婚姻，也不能被强迫重新恢复一个业已离异的婚姻”；“任何一名男性经父母同意，或者没有父母时完全按照自己的愿望，只要双方有结婚的意愿，则婚姻有效”。尽管嫁资未给付，或者就嫁资未写任何文字依据，在这种情形下如同文件写成一样，婚姻是有效的。因为婚姻不是通过嫁资而是通过双方结婚的意愿所缔结。在欧洲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将“爱情”以法律的形式与“婚姻”达成契约，即便此后曾有反复，基于“双方同意”的“合意”原则已然成为缔造婚姻的必要前提。

有夫权婚姻时代留下的三种婚礼没有在词语上对后世的婚礼产生影响，《法学阶梯》中反复使用的“婚姻”（Matrimonium）却很可能影响到了1000多年后的“费加罗的婚姻”。如今人们熟知的英语中的“marriage”或和费加罗更直接相关的法语版本“mariage”，究其起源在语源学上仍是个众说纷纭的公案，但很多线索已经指向“matrimonium”。“matrimonium”通常被认为是“matris”和“munium”两个拉丁词的组合，前者意为“母亲”、“父母”，后者意为“任务”、“责任”，合称为“母亲的职责”，显示出罗马法中“婚姻是在男女间创造合法子嗣的纽带”这一观念，甚至隐现出古希



多梅尼哥·基尔兰达约画作《新娘的嫁妆》

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以“oikurema”（用来照管家务的物体）来称呼女性的味道。“matrimonium”同样是意大利语中“maritaggio”以及西班牙语中“maridaje”的始祖，此外还有英语中关于“婚姻”更堂皇的说法、始见于14世纪前后的“matrimony”。英语里作为婚嫁之事动词的是“marry”，据学者们猜测源自古法语“marier”，而后者源自拉丁语“maritare”（成婚），意为“获得少女（mari）的”。由于罗马法复兴后“matrimonium”在法律以及神学典籍上的广泛应用，该词在欧洲很快普及。在拉丁语族的国家中，“marriage”一族也因此都指示婚姻所需要的各种法律程序，带有某种神圣意味，它最初用于形容“男女之间通过某种特定的结婚仪式而共度终生”见于14世纪初，带有“婚誓、因婚礼而达成的正式誓约”含义则始见于14世纪末。在欧洲的语境中，以“matrimonium”为根基的“婚姻”即便无关“爱情”、也绝对是比“婚礼”更加严肃的伦理事件。

以罗马法来看，用来证明“双方同意”的婚誓是“爱情”之外与“婚礼”最密切相关的。西班牙语沿用至今的“婚礼”（Boda）仍来源于拉丁语“vota”（誓言），但同属拉丁语族的意大利语与法语却似乎焦点有所偏移。在那个词语以另一种方式丰富的年代，拉丁语甚至为婚礼的当事双方都准备了不同的说法：男性结婚使用“ducere uxorem”，字面意思为带有罗马法味道的“引导妻子”；女性结婚则使用“nubere”，意为“蒙上面纱”。古罗马与东方的犹太或伊斯兰世界谁先开始蒙面的传统？这或许又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纠结问题。然而，如果考虑到古罗马海神尼普顿（Neptune）名称的起源，《旧约·创世纪》中“容甚丽、尚为处子、未曾适人、临井汲水、盈瓶而上”的利百加初见以撒时“拿面纱（Veil）蒙上脸”的场景似乎欠缺了一些爱情的浪漫。


DAVID



萨宾人和罗马人同为古罗马文明的创立者，罗马最早的300 名元老中即有 100 名来自萨宾。罗马人和萨宾人之间曾冲突不断，相传有一次罗马人劫掠了大批萨宾妇女为妻，萨宾人进攻罗马进行报复，已为人妻人母的萨宾妇女苦劝丈夫与父兄和好，最终促成两个部族融合。图为反映这一主题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画家大卫的画作《萨宾妇女》

与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相关的意大利语“nozze”或法语“noces”代表的“婚礼”都源自“noptiae”，后者是古典拉丁语“nuptiae”（婚礼）的俚俗化版本，在从“nuptiae”变化到“noptiae”的过程中受到了拉丁俚语中“novus”（新）的影响。“nuptiae”本身演变自“nubere”，与古希腊令人遐想的山林仙女宁芙（Nymphe）相关。宁芙自古希腊后是“bride”（新娘）或更直接的“nuptialis”（适婚少女）的代名词。和潘神（Pan）总纠结不清的宁芙代表的世俗之爱回应了尼普顿名字的来历：古罗马学者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的著作中将尼普顿的命名阐释为东方其实很易于理解的含意：“云（Nuptiae）与海的交融”。古罗马后期以你我相称的婚姻誓言“tu nubere me”绝非师出无名。



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剧照

日耳曼式情婚

在古罗马共和时期，无论是买卖婚还是共食婚，婚礼前还有一项重要的仪式：新郎和他的朋友们在约定的时刻突入新娘的房子，假装以暴力将新娘从她母亲或者（如果她母亲不能在场）她最亲近的女性亲戚的膝间夺走。民间对于这一习俗的解释又回归到“抢夺萨宾女人”事件，苏格兰人类学家麦克伦南（John Ferguson McLennan）在1896年出版的《原始婚姻》（*Primitive Marriage: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Form of Capture in Marriage Ceremonies*）中将此引申为：“象征性的抢劫发生在缔定某种婚姻契约之后……婚姻通过讨价还价商定，而偷窃和绑架随后作为认同的表现使婚姻有效……抢劫是协定的，并且有婚约在先。如果先无婚约，事情就是一件实际的绑架了。”

然而，在后来的日耳曼人看来，即便真的是“绑架”也没什么不可以，只要是以“爱情”的名义。布洛涅的《西方婚姻史》中记载：“日耳曼人就是这样，他们的婚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家庭决定的正式婚姻，伴有给新娘父亲或监护人的礼物，另一种是被称之为‘情婚’（Mariage d’affection）的比较松散的结合。‘情婚’是‘体面的同居’，无需举行正式仪式，也无需父母参与。只要男女双方同意或者把女孩子抢到手，就算结婚了。这种结合所生的子女不是合法子女。但是，在某些日耳曼法律里，如果父亲愿意或者他没有别的继承人，这样的‘私生子’就不会完全丧失继承权。各日耳曼国家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丹麦把私生子排除在继承之外，瑞典为了不能继承而给予私生子一些补偿；而在伦巴第，大概还有法兰克，私生子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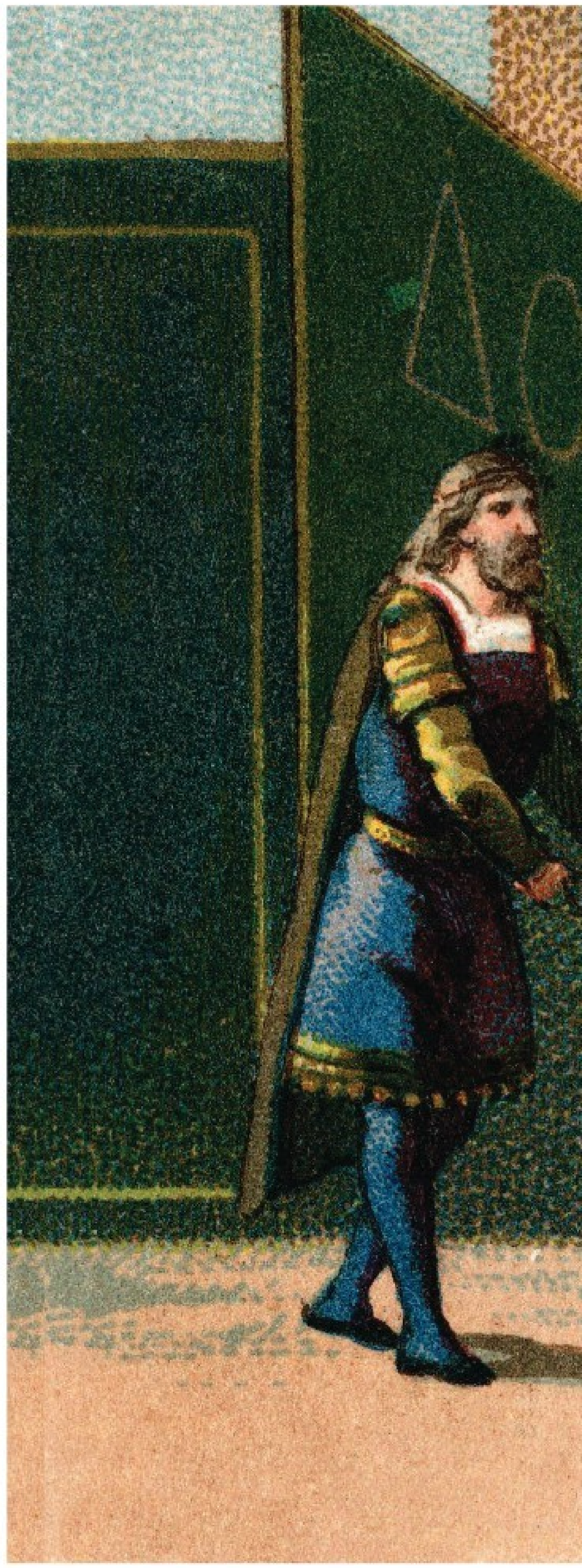
有继承权……‘情婚’并非就不稳定，双方彼此忠诚的程度提高以后，这种结合看起来就和正式婚姻一样。‘情婚’中的妻子受法律保护：谁和她同床了，谁就得付给丈夫一笔赔偿金。在大家庭里，实行‘情婚’似乎是为了让即将成年的小伙子耐下心来，先有个地位低的女人或女奴，再等着结一门更为称心如意的亲事。”

布洛涅所说的“某些日耳曼法律”日后将构成现代婚姻法的又一渊源，在当时则为罗马人带来了陌生而又颇为刺激的爱情观。公元5世纪日耳曼部落大举南迁，两度洗劫罗马并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反客为主地入驻欧洲中部与意大利半岛。这种只因听闻“三秋桂子”便挥鞭南下的魄力与手腕几乎也赶得上一场“情婚”，而“抢婚”成功后这些日耳曼小伙子们似乎也确实安静下来了。20世纪的德国历史学者卡勒尔（Erich Kahl）在《德意志人》（*The Germans*）中写道：“当日耳曼诸部落带着其朴素而原始的野性征服土崩瓦解中的罗马帝国时，他们所遇到的是难以捉摸而又无法逃避的力量，这种对罗马名称的尊崇，成了日耳曼征服者对罗马和基督教的一切东西都怀着矛盾心里根源：他们既要忠实于他们的日耳曼出身，又要忠实于他们获得的罗马的尊崇。”“他们试图从令人羡慕的外国文化中寻找榜样，来抵消对那种混乱状态感到绝望的情绪。”

狭义概念上的日耳曼法就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5世纪末，以法兰克王国为代表的各个日耳曼人王国开始将过去不成文的习惯法编纂为法典，著名的有5世纪末西哥特王国的《欧里克法典》（*Code of Euric*）、5世纪末6世纪初法兰克王国的《萨利克法典》（*Lex Salica*）等，其中又以《萨利克法典》影响最为深远。日耳曼人是征服者，但他们的母语暂时并没有成为法律领域的优势语言。这些法典大都用拉丁文写成，虽然使用了若干罗马法术语，但并没有规定社会成员所应遵守的一般规则，而只是记载了一些具体案件的判决。以《萨利克法典》为例，总共只有65款，与成熟的罗马法相比，这种近似约法三章的法典实在过于简陋。当时谁也不会预想到，日耳曼人这种近似结绳记事的立法形式日后会发展出一个独立法系：基于判例法（Case Law）的海洋法系。假如说如今的大陆法系（Civil Law）与罗马法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法系（Common Law）就更多地承接了日耳曼法的衣钵。大陆法系重视编写法典，每一个法律范畴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法典里有明文规定；海洋法系则是判例之法而非制定之法，作为判例的先例



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与勃艮第公主克洛蒂尔达的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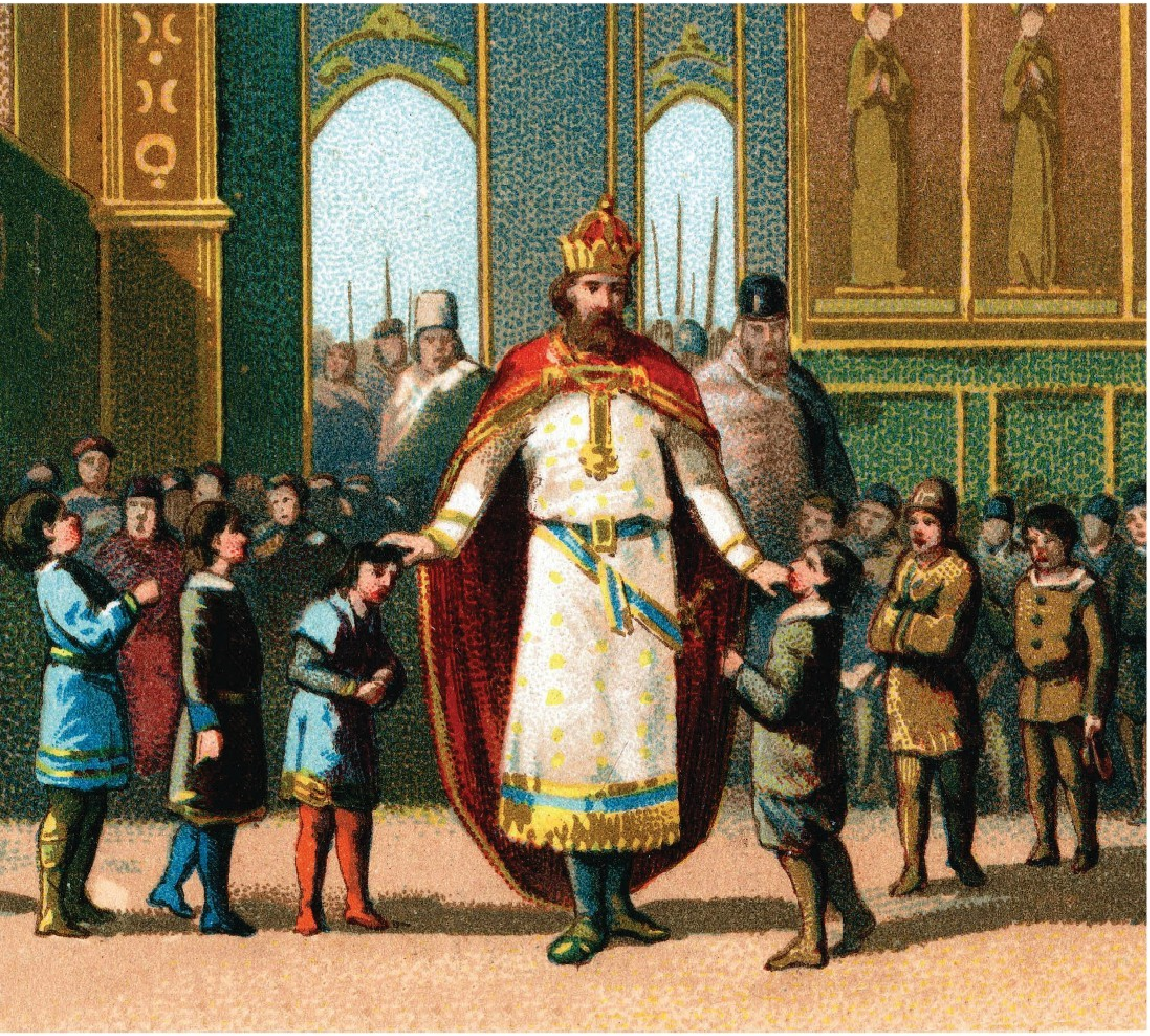


对其后的案件具有法律约束力，成为日后法官审判的基本原则。

中国近代法学家李宜琛在《日耳曼法概说》中这样比较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罗马当时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有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之称，所以支配当时的法律就形式说是严密精确，就内容说是主张意志自由、充满了个人主义的思想。日耳曼法的产生虽在罗马法之后，但因为是农业社会的法律规范，所以反映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没有成文的法典，只有习惯的聚集，法律的内容也大都是支配服从义务拘束的关系，不过可以说是富于团体本位的思想。”

恩格斯曾提出日耳曼法就是古代的马尔克法。“马尔克”(March) 的原意是边界，后成为日耳曼人农村公社的名称。其主要特征是以地缘作为联系纽带，土地公有和私有并存：各户的耕地已转化为私有财产，但森林、牧场等仍归公社所有。公社成员彼此平等，他们定期集会，选举公职人员，制定大家共同遵守的法规，裁决公社成员间的纠纷。与其说当时入侵罗马的日耳曼人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部落的联合体，各部落散落地分布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按照早年习惯依公社组织定居。日耳曼传统认为，统治者是人民的代表，他要受制于人民的意见，而且恒久的习惯是在日积月累中产生的，它绝不可能被国王创造，因此不允许国王破坏他们先前制定的法。排除征服者的虚荣与傲慢，这种顽固的传统恐怕也是当年日耳曼法必须存在的原因之一。

公元6世纪中期，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出兵击溃东哥特（Ostrogoths）王国、并将《民法大全》带回意大利。此后东罗马在意大利统治的核心地区直接使用罗马法。然而好景不长，公元6世纪末期，东罗马帝国对意大利中北部的统治又被新到来的又一支日耳曼部落伦巴第人（Langobardi）驱逐。建立伦巴第王国后，伦巴第人也编纂了自己的《伦巴第法令集》(*Edictum Rothari*)，执法时依照日耳曼惯例实行“属人”而非“属地”原则，即罗马法与日耳曼法并存，虽然同样是在罗马，罗马人应用罗马法，日耳曼人应用日耳曼法。更准确地说，当时西欧的情况是：西哥特人（Visigoths）、勃艮第人（Burgundians）、伦巴第人、法兰克人（Franks）、撒克逊



查理曼大帝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兴办学校，并对各阶层的男孩开放

人（Saxons）等部落的法律都与罗马法并存，但各部落法律原则上都只对本部落人具有效力。日耳曼人南下初期，不仅在同一个王国之内几种法律可以并存，而且几种类型的婚姻也可以并存，同一城市里可以建立不同类型、受不同类型的法律管辖的婚姻关系。关于日耳曼法为什么要使用如此烦琐的属人原则，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做过一番不失浪漫的分析："日耳曼的各部落被沼泽、河泊、森林所分隔，甚至在凯撒的著作里还能看到，他们喜欢分居。当这些部族分开的时候，他们全都是自由、独立的；当他们混合的时候，他们仍然是独立的。无论分开还是混合，每个人都被按照本部落的习惯和风俗裁判。各族共有一个国家，但又各有自己的政府。在这些部族离开他们的家乡之前，他们的法律精神就已是属人的了，他们把属人法的精神又带到了他们的征服地。"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以气候、"风土"区分不同地区人们气质



公元 306 年召开的艾尔维拉会议。此后基督教会开始制定并公开发布具有法令效力的教令

的说法更加浪漫，只是常常自相矛盾，似乎并不那么“法的精神”。在情感问题上他首先将“爱情”视为南方的强项：“在北方的气候里，爱情在生理方面几乎没有力量让人感觉到它。在温暖的气候里，爱情带有成千种的附属物；有些东西乍一看来像是爱情，使人感到喜悦，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爱情本身。在更炎热的气候里，人们是为爱情本身而爱爱情。爱情是幸福的唯一泉源；爱情就是生命。”但在随后的论述中温暖的气候又成了南方式情欲的元凶：“在南方的国家，人们的体格纤细、脆弱，但是感受性敏锐；他们或者是耽于一种在闺房中不断地产生而又平静下来的爱情，要不然就是耽于另外一种爱情，这种爱情给妇女以较大的自由，因而也易于发生无数的纠纷。在北方的国家，人们的体格健康魁伟，但是迟笨，他们对一切可以使精神焕发的东西都感到快乐，例如狩猎、旅行、战争和酒。你将在北方气候之下看到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的人民。当你走近南方国家的时候，你便将感到自己已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在那里，最强烈的情欲产生各种犯罪，每个人都企图占别人的一切便宜来放纵这些情欲。在气候温暖的国家，你将看到风尚不定的人民，邪恶和品德也一样地无常，因为气候的性质没有充分的决定性，不能把它们固定下来。”

无论孟德斯鸠的理论是否有理，来自北方的日耳曼部落在习俗与伦理观上显然需要一个风土适应的过程。尽管日耳曼部落是征服者，但简单的“蛮族”（Vulgar）一词便足以令西罗马帝国废墟上识文断字的罗马人获得虽败犹荣的语言优越感。同样，虽然如今在实际应用上大陆法系可以与海洋法系平起平坐，但“出身低微”的日耳曼法在法律史上总难免被罗马法乃至“罗马法复兴”的光芒衬托得黯然失色，以判例为基准的审判方法也渗透出游牧部落年代流动法庭的马鞭味道。因循部落草莽习惯的日耳曼法曾派生出司法决斗、神明裁判等令人诟病的粗暴裁判制度，但即便不考虑它留下的“判例裁决”这一看似浅显、之前却无人敢于提出的司法体系，北方部落风格的粗犷与直白使日耳曼法在婚姻问题上为爱情敞开了比“风尚不定”的南方人民敢于想象的更多的空间。日耳曼法以近似“抢婚”的方式冲入古典文明世界，在未来即将取得之前罗马法从来不曾梦想到的爱情主宰权，而它初期那些看似鄙俗的判例原则、属人原则以及团体本位思想，日后却将搭建出一张令整个基督教世界震惊的婚床。

不过，在公元5世纪末，日耳曼人的各王国还基本保持着与罗马“情婚”的蜜月期。各部落成功地赶走了罗马皇帝，却未想到还有一个更棘手的对手。公元313年，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和东罗马皇帝李锡尼联合颁布了《米兰敕令》（*Edictum Mediolanense*），给予基督教以合法地位。直至公元337年临终受洗，君士坦丁都不曾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但在他统治时期，信奉基督教成了晋升国家高级职位的一条捷径。经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基督教的地位已不可动摇，终于在392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廷刚站稳脚跟一个世纪，却发现帝国的土地上换了一批脾气莫测、经常内部都彼此意见不一致的新主人，颇似不巧赶上改朝换代的使节。公元493年，一场婚礼改变了罗马教廷与日耳曼人之间的关系。据《论法的精神》描述，由于同意大利毗邻，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征服的地区更好地保存了罗马法并乐于接受，在这些地区罗马法甚至已经成为属地法；法兰克人、撒克逊人的地区相反，对罗马法的认同较差。因此，一场法兰克国王与勃艮第公主之间的联姻对于教会来说是幸运的。更幸运的是，这位勃艮第公主克洛蒂尔达（Clothilde）自幼在天主教环境中长大，她与国王结亲的经过也颇似一场王子救美的爱情故事。也许是“爱情”的力量造就了奇迹，公元496年的圣诞节，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Clovis Ⅰ）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不过，施洗前罗马教廷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求：“接受基督教就必须接受罗马法，因为教会是根据罗马法生活的（Ecclesia vivit iure Romano）。”

克洛维一世履行了诺言，在公元507至511年间组织学者编纂了《萨利克法典》，将罗马法与日耳曼习惯法融合在一起。公元306年艾尔维拉会议（Council of Elvira）召开后，基督教会已开始制定并公开发布具有法令效力的教令（Canon）。此时距君士坦丁皈依还有31年，教令显然只对所有基督教社团具有权威性，为主教们提供了审理基督徒之间纠纷初步可依据的法律。公元314年，君士坦丁在阿尔勒城（Arles）召开的大型宗教会议确立非世俗意志是唯一合法的教会法规来源，正经、伪经、宗教会议颁布的教规构成了教会法典主要渊源。公元496年，希腊修士小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Exiguus）应教皇邀请来到罗马，将此前的会议法令与教规编成《狄奥尼修斯汇编》（*Collectio Dionysiana*），这成为西方拉丁教会法的基础。同年教皇格拉修斯一世（Gelasius Ⅰ）提出“双剑论”：在基督那里，本来是君主、教主合为一体的，但基督深知人的弱点，便在尘世中将这两种职能分开，将两把剑一给君主，一给教主，并令他们互相提携。格拉修斯一世否定了之前罗马皇帝拥有“牧师－国王”双重身份的权力，提出国王在精神事务上服从主教，而主教在世俗事务上服从国王。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为“教皇君主制”的形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虽然依照“双剑论”教会的势力不应渗透入世俗法领域，克

洛维一世的皈依却实际上使罗马教会一箭双雕地同时获得了一名虔诚的信徒和一位大体上靠得住的世俗立法官。

克洛维一世一生只娶了一位王后，没有给罗马法规定的合意原则和一夫一妻制惹什么麻烦，克洛蒂尔达后来还成为法国民间的新娘保护神。但依照属人原则，克洛维一世无法控制其他日耳曼国王的选择，更难以预料200多年后自己的一个子嗣会因为婚姻问题与教会闹得不可开交，而届时争吵的问题以日耳曼的婚姻观来看实在是小题大做。

物权爱情

在罗马法与教会看来，传统的日耳曼婚姻观实在过于“蛮族”。日耳曼法中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个人的权利义务受到家庭和氏族制约，这一“团体中心”特点也影响到它对婚姻的管理。重视血亲团体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作用，这是日耳曼法谈及嫁娶时的一大特征。“情婚”可以出自一时血脉贲张，但在日耳曼的“体面婚姻”中，新娘始终是婚约的标的物，而非当事人：男女双方家庭达成协议，由男方支付新娘身价给女方家庭，女方即被交付男方为妻，而无须女方本人同意。在婚后的家庭中，男性拥有家长权与夫权。丈夫有保护妻子之责，也有惩戒妻子之权，只是虐待妻子将引起妻子家庭的干涉。在财产方面，虽然实际上都由丈夫管理和处分，但理论上实行共同所有制，并承认已婚妇女可拥有自己的个人财产。

日耳曼法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又确认国王和贵族可一夫多妻。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做法因为都对血脉和财产的延续有利而被同时认可。在“何以确定婚姻”这一问题上，与古罗马法中书卷气的“合意”原则迥然不同，出身山野的日耳曼国王们毫不掩饰地亮出了“女人是在就寝时赢得亡夫遗



意大利画家希皮奥内·普尔佐内的作品《圣母的婚礼》

产的”这句俗谚。在日耳曼法的婚姻世界里,爱情已经不只是“基路伯天童”模样的丘比特，而是回归到它更原始的厄洛斯状态。

日耳曼法中将与“情婚”相区别的“体面婚姻”规定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订婚,然后是婚礼,随后就寝。《西方婚姻史》中记载:“这与罗马法截然不同，根据罗马法，只要夫妇双方同意，婚姻就足以有效。在罗马法学家看来，两个不在场的人举行婚礼或者和一个不能生育的男人举行婚礼都合法。日耳曼人的看法则相反，他们认为性的结合是婚姻的基础。婚礼的第二天，丈夫要对妻子有所赠予，这才是婚礼的第三阶段，强调了肉体结合的必要。”“在日耳曼法中，如果说将权力从父亲手里移交给丈夫时把管理妻子财产的事也交给了丈夫，那么唯有肉体的结合才能使夫妻在法律上成为一体，并把财产变为夫妻共有财产。可以说，只有这种事实上的婚姻——在日耳曼人的两种类型的婚姻(‘情婚’和由家庭决定的正式婚姻）里都是如此——才构成婚姻关系。婚礼的其他两个阶段只不过是将父权向丈夫移交。如此说来，尚未基督教化的日耳曼人的婚姻可能只有一种类型，即以肉体结合与丈夫给妻子‘童贞费’为象征的事实婚姻，其余的都只不过是购买父权以及合法地处置遗产。”

虽然已经基督教化而且“体面婚姻”的数量越来越多，以“爱情”为旗帜的“情婚”的魅力似乎是难以抗拒的。日耳曼法与罗马法之间第一番关于“爱情”的交锋发生在公元7世纪，也即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的时代。查理曼大帝一生娶了5位王后、废了2位，另有5位被讳称为“侍妾”(Concubinage）的情妇，育有13个嫡出的孩子、7个私生子。罗马法对于离婚的限制并不严格，只要双方不再合意就足以构成，但对于刚在摸索制定教会法、试图将婚姻神圣化并纳入教会管理的罗马教廷来说，查理曼大帝的需求却是个棘手的难题。公元3世纪，教会接受了罗马法中以“订婚－婚礼”二阶论承认完婚的概念，就此解决了圣母的身份问题。如今查理曼大帝却以未曾“圆房”(Consummationem）为由要求教会不认可完婚、判决婚姻无效，确实有点超乎时任教皇哈德良一世（Adrianus Ⅰ）的脑力范围。据说哈德良一世曾因此谴责查理曼大帝:“这是异教徒的做法！”

尽管如此，查理曼大帝还是在死后得到了封圣，与他相关的一些似有若无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现在听来已经不会导致类似公元824年那名修道士弥留状态时的噩梦。据说这名修道士看到了因生前放浪而在地狱中被折磨的查理曼大帝。这位扑克红桃K原型的一些故事虽然过于传奇，仍令人好奇揣测：倘若查理曼大帝的爱情如同他所向披靡的军队一样横扫欧洲，结局会是怎样？最令人遐想的故事莫过于查理曼大帝与东罗马帝国伊琳娜女皇之间似乎真有其事的联姻计划。公元800年，心高命薄、一直倚仗查理曼保护的教皇利奥三世（Leo Ⅲ）因看到东罗马帝国欠缺男丁、只拥戴了一位女皇，便想出为查理曼加冕罗马帝国皇帝、以此既“报恩”又羞辱东罗马帝国的办法。查理曼从此拥有“查理曼大帝”的尊号，但他对帝位的想法显然与利奥三世大相径庭。据说就在加冕后几天，58岁的查理曼致信48岁的伊琳娜女皇，建议两人结婚，从此统一全欧。可惜的是，公元802年查理曼大帝的求婚使者刚到君士坦丁堡不久，女皇就被宫廷政变废黜。查理曼大帝的最后一任皇后确实死于公元794年，不过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致信伊琳娜女皇时，他已经拥有了第四位侍妾，并于翌年得到了第四个私生子。公元803年，伊琳娜女皇死于流放地。当年查理曼大帝确实没有结交新欢，也没有新的私生子，只是在第二年才接纳了第五位侍妾，又多了两个私生子。直至公元814年去世前，查理曼大帝不曾再有皇后或伴侣。

查理曼大帝比为他加冕的教皇利奥三世多活了两年，比谴责他的哈德良一世多活了近20年。继承了日耳曼人澎湃热血的查理曼大帝为罗马教会留下的最后一点体面是：他一生中的几个女人都是相继认识的，无论是皇后还是侍妾，从来不曾同时正式拥有两个妻子。所以，他没有违反罗马法的一夫一妻制，从日耳曼法看也不算通奸。对于罗马教廷来说，这不过是“consummationem”首度被恼人地赋予别样含意。大约8个世纪之后的1530年，英语中由此派生出的一个新词，“consummation”将会更令人恼火地嗡鸣在教廷内外。曾经羞于以自己的语言制定法规的日耳曼人甚至在语言上也发起了逆袭，日耳曼传统婚姻中次日清晨的那笔“晨礼”悄无声息地伴着古高地德语的“morgangeba”与古英语的“morgengifu”潜入拉丁语，为中世纪拉丁语增添了一个新的婚礼表述“matrimonium ad morganaticam”(晨婚)。

日耳曼法与罗马法对于婚姻判定的差异，其实不只因为对“爱情”本身的尊重与否，而是源于两种法系对于物权归属的差异。日耳曼法认为对物的每一种利用权都是一种独立的权利，是对于特定财产的全面支配；罗马法则认为，对于财产的全面支配是一种具有弹力的所有权。换而言之，日耳曼法中对财产的支配是量的差异，而罗马法中则是质的差异。此外，日耳曼法中对于物的利用权的变动、支配权的变动均伴有对于物的占有（Gewere）的变动，对于物的占有与对物的利用权、支配权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罗马法中对物的支配权与表现该支配权的占有（Possessio）是严格区别

的。承继了马尔克公社式的“团体本位”思想，日耳曼法的物权具有社会性，而罗马法的物权却是一种纯粹的、私法上对物的支配权，人与人的关系根据亲属权、债权而成立。搞清楚这一番定义便容易理解，为什么罗马法可以相对轻松地将合意原则作为“资源匮乏”时婚姻成立的基础，而日耳曼法执著于“婚姻关系成立的重点在于转移新娘的监护权，即家长或家族团体将新娘的监护权转移给新郎或其家族”。

对于防范乱伦的亲等界限也能显示出两种法系在古典时代对于爱情的斟酌：与罗马制用上溯到共同祖先的办法计算亲等的方法不同，日耳曼模式使用了横向计算的“人体结构”：从头（始祖）开始沿着手臂向下数，一个关节算一个亲等。这种算法将所有兄弟算成一等，与其说按称谓计算，不如说按辈分计算。日耳曼模式的亲等计算带有游牧部落式的“宁错勿滥”原则，以至于教会立法计算亲等时都不按照罗马法行事，而“屈尊”按照不曾经历过扩大乱伦范围的日耳曼人的方法计算。查理曼大帝一生执著于红粉，在避亲问题上却能做到严格自律，丝毫不曾越轨。

日耳曼文化为欧洲语言留下的婚姻用词远不止“晨婚”，无论是“婚礼”还是“婚姻”本身，距离拉丁语较远的英语和德语都留下了更具日耳曼部落文化特色的词语。与“子嗣”或“面纱”之类相比，这些词语更多带有原始的誓言与“团体本位”特色。当18世纪费加罗家中那点事的歌剧版本以“marriage”的译名出现在英语中时，译者也许更想强调这一事件更加静态的拉丁意味。但作为一名罗马舶来者，“marriage”在英语中的“辈分”显然不及更加古老、且与歌剧名对应的“wedding”（婚礼）。“wedding”源于古英语“weddung”（被定过约的），而其中最关键的“wed”源自日耳曼语的“wadjojanan”，意为“发誓或约定做某事”。“wed”词根与“誓约”相关的意味还保留在德语等其他印欧－日耳曼语系的语言中，例如德语中的“wette”（赌注），唯有在英语中延展出与婚姻相关的意味。由于“wed”的存在，英语中还有一个与婚礼相关的颇具古意的说法：“wedlock”。据史料记载，“wedlock”最初用于表示“已婚”是在13世纪初，它源自古英语“wedlac”，由“wed”和“-lac”两部分构成，前者仍是“发誓”，后者则是为带有“动作”、“进程”含意的名词后缀（“lock”是“-lac”演化后的变形）。“-lac”可以在20多个古英语词汇中看到，例如“feohtlac”（战事）。在英法之间始终联姻与战火并存的漫长历史里，“wedlac”可以和“feohtlac”搭配成完美的情诗韵脚。如今唯有“wedlock”保留在现代英语中，或许该称为幸事。

在最固执地保留了原始日耳曼语种种因素的德语中，可以见到与婚娶相关最花哨的词语，堪称当年日耳曼人婚嫁文化的缩影。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德译本标题中使用的“hochzeit”（婚礼）源自中古高地德语中的“hōhzīt”以及古高地德语中的“hōhzīt”。前缀“hoch”的词源为“hu”，意为“肿胀”、“增大”乃至“怀孕”，早期只用于形容大型的部落庆典活动，自中世纪晚期开始用于描述世俗的或教会的庆典。“hochzeit”强调结婚乃至同居（Verpartnerung）典礼期间举行的各种仪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更正式、更隆重的“婚礼”（Eheschließung）一词的讲解。“eheschließung”由“ehe”与“-schließung”两部分构成，前者在古高地德语中意为“永恒”、“律法”，在现代德语中意指“婚姻”；后者则意为“闭合”、“完成”，颇令人想起那张令罗马法侧目的婚床。“ehe”及其衍生出的很多词语经常见于与婚姻相关的法律术语，不过日常德语表示“已婚”更常见的说法是“Ich bin Heirat”。其中的“heirat”源自古高地德语“hīrāt”。男女结合为一个家庭的过程及其结果，也即“家庭”本身最初被称为“der hîrât”，后来才出现了“die Eheschließung”和“Vermählung”。“hīrāt”为组合词。“hī”可追溯至古德语的“hiwa”（房屋，家务）以及“kei”（躺下），此处带有“安顿”之意；“-rat”与“raten”（劝告）、“reden”（谈话）同源，最初意为“必要的生计手段”。



《征服者威廉》，19世纪夏邦提耶的铜版画。描绘威廉一世为镇压长子反叛返回法国时落马受伤



古罗马主神朱庇特和朱诺的婚礼。朱诺是掌管婚姻的女神，是生育及婚姻的保护者

两者结合，颇能令人想象出一些模拟经营类游戏中的帐篷、炊烟、小红心。

从语源学的残留上可以隐约看出，当年日耳曼法与罗马法在婚姻与爱情问题上的纠结近乎“鸡同鸭讲”。从结果看，英国和德国显然比法国或意大利在实际距离或心理上都与罗马距离更远，虽然广义而言的德语地区始终抱有自己定义的罗马帝国梦想，后来还以继承或光复罗马法为己任。在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时代，法兰克人或许会因为查理曼大帝式的非正式婚姻而感到耻辱，其他日耳曼部族却仍我行我素地享受着自己的习俗。但教会对如何使用自己掌握的那柄剑也越来越熟练，逐渐强行推行这样的概念：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种婚姻。教会反对两种类型的“低级婚姻”：罗马人的“姘居”和日耳曼人的“情婚”。“情婚”被等同于“姘居”，这种婚姻所生的子女没有继承权。公元 863 年，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成功地否决了查理曼大帝的后代罗退尔二世（Lothair Ⅱ）的离婚案。1035 年，尽管被父亲罗贝尔一世（Robert Ⅰ）郑重地当着所有廷臣指定为诺曼底大公爵位的继承者，身为私生子的纪尧姆（Guillaume）仍不得不从姨妈一支寻求微弱的血缘证据，以此说服教廷支持自己的继承权。纪尧姆后来跨海去了英国，成为大名鼎鼎的“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但从纪尧姆王位的缘起上论，实际上是教会“征服”在先。21 世纪美国法学家伯尔曼（Harold J. Berman）将基督教与王权视为日耳曼法中的两个动态因素：“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因素导向了日耳曼法自觉、公开的变化，一方面是基督教对法律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跨地域和跨部落王权的建立。”伯尔曼的名言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听起来也很近似于 2000 多年前教皇格拉修斯一世的口吻。时至 11 世纪，一切已经很清楚：合法的基督教婚姻在欧洲获得了胜利。不过胜利背后真正的赢家并非“爱情”。如今教会不仅想管继承也想管婚姻，自古希腊罗马时代





意大利威尼斯画派代表画家提香·韦切利奥

起就隐现在婚姻背后的父权角色再次更换了新面孔。

天上与人间的爱

1514年，25岁的画家提香（Tiziano Vecelli）在威尼斯接受了一份婚礼定制油画的委托。500年后的今天，这幅油画的身价已经超过收藏它的罗马博盖塞美术馆（Galleria Borghese）整个建筑加全部展品的总和。1899年，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尝试以400万里拉的价格收购这幅作品，但被博盖塞家族拒绝。至今它仍是意大利最神秘的油画，在绘制完毕后的100多年里，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说明它的含义。1608年，作品被博盖塞家族的红衣主教西皮欧内（Scipione Borghese）收藏，1648年首次出现在家族的藏品目录中，但只标注为“16世纪20年代威尼斯画派作品”。1693年，藏品目录赋予它一个益发朦胧的标题：《神圣的爱与世俗的爱》（*Amor Sacro e Amor Profano*）。

标题另一个更为通俗的译名是《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21世纪的观众一般很难真切理解，“amor”（爱）字本身在这里出现就带着神秘意味，尽管这是一幅婚礼定制作品。欧洲各地历史上有关“婚姻”或“婚礼”的称呼众多，奇怪的是词根后缀中却很少见到“爱”的痕迹，几乎仿佛是在刻意规避，或者暗含了那个年代的某些避讳。少数的例外之一是英语中表示“伉俪”的“match”。类似含义的“couple”（配偶）源自拉丁语的“copula”（纽带），还是略显“冷淡”，但“match”源自古英语的“mæcca”（成双），而“mæcca”的源头终于带了些感性的味道：原始日尔曼语的“gamakon”（情意相投的）。词根“mak-”或“mag-”意为“相配”，在它的统率下有一批温馨的词语：古萨克森语中的“gimaco”（伙伴），古高地德语中的“gemach”（舒适）。“couple”进入英语是在13世纪前后，本土的“match”则在14世纪晚期开始具有“配对”的动词含义。“match”在随后两个世纪的词义扩展似乎暗藏了婚姻观中某些微妙的变化。15世纪前后，开始出现“竞争”含义；16世纪90年代，增加了“使平等”的意味。

现代英语中“match”又一众所周知的含义是“火柴”。这很容易令人愉快地想起汉语中的说法：“擦出火花”。



提香画作《神圣的爱与世俗的爱》

可惜，如同汉字繁简变化期间很多字被合并一样，作为“伴侣”的“match”和作为“火柴”的“match”并不拥有同样的始祖。表示“火柴”的“match”在英语中始见于14世纪末，源自古法语“meiche”（灯芯）以及拉丁俚语“micca”或“miccia”，拉丁语的最终源头或许是“mucus”。它最终的原始印欧语的词根“meug-”的含义有些不那么严肃：“黏滑的”。火柴会有这样的鼻祖，据信是因为油灯的灯芯下垂时让人想起鼻涕。

当然，16世纪初的人们在面对“婚礼”乃至“爱情”的定义时不会接纳“鼻涕”甚或其他更油滑的意象，尽管“火”的概念在基督教世界里确实和“爱”有关。为颂扬上帝之爱而生的炽天使就以火焰为躯体，“seraph”的名称本身也与“seraphim”（燃烧）相关，只是“seraphim”与“serpent”（巨蛇）的关联让人怀疑这种炽热之爱中令人愉悦的成分。依照语源学考证，“serpent”之所以会与“seraphim”同源，是因为这种巨蛇的毒液使人感到火烧火燎的灼痛。

另一个同样火光四射的词“passion”（激情）问题更为复杂。自16世纪80年代后，“passion”确实具有了与“爱”相关的含义，但它的拉丁词根是“pati”，意为“经受”、“忍受”。如今人们更多享用它“激情四射”之类的含义，但在10世纪前后是用来表示“基督受难”的专有名词，在13世纪时又扩大泛指所有殉教徒的受难。倘若将“passion”与“seraphim”一道归属为“指向天上的爱”，它在16世纪末增加的有关“爱”的含义却又暗含实际操作的过程，更接近人间的或世俗的爱。

提香这幅无名作品在1693年首度拥有标题时，距离费加罗系列剧作诞生只有不到100年。当歌剧舞台上的凯鲁比诺询问“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他最初使用的也是意大利语的“amor”。与“amor”相同，法语的“amour”或是西班牙语的“amor”都源自拉丁语中的“amorem”。然而，1514年提香为那场婚礼创作时，是否真的将主题确定为现今意义上的爱情，从画作标题的缺失上便足以存疑。倘若追溯回“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命题诞生的中世纪，“amorem”及其衍生的各词语本身能否等同于今天概念上的“爱”都成问题。

如同日耳曼法一样，中世纪在自信拥有更密集信息获取渠道的现代人眼中总容易被黑暗化。至少就中世纪教会而言，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1928年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中有段论述其实更为公允：“中世纪教会是一个封建化的教会，它处在封建社会里并属于封建世界，但它从来不像懒汉般照样接受所看到的现状……在极大的程度上，它具有领导的品质和倡议改革的力量。它以伟大的勇气和勤劳（虽然它的言行不一定相符）竭力造成一个更好的封建欧洲，竭力纠正封建政府和封建社会的缺点、暴行和弊病。中世纪教会虽然未曾企图推翻封建社会，但力求管理封建制度，希图从旧传统和旧惯例里建立一种新的建设制度。”

面对终日不是吵吵闹闹就是异想天开的欧洲诸王国，中世纪时罗马教廷要处理的麻烦绝对不比今天美国纽约那栋著名大楼里少。在管理婚姻家庭的问题上，要扮演好“蛮族”们德高望重的父权角色，教会首先得洁身自好地把自己的立场与逻辑彻底整理清楚。棘手的是，《圣经》本身就给教会遗留了一道难题。

《创世记》中，在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之前，上帝就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为由使“二人成为一体”，在两人被驱逐出伊甸园后又认可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并生了该隐，使夏娃相信：“神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恰如《西方婚姻史》中指出的：“事实上，为了使各种说法不相互抵牾，应该承认亚当和夏娃有两次婚姻：一次在伊甸园，另一次在犯了原罪之后。伊甸园是为一对没有情欲的夫妇准备的纯洁圣地，在那里上帝已经规定了体面的婚礼，规定了没有罪恶激情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可以让人不带激情地受孕，没有痛苦地生产。这就是后来


北翁布里亚国王爱德维

所谓的‘责任婚姻’，是‘为了履行职责’而制定的婚姻。换而言之，婚姻是为了种族繁衍，而不是为了满足当时还不存在的性欲。犯了原罪之后，色欲出现了，因此，‘作为对策’，必须制定第二种婚姻当作一味治疗人性弱点的妙药，以避免人类‘违反道德的冲动’。”

这一逻辑后来成为基督教意义上“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的基本出发点。幸运的是，当谈及“灵魂”问题时，当时各国“蛮族”们的接受能力远高于罗马传教士们的期望。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编年史家及神学家贝德（Bede）在公元731至732年完成的《盎格鲁人的基督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中记载，北翁布里亚（Northumbria）的国王爱德维（Eadwine）打算改信基督教，在做出这个重大决定之前，他想同在场的贵族们讨论一下。出席会议的一位贵族说：“在我看来，国王，我们生活在尘世的一生中，许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打一个比喻：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您坐在这里吃晚饭，周围是文武官员，房间里生着火，暖融融的，而外面大雪纷飞。一只迷路的麻雀突然飞了进来，穿过大厅，然后又返回到外面的黑夜里。当它穿过房间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冬天的严寒，但是一瞬间立刻就过去了，它又消失在暴风雪里。它的经历，陛下，我感到像人的一生一样：我们对人生的过去和未来一无所知，如果新的信仰给我们带来希望，那么，我们听听它怎么说。”这段与中国距它近1000年前的“白马过隙”有异曲同工感染力的文字在西方被誉为“中世纪最优美的散文”。足以证明“天上的爱”对人间情爱支配力的例证是，当意大利教士格兰西（Flavius Gratianus Augustus）在12世纪初编纂《教会法汇要》（*Decretum Gratiani*）时，他有足够的信心表示：“约瑟夫被称为‘圣母玛丽亚的丈夫’，起初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肉身的结合，而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上互相照应、精神上互相爱慕，后来他们才有完成的婚姻。”

从实际操作上考虑，罗马法中对于婚姻的“合意原则”也不能忽视。对于出自部落理念而建立的总体对女性不平等的日耳曼法来说，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婚姻应自由缔结”、“婚姻应不受任何胁迫干扰”的中世纪教会法提升了婚姻中的女性地位，同时也增加了“爱情”在婚姻中的比重：只要两人相爱，男女的结合即构成合法的婚姻。当然，前提是不触犯亲等或社会地位戒律，同时禁止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婚姻。用格兰西的话说：“对任何人的爱都不应成为放弃信仰的理由。”不过，在后一问题上，早期的教会仍为“爱情”留下了足够的选择空间。一方面，非基督徒夫妻可能有一方成为信徒，由此问题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虽然从法律上讲基督徒可以离开自己不信奉上帝的配偶，然而格兰西承认这样做并不恰当：“如果非基督徒愿意和自己的基督徒配偶生活下去，后者出于爱心应该同意。这固然是为了感化对方，使之成为基督徒，但也是为了不伤害对方的感情。”

然而，离婚再娶却因为阻碍了已经由教会主持缔结过的婚姻而成为大忌。当“婚礼”经过冗长的神学辩论被正式认可为七大圣事之后，接受过婚礼的配偶所受的限制已经如同接受过洗礼的信徒一样，等同于接受天父管辖与否的原则问题。借助基督教早期相当于“法官”角色的使徒保罗（Paulus）及其宗徒的名义，1439 年召开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综合性说明了婚姻圣事的道理：“第七件圣事是婚配圣事；这件圣事，按保罗宗徒所说的，是基督与其教会结合的标记。”圣保罗的见解主要见于《新约》的《以弗所书》（*Epistle to the Ephesians*）。《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在约公元 60 ～ 61 年在罗马的监狱中写给小亚细亚的以弗所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书中提到：“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自己乃是身体的救主。教会怎样服从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服从丈夫。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好圣化教会，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洁净教会，他好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没有斑点、皱纹或者任何这类的病，好使它成为圣别，没有瑕疵。丈夫也当照样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使徒保罗相信男人与女人的“奥秘的婚姻”是信徒与耶稣的深度关系的预先尝试，最终目的是“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自《约翰福音》（*Gospel of John*）开始，基督就被比喻成新郎。《约翰福音》中记载，约翰的门徒告诉约翰说，有许多人都到耶稣那里去了；但是约翰并未因此失望，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段话被神学家们阐释为：“众门徒如同新妇，必要归于他们的新郎，就是基督；约翰自己并不是新郎，乃是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不能夺去新妇；约翰他自己不要夺去基督所当得的门徒，却因基督得了众人更加喜乐了。”



古罗马哲学家、神学家圣奥古斯丁

其实《旧约》的《以赛亚书》就曾把以色列人描述成上帝的新妇。《新约》出现后，“基督的新妇”（Bride of Christ）被转借成为“教会”的隐喻说法。因为相信基督将基督徒与他之间的关系比作一个婚约、指向世界末日后天堂中的婚礼，由教会见证过的人间的婚约与婚礼也变为神圣不可侵犯。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得出决议：婚姻圣事的成因（Causa Efficiens）是由于男女彼此言明自己对此婚姻的同意，而且“婚姻的好处有三：第一是生育子女，并教导他们恭敬天主；第二是夫妻该互守信用；第三是婚姻的不能拆散性。它即因此而成为基督与教会不能分离的标记。虽然夫妻可因对方犯奸淫而分居（不同房），但绝不可再和别人结婚，因为合法婚姻的婚姻束缚是永久的”。

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中指出：“教会的婚姻法部分地依赖于两种婚姻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是作为在上帝面前两个人自愿结合的婚姻圣事概念，二是作为在教会这一社团性实体的法律体系内的一种法律行为的婚姻圣事概念。而家庭法的系统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教会当局对于婚姻圣事的管辖权方面。从对婚姻案件的管辖权中，发展出处于整个教会法体系中

的由各种法律准则、原则、概念以及规则构成的一种相对完整的次级体系。因此，尽管家庭法不乏其自身的结构特色，例如，其包括婚姻的有效与无效、婚姻的解除、秘密婚姻、婚姻承诺、分居、子女的合法化以及婚姻财产等，但它也具有整个教会法体系的结构特色，一种体现就是它对婚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强调。”

这种“稳定性和持久性”在一个世纪后就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因为这种以教会为代表的天父监管下的“爱情”毕竟不同于现代乃至凯鲁比诺所在的18世纪的概念。凯鲁比诺说：“我想把一切讲给你们听／新奇的感觉我也说不清／我有时兴奋，有时消沉／我心中充满火样热情／一瞬间又感到寒冷如冰／幸福在远方向我召唤／转眼间它又无踪无影／不知道为什么终日叹息／一天天一夜夜不得安宁／不知道为什么胆战心惊／但我却情愿受此苦刑。”这段唱词与下面文字颇有相似之处：“我还没有爱上什么，但渴望爱，并且由于内心的渴望，我更恨自己渴望得还不够。我追求恋爱的对象，只想恋爱；我恨生活的平凡，恨没有陷阱的道路……爱与被爱，如果进一步能享受所爱者的肉体，那为我更是甜蜜了。我把肉欲的垢秽沾污了友谊的清泉，把肉情的阴霾掩盖了友谊的光辉；我虽如此丑陋，放荡，但由于满腹蕴藏着浮华的意念，还竭力装点出温文尔雅的态度。我冲向爱，甘愿成为爱的俘虏……我得到了爱，我神秘地带上了享受的桎梏，高兴地戴上了苦难的枷锁，为了担受猜忌、怀疑、忧惧、愤恨、争吵等烧红的铁鞭的鞭打。”

如果回归原文，两段文字中的“爱”都源自“amorem”。熟知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人知道，凯鲁比诺的疑惑是源自他私下对已婚的伯爵夫人的爱恋，但后一段文字中“爱”的指向却完全不同。在中世纪经院神学的视野里，“amorem”代表的是不诉诸肉体的“神秘之爱”，多用于神学。但凡用于尘世，也只意味着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在提香的画作可以使用“amor”的标题之前，这种爱甚至被剥离出夫妻关系之间：涉及“伉俪之爱”的是“affectio”（情感），由于过于亲昵而不登大雅之堂。

《圣经·新约》在公元4世纪的拉丁文译者圣哲罗姆（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就对爱情婚姻和世俗妇女有许多过激的批评。他认为，艳丽的女子不独模糊男人的理性，而且腐蚀他的品格、消磨他的志气。丈夫即使是热爱自己的妻子，在道德上也与通奸同样低下，因为他把妻子当成了情人。然而，在“更恨自己渴望得还不够”这段文字的作者看来，“男女相聚符合神意，也保证了上帝创造的人类得以延续，所以有亚当和夏娃；但肉身的结合之成为必要却是原罪的结果。婚姻是美好事物不仅仅是因为子女的生育和抚养，夫妻两情相好也是自然之美；但不为生育而进行的性爱却是邪恶的”。



意大利16~17世纪画家卡拉瓦乔

与提香同时代的画家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曾经为比圣哲罗姆更相信“男女相聚符合神意”的先人画过一幅肖像。他就是在基督教世界鼎鼎大名的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那段热情澎湃的文字出自他40岁时撰写的《忏悔录》（*Confessiones*）。虽然同被封圣，两位几乎处于同时代的圣人早年的经历完全不同。圣哲罗姆出生于公元347年，19岁左右就受洗，早年热衷于修辞学和希腊罗马哲学，但很快就为基督教禁欲主义所吸引，一度到叙利亚沙漠中苦修。公元382～385年在罗马担任教皇秘书，受命修订《新约》的拉丁文译文，并在当地的贵妇人中间提倡守贞修行的生活。公元385年，哲罗姆与他的追随者前往巴勒斯坦，在那里建立数座修道院，从此再未离开。与此相比，出生于公元354年的圣奥古斯丁受洗时已经33岁，是在中年才确立的基督教信仰。

圣奥古斯丁的父亲是个非基督徒，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由于教会禁止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婚姻（当时教会已经开始将“婚礼”视为圣事，基督徒中聋哑人都因无法口述自己的意见与誓言而不能举行婚礼，非基督徒更不可能），圣奥古斯丁是以“私生子”的身份诞生的，出生后并未接受洗礼。少年时期的圣奥古斯丁才华洋溢，放荡不羁。他16岁赴迦太基求学，17岁与一乡下女子同居，18岁育有一子，19岁受西塞罗的《霍尔登修》（*Hortensius*）影响接受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信仰，20岁完成罗马帝国

规定的三级制教育学业，22 岁在迦太基教授雄辩术，26 岁写了第一本论文《美与均衡》，后来受新柏拉图主义鼻祖普罗提诺（Plotinus）的影响而放弃摩尼教。30 岁起跟随米兰主教安波罗修（Ambrose）学习天主教信仰与神学，并与同居十几年的情人分手，跟小他 18 岁的少女订婚。在研究了各种宗教与哲学后，32 岁的圣奥古斯丁对生命有了悔悟，终于在 33 岁接受洗礼。

著作等身的圣奥古斯丁后来被誉为“罗马帝国时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在那个非基督教世界还在为“姘居”与“情婚”争论的年代，他提出“回避两性关系比回避什么都重要”，并将原罪和性欲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然而，也许是早年的经历影响，他在《论婚姻之益处》（*De Bono Coniugali*）中又有些自我矛盾地论证说：“夫妇一方不顾对方的意愿单独守贞是不可取的，会导致其配偶犯通奸罪”；“与异教徒结婚的基督徒可以帮助自己的配偶成为信徒；基督徒夫妇可以互相督促，按照基督教的道德生活”；“老年夫妻之间精神上的相亲相爱感人至深，青年夫妇若能守贞，他们心灵相通的爱情又要伟大许多倍”；“已婚者虽不能像修士和修女那样全身心地侍奉上帝，还是能尽其所能地走上帝指引的路”。



卡拉瓦乔画作《胜利的爱神》（绘于 1602）

卡拉瓦乔绘制的《圣奥古斯丁》是 2011 年才被发现的，创作时间约是 1600 年前后，也即画家 28 岁之时。此前这件作品一直被认为是 17 世纪某位画家的匿名作品，修复之后画面上一些手法的特质才揭示出它真正的作者。在艺术史学者看来，它“显示了卡拉瓦乔安静的一面”。卡拉瓦乔更为人所知的是他放荡不羁的一面，本身如同使徒多马（Didymus Judas Thomas）一样对基督教充满质疑的卡拉瓦乔既绘制过圣哲罗姆的肖像、又绘制了圣奥古斯丁的肖像，这已经显示出文艺复兴时对爱情与婚姻问题的价值观。就在完成《圣奥古斯丁》前后，卡拉瓦乔创作过一幅《胜利的爱神》（*Amor Victorious*），17 世纪早期的一本回忆录将画中的模特称作“切科”（Cecco），可能是弗朗西斯科•伯内利（Francesco Boneri），1610 至 1625 年在艺术圈中颇为活跃的一个人物，人称“卡拉瓦乔的切科”（Cecco del Caravaggio）。画中的小爱神手持弓箭，踩踏着象征战争的科学器具以及象征和平的艺术作品。画中强烈而又暧昧的现实性正是一直令当时的人们对卡拉瓦乔难以认同但又为他着迷之处。据和卡拉瓦乔同时代的人记载，卡拉瓦乔甚至多次使用罗马的一名高级妓女充当作品中圣母的模特。

与四处游荡、39 岁就不明身亡的卡拉瓦乔相比，几乎一直身在威尼斯、活了 86 岁的提香要含蓄很多。20 世纪的学者对于提香那幅标题暧昧的作品还考证出新柏拉图主义的来源：源出古希腊神话的主管理想爱情的“阿弗洛狄忒•乌拉尼亚”（Aphrodite Urania）以及主管肉欲爱情的“阿弗





美剧《都铎王朝》剧照

洛狄忒·潘得摩斯”（Aphrodite Pandemos），也即“天上的爱神与人间的爱神”。这一典故同样出自于以哲学的名义大谈爱情的《会饮篇》。筵席上的包萨尼亚是名法律专家，他区分了天上的爱神和人间的爱神：根据《神谱》记载，天帝乌拉诺斯（Uranus）被他的儿子砍碎投入大海，海里涌出的白浪，变成了爱神，这就是“天上的爱神”。“人间的爱神”则是《荷马史诗》中记载的由宙斯和宙尼（Dione）所生。尽管包萨尼亚所说的“爱”与如今最经常适用的范畴略有区别，但他提出的“被爱者接受爱者的爱是为了增进品德”这一假设还是通用的。包萨尼亚认为，如果被爱者屈从爱者的目的在于得到爱者的帮助、以便在哲学或其他品德上更进一步，这种屈从就并不卑鄙也不算谄媚，爱情与对学问道德的追求也就此合为一体。也许足以令包萨尼亚欣慰的是，至少在形而上的论证上1000多年后他还能在北方“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的人民”当中找到一个知己：黑格尔在论及美的生成条件时认为，美是自由与无限的，超然于人的欲望和征服之外。爱神的消解作为欲望与节制冲突的结果，使美神从爱神的躯体中抽象出来。

在提香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看来，包萨尼亚界定的两个爱神的说法与《会饮篇》中对“爱欲”（Erotic）讨论的一个重要结论完全一致，也即是要倡导高贵、超越低级肉体需要、朝向永恒的不朽之爱：出于天上的、年老的美神引起的爱神所促成的情爱是高贵的、精英式的，而出于地上的、年轻的美神引起的爱神所促成的情爱则是低贱的、大众式的。另一方面，包萨尼亚又说：“如果爱神只有一个，厄洛斯也就只有一个；如果阿芙洛狄忒有两个，厄洛斯也就必定有两个。”这个曾令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纠结的“erotic”正是源自古希腊的厄洛斯，其本意是指任何强烈的欲望，却随着两个爱神的出现而变成了一个灵活的舵手。12世纪的教令集中早已明确：“教会在基督面前有两种不同的地位：以生命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教会的前途来说，教会是基督的新妇。以教会与基督的联合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教会与基督的亲密来说，教会是基督的新妇。”既然人间婚姻是天上的爱的缩影，爱情在婚姻中的比重也应如此把握。然而，原属“天上的爱”的“passion”自16世纪末就已经具有与“人间的爱”相关的含义，于是和提香画作相关的另一个谜题浮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

出水面：画面上的两位爱神一位保留了古典式的裸体，另一位盛装华服，究竟哪一位是天上的爱神，不仅不同时代将给出不同的答案，当时的教会和画家心中也早就暗藏了自己的见解。

两个爱神的存在为柏拉图恋情留下了回旋舞台，凯鲁比诺可以在舞台上坦言自己对伯爵夫人的爱恋也是源自于此。更重要的是，中世纪教会法以“神秘之爱”（Amore）留下的这个缺口为欧洲各国基于封建效忠而鼓励的骑士爱情文化留下了转机。如同武侠小说般的骑士小说毕竟有其矫情之处，如同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一样，中世纪经院学者们小心翼翼雕琢出的“神秘之爱”也难以避免所谓“去奢侈化”（Deluxurilization）。一旦小说的浪潮退去，对“爱情”的操控权也将随之重归世俗，更不必说日耳曼法中潜藏的杀机在1530年爆发，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问题彻底将罗马教会历经百年获得的经由婚姻入主世俗法的父权全盘否定。相形之下，尽管18世纪末欧洲仍在纠结费加罗遇到的麻烦是属于“婚姻”还是“婚礼”，一切只不过是“天上伦理”残存的一点表面装饰泡沫。

骑士的爱和国王的婚姻

欧洲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一个伦理概念是：“婚姻”是神圣的、与基督相关的，而“婚礼”是人间的、属于夫妇双方的，自12世纪起教令集中就明确指出：婚礼上新郎与新娘才是完成圣事的“主体”，神职人员不过是“在场”而已。因此费加罗的婚礼可以只被视为“疯狂一日”，费加罗的婚姻却不能儿戏。

博马舍的戏剧事实上还是关于婚姻的，囊括了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许多与婚姻相关的概念，虽然“疯狂一日”的标题使它显得似乎只是有关爱情。故事大致如下：17世纪，西班牙塞尔维亚郊外阿尔马维拉（Almaviva）伯爵的府邸中，伯爵的贴身男仆费加罗（Figaro）当天要和伯爵夫人的首席女佣苏姗娜（Suzanne）成婚，费加罗正欢天喜地地准备婚礼，苏姗娜告诉他伯爵以嫁妆要挟，想实现他曾经宣布要放弃的“初夜权”（Droit de Seigneur）。费加罗听后决心给伯爵点教训。此外，管家玛塞林娜（Marceline）痴心地想以一张债据作为要挟与费加罗成婚，给她出主意的是医生巴托洛（Bartholo）。在“费加罗系列三部曲”的第一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Le Barbier de Séville*）中，正是费加罗帮助伯爵从巴托洛手中“抢”到贵族小姐罗西娜（Rosine）为妻，因此巴托洛打算在10年后费加罗自己的婚礼上进行报复。坏人当然不会得逞。经过一番走马灯式的胁迫、躲藏、发现、换装、误会、错认，最后费加罗完好无缺地迎娶了苏珊娜，心怀诡计的人受到了适度的惩罚，一切在谅解的氛围中告一段落。

当年引起最大争议的是费加罗在婚礼当晚因误会苏珊娜对伯爵做出让步时愤怒的谴责：“不，我的大人，您得不到她！……就因为您是一个了不起的贵族，您就自以为是个天才！爵位，财产，官阶，地位——你们会使一个人变得多么傲慢！您何德何能享受这些？您不过是出生时费了把力气，除了这些又与平民有什么差别？！我被埋没在平民中，为了谋生不得不花费更多心思去学、去算、去练，这些本事早就足够统治西班牙全境100年！”可以料想，莫扎特的歌剧中删去了这段“檄文”，达·庞蒂为同一场景重新创作的脚本将矛头指向女性，在一段名为《睁开你们的眼睛》（*Aprite un po' quegli Occhi*）的咏叹调中，费加罗唱道：“世上的男人，睁开你们的眼睛！女人是有刺的玫瑰、诱人的雌狐、微笑的母熊，再不要被她们迷惑！”不过，在第一幕增加了一个博马舍原剧中没有的段落。当费加罗听说伯爵心怀不轨后，他唱了段在旋律上剑拔弩张的小调（Cavatina）：《想要跳舞？我的小伯爵》（*Se Vuol Ballare, Signor Contino*）。显然，达·庞蒂与莫扎特有自己的玩儿法。

凯鲁比诺在戏剧中的法语姓名是“Chérubin”，比他的意大利化的姓名更接近直白地指向智天使“cherub”。在吴达元的译本中，他的名字被译作“薛侣班”。虽然从发音上和“薛蟠”有本家之嫌，但形象绝对大相径庭。关于这个人物，博马舍在剧本开始的人物介绍中写得很清楚：“这个角色只能依照老办法，请一位很美丽的年轻姑娘扮演。我们的戏班里还找不到一个年纪轻轻但相当成熟的男演员，能充分领会这个角色的细腻情绪。在伯爵夫人面前显得非常胆小，在别的地

方却是一个在女人身上并不怎么老实的可爱的孩子。抱着惶惶不安和缥缈不定的愿望，就是他的性格的基础。他恨不得赶快到了结婚的年龄，但这也并不是因为有什么计划，有什么认识；他是不管什么事情都喜欢参加的；总而言之，任何母亲心里也许都愿意有这样一个儿子，虽然她会因他而感觉十分痛苦。”在莫扎特的歌剧中，凯鲁比诺也是由次女高音（Mezzo-soprano）反串扮演的。

享有“智天使”名字的凯鲁比诺在伯爵家的地位并不高。英语中有个老笑话：“贵族和书的共同点是什么？‘标题’（Title）和‘页码’（Page）。”“标题”是因为“title”也用作“头衔”，而凯鲁比诺就是那个“页码”。在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骑士制度中，“page”被称为“侍从武士”，一般是指14岁以下、跟随某一贵族学习如何成为骑士的男孩。所谓的“学习”其实并不比在平民阶层的工匠那里当学徒复杂多少，基本就是替所效忠的贵族送信打酱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最广为人知的咏叹调就是费加罗开导凯鲁比诺的《再不要去做情郎》（*Non più Andrai*），然而，在12世纪之后，“情郎”的角色已经成为骑士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世纪法国史学家高梯叶（Émile Théodore Léon Gautier）在《骑士制度》（*Chevalerie*）中提出典型的骑士制度有三个组成部分：封建主义的结构和影响，教会的约束和指导，最后就是以“骑士爱”（Amour Courtois）为核心的爱情婚姻观。

由于堂吉诃德和他的魂牵梦绕的杜尔西内娅（Dulcinea del Toboso）的推广，“骑士爱”的形式一直到今天都栩栩如生。作为概念，一般认为是在近代由法国文学史专家帕利斯（Gaston Paris）在1883年提出来的，他以此来描述12～13世纪西欧传奇文学里骑士和他的女士的关系，认为“前者对后者崇拜敬爱，后者令前者变得高贵勇敢”。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家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在《爱的比喻》（*The Allegory of Love*）中也指出“骑士爱”是一种特别的爱情，“以谦恭、礼让、婚外恋和爱的宗教化为特征”。

除去《堂吉诃德》这样以“镜中世界”的方式歌颂“骑士爱”的作品之外，骑士文学大多要设法完成一项左右互搏的使命：一方面要





因为与古罗马月神同名，法王亨利二世的宠妃戴安娜成为当时许多有关月神的绘画与雕塑的模特



1152 年 3 月 21 日，埃莉诺与法王路易七世离婚

称颂夫妻之间的和谐与情爱，另一方面要以夸张的手法美化贵妇人和她的崇拜者的关系。卡佩拉努斯（Andreas Capellanus）据信是 12 世纪后半期法国香槟女伯爵玛丽（Marie de Champagne）的一位廷臣，被后世视为“骑士爱”的经典理论著作《爱情论》（*De Amore Libri Tres*）就是他应玛丽的要求创作的。《爱情论》中有多处明确地提到爱情不可能存在于夫妻之间。最明显的一个事例是：一名出身小贵族的已婚女子拒绝了一名出身高阶贵族的男子的追求，理由是她已经有相爱的丈夫；该男子回答说爱情（Amor）与夫妻感情（Maritalis Affectio）不是一回事，后者光明正大，没有互相嫉妒的成分，带有延续后代的目的，甚至夫妻之间的抚爱也是婚约的一部分，不完全是因为情深意笃；他们两人的争论最后由香槟女伯爵玛丽进行裁决，结果玛丽支持那位贵族男子的看法，认为婚姻与爱情不可能并存。

因为是“私人定制”作品，后人甚至难以明确地知道卡佩拉努斯本人是否赞成爱情与婚姻不相容。卡佩拉努斯《爱情论》的开篇将“爱情”定义为：“一种内在的痛苦，其根源是穷思苦索异性之美，其结果是相爱的双方都祈望拥抱对方并服从爱情的每一道指令”；“情人就像一名尽职的士兵，为自己所爱的女子经历各种苦难而在所不辞”。卡佩拉努斯在创作风格上颇受古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影响，所描述的“骑士爱”却与奥维德笔下的爱情大相径庭。他相信爱情是一种情欲，但是一种令人高尚的情欲：“爱情能把粗俗之人改造得体面雅致，能赋予出身低微者以高贵气质，能化傲慢为谦卑。被爱情俘虏的男子乐于为他人服务，而且用情专一。”然而中世纪重磅打造的“天上的爱”卡佩拉努斯也没敢忘却。在《爱情论》第三章里，安德里阿思强调：爱情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那毕竟只是人间之男女情爱。在天国之爱的层次上，人间情爱是没有地位的。

卡佩拉努斯的《爱情论》完成于英法百年战争的前夕。当时的读者肯定会读出别样的味道，因为委托者的母亲可不是如同杜尔西内娅那样只需要“按照意愿对她的相貌和品德进行想象”的“世界上最高贵的公主”，英法之间即将燃起的连绵战火也不是风车大战式的儿戏。

香槟女伯爵玛丽是法国国王路易七世（Louis Ⅶ le Jeune）与阿基坦的埃莉诺（Aliénor d' Aquitaine）的长女，而埃莉诺在法国史书上是个令学者们爱恨交集的名字：她的婚姻造就了未来英法之间延续上百年的领土纷争。1137年，因家传而拥有大批法兰克周边领地的埃莉诺在14岁时嫁给了16岁的路易七世，8年后生下女儿玛丽。据说活泼的埃莉诺与丈夫一本正经的家人及廷臣相处得并不愉快，但这无损路易七世花尽心思、金钱来满足她大大小小的所有愿望。在民间传说中，埃莉诺后来对路易七世失去兴趣是因为后者刮掉了胡子。另一种说法是，路易七世是名虔诚的基督徒，还发起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过于频繁昼夜礼拜和忏悔使埃莉诺受到了冷落。

婚姻末期，埃莉诺因与当时只是诺曼底公爵的亨利二世（Henry Ⅱ Curmantle）私通，所以多次尝试令婚姻被宣布无效，却被教皇犹金三世（Eugenius Ⅲ）拒绝。教皇甚至亲自命令埃莉诺与路易七世再度同床。几个月后，埃莉诺终于怀孕，但生出来的却仍是女儿，法国的臣民借此要求路易七世让婚姻被宣布无效，路易七世选择了顺从，但实施判决的不是国王。1152年3月21日，四名大主教在得到犹金三世批准后宣布婚姻无效。已经30岁的埃莉诺回到自己的领地后，派遣使者要求当时只有19岁的亨利立即前来迎娶。据记载，1152年5月18日，两人在“没有与他们身份相称的仪式下”结婚。1154年，亨利加冕为英格兰国王，开创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埃莉诺则成为英格兰王后，她在上次离婚时被分配到的部分法国领土并入英格兰治下。亨利二世晚年期间，他与埃莉诺所生的几个儿子时常叛乱。亨利二世认定是埃莉诺怂恿，自1173年起囚禁埃莉诺，直至他于1189年在法国去世。亨利二世晚年有数名情妇，曾秘密请求教皇允许他与埃莉诺离婚但是未获同意。埃莉诺再未嫁人，于1204年在英格兰一家修道院去世并葬于此地，终年81岁。

这类当时还可以用“骑士爱”来诠释的“孽缘”在300年后将会发酵出更具剧情戏（Drama）的结果，但在“言情”（Sentimental）方面恐怕不及于此。更久之后托尔斯泰所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能在20世纪以后能获得更多的认同，但在16世纪之前的罗马教会看来并非如此。除继承自罗马法的“合意原则”外，在婚姻问题上罗马教会还执著于承接自圣奥古斯丁的一个信念。20世纪美国神学研究者雷诺兹（Philip Lyndon Reynolds）认为，圣奥古斯丁对于婚姻思考的核心是将婚礼与洗礼对比：“正如洗礼使一个人无法挽回地成为教会成员一样，丈夫与妻子一旦结婚，婚姻就不可解除。洗礼过的基督徒离开教会并没有失去教会成员的身份，这种关系仍然保留，但不是为了个人拯救，而是对他（或她）的惩罚。即使他因成为通奸犯、异端被教会开除教籍也仍是如此。同样，只要丈夫和妻子都活着，婚姻关系就存在。如果一个人与配偶离婚后再婚，原来的关系仍然保留，且要对他进行惩罚。即使一方因另一方通奸而合法离婚也仍然如此。”正因为婚姻还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结合不可解除的标志，教会法坚持：“合法缔结的婚姻是不可解除的，除非有一方撒手尘寰。否则即便另一方成为异教徒、失明、得了麻风病或遭受其他重大不幸，婚姻仍要继续。”在教会法看来，“从一而终”不单单是对爱情的诗意表达，它更像是确认责任。

对于可以导致婚姻被判废除的婚姻障碍，古罗马法中定义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性功能障碍，二是亲等障碍，三是社会地位障碍。尽管承认有通奸、异端、残酷无情三种原因可导致实际上只是分居的“分食分寝式离婚”（A Mensa et Thoro），被各种圣言束缚的教会法只规定了两种婚姻障碍：一是血亲、姻亲及教亲障碍，二是胁迫。中国传统上的“无后为大”在罗马教会法的尺度上倒会被视为某种有利修行的善举。倘若夫妻双方坚持以此申诉，唯一可以被判决婚姻无效的方法是男方与一两位“富于奉献精神的公众女性”当众操作验证。依照16世纪之前的教会法逻辑，虽然婚姻的好处之一是生育子女、而且不为生育而进行的性爱是邪恶的，但是夫妇一方不顾对方的意愿单独守贞是不可取的，因为会导致其配偶犯通奸罪。以“天上的爱”拖延或许已经没有“人间的爱”的婚姻，这是当时罗马教会面对诸多想利用教会法与世俗的日耳曼法之间真空地带的王室诉讼的通用方法。然而罗马教会还是忽略了日耳曼法潜在的判例力量。在1152年埃莉诺与路易七世的“离婚诉讼”中，埃莉诺一方因提出“亲等障碍”的理由而虽败犹荣，达成了自己的目的。这一理由将像武功秘籍一样在英格兰传承后世，400年后再度因爱情驱动让教会左右为难。

在《费加罗的婚姻》中，玛塞林娜想阻挠婚礼的武器是一张借据，借据上有费加罗白纸黑字签署的“不还债就抵人”的契约。尽管间隔近2000年，古罗马时代的买卖婚依旧在欧洲存有余响。倘若不是审判中费加罗突然被发现是玛塞林娜与巴托洛失散的私生子，缺乏这类“亲等”铁证的费加罗当天还真的无法迎娶苏珊娜。但玛塞林娜终究只是插曲，影响这场婚姻的真正冲突焦点还是所谓“初夜权”，也即自欧洲中世纪存在的一种领主与奴仆的新娘同宿第一夜的特权。这一习俗依照考据最早源自原始人类将血视为不洁物的恐惧，因此产生了对神献祭、对客人献身等不同的风俗。以21世纪的眼光来看，初夜权显然会被

归入“陋习”，但自中世纪起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甚至被视为领主对奴仆婚姻的一种关爱。

一切的源头仍要倒推回传说中“亚当、夏娃的婚礼需斋戒祈祷40天才礼成”。尽管同样被列为“伪经”，《亚当的战斗》和《多比雅书》（*Tobit*）中关于人间婚姻的一些禁忌仍在早期教会法中有所体现。所谓“多比雅三夜”（Tobias Night）是指传说中多比雅在婚后三夜禁止撒旦接近床榻。后来引申为新婚夫妇在得到婚礼祝福以后的三夜绝对禁止任何性行为。自12世纪起，尽管可以用将婚礼持续2～3天的方式帮助新婚夫妇遵守“多比雅三夜”，但以“赎买”方式体现的各种豁免很快出现，首先就是领主赎买新娘的初夜权，不久是新郎向主教赎买。时至中世纪末期，新婚禁欲已经由强制遵守的规定淡化为一种建议。在这一习俗上至少欧洲人无权耻笑当年的祖先，初夜权令人诧异地在欧洲部分地区甚至遗留到今天，只是基本已经以象征性货币购买的方式代替：当今的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在英国威尔士地区购置了一处庄园作为他和卡米拉的度假别墅，依照当地一项拥有170多年历史的古老法令，作为“庄园主”，查尔斯将从此拥有邻近所有新娘的“初夜权”，除非新娘向其交纳50便士。



亨利八世为裁定自己的婚姻是否有效，亲自召集了宗教法庭，皇后凯瑟琳出庭为婚姻的合法性宣誓

自己就已经麻烦事够多的查尔斯王子当然不会再对这种古老习俗认真。当年身处20世纪的查尔斯与戴安娜夫妇对婚姻与爱情做出了各自令人唏嘘的决断，在同时代人看来带有为爱而牺牲的悲壮意味，但在英国王室的历史上却不过是同一风土上不同演绎者做出的类似选择。即便不属于同一血脉家族，因远离欧洲大陆而享有天然独立性的英格兰或联合王国的几代王朝都各有铁腕人物诞生，他们各自依照“衡平法”（Equity）平衡着自己的婚姻问题。

衡平法是英国自14世纪末开始与普通法平行发展、适用于民事案件的一种法律，也是海洋法系中法规的渊源之一，主要来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与诺曼底封建法的融合。自从曾经因出身合法性问题经受过教会质疑的“征服者威廉”踏上英格兰的土地后，为了扩大王权以及更能捍卫王权的世俗法权，威廉派遣大法官在英格兰各地出巡并处理种种矛盾，其间有很多问题并无成文法可供凭借，日耳曼法传统中的判例原则和“以当时当地风俗为准”的属人原则发挥了更大作用。衡平法的最高目标是以“正义、良心和公正”为基本原则，以实现和体现自然正义为主要任务。它因弥补普通法的不足之处而产生，但形式更加灵活，在审判中更加注重实际，而不固守僵化的形式。

英语版《费加罗的婚姻》直接使用了“marriage”的译名，本身就显露出它对于如何定义“matrimonium”这个古老名词的信心，无怪乎英国民法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现存欧洲的“唯一的日耳曼法”。当16世纪那位被后世抹黑为“蓝胡子”的亨利八世（Henry Ⅷ）出现自己的婚姻问题时，尽管罗



马教会不会承认判例裁定，他已经足够有信心吸取埃莉诺等前车之鉴，以护教使者的身份自行诠释自己婚姻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是合意原则，最后的杀手锏是婚礼是否礼成以致造成亲等障碍。

来自西班牙阿拉贡的凯瑟琳（Catalina de Aragón）带着足够优厚的政治嫁妆，以至于亨利八世的父亲亨利七世（Henry Ⅶ）把这份婚约搞到手后无论如何不忍放弃，即便原有的王储亚瑟（Arthur）在新婚不久后猝亡，亨利七世仍安排时年12岁的亨利八世依照远古日耳曼部落的“弟承兄嫂”习惯接手了这位已经举办过一次婚礼的新娘。“亲等障碍”一直是罗马教会面对这些日耳曼部落出身的国王们头疼的问题。他们可以因为爱情而规避亲等，也可以因为新的爱情拉出亲等作为挡箭牌，而“天上之爱”衍生出的“骑士爱”又经常为这种遭遇的发生制造条件。1533年，搪塞成习惯的罗马教会没有想到，12世纪经院神学因为与世俗法通融而定义的“两情相好（Consensus）与肉身的结合（Coitus）才构成完成的婚姻（Perfectum Coniugium）”理论会导致逆转，以该理由特赦的婚姻又因同一理由被宣告无效：1504年时，亨利父子以亚瑟的婚姻未曾圆房为由从罗马教廷争取到特赦，宣布亚瑟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凯瑟琳改嫁亚瑟的弟弟；30年后，业已成人的亨利八世又为与另一个女人成婚而宣称亚瑟其实在那场婚礼之后已尽夫道，所以亚瑟与凯瑟琳的婚姻成立，自己30年前缔结的那场婚姻才应该因触犯亲等障碍而被宣告无效。更出乎教会预料的是，原本是一场为平衡欧洲君主间势力以“婚姻”为筹码的博弈最后出现这样的结果：1534年，英格兰国会确认英国教会独立。由此诞生的《国王至上法》（*Act of Supremacy*）标志着英国圣公会（*Anglican Communion*）的诞生，英国教会和罗马教会最终破裂。

亨利八世的六位妻子的故事在远隔几个世纪之后经常被作为传奇供后人瞻仰，其中不乏有关“爱情”的呢喃，虽然很多人也明确知道它从根基上来说是一场欧洲常见的政治联姻失败后的报复事件。至于爱情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比重，如同布洛涅的《西方婚姻史》中统计的：“从这个时候开始，皇后的更迭就加快了……14年，他第一次婚姻持续时间的一半，国王娶了5个妻子。”促使亨利八世做出第一次决断与原配离异的，是那位他追求了8年、秘密结婚3年后斩首的安妮•博林（Anne Boleyn），他们的后代“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以另一种方式献祭了爱情的誓言。亨利八世所属的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自伊丽莎白一世之后因无子嗣宣告结束，随后的斯图亚特王朝（The House of Stuart）则以另一种突降法结束：倘若说都铎王朝是君主以砍皇后的头出名，短暂的斯图亚特王朝则是因君主的头被平民所砍而垂名青史。时至现今的温莎王朝（The House of Windsor），自温莎公爵以后任何与王室有关


歌剧《费德里奥》剧照

的“爱情的风声”人们都会关注。当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用自恃“自由浪漫派”的口吻评点当今英国对于爱情如何保守时，他们恐怕真的已经忘记了直至18世纪英国与西班牙还都被视为自由爱情的圣地。正是因为亨利八世自罗马教会夺得“婚姻”的定义权，一直始终在婚姻附近隐现的爱情再次将主导权放归人间。

成为费加罗的唐璜们

假如说亨利八世与罗马的决绝是一次英国式的不流血的光荣婚姻革命，以费加罗式的“您得不到她”预示的法国婚姻革命却有些动口动手不动心。戏剧《费加罗的婚姻》中费加罗的台词已经显露出和他在歌剧中的同伴的差别。凯鲁比诺吟唱着古典式的“我有时兴奋，有时消沉”，费加罗则对着新娘苏珊娜表白：“这些日子，我觉得我的心非常激动。一看见女人就心跳，一听见爱情和肉欲这些字眼，我就坐立不安，心烦意乱。总之，我需要对人说：‘我爱你。’这个需要对我是那么迫切，我竟自己一个人也说，往花园里跑着的时候也说，对你的主妇说，对你说，对树说，对云彩说，对把我那些无的放矢的话和云彩一起吹散的风也说……”

法国作为“骑士爱”发祥地之一，自路易十三世（Louis XⅢ）起就习惯了皇后主内、情妇主外的宫廷政治模式。那些因指派婚配而变得无害的“夫人”（Madame）们以洛可可的风格为君主们提供了文艺复兴式的服侍。法语中与爱情相关、原本暧昧的“amour”一词在这一时期以绘画或雕塑中“真人扮演”（Cosplay）的方式回归人间：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以情妇为模特作画尚需遮掩，在16世纪的法国却已成为某种可以炫耀的高级婚纱照。就在对岸的亨利八世如同雏菊占卜一样轮番废弃皇后时，法国亨利二世（Henri Ⅱ）和他的皇后却因国王情妇的存在做到了某种意义上的白头偕老。即便铁腕如美第奇的凯瑟琳（Catherine de' Medici），也不得不容忍亨利二世对比他大20岁的普瓦提的戴安娜（Diane de Poitiers）骑士效忠般的爱情。由于与古罗马的月神同名，普瓦提的戴安娜又被以符合古风的赤裸形象呈现在遍布国王大小宫殿的绘画与雕塑作品里，至今在



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剧照

枫丹白露宫（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的花园中仍能看到见证这段历史的一尊月神雕像。与对岸英国将爱情“欲行其实必先正其名”的价值观相比，在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决裂的那一年出生的蒙田（Michel.de.Montaigne）的观点影响了更多的法国人。蒙田研读过大量古罗马诗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的作品。维吉尔诗中将维纳斯描绘成“赤身露体、生动活泼、气喘吁吁”，严肃的蒙田觉得这样的维纳斯“对于丈夫来说有点过于激动了”，他相信：“最脆弱的婚姻是由爱情结合的婚姻。结婚更主要的是为了生儿育女和家庭……在这种可敬而又神圣的亲属关系中随意放纵，也是一种乱伦。”

当婚姻中的爱情有成为“乱伦”的危险后，普瓦提的戴安娜的献身已经等同于“为拯救国王灵魂而牺牲”的高尚行为。从男性的角度看如此，从女性的角度看也是如此。17 世纪浪漫小说中最煽情的段落之一描述了一位王子如何到了弥留之际才向妻子倾诉自己的爱：“我把自己的大部分爱情向您隐瞒了，怕让您觉得不自在，也怕表达的方式与我这个做丈夫的身份不合，因而失去您对我的尊敬。”当时的状况正如布洛涅的《西方婚姻史》中的描述：“爱妻子是一件有失尊严的事，妻子会觉得爱是冒犯。情夫的爱可以原谅，因为情夫是轻浮的化身，是附属的；可是，一个完全依靠丈夫的妻子怎么能够信任一个有着和情夫一样弱点的男人呢？瞽目小爱神在彼特拉克笔下是胜利之神，被爱神绑在战车上的俘虏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难道妻子想看到自己的丈夫也受到这样的侮辱？”

时至 18 世纪，以爱情和维系婚姻名义存在的情妇或情夫逐渐成为每个有追求的法国贵族家中如同现代的手机一样维系情感的标配。模仿古典爱情场面的真人油画摆景成为沙龙中流行的消遣项目，因为文学中的爱情场面需要突破文字的障碍更易于被感官接受，戏剧也逐渐成为时髦。同样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困惑：为何褴褛遍地却又如此纸醉金迷，人人都在以无关痛痒的口吻谈论着放大的爱。

以当时的伦理观，18 世纪的观众绝不会质疑博马舍是否懂得爱情。钟



法王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奈特皇后及他们的孩子们

表匠出身的博马舍一生娶了三个妻子。第一场婚姻为他带来了宫中的任命、大笔财富乃至为姓名增添了贵族味道的“德·博马舍”(de Beaumarchais)。然而这位忠心的妻子在结婚10个月后就神秘身亡。第二场婚礼举办于12年后，但这位妻子又在两年后神秘身亡。一般认为博马舍的第二位妻子是死于肺结核，但当时就有人猜测：博马舍的前两任妻子都死于毒杀。因财起意或许尚有可能，因情而铤而走险绝不是博马舍的风格。无论是在哪一段婚姻里，博马舍身边都没缺了情妇，在朋友圈中有“懂得女人的好男人”和“顾家的好丈夫”的名声。在结束第二段婚姻16年后，博马舍迎娶了与他同居了12年的情妇。《费加罗的婚姻》正是诞生于同居期间。

作为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脚本作者，达·庞蒂自身的情场阅历也绝不逊于比他大17岁的原剧作家。达·庞蒂出生在威尼斯，原名“Emanuele Conegliano”，是一个犹太家庭中的长子。他的父亲在丧偶后为了再娶皈依基督教。达·庞蒂的名字就得自为他施洗礼的主教。同一位主教为达·庞蒂和他的两个弟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达·庞蒂本人在23岁接受神职，成为一名教士。作为教士的达·庞蒂贯彻了天上与人间都是爱的信仰，情妇无数，还有两个私生子。1779年，30岁的达·庞蒂被教会法庭裁决“公开非法纳妾”、“掳掠贵妇”罪名成立，判处驱逐出威尼斯15年。正是流亡生活赋予了达·庞蒂机会，为莫扎特这部在21世纪的演出场次榜上排名第六的歌剧撰写脚本。

假如说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是18世纪的两位情场高手强强联合的结果，随后的《唐·乔瓦尼》(*Don Giovanni*)堪称这个风流时代的终极巅峰之作：这个经典的浪子题材不仅对于达·庞蒂来说更加游刃有余，而且据说曾与132个女人有染的大名鼎鼎的卡萨诺瓦(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代笔了第十幕的歌词及对白。贝多芬曾经因《唐·乔瓦尼》而谴责莫扎特：“有些东西换作我绝对不会谱曲。”推崇“费德里奥”式夫妻忠贞观的贝多芬当然不会认可将情人名单当作小调来吟唱。《费德里奥》(*Fidelio*)首演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1805年，而《唐·乔瓦尼》的首演是在大革命爆发前夕的1787年，当石像在终场宣称唐·乔瓦尼的“笑声即将在黎明终结”，即便莫扎特的配乐和达·庞蒂的台词都只是为达到单纯的渲染与修辞效果，舞台下的观众却未必都想得这么简单。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路易十六(Louis ⅩⅥ)是法国波旁王朝(Maison de Bourbon)中唯一不曾拥有情妇的国王，但他的家庭被革命党人指责为“淫乱之首”。潘宗亿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中曾就“书本是否铸成了法国大革命”进行过这样的探讨：“读书率的提高还反映在文本需求量的增加，产生了为无力购买者提供的新兴行业，如阅览室、借书店，甚至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租。18世纪法国出版书籍种类的状况主要的特色是，宗教类书籍出版与占有之比例下降，科学艺术类、色情春宫文学、诽谤文学等书籍数量之提升。宗教类书籍在17世纪末时仍占有了1/2的比例，到了18世纪20年代则下降到1/3，一直到50年代持续下滑到仅占1/4，最后到80年代革命前夕则仅仅占有1/10而已，这显示了读者群在知识兴趣上的转变。科学与艺术类的书籍在1720至1780年间成长了两倍，在50年代仅占1/4，到80年代则成长到占有40%的比例……此外，秘密禁书目录中色情文学、诽谤文学等订购率也非常的高……事实上，以春宫文学为例，学者多认为其与大革命有相当大的关系，其画作之内容多为批判攻击王室分子之作，最有名的一个春宫文学的主题即在攻击玛丽－安托瓦奈特皇后之荒淫，并讽刺国王若不能控制皇后或确定他是孩子的父亲，他将如何治理法国呢？此外，许多春宫文学的画家与作家也列名革命领袖之林，如萨德(Sade)。”

除了“风雅爱情”，旧制度的婚姻制度也在接受考验。《西方婚姻史》记载：“大革命在开始的时候依靠下层教士，并不想过早地去对付宗教问题。有关婚姻的事没有立即提到日程上来；制宪会议于1790年7月12日研究了婚姻问题，但没有做出重要决定。然而，1790年7月12日至24日讨论通过的《教士的公民组织法》把教士们激怒了。拒绝宣誓的教士变得更加不妥协，宣了誓的教士也在盛怒之下要求将宣过的誓作废。主教拒绝依照1789年8月11日的法令赋予他们的权利对婚姻遇到障碍的人实行豁免，神父拒绝为可能引起争议的婚姻主持婚礼，尤其是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结婚的婚礼。另一方面，面对大量的秘密婚姻，行事极端的人希望干脆将宗教婚姻取消。”

然而，法国人民终究还是以“国家”的名义把教会花了19个世纪的时间才确立下来的父权接了过来。在1792年的《夫妻新法典》(*Le Nouveau Code*)草案里，第一篇第一条就将婚姻定义为：“一种将公民和祖国、将祖国和公民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联系。”此外，个人之间的结合还包含着最重要的义务：“法律要求公民生儿育女，世代绵延。”因此，只有已经娶妻生子的人，才能够求得“公职”。婚姻变成了“善人对自然欠下的债，公民对祖国欠下的债”。反过来的结论是：一旦公民生儿育女，他将被视为结清债款，如果愿意就可以和妻子分手。

《夫妻新法典》中还描述了一个很富于戏剧性的公民婚姻仪式。公务员充当过去神职人员的主祭角色，手持宪法向新婚夫妇宣告：“你们好，两位自由公民！请时刻记住把你们结为合法夫妻的法律；你们的友爱和利益，

应该使那条把你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永不松懈。（对新郎）自由的男人，（对新娘）自由的女人，（对四名证人）自由的公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宽厚仁慈的民族为之做出了重大牺牲的宪法，要由家长以及妻子和母亲的警惕性来保护，要由年轻公民的爱心来保护，（对全体参加婚礼的人）要由全体法国人的勇敢来保护。”新婚夫妇的答词是：“自由万岁！民族万岁！善良的公民们，祝福我们吧！”甚至曾有议员建议：造一座祖国圣坛，在那上面举行公证婚礼。

这种颇令人情何以堪的仪式自然难以长久。1801 年签订的和解协议恢复了宗教婚姻，但没有取消公证结婚。1804 年，又被称为《拿破仑法典》的《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çais*）诞生，这是对现代法国民法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一部法律，它使用了《法学阶梯》的结构体系。近 13 个世纪后，编写出最早的日耳曼法的法兰克人的后代们回归罗马法体系。《拿破仑法典》规定：必须在宗教婚礼之前举行公证结婚。关于怀念旧制度的人对于这项新制度的态度，可以从当年一部以 1805 年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中看到些影子。布列塔尼的一位贵族小姐不情愿地嫁给一个有钱的市民。为了避免婚礼公开举行，三个有关权威部门同一天派人去了城堡。“婚姻的三重纽带”分别由公证人、户籍官员和神父来体现。当然，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事。可是，因为神父迟迟未到，没能为新婚夫妇祝福，新娘父亲就认为女儿的婚礼只完成了“四分之三”。最后那位上了年纪的神父确定不来了，新娘父亲只好再派人去请小姐一开始就拒绝了的新教牧师。结果，小姐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结婚。

当问询爱情的权利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在质问自身爱的权利。在这方面，似乎中世纪更超脱。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英国的 1836 年婚姻条例才开始承认在政府机关登记的民事婚姻，1898 年的婚姻条例才不以举行宗教仪式为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19 世纪不仅见证了大西洋两岸婚礼的质变，也见证了英国与法国在“爱情”形象上的对换：曾经被视为自由爱情的乐园的英国逐渐被贴上了“古板”的标签，而以国家的名义将婚姻捧上圣坛的法国成为自由爱情的新保护神。然而很快，法国社会上开始流行一种说法：结婚就是迎合“法国革命带来的市民习俗”。司汤达曾经记载，经常遇到“富有的年轻人以表现轻狂为荣，为的就是让人以为他们仍然像过去一样有教养”。

司汤达曾说：“爱情之于我始终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我唯一的大事。”在《论爱情》中他将爱情称为“结晶”（Cristalliser），分为七个阶段：惊叹、幸福、希望、爱情诞生、第一次结晶、怀疑出现、第二次结晶。司汤达相信：“能使爱情保持长久的是第二次结晶，在这个时期，人们时刻都会感到要么被爱、要么去死。又经过几个月的爱恋而成了习惯之后，你对爱愈来愈坚信不疑，难以会想中止这种爱？个性越是坚强，就越不会对爱情不专一。在被过快地委身于你的女子所激起的爱情中，几乎完全没有第二次结晶。”市民阶层兴起后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社交活动成了工作之余的休闲，而不再是生活中必须做的事情。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司汤达不时怀念旧制度下对于“风雅爱情”的某种奢侈：“从前在法国宫廷中能够见到的那种真正的上流社会，我想自从 1780 年以来已经不复存在。那个社会于真正的爱情不利，因为它使‘孤独’和‘悠闲’几乎成为不可能，而孤独与悠闲于爱情的结晶过程却是不可或缺的。”新的社交方式对于见识过旧制度时代“大场面”的人来说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但对于缺乏社交锻炼的新兴市民阶级来说却很容易掉入“风雅爱情”的陷阱。如同布洛涅注意到的，包法利夫人似乎就是一个验证：“福楼拜好像要使司汤达的理论发扬光大，把舞会的场面描写得令艾玛·包法利久久不能忘怀。如果那种舞会每天都有，她还会那么痴情地爱上鲁道夫吗？”

当问询爱情的权利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在质问自身爱的权利。在这一方面，貌似封闭的中世纪有时甚至做得更加超脱，因为他们至少还有天上的爱可以衡量。布洛涅认为：“自然法婚姻理论，是基督教婚姻的世俗化。基督教婚姻一向被认为是神定的，人不能做丝毫变动。与一切革命立法（我们今天的立法大部分都是从革命立法中继承下来的）以之为基础的‘契约婚姻’相反，‘体制婚姻’错误地拒绝给予夫妇和立法机构以任何改变‘基本规定’的自由。‘基本规定’被认为来自神、来自大自然或者来自爱国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主婚的既不是人，也不是国家，而是父亲的身份。以父亲身份做出的决定是不能拒绝的。后来，革命的空想主义者们又把这种既反对同居也反对正式婚姻的‘自然’婚姻理论做了进一步发挥。在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这种理论还会冒出来，时隐时现。”

除《费加罗的婚姻》及其前传《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外，“费加罗三部曲”中还有最后一部，故事发生在伯爵上了年纪之后，剧本上说他“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心平气和的老绅士”，“不再像年轻时期那样胡闹、荒唐了”。他

甚至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新思想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也讲究“民主”、“平等”了。他不允许家里的仆人们再称他为“老爷”了，而要他们称他为“先生”。费加罗和苏姗娜仍然住在伯爵的家里，费加罗已成为伯爵家里的总管，“对他的主人非常忠心耿耿”。从塞维利亚街头的“无事忙”与多情公子到互称“先生”，费加罗与伯爵完成了从浪子唐璜到居家男人的转变。凯鲁比诺在此次故事开场前已经夭亡在战场上，他不曾在舞台上出现，却影响了所有人的命运。临上战场之前，凯鲁比诺与伯爵夫人的不复纯洁的暗恋孕育出一个私生子。凯鲁比诺在战场上留下一封与伯爵夫人诀别的血书，以表达他对伯爵夫人深挚的爱情至死不变。这封血书即将成为剧中一场对伯爵的家庭幸福造成威胁的阴谋的源头。毫无疑问，最后解救伯爵一家的还是费加罗。剧本的标题颇令人想起“原罪”：《有罪的母亲》（*La Mère Coupable*）。

比尔基埃的《家庭史》中这样分析过“家庭”（Familia）的语源：“‘familia’是个拉丁词，它出现在罗马，从‘famulus’（仆人）派生出来，但是它与我们平常对这个词的理解并不符合。‘familia’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屋顶下的全体奴隶和仆人，后来又指‘maison’，一方面是主人，另一方面是在主人统治下的妻子、儿女和仆人。后来词义扩展，‘familia’又指‘agnati’和‘cognati’，成了‘gen’这个词的同义词，至少在日常用语中是如此。‘maison’是指生活在同一屋顶下的所有的人，‘gens’是指同一祖先的所有后代组成的共同体。”在《圣经·创世记》中，“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亚当对自己和夏娃的关系的定义，创造夏娃时上帝使用的说法却是：“I will make him a help meet for him.”（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消融于家庭后都现出了“相助”（Help）的本源。

人们反复丈量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关系，经常是因为忘记了爱情的坐标。在历史上它们都曾经被定位得很精准，但后人总觉得那是GPS信号不好造成的误判。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其实都很像是放大镜下的样品：距离越远观察越不易变形，只是它已经不再属于你能触及的范围。如同一句老话：“过去的玫瑰存在于它的香气中，我们拥有的只是这个名字（Stat rosa pristine nomine，nomina nuda tenemus）。”




TAILOR
PHOTO WHITE
SARTORIA
PERUGINA



1954年12月，意大利那不勒斯省卡普里岛，一家“征婚俱乐部”的会员们正在参加首次约会。该俱乐部共登记有100名单身男子和71名单身女子



匹配爱情：条件、感受、关系规范

上海社科院针对 800 名未婚男女进行的“普通人的爱情观”的研究结果显示，条件、感受、关系规范，是人们理解爱情的三个向度。经济、地位等具体条件，或是激情、浪漫等抽象的个人感受，都被用来解释爱情。但是，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更加认同爱情是一种社会关系规范，表达了对恋爱双方承担责任、体贴互助的期待。而在另一项针对 2200 名家庭成员进行的“家庭幸福观”调查中，多数人从关系规范取向来定义幸福的家庭，与前述调查中对美好爱情的理解构成了一致，良好的关系规范是连接爱情和家庭的节点。

记者 王玄　主笔 贾冬婷



2013年5月18日，这些新婚夫妇共同参加在上海郊外举行的集体婚礼

条件

34岁的古新（化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男人，当被问及他最近一次相亲为什么没成功时，他说：“没感觉。”为什么没感觉？“第一，她不够漂亮。第二，嗯……还是不漂亮。”最近一两年，他会规律地与亲友介绍的相亲对象见面，每年见上六七个人。会面的前奏是各种条件的适配：“首先会看照片，不要求特别漂亮，但要有气质，漂亮些当然更好，但我一摸口袋，还是觉得不能太挑剔。”他在一家德国企业做技术支持，口袋里有税前20万元的年收入，家中有房，没有买房压力，每年一半以上的薪水能存下来，目前已经有了一些积蓄。即便这样，他觉得自己在婚恋市场上依然没什么竞争力。

“我们以往对用户进行的调查显示，排除人品的选项，男性最看重女性的外貌，女性最看重对方的工作能力和经济能力。”百合网婚恋产业研究院院长王治国坦白地说。他告诉我们，婚恋网站的基本功能在于，将“对我好”、“善良”这些抽象的择偶想法，变成具体的条件，然后帮助用户“找人”。因此，婚恋网站对“条件”的倾向特别敏感。“事实上，观念和行为是有偏差的，‘男看貌、女看财’在真实的择偶过程中会更加明显。”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说法。自从上世纪中叶乔治·霍曼斯提出社会交换论，社会学家们就不断地用它来解释婚姻，其中最常见的判断是，男方用自己的社会经济资源来交换女方的外貌、性和家务服务。

王治国曾经在后台对百合网的一位活跃用户进行过观察：“那是女神级的人物，二十四五岁，特别漂亮，一年的收信量是6000多封，平均每天近20封，而普通用户每天的收信量是两三封。”王治国告诉我们，在择偶过程中，外貌的认同是最初的阶段，之后才是个性爱好、价值观的匹配，这是心理学研究出的规律。“国外最近流行的一个交友软件Tinder，它的功能非常简单，就是不断地给你发送异性照片，对于每张照片，你可以做出两种选择，‘喜欢’或者‘跳过’，如果对方恰好也‘喜欢’你，那么你们可以在Facebook上深入交流。”王治国的平板电脑里安装着各种各样的交友软件，他随手打开一款，系统根据算法推荐的用户照片就跳出来，“你看外国人的照片，大多数衣着更正式，梳化得体，让人觉得很有魅力。但是中国的交友网站上，很多人的照片都太生活化，尤其是男性，不拘小节，让人觉得不够可信”。

而那些从照片上就看得出比较可信的高端男会员，通常不会自己在网上搜索、收信，他们会支付从3万元到15万元不等的费用，购买优质的线下服务，让红娘一对一地为他们寻找适合的伴侣。“他们经济条件优渥，十分自我，很少找咨询师咨询、探讨情感问题，直接就让红娘去找人，首先要年轻漂亮，但是在此基础上，也要高学历、有教养，条件很高。”周小鹏是百合网首席婚恋专家，这是她对高端定制男会员的速写。而对于数量众多的、没有专属红娘服务的线上用户来说，他们常常需要“相亲助手”的帮助，“相亲助手”数据库里有1400多道常规问题，大到婚姻家庭观，小到“你喜不喜欢吃大蒜”，做出选择后，系统会为你推荐有相同选择的异性。用户每回答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为自己的择偶增加了一个条件，通过一个一个的条件匹配，不断地缩小范围，增加寻找到伴侣的可能性。

“选择的过程并不美好，开始时，你觉得跟10个人都合适，发出10封信，可能只收到一两封回复，最多的是失败的经验。”王治国说。古新有相似的感受：“相亲不像生活中自然地结交朋友，你交朋友的时候是不会设定条件的，你会慢慢发现她的优点，最后成为朋友。但是相亲从一开始就有一套

标准，你们的交往是一个不断去匹配标准、不断扣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很多社会学家会用“婚姻市场”理论来解读择偶模式，认为未婚男女是市场的潜在交易伙伴。而当这个虚拟的交易市场真的由婚恋网站、相亲会所赋予现实感后，它显得有点残酷。

“普通人的爱情观”研究结果却并不反映这种残酷景象。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徐安琪告诉我们，在701个被统计样本中，“物质基础”仅被提及了63次，而以其作为爱情唯一内涵的人则微乎其微。在男性最看重的择偶因素中，“容貌”排名第22位，远远低于孝敬老人、善解人意和温柔体贴。



百合网首席婚恋专家周小鹏

感受

周小鹏从百合网的基层红娘做起，到现在成为首席婚恋专家，接触过无数的择偶案例，她从来不相信一个人的婚恋问题能够完全依赖婚恋中介、靠一个个现实条件的筛选来解决。“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平台，用具体的条件来帮助用户拓展和划定一个范围，但最后能不能找到适合的伴侣，还要靠用户自己的感觉。”

不久前，她为年近五十、事业有成的高端定制女会员L女士提供咨询服务。“她是那种低调、优雅、细致的女人。每次给来访的客人准备水果之前，她都一定会洗一遍手，并不是因为手脏了，而是她担心手上的护肤品沾到水果上。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对男性的要求也是从里到外都细致、体贴、解风情。”L女士希望男方首先从外表上看要很儒雅，红娘帮她在核心资料库里按照收入、年龄等条件进行基本筛选，然后再人工筛一遍，排除那些不够“儒雅”的人选，最后挑选几位匹配度高的男性安排见面。大半年时间过去，L女士的择偶过程毫无进展，那些条件不错的适龄男子全都过于平庸，对她毫无触动。“我告诉她，不要只依赖红娘为她推荐的对象，在咨询的过程中明确了自己的需要后，可以亲身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对象。”周小鹏说。

L女士第一次自己登录网站，在搜索框里输入她的要求，数十个搜索结果，一个一个仔细去看。看到男会员W，她忽然停住，“感觉不错”，发线上消息过去，索要联系方式。“后来我们一看W先生的资料，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资料库里，但是在我们看来，他的外表比较‘粗犷’，实在不符合‘儒雅’的要求，就被淘汰了。”他们很快相约见面，W先生选择了一家年轻人很喜欢的热门咖啡馆，L女士走进咖啡馆的玻璃房子，北京秋天的阳光直射下来，她马上被这温暖浪漫的气氛感染了。从事设计行业的W先生身材壮硕，开口说话却有着与外表不太相称的温和，他们从咖啡馆的选择聊起，L女士发现他的生活品味跟自己很相近。聊着聊着，W先生忽然说：“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去旁边的公园散步吧。”L女士心里暗暗惊讶，完全没想到他会提出这个建议。她已经很久没有跟异性一起在公园散步了，他们在绿地间悠闲地走着，她感到十足的浪漫，两个人的手自然而然地就牵到了一起。

“很多人说年纪大些的人不爱浪漫，我觉得这跟年龄没什么关系，理性人和感性人的情感需求就是不一样的。现在L女士和W先生相处得很好，两个人每天下班一起在家烹饪，生活很有情趣，跟年轻的热恋情侣没有区别。”周小鹏说。

赵庭（化名）跟L女士一样有着对浪漫爱情的期待，但她的运气似乎不太好。聊起自己的婚恋观，她总是会先联想起5年前购买的那份商业年金保险。“我耳根子软，那个保险推销员一直给我打电话，我实在受不了，就想要不凑合买一份吧。”除了最初一次性交付的几万元，她在未来20年中，每个月都要交付几百元的保费，20年之后开始获得保险收益。“当初迫于推销压力，稀里糊涂就买了这份保险，但是没想清楚成本和收益，谁知道20年以后的物价、市场会是什么样子？与其冲动投入，还不如拿这些钱来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投入到一段关系，就跟买这份保险类似，千万不能迫于压力而凑合。”她大专学历，收入中等，对男

方要求不高，条件差不多即可，但两人相处，一定要感觉“舒服”。什么是“舒服”？“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什么是不舒服、我所不喜欢的。”她跟一个条件匹配的男人在咖啡厅见面，对方放松地靠坐着椅子，将手随意地搭在隔壁桌空着的椅背上。“我当时就很反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并不是不文明，但那种随意的状态让我觉得他跟整个咖啡厅的氛围格格不入。”心里突如其来的厌恶感重过之前的一切评价，两人从此再无往来。赵庭32岁了，她会不时被身边亲友提醒找个人结婚成家，但遇到的人没有一个让她感觉舒服、心动。“也许我该先把自己的‘少女梦’放弃掉。”她叹了口气说。

对于L女士和赵庭来说，抽象感受都是她们在评价爱情、选择伴侣时的重要考虑，在爱情观调查中，“快乐的”、“浪漫的”、“缘”这几种说法也各有10%左右的提及率。但那些完全用个人感受来理解爱情的受访者并不多见，这些词语常常是与物质基础、理解、责任等非感受性的描述同时出现。

关系规范

“你心目中爱情的含义是什么？”赵庭停顿了两秒钟，答道：“感动，浪漫的感觉，相互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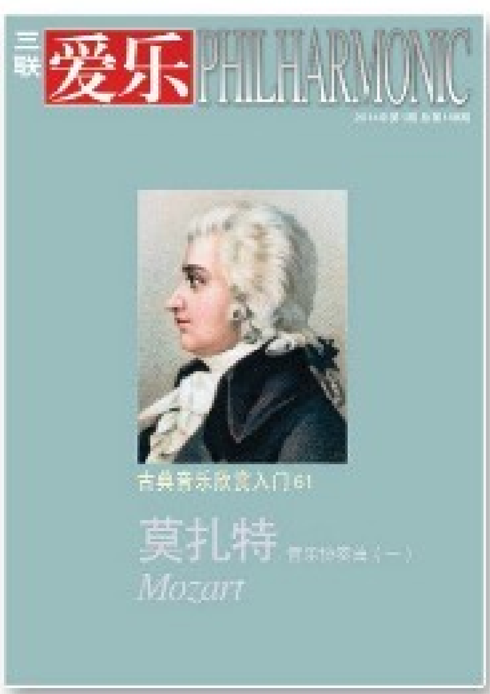
几年前，徐安琪和同事进行“普通人的爱情观”研究时，问的就是这个简短的问题。他们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方法，在上海和成都分别选取了500个和300个适龄未婚青年（男22～30岁，女20～28岁）作为样本，以开放式问题的形式调查了他们对爱情的理解。

800人中，未答或答“不知道”的有28人，认为“难说”或“说不清”的12人，“不相信有爱情”的有3人。研究者对余下的回答进行编码归类，提炼出了16个主要类型，涵盖了701人的表述，分别是：缘、感觉、感情好、责任、体贴互助、心灵相通/相知、尊重互让/包容、有共同语言、物质基础、真诚/信任、付出、相处和睦、快乐/幸福的、浪漫/神圣的、激情、平淡。其中被提及频率最高的是158次的“体贴互助”、140次的“责任”和136次的“心灵相通/相知”。

徐安琪发现，这16种表述还可以被进一步归为三类。一类是从对爱情的个人感受出发，描述爱情是“激情”、“浪漫/神圣的”。第二类说的是爱情的前提或条件，比如“有共同语言”、有“物质基础”。“只有不到10%的人提到了爱情的物质基础，以物质基础作为爱情全部的人就更少了。现在恋爱、结婚成本在增加，社会风险、社会分化程度都比过去高，人们明确和适当提升物质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只能说明人们面对爱情和婚姻更理性，而非更物化。”

第三类是将爱情看作一种社会关系规范，强调对恋爱双方相处规范的期待，出现频率最高的“体贴互助”等三种表述皆属此类。在调查中，64.8%的人对爱情的理解体现了关系规范的取向。这可能与人们的生活经验有出入，徐安琪解释：“文学、艺术作品里谈论的爱情多半是浪漫的、感受性的，但是实际上到了普通人这里，爱情更多被理解为一种关系规范，甚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传真）
E-mail: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4年第一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61

·“管”窥莫扎特
·薛蔚原、孙健、张可驹、李庆任等对莫扎特长笛协奏曲、长笛与竖琴协奏曲、圆号协奏曲与单簧管协奏曲等管乐作品的精彩解读

逝者 纪念英国作曲家约翰·塔文纳爵士
话题 欢迎来到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世界（上）
现代音乐 卢恰诺·贝里奥
乐史空间 雅纳切克最后的夏天
作曲家档案 奥地利作曲家施梅尔策父子
指挥家档案 大师自述：阿巴多的心路历程（下）
专题 大提琴历险记（一）

《爱乐》2014年订阅须知

2014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4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百合网婚恋产业研究院院长王治国（右）

至包含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内涵。”

古新仔细想想，自己过去几段开端良好的感情并未深入，问题就出在“关系规范”上。“我的性格很直很急，脾气不够好，遇到不认同的事情会很生气、甩脸。过后冷静下来又不会去哄女孩子，这个技能太难了。”他的直白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够尊重和体贴，她们率先提出分手时，他不知所措：“我觉得还没到要分手的地步。”几次之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与女友的相处模式。“我打电话过去，对方不接，过后也不回电，没关系。遇到重要的节日和纪念日，对方不记得，不重视，没关系。”他能在这些行为方式上坚持一两个月，“时间一长本性就会暴露”，自己那些强烈的好恶又会不自觉地显现出来。“她不是你妈，不会无条件地去接受你的个性。最好的关系是大家各让一步，但我还没做到，也还没有找到愿意包容我的人。”

“我父母感情很好，但平时也少不了摩擦争吵。”赵庭说，“他们了解彼此的习惯和缺陷，知道改变不了，只会包容，吵架不过是出于一时意气。出现更多的场景还是他们一起买菜做饭、照顾家庭。”接受采访时，赵庭刚刚下班，手里拎着双层保温饭盒，她每天用来自带午饭。“今天带的是简单的炒青菜，我爸爸做的，他擅长炒菜，我妈擅长凉菜和面食。”父母的婚姻成了她的范式，一个工人和一个商店店员，两个那么普通的人，相扶相携，竟然一同度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我和一些同龄人一样，年龄在长，感情没长，吵架时转身就走，不太负责任。与父母相比，我们少了一点儿坚持。”

在徐安琪和同事之后进行的另一项关于“家庭幸福观”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恋爱中对于关系规范的期待延续到了家庭观中，像赵庭的父母一样，多数受访者从良好的关系互动中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幸福。

研究同样采用开放式问题，对上海 1200 个和兰州 1000 个家庭成员进行提问，将答案编码成 16 种表述类型，53% 的人认为幸福的家庭是“和谐团结”的，“健康平安”和“收入无忧”分列二、三位。聚类分析后，16 种表述又可以被划归为三类，分类与爱情观研究一致，关系规范取向的“和谐相处型”家庭受到 40% 受访者的认可，条件取向的“经济安全型”约占三分之一，感受取向的“感觉良好型”相对被提及最少。

“感受良好型”的家庭被认可更少，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注重个人感受，在徐安琪看来，那是爱情中的浪漫、激情在家庭中被转化成更稳定的感情。被问及“维系婚姻的纽带是什么”时，57% 的受访者提及“亲情 / 感情”，其次是“责任 / 良心”和“子女”。选择“爱情”的人占 22%。“没有选择‘爱情’或‘亲情 / 感情’的人不到三分之一，说明大部分婚姻还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并不像某些人所臆断的当今社会流行‘凑合型’婚姻。”徐安琪提到，1996 年，她曾经做过同样的婚姻调查，那时选择“爱情”的人只有 5%。

在家庭观调查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上升了，经济无忧成了幸福家庭的保障，但绝不是唯一的。“把职业、收入和住房条件这些因素作为唯一标准的人是极少数，只有 3%，大部分人同时考虑了经济和非经济因素。”课题组得到的主流回答类似这样——一位来自兰州农村地区、高中毕业的 25 岁女性说：“（幸福的家庭是）同甘共苦，相互尊敬，相互信任，相互爱着彼此。而且要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宝宝围绕着。最主要的是全家身体健康，最实际的是赚多多的钱。”

“和谐团结、体贴互助、尊重平等等这类关系规范在家庭观调查中依然被看重，说明普通人观念中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之间有关联性、一致性。”徐安琪告诉我们，良好的关系规范是连接爱情和家庭的节点。

对于古新来说，他的困惑是，虽然已年过三十，自己却在感情上过于晚熟，意识到婚姻的价值，但不知道如何好好地经营一段关系去实现它。“我妹妹的孩子今年满 1 岁了，他们夫妻带着孩子回家看望父母，爸爸妈妈抱着孩子时喜悦的眼神让我的心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也许有一天你走在街上，会偶然看到一位六七十岁、孤独一生的老人，那时你就会知道他年轻时做错了什么。”



劲速。一马当先。

全新BMW M6四门轿跑车马年限量版，以2:28:044劲破上海国际赛车场四门量产车单圈纪录，领衔BMW马年限量版系列车型啸风而至。



驾临。瑞领马年。

撼世荣耀，开启马年传奇。全新BMW M6四门轿跑车马年限量版和新BMW M5马年限量版，双双劲破上海国际赛车场四门量产车单圈纪录。作为BMW专为中国打造的马年诚意之献，装备马年限量版专属内饰，BMW M竞速套件及碳陶瓷刹车系统*。耀领马年限量版系列车型陆续登场，为您创写马年传奇。

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00-6666，或登录www.bmw.com.cn

BMW马年限量版系列车型震撼来袭。

BMW之悦。

*只装备于全新BMW M6四门轿跑车马年限量版车型。



中国奥委会合作伙伴



英国凯特王妃在2011年结婚时穿着的婚纱，由 Alexander MaQueen 掌门人莎拉·伯顿设计。这件婚纱由白色和象牙白色的绸缎和透明丝制成，饰有蕾丝缝花



一件神圣礼服的今生前世
——婚纱 300 年

虽然时装购买已经成为商品拜物教中最为显著的一类消费行为，但婚礼礼服的购买在女性消费者眼中无疑拥有某种先验而显著的神圣性，作为一件富于仪式感的服装，女性婚礼礼服的历史几乎和婚姻本身一样长，它代表着新娘对于自身在即将成立的家庭中重要性与角色的物化，也在强调婚姻所代表伴侣关系的排他性。

主笔 ✒ 朱步冲

18至19世纪：昂贵与贞节的白色

当代女性婚礼礼服制度的出现，直接来源于17世纪欧洲教堂婚礼制度的形成。17世纪初期，新人在婚礼上的服饰不仅由双方家庭的财富经济状况决定，也由其社会阶层决定，贵族倾向于白色与银色，正如苏格兰画家高文·汉密尔顿在油画《杜·卡恩与波姆家族》中描绘的那样，两位出自胡格诺教派贵族家庭的新人，查尔斯·波姆与琼·杜·卡恩，都身穿银色丝绸与缎制礼服，除了婚礼，这些礼服也适用于其他庄重的社交场合。截至17世纪末期，甚至中产阶级也难以接受以不菲的价格定制一件仅供婚礼单次使用，随后就会束之高阁的昂贵礼服。

实际上，18世纪大部分欧洲家庭，无论资产阶级、贵族还是平民，都会选择在婚约敲定后一个月，甚至几小时后举行婚礼，最繁琐头疼的部分并非婚礼本身，而是婚前财产协议的签订。英国画家威廉·荷加斯的名画《婚前协议》即描绘了一位门第高贵但囊空如洗的伯爵迫不及待地撮合其子与一位富有的伦敦杂货商之女达成婚约的场景，画面左侧，两位因家庭包办而即将成家的新人郁郁寡欢，准新娘身穿白色丝绸蕾丝刺绣长裙，准新郎则是标准的贵族装束，马裤与白色长袜，黑色银扣皮鞋，蓝色锦缎外套与带有金线装饰的宽大衬衣，而左侧则是伯爵本人和未来亲家翁，在公证人的斡旋下手持账簿契约，唇枪舌剑。

在1804年公布民法典之前，法国人可以根据三种不同的法律，包括在南方实施的罗马法、北方的诺曼习惯法或巴黎习惯法草拟婚约，通常双方家长都想方设法取得公证人的偏向，将夫妻共同财产限定在一个固定数量上，并尽可能设置一些对自己子女有利的条件，通常富裕的一方会将家庭遗产从夫妻共同财产中剔除。一般来说，婚礼必须在教堂中举行，时间为上午8时至12时，在婚礼举行前的三周，新人必须连续在教堂布告栏中发布婚讯，用以昭告四方，让对婚姻本身效力起疑者能够及时到教堂申诉。婚讯的散布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内容鄙俗下流的街头传单或者小报。巴黎街头小报《桃色新闻报》上，总是不征得事主同意，披露一些上层人士的婚礼预告，也披露陪嫁、家庭谱系甚至双方婚前暧昧关系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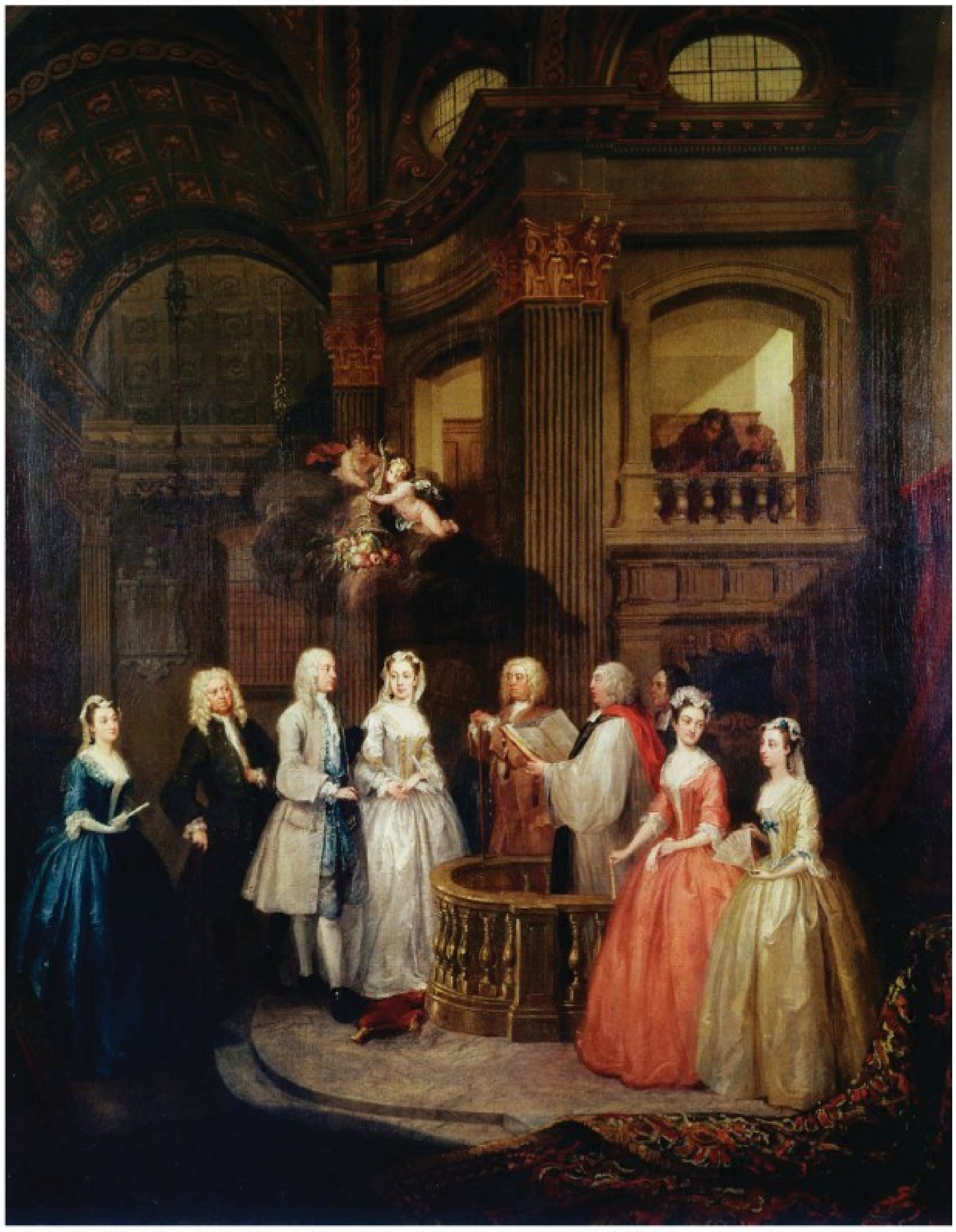
在荷加斯的另一幅作品《斯蒂芬·贝克汉姆与玛丽·考克斯的婚礼》中，我们可以看到17世纪中期一对标准的资产阶级中产婚礼的状况：新娘身穿白色蕾丝长裙，头戴白色轻纱有金色蕾丝镶边的头饰以及一串珍珠项链，白色蕾丝长裙通常是新娘家境殷实的体现，因为其颜色和质地决定了这件礼服既要花费大量工时物料制作，又需要繁琐的步骤来保持整洁。当时伦敦东部的斯皮塔菲尔兹已经成为丝绸纺织、花边加工与服装制造业的集中地，一般考究的婚礼服装都会由此地的裁缝制作。

在上流社会的婚礼中，新娘不止需要一件礼服，因为在婚礼结束后的小规模庆典聚会中，她们必须换装。1773年，一位诺福克郡富裕的外科医生威廉·布朗尼之女玛丽·布朗尼的婚礼，是当地乡绅社交圈每天下午茶聚会中谈论的焦点问题，最终，新娘在结婚典礼上的装束确实令人艳羡不已。首先是缀满小型银扣的白色丝绸宽松长裙，配浅粉色缎子衬裙，而在稍后的答谢宴会上，新娘又换上了一套浅紫色的缎子贴身长裙，有紫色的花叶刺绣，配一条炫目的钻石项链。

在17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婚礼服饰的大部分开支仍然是昂贵而稀有的材料，而非人工，女士盛装的款式几乎在200年间停滞不前。1724年，当詹妮佛·格雷女士准备嫁给阿什本汉姆爵士时，新郎慷慨地为新娘的婚礼盛装支付了45英镑的巨款，然而裁缝伊丽莎白·阿克女士只得到了大约16先令的制衣费用，其余都用来支付“18英尺长的银色与白色丝绸”了。白色丝绸与银色贵金属的混合使用，不仅会带来华丽的反射光泽，也会带来炫耀性的结果。在1761年9月8日，英格兰的新君乔治三世在圣詹姆士宫内的皇家礼拜堂迎娶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的索菲娅·夏洛特女公爵为妻，新娘的装束是白色，缀满珍珠和银饰的拖地长裙，外罩紫色、貂皮镶边的天鹅绒斗篷，新娘拥有10名伴娘，都是身份高贵的贵族家庭淑女。



18 世纪画家威廉·荷加斯的代表作《婚前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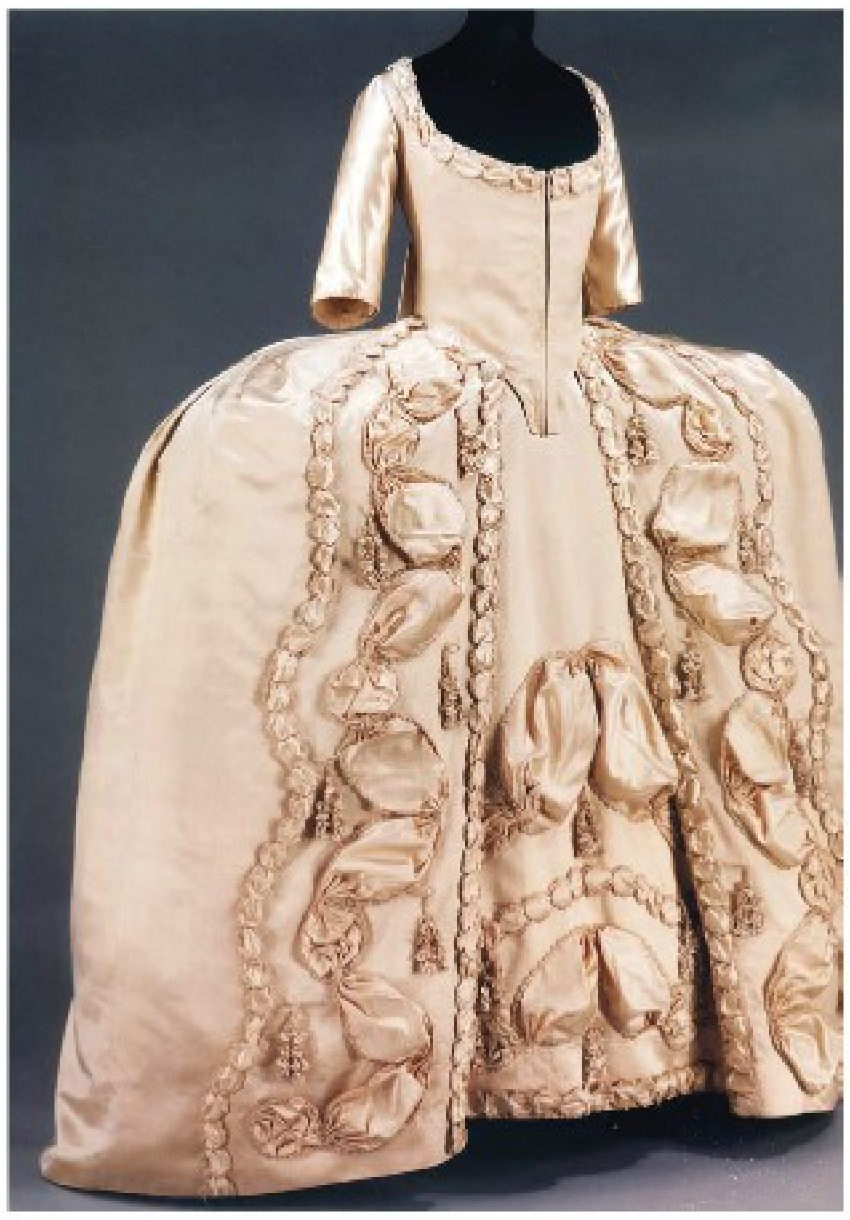


威廉·荷加斯画作：《斯蒂芬·贝克汉姆与玛丽·考克斯的婚礼》(1729)

与贵族阶级不同，平民阶层的婚纱，除了少量白色，更多倾向于蓝色、奶油色与粉色，全新的纺织材料如来自殖民地印度的棉布、亚麻布与轻纱给了婚礼礼服更多的选择，也使无法支付昂贵丝绸、缎面材料的平民阶级也能在典礼当天显得体面高贵。然而在农村地区，淳朴的农民依旧偏好更为鲜艳的装扮。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新娘子在连续三天的庆典之中要拥有三件长外衣，第一天是富丽堂皇的红色，第二天是蓝色，第三天是棕色，每天晚上就寝时，新娘还要穿上象征纯洁的白色睡衣。直到 19 世纪末，来自城市的白色婚礼正装才被西欧农村居民所逐渐接受，但只允许以贞洁之身成婚的新娘穿着。

1840 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婚礼为整个英国和西欧的新娘们建立一个庄重、质朴的范本，女王本人决心借助婚礼昭示一种规范整个不列颠的美德风尚——“庄重、简朴与虔诚”，为此她为自己挑选了一件纯白色缎面的礼服长裙，完全由斯皮塔菲尔兹的工匠制造，借以表示王室对于英国本土手工业的支持与尊重；长长的裙摆也由英国本土霍尼顿出产的白色蕾丝制成，花冠由象征美德、多产，香气浓郁的香橙花花朵组成，与面纱合二为一。

近代女性婚礼礼服形制的最终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设计天才查尔斯·沃思（Charles Worth），他被誉为时装界第一位女装设计大师。1845 年，这个出身林肯郡，钱包里只有一张 5 英镑钞票的服装面料销售学徒来到了巴黎，加入著名丝绸与成衣商盖其林（Gagelin）公司。1858 年，这个曾经只能睡在衣料柜台底下地铺上的伙计凭借自己敏锐的设计感觉和商业天赋开设了自己的时装设计工作室，到了 1870 年，他已经雇用了超过 1200 名裁缝工人，年净利润达到 4 万英镑。作为第一名定期举办夏冬两季



来自英国的一件真丝缎制礼服（1775~1780）



1780 年的一件礼服，为当时的流行款式



女仆沙拉·玛利亚·怀特的棉质婚纱（1841）

时装发布会，并雇用女模特穿上自身品牌作品走秀的天才，沃思吸引了大批时髦而富裕的女性主顾，包括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妮皇后。

在整个 19 世纪上半叶，女性正装长裙的腰线在逐渐升高，袖笼长度在缩短，整体剪裁趋向于贴合身材，一般婚纱样式基本继承了主流女性晚礼服的裁剪方式，只是胸线更低，袖子更短，但裙摆更长。沃思的革命性创造包括加长蓬松的裙身，垫肩，将披肩和纱巾加以复杂化、装饰化，以及将女性裙装改为前平后耸的优雅样式——时装设计师不再是一味屈从迎合主顾品位、唯唯诺诺的手艺人，而是拥有崇高地位的艺术家。

19 世纪中叶，除开艺术与审美等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工业革命时代的大机械生产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着装和修饰自己的手段与癖好。1785 年，改良蒸汽机被用于纺织厂，广袤的北美大地出产的巨量棉花，通过 1793 年发明的惠特尼改良锯齿轧棉机，变成了大量廉价的棉线与棉纱涌入欧洲，在东方，英属印度殖民地生产的亚麻布与棉布通过大西洋抵达了欧洲。1846 年，艾萨克·辛格发明了个人缝纫机，这样大批量精细剪裁的成衣生产，以及不断对服装版型进行微调，首次成为现实。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使得全欧洲的高级裁缝纷纷选择远离战火的英伦三岛作为全新的驻扎地，著名女装设计师维德芒夫人（Madame Videment）在伦敦邦德街与康德大街交界处开设了自己的女装工作室，提供“来自巴黎的时新女装，以及全套婚礼礼服、配饰”。法国女性时装杂志《Le Follet》也开始出版英文版本，并定期开辟关于婚礼礼服的专刊与版面。为了与各式各样的婚服面纱匹配，这些时尚杂志还开始介绍各种标新立异的妆容与发型，包括发髻、卷发、弯曲的鬓角，盘结在一起的各式发辫。

纺织技术的进步，使得女性婚礼礼服在袖口、领口与裙边、面纱边缘的装饰越来越繁复，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藏的婚纱中，有一件属于 1834 年玛丽·奎因女士新婚所穿的礼服原件，由白色平纹细布混合白色丝绸组成，表面拥有精美繁复的茎叶、藤蔓与花蕾状刺绣装饰——原本在手工业时代只能是贵族上层享受的奢侈产品。至于下层平民阶级，则尽可能地在自己支付的范围内，模仿高于自己的社会阶层，正如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说的那样，下层民众的节日服饰，是对拥有较多财富和更高社会地位的拟态，虚拟一种更加体面的生活方式

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里，还有一件属于女仆莎拉·玛利亚·怀特的婚纱，她于 1841 年 7 月在思科博克的圣尼古拉斯教堂嫁给了自己的丈夫——农场工人丹尼·尼尔。她的婚纱使用的缝纫材料是较为廉价的棉布，但长袖和裙身采取了满是褶皱的设计，当时中产阶级和贵族的婚纱时尚为短袖、紧身、高腰线，然而怀特的礼服反映了这种新颖的时尚暂时无法为相对保守的下层妇女所接受，或超出了她们的支付能力。

尽管如此，裁缝在这件礼服上依旧花费了不少心思，诸如利用水洗印染，形成了渐变色的花卉与抽象图案，



时装品牌 Anna Valentine 2010 春夏系列中的婚纱礼服



19世纪上半叶的新娘发饰



19世纪50年代末期流行的新婚纪念装饰相框



1855年10月20日的《伦敦新闻画报》手绘专版描绘了一场“时尚婚礼”

这块珍贵的布料是当地流动商贩从林肯市购得，价值不菲。更重要的是，它的剪裁样式还使得它能够负担多种用途，包括节日聚会以及周日礼拜，实际上，怀特的礼服上就有多处织补、修改痕迹，其中在腰线附近曾经有过一次较大的加宽，可能是为怀特孕期穿着所做的改动。

婚礼礼服的样式变化更加迅速，还要归功于摄影术、机械纺织与印染术的发明、百货公司的诞生，以及1870与1882年英国已婚妇女财产法的出现，这都使得以往繁复纠结的婚前协议不再是新人关心的重点：在18世纪之前，妻子的嫁妆通常被投资在土地上，然后把土地分配给新婚夫妇，而不再像之前那样落入新郎父亲的腰包，这自然就使得妻子在家庭经济中的分量更加重要。此外，双方缔结的婚约中开始加入这样一个条款，它涉及的是新娘在婚后个人私用开支的支

配，这一条款保证了她享有一笔自己支配的固定收入。

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约翰•科迪・杰弗森在1872年谴责说，妇女热衷于选择教堂婚礼已经不再是为了宗教信仰原因，而是为了它的可见炫耀性；工业革命造就的全新社会家庭关系，使得传统的世袭大家庭分崩离析，由夫妻与其直系后代组成的“核心家庭”开始成为亲密社会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父母已经很难通过掌控下一辈的财产与社会关系来完全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

同时，婚前恋爱方式的逐渐流行，也使得新一代青年人有了选择配偶的自主性。乔治娜・唐森・戴默是在父母主办的社交沙龙上认识了自己的未婚夫，富于魅力的维斯卡・埃布里顿。戴默家族是西南港口城市韦茅斯的爱尔兰后裔富商，未婚妻的婚纱样式完全是由本人选择，包括完全模仿维多利亚女王的白色细棉布与丝绸拼接，绣有粉色玫瑰的长裙，头戴霍尼顿蕾丝面纱和香橙花花冠，以及一顶缀满了珍珠和银线刺绣的软帽；男方则庄重地身穿一件黑色天鹅绒礼服，内罩一件珍珠色的丝绸马甲，上面刺绣着勿忘我与雏菊花，象征纯洁与忠贞。

较之女装样式的日渐繁复，婚礼上另一主角新郎的服装样式反而在进入19世纪后逐渐锚定。自从进入启蒙时代以来，男子气概被表现为着装上的简洁、拘谨与单调，所以男士在婚礼上的穿着基本与绅士昼间正装等同，除了那些因在军中服役而不得不穿着制服的新郎。19世纪初，英国花花公子、社交明星乔治・布吕梅尔试图塑造一种“空前绝后，带有男子气概和庄严色彩的服装风格”，他和另外两位上流社会男士——奥赛伯爵与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勋爵，共同塑造了19世纪欧洲男士时尚的主流。

当时的《伦敦新闻画报》专门开辟出专版，以绘图形式报道国内显贵家庭的红白喜事盛况，包括曾经被新娘拒绝过的愤愤不平的追求者，因早起而昏昏欲睡的伴郎，以及竭尽全力放声歌唱，希望能得到足够食物赏赐的孤儿院儿童唱诗班。有时，也会刊登愤世嫉俗的读者来信。一位匿名中产阶级父亲曾来信，愤怒地控诉自己的女儿一心奢求一个超出家庭预算的豪华婚礼，包括昂贵的礼服、婚宴和更多的嫁妆。“如果满足了她，我自己简直无法支付自己的葬礼。”

1853年，拿破仑三世与欧仁妮皇后的婚礼迅速占据了欧洲各大报纸的新闻头条，欧仁妮的西班牙血统，惊人的端庄与美貌，以及对于奢侈品的



英国画家弗雷德里克・哈迪的画作：《结婚礼服》（19世纪60年代）





热爱与品位让她迅速成为当时欧洲时尚界的领袖，维德芒夫人与杜莎夫人等欧洲知名女装制作家都在自己的时装工作室里推出了欧仁妮皇后婚礼礼服的复制品：大胆的欧仁妮并没有选择欧洲传统的女式婚纱，而是标新立异地身穿一件巴斯克风格的荷叶边刺绣层叠长裙，上身是配有同样巴斯克风格刺绣宽松长袖的丝绸紧身衣，这套搭配顿时成为此后 5 年内欧洲大陆贵族与上层资产阶级新娘的挚爱。

摄影术，极大地促进了时尚女装设计与媒体传播。从 1855 到 1866 年，伦敦的商业照相馆数量从 66 家猛增至 284 家，拍摄一组 12 张的肖像照片定价为 0.5 英镑至 1.1 英镑不等，越来越多的新婚夫妇倾向于在结婚典礼之前身着盛装礼服前往照相馆，再将相片制作成明信片分发给亲友或用镜框装裱，当作纪念。一些昂贵的镜框特别以银制成，镶以玳瑁、贝类、珍珠甚至宝石。在伦敦东部新兴的索迪治等地，专业的服装裁剪女工学校也开始建立，招收那些来自贫苦家庭，年龄在 12 至 14 岁之间心灵手巧的女性，为伦敦蓬勃发展的时装工业源源不断地提供熟练工人。

1863 年，维多利亚女王特地允许美国摄影师约翰·马约拍摄了一组其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与其妻丹麦公主亚历山德拉身穿婚礼盛装的照片，并制成明信片在全国发行，以彰显王室的亲民姿态。新娘的长裙整体设计虽然中规中矩，但精心点缀以玫瑰、洋蓟与三叶草图案，象征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作为不列颠帝国领土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随着钻石、有色宝石、翡翠与刚玉等来自东南亚、非洲与拉美殖民地的珍贵矿物滚滚涌入欧洲，首饰也成为 19 世纪中后期新娘婚礼不可或缺的配饰，传统上，未婚夫和新娘的父亲要负责这项支出，包括头冕、发卡、戒指、项链，甚至手镯，上层社会有



查尔斯·沃斯于 1880 年设计的一款丝制绣花婚纱



婚纱礼服细节（1890，美国）



丝质罗缎婚纱（1899，英国）



阿尔盖女公爵玛格丽特·威汉 1933 年结婚时的礼服，设计师为查尔斯·詹姆斯

时会让新娘在正式婚礼和稍后的晚间宴会佩戴两套不同风格的饰品。1869年，第26代克劳福德伯爵詹姆斯·林赛就请罗马著名的珠宝制作工坊卡斯蒂略亚尼为自己的新娘制作了一条外形仿制桃金娘树枝条，以黄金和珍珠为材质的头冕。

工业革命与炫耀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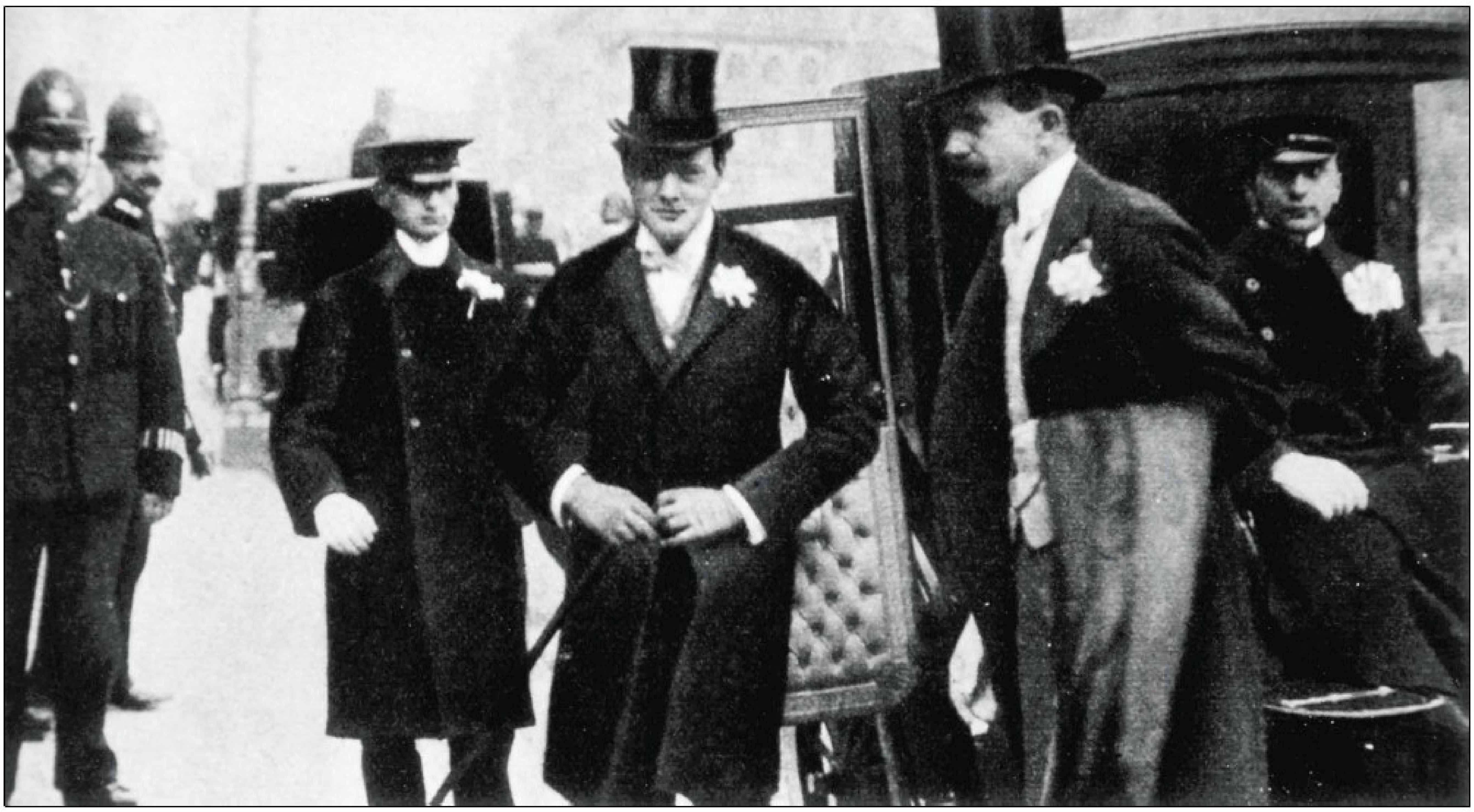
工业时代物质的极大丰裕，造就了“炫耀性物质消费”的普及：19世纪70年代，婚纱礼服的裙尾长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惊人的量级，有时需要8到12名伴娘才能将其顺利托起，如此累赘的设计通常使得新娘在婚礼和随后的聚会中不堪重负，于是一些别出心裁的时装设计师推出了“分体式”婚纱，由一件通常风格的晚礼服裙和可拆卸式裙摆组成，在教堂仪式结束后，新娘可以选择将裙摆摘去，既摆脱了负赘，又可以使自身风格一变。

美国大亨、胜家缝纫机公司创始人伊萨克·梅里特·胜家的私生女克拉拉·马修斯在自己的婚礼上就请巴黎著名的沃思时装工作室设计了一条裙摆可拆卸的礼服：上装是由象牙色缎子缝制的长袖女式马甲，上装和裙子的下摆缀满了珍珠制成的豪华流苏，更多的珍珠和亮片在裙身上组成了复杂的花叶形状，可拆卸的裙摆用搭扣围在新娘的腰线部位，这条奢华的婚纱礼服后来作为沃思工作室的展品于1881年在伦敦首届“国际婚礼博览会”上展出。

随着英、法等欧洲列强19世纪在全球殖民地的大肆扩张，对于异国奢侈情调的追求也越来越普遍。1857年2月，玛格丽特·斯科特·朗与曾在驻孟买骑兵团服役的亨利·斯科特喜结连理，玛格丽特的礼服上半身精心附加了一条来自孟加拉坦盖尔的真丝沙丽，并戴上了一条鲜明殖民地风格的巨大红宝石项链。1850年后，新娘们也逐渐不满意形制单一、系于头后发髻的白色面纱，一种全新、来自匈牙利、从额头垂下直至胸口的前盖式婚礼面纱开始迅速流行，被称为“a la hongroise”或者“a la paysanne”。

不仅如此，对于工业革命所代表的机械生产、理性与进步意识形态的返潮，强调神秘不可知论，个人情感主导与异国情调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出现，也让女装时尚开始追求某种复古、唯美的色调。著名伦敦女时装设计莎拉·富尔顿·蒙泰斯·扬在一套婚纱中，首先在内部放置了一套维多利亚时代标准风格的鲸骨撑紧身胸衣，使得穿着者的体态呈现娇柔轻盈的S形，而在礼服表面，她大胆地使用了蓝色手工刺绣的阿拉伯式蔓藤花纹，而新娘的面纱也被大胆改成了阿拉伯风格。

在诸多以浪漫主义大胆设计风格为主打的时装设计师中，集大成者是亚森·拉森比·利伯蒂。1884年，他在大名鼎鼎的伦敦摄政街开办了自己的时装工作室，他大胆地在设计中杂糅了巴黎时新风尚、拿破仑时



丘吉尔（中）在1908年9月12日结婚时的礼服着装

代、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及殖民地本土风格，他曾大胆地将中世纪修道院女修士服式与文艺复兴时代贵妇风格合二为一，马甲上衣的上半部和长袖外侧大胆地用手工蕾丝构成。最具革命性的是，他大胆地摒弃了传统女士礼服所必备的束腰紧身衣，使女性穿着者的体态实现一种当时看来令人惊愕的自然状态：被称为“执政时代风”(Directoire Style)——在19与20世纪之交，医学、生物学的发展以及女权运动的初步兴起，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倾向于通过走出居室，来获取一种时髦的“自然与健康之美”，平坦的腹部，肌肉坚实的肩膀，背部与修长健硕的双腿而非传统丰腴苍白的身体，成为全新女性身体审美的标准。1908年伦敦奥运会是首届正式将女子体育竞技列为正式项目的奥运会，体育也是将城市资产阶级妇女从闺房密室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动力。仅仅是女子网球单打比赛，就破天荒有5名选手报名参加。从顾拜旦勋爵到巴黎的斯塔夫男爵夫人，都公开声称除了美容，美丽应该源自健康，包括饮食、温泉疗养与锻炼。

1908年9月12日克莱曼婷·霍西尔嫁给温斯顿·丘吉尔的婚礼上，她为自己选择的是灵感取自弗兰克·迪科塞尔的名画《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一款女式宽松缎子无领短袖长袍，饰以意大利风格的蕾丝花边，《每日电讯报》赞叹这一身新潮的选择“拥有出乎意料的简约与优雅”，然而那位出身显赫、尚未发福的新郎选择的双排扣大衣却遭到了截然相反的嗤笑：“丘吉尔先生的穿着是本城上流人士婚礼着装史上空前的失败，他看起来更像是个马车夫……”

自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纯白色婚纱一统天下的时期，然而自20世纪初开始，更大胆激进的改变开始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的爱德华时代，英



1933年2月21日，玛格丽特·威汉和丈夫在伦敦布朗普顿礼拜堂举行婚礼



1926年的一款婚纱造型



Jasper Conran 2007 秋冬系列婚纱礼服

国女性昼礼服开始向男装风格过渡；以往，女性婚礼礼服的模板一直是女士昼间常礼服，现在开始逐渐向更为大胆、挑逗的晚礼服靠拢，粉色、杏黄、天蓝，甚至大胆的紫色与褐色开始打破白色的垄断地位。婚纱“晚礼服”化的另一个推动力即是婚姻登记与管理权终于从教会逐渐转移至现代民事公共管理机关，教堂纯粹变成了某种提供典礼服务的公共空间，允许主办婚礼的时间一再延长，最终可以晚至傍晚18点，于是婚礼后的宴会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晚宴或者晚间酒会。

新兴的电影工业，尤其是来自美国好莱坞的爱情与歌舞电影，也迅速成为新一代年轻妇女生活方式与衣着品位的指针。正如人类学家霍坦斯·鲍德马克所批判的那样，好莱坞电影持续发出一种“关注我，以及我的身体”的理念。1917年，英国时装设计师克劳德·罗佛特·弗拉瑟决定迎娶美国歌手格雷斯·克劳福德时，他和新娘共同设计了一款别出心裁的婚纱：金色的绸缎高腰长裙，而四位伴娘则身穿紫色雪纺绸礼服，不过为了表示尊重家族与传统，格雷斯依旧戴上了传自祖母的白色蕾丝面纱，和传统的香橙花花环。

世界大战，女权与“新形象”

两次世界大战是以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战事机械化为标志的“总体战”，妇女前所未有地投入到工业与农业生产以及各项为战争服务的后勤工作之中，随之而起的是妇女权利意识的勃兴，从选举权、同工同酬到裸露身体的自由等等，这种狂飙激进式的思潮反应到女性时尚中，表现为阳伞和长手套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简洁的短裙与指甲油，以及更加裸露后背与肩部、乳沟的晚礼服，类似嘉宝与玛琳·黛德丽在电影《残花覆艳》（*Susan Lenox*）以及《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所穿着的戏装那样。当时，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时装设计师是达夫·哥顿夫人以及其高足爱德华·莫里纽克斯（Edward Molyneux）。

1923年，莫里纽克斯在伦敦奥林匹亚体育场举办了一场成功的时装发布会，后来以电影形式在欧洲各大影院播放，他大胆地推出了一组新颖的婚纱礼服：模特头戴俄罗斯传统卡柯史尼克风格（Kokoshinik）珠宝冠冕与面纱，身穿雪纺绸露背长礼服，没有裙摆——这也是来自战争时期纺织原料匮乏的持续影响。实际上，即便在“一战”后20年代短暂的繁荣中，传统的拖地长裙摆也没有完全回潮，到了20年代中期，一些新潮女性甚至会选择在婚礼上身穿短至膝盖的礼服裙，并采取其他标新立异的设计。在一张著名摄影师彼得·诺斯拍摄于1926年的新娘定妆照上，一位新娘采用了固定在头冕后部，由全透明薄纱制成，末端采取亮片装饰的裙摆，裙装本身的下半部也是半透明的蕾丝材料制成，并采取了时新的荷叶式剪裁。

1928年，牛津街上最具盛名的马歇尔和斯内尔格罗夫百货公司（Marshall&Snelgrove）出版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婚礼礼服商品目录，用绘本的形式描绘了婚纱、珠宝、配饰等一系列婚礼相关产品。这个奢华的时代仅仅因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而短暂停止。1933年2月，伦敦社交名媛、后来的阿盖尔女公爵玛格丽特·威汉嫁给了来自纽约的股票大亨查尔斯·斯威尼，据说早在头天午夜，许多好事的群众就在布朗顿礼拜堂外早早占据了位置准备观礼，一睹这位伦敦社交圈之花与来自新大陆的年轻暴富新郎的风采。威汉为自己挑选了一件由香槟色绸缎制成的长袖贴身晚礼服裙，而同色裙摆则达到了夸张的12英尺，这件奢华的礼服花费了6周时间才缝制完成，造价达到了惊人的52英镑，几乎是一个普通女性工人一年的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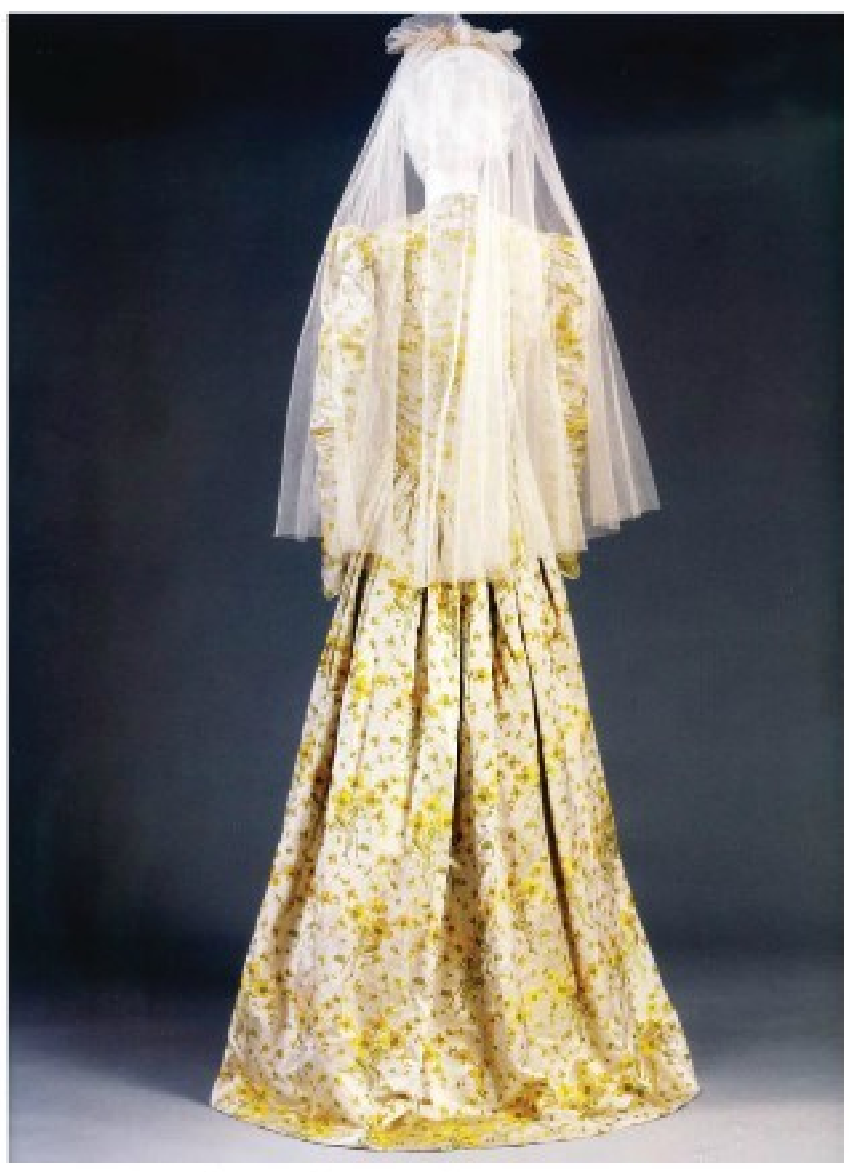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体育锻炼的普及与妇女地位的上升，女性礼服的肩部逐渐加宽，胸部逐渐凸显，而腰部与背部完全贴合身体，彰显曲线。《Vogue》杂志曾在1937年婚礼礼服专题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新娘应该理直气壮地认为，她们有权利在婚礼当天“充当一天明星”。在作者看来，传统白色婚纱简直是从自己祖母衣柜里偷偷翻出来的遗物，杂志推荐读者大胆选取诸如美国设计师曼·波彻（Main Rousseau Bocher）设计的天蓝色雪纺绸礼服裙，搭配同色长手套，或者采取时新的绉纱材料缝制一条类似希腊女祭司长袍的礼服，来彰显自己简洁雍容的古典品位。

然而，突然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迅速打断了这一段纸醉金迷的岁月，严酷的战时物资统一配给政策使得各参战国妇女们必须绞尽脑汁才能满足家庭日常生活的各种必要消耗。从1941年开始，英国妇女就不得不每天面对一张特殊的CC41标签，它代表自1941年开始配给的平民服装。实用服装是根据政府规定的样式制作的，一般都简单实用，为确保不浪费布料，尽量削减了装饰成分、口袋和褶皱。刚开始实行服装配给制时，每人每年有66张服装票，可保证普通妇女有一套新衣服。到1942年，配额减少到每15个月60张票，只够一名男子每两年买一条长裤、一件夹克和一条短裤。

在这种情况下，不幸于战时成婚的新娘们就只能同时发挥想象力、手工和锱铢必较的美德，一些新娘被迫重新穿上长辈的旧婚纱，或者直接身穿战时妇女劳动队的制服走进教堂；有些则开动脑筋，将窗帘、沙发套甚至废弃的降落伞改制凑数。1941年9月，19岁的伊丽莎白·金与27岁的拉尔夫·罗兰德·阿布萨罗姆在海德公园一家小教堂内举行了婚礼，新娘

的礼服是用住宅中一幅古老而巨大的窗帘改制的，因为金酷爱传统式样的拖地长袖礼服，而手中的服装票则远远不敷使用。这幅缀有黄绿两色金桃花图案的淡茶色窗帘在被改为结婚礼服后，却拥有一种出乎意料的古典田园风格。

随着战争于1945年8月的结束，奢华与激进风潮似乎转眼之间就扫平了战时的拮据与简朴。通过在战时经济中的卓越贡献，女性的地位再次提高，新兴的家庭消费电器第一次将她们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她们成为了“客厅与家庭的主管”而非奴隶，被战争长期抑制的消费与审美欲望的急剧反弹，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购买力。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女性相关产品——从化妆品、日用消费品到时装，都开始大胆地以独立自主与性感诱惑力为卖点。在传统的家庭主妇、年轻的已婚女性之外，《Cosmo》、《玛丽嘉儿》等新兴时尚杂志的核心读者群是一个全新的女性群体：漂亮，自信，职业与人格独立，无固定男性伴侣的都市年轻女性，从消费主义层次支持了波伏



伊丽莎白・金由窗帘改制的婚纱



伊丽莎白・金和丈夫在婚礼上



2008年拍摄的电影《欲望都市》中，女主角凯莉的婚纱由薇薇安·韦斯特伍德设计

瓦所谓“妇女对自由、责任和社会流动性不可抑制的需求”。

1947年2月，克里斯汀·迪奥在巴黎举办的“新形象”主题时装秀宣布了这个全新时代的到来，柔和的肩线、纤瘦的袖型、以束腰构架出的细腰强调出胸部曲线的对比，以及大而夸张的翻领，长及小腿的宽阔裙摆，使用了大量布料来塑造圆润的流畅线条，自此决定了此后将近20年的女装流行大趋势。次年2月，著名《Vogue》杂志模特帕特里夏·康宁汉在决定嫁给高级定制时装设计师查尔斯·格里德后，特地邀请爱德华·莫里纽克斯为自己设计制作了一条具有鲜明“新形象”风格的婚礼礼服。无论是高级成衣还是定制时装，单纯精良的用料和剪裁已经不能满足传统高端与新一代中青年客户的要求，而必须拓宽灵感与设计思路，从早期清教徒服饰，到西部拓荒时期，乃至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卡斯蒂略宫廷或路易十四时期凡尔赛宫廷时装，从而为自己的作品增添附加价值，正如尼可拉斯·柯勒





1971 年，身着潮流婚纱的比昂卡·莫雷娜与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结婚

律治在《时尚的阴谋》中论述的那样：“当设计师故意用蓬皮杜夫人来命名一套价格 1.5 万美元的斜纹丝绸夜礼服时，他所推销的不仅仅是服装本身，还是一种对 18 世纪法国宫廷奢华的兴趣和想象。”

1955 年，《新娘》（*Bride*）杂志在伦敦创刊，在它的大力主张下，短裙成为越来越多新一代新娘的选择。著名好莱坞女影星格蕾丝•凯利在《上流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崔西·劳德就身穿一件米高梅戏装设计师海伦·罗斯制作的芭蕾舞裙风格婚纱，裙摆的长度只到膝盖左右。在电影上映后不久，格蕾丝·凯利就与摩纳哥雷尼尔王子喜结连理，从而使得这件婚纱在美国青年女性中风靡一时。而新一代时装设计师诸如玛格丽特·夸特，更是被誉为迷你裙女王。1960 年，她推出了一组裙摆仅仅到达膝盖的紧身钟形婚礼礼服裙，它和凸条毛衣、氨纶紧身裤等其他夸特稀奇古怪的设计一道，迅速被欧洲青年所接受。1962 年 8 月，当英国著名珠宝设计师温蒂•拉

姆肖与同行大卫·沃金斯举办婚礼时，大卫就让自己的新娘穿上了一条白色低领连衣短裙；而法国著名影星碧姬·芭铎在3年前嫁给男演员雅克·夏理尔时，也选择同样的款式。

在60年代的狂飙运动中，新锐设计师的古怪作品层出不穷，约翰·贝茨曾设计了一款古怪的华达呢配人造亮革材质双排扣短大衣作为女性婚礼礼服，贝琳达·贝尔维尔（Belinda Bellville）甚至将长至脚踝的俄罗斯风格女式长大衣作为婚纱作品推出。虽然蕾丝装饰的传统白色婚纱依旧是欧洲女性婚服的首选，但其使用率也逐渐下降至60%左右。

较之60年代的解放，70年代的特征是更为喧嚣、多彩、迷乱，包括薇薇安·韦斯特伍德引发的朋克美学，安德烈·库雷热的太空主义试验，以及摇滚歌手大卫·鲍伊带来的双性与华丽风格。在意识形态领域，婚姻和其他社会正统观念一样，被看作隶属资产阶级可鄙、自利、反人性的东西。1968年的欧洲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中，青年们喊出了“让家庭进博物馆”和“做同居的自由人”等口号，自1970年起，整个欧洲每年结婚的公民人数都在以2%至3%的幅度慢慢下降。1971年，当“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与女模特比昂卡·佩雷斯·莫雷娜结婚时，他们的穿着明显地反映了这一潮流所带来的冲击：有了三个月身孕的新娘戴了一顶白色遮阳帽，并把面纱随意地固定在帽檐下，身上则是一件松垮的、由伊夫·圣洛朗设计的白色亚麻西服上衣配长裙，从大敞的领口里，摄影记者能够毫不费力地看到新娘裸露的胸部，而贾格尔本人则穿了一套出自伦敦萨维尔大街知名高级定制服装工作室Nutter的浅绿色三件套西装，内配花衬衫，脚下却是一双舒适的运动鞋。

如果说Nutter的设计还是在竭力将传统与70年代放荡不羁的明星



设计师阿尔伯·艾尔巴茨在2008年为法国高级时装品牌Lavin设计的一款婚纱



桑德拉·罗德斯在 1976 年设计的婚纱



约翰·贝茨在 1966 年设计的一款“古怪”婚纱

新主顾特立独行的审美结合起来，那么其他一些新锐设计师的作品简直是在故意通过戏仿和解构，嘲讽婚礼制服背后所代表的传统。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服装设计师桑德拉·罗德斯（Zandra Rhodes）于 1976 年设计了一件工厂垃圾风格，由雪纺绸材料制作的婚纱礼服，长裙的一侧被无情地撕开，暴露出穿着者的整条大腿，裙摆上满是不规则的裁剪洞，并装饰以朋克风格浓郁的搭扣与金属链，紧身无袖上装通过一条带子固定于穿着者上身，下摆也缀以倾斜的褶皱与金属链。这件标新立异的婚纱最终被同校校友、同为新锐艺术设计师的伊丽莎白·维纳相中。

高级定制、明星与廉价快消

70 年代的喧嚣狂放，在 80 年代早期遭遇了回潮，保守主义卷土重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要求回归谨慎的传统。1981 年 7 月 29 日，全球超过 5 亿人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英国王储查尔斯与戴安娜王妃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世纪童话婚礼”，戴妃身上的传统式象牙色塔夫绸长袖婚纱由大卫·伊曼纽尔设计，长达 25 英尺，用珍珠刺绣图案装饰的裙摆旨在使新娘看起来“像一位童话中走出的公主”。同时，另一批年轻的、来自英国圣马丁中央艺术设计学院的天才们则致力于重拾英国时装设计在欧洲的独创与前瞻性地位。1987 年，年轻的圣马丁毕业生约翰·加利亚诺为电影演员弗朗西斯卡·奥蒂设计了一件特



Bruce Oldfield Couture 2010 春夏系列婚纱作品



Jenny Packham 2010 年春夏系列婚纱作品



Marchesa 2010 年春夏系列婚纱作品



Temperley London 2010 年的婚纱作品

立独行的婚纱：它由三部分组成，一件不对称剪裁的人造奶油色绉纱无袖长裙，内衬一件白色硬纱女衬衫，肩部饰以人造象牙色丝质玫瑰花。

1990年，美籍华人设计师薇拉•王创办了自己的时装设计公司，力争以经营女式高档成衣的模式来营销自己设计的女性婚礼礼服。她的出发点很简单，自70年代以来，婚纱本身的设计已经与主流发展渐行渐远，普通消费者付不起大牌设计师为明星量身打造、充满出格想象力的款式，就只能屈就于毫无特色可言的传统设计。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与时尚平面、电视媒体的滥觞，一般女性消费者对时尚设计的感知与积累已经达到了以往无法企及的高度。1995年，《玛莎・斯图尔特婚礼杂志》在美国创刊，进入新千禧年后，还出现了ASOS、NET A PORTER等涉及婚礼礼服的在线快时尚购物网站。新时代的女性同时在社会生活中高度成功，婚姻年龄也普遍推后，根据统计，90年代初，欧洲女性迎来“生命中最美好一天”的平均年龄是26.7岁，男性为26.5岁，比60年代推迟了一岁多。很明显，消费者的口味会越来越挑剔。

90年代婚礼礼服时尚的另一大革命，就是露肩长裙被设计师和消费者所接受，这一设计的最初灵感是薇薇安・韦斯特伍德，将束身内衣稍加改变，作为可以外穿的服饰设计。同时，由于环保主义和新简约风潮的影响，一批主要来自德国的新锐设计师开始尝试创造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维罗妮卡・施瓦特（Veronica Schwandt）利用无印染天然麻布和可循环使用材料制作了一件混搭了中世纪亚洲风格女式长袍与80年代简约设计的婚纱，通过腰部与袖口设置的一系列带子，穿着者可以自由调节这件礼服的贴合程度，目的在于使一件礼服能够多次被不同体型的新娘穿着。

而在高级定制时装方面，典礼正装和婚礼正装始终是它赖以维系自身生存的两大需求，一些巴黎高级定制品牌，诸如克里斯汀・拉克鲁瓦（Christian Lacorix）在财务报表中承认，90年代中期，超过40%的营运收入来自婚礼定制，而达到这个目标仅仅只需每天售出几十条婚纱长裙——每条的定价通常超过10万美元。而克里斯汀・迪奥、纪梵希等品牌高级定制部门的数字也差不多，这些主顾通常来自中东石油国家的富豪、欧洲传统贵族世家和好莱坞明星。

用80年代美国版《Vogue》主编格蕾丝•米拉贝拉的话讲，克里斯汀•拉克鲁瓦的婚纱是“为大剧院舞台而设计，为聚光灯而设计，最终是为了满足女性关于奇观和盛典的梦想所设计”。1993年秋冬季发布会上，拉克鲁瓦展示了一款令人震惊的黑白两色婚纱长裙，紧身高领上衣的袖口、领口到胸部，以及裙摆处使用了大量的盘结绳绒、刺绣，以及金片、宝石与珍珠装饰，面纱也一反常态地使用了黑色，营造出一种肃穆、华丽的效果。

在大众视觉娱乐媒体时代，名流婚礼持续成为普罗大众关注的对象。1999年，《OK！》杂志斥资100万英镑，获得了辣妹维多利亚与曼联足球明星大卫・贝克汉姆婚礼的独家报道权，尽管当时新娘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她坚持要求在自己的婚礼上看起来“纯洁无暇”，于是选择了薇拉・王的一款香槟色缎子长裙，上身是缎带束身内衣式礼服，用以模仿1939年版《乱世佳人》中的费雯丽。

2005年最为引人注目的新婚夫妇莫过于模特、高级舞娘蒂塔・万提斯（Dita Von Teese）与美国哥特死亡金属摇滚明星玛丽莲・曼森，两人于12月在爱尔兰Gurteen古堡举办了婚礼仪式。蒂塔选择了一件薇薇安・韦斯特伍德设计的紫罗兰色丝绒露肩礼服，新郎依旧带着平时舞台上惊悚的白色妆容与巨大的哥特黑眼圈，身穿一套黑色天鹅绒礼服与奢华的白色18世纪风格领结。“一对新人仿佛是来自19世纪浪漫主义吸血鬼传说中的人物，带着不可思议的冷酷、死亡感与美丽。”美国版《Vogue》杂志如此评论。

除了电影与娱乐明星，诸如《欲望都市》这样的美剧也开始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全球女性的着装与消费趋势。2008年6月，《欲望都市》电影版在伦敦举办了首映式，莎拉・杰西卡・帕克在戏中换装超过300套，其中凯莉的新娘礼服分别来自薇拉・王、克里斯汀・拉克鲁瓦、朗万、克里斯汀・迪奥以及薇薇安・韦斯特伍德，堪称是这个消费至上的丰腴时代女性关于婚礼与婚姻的终极幻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高级定制时尚成本越发上升、曲高和寡的年代，全球一体化经济与代工外包模式最终使得这些设计能够为一般消费者所享用，大部分欧洲高端成衣品牌的代工工厂现如今设在东南亚，一旦高级定制与成衣品牌将最新款式设计委托给这些代工点，它们就能迅速在几周之内批量生产款式相当、裁剪与质地稍逊的廉价仿品，一部分在本地消化，一部分通过低端快时尚品牌以及亚马逊等网购电商渠道回流至欧美。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更使得这股廉价消费热潮越来越成为普通女性婚礼消费的主流。2009年初，英国零售业巨头BHS推出了仅售100英镑的平价简约婚纱套装。不过随着经济形势的回暖，高级定制时装与成衣品牌的婚纱线产品旋即又供不应求，2010年，均价6000英镑的英国高端婚纱品牌Brown Bride的销售业绩较之2009年增加了50%。然而这些设计的主调又不约而同地回归了最为传统的白色。300年来，尽管女性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持续上升，对于婚姻、家庭的观念不断改变，时装设计师们来去匆匆，但这件简单的白色礼服所承载的某些认知与价值，却依旧未变。



苏迪和阿羚夫妇

爱情不说话

“不说话，就没有争执，但会有误会。”有一段时间，阿羚也担心过他们的异国爱情是一场“误会”，因为从相识到谈婚论嫁，一切都显得草率和仓促。

记者 黑麦



苏迪（Sudeep）踩着踏板摩托车穿行在加德满都的小巷，身后坐着他的中国老婆阿羚，3岁半的王熙萌坐在两人中间，每天，他们都用这样的方式接送儿子上幼儿园，之后，苏迪会带着阿羚在尼泊尔采购，维持着他们的淘宝网店。

这个在上世纪60年代被西方称为“嬉皮运动第二故乡”的加德满都仍旧保持着当年某种慵懒的沉睡状态，在这里几乎没有一幢现代化的都市地标，没有一条繁忙的马路，一些低矮甚至有些破旧的房子密集地散落在这个山谷中。住在这里的人多数信仰印度教，他们敬畏神灵也崇尚安逸，几乎每个人的眉间都被点上了提卡（Tika）红点，这是他们祝福彼此的日常习俗。在巴格马提河上，随处可见玩耍的孩童，闲谈的年轻人，小贩也不张口叫卖，最大的投入也就是向走过的人微笑片刻。

吃过晚饭，阿羚躺在床上，似乎想和她的丈夫比画点什么，比如是早餐或是换洗的床单之类的事情。此时，她3岁的儿子拿着玩具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她拿起手机拍了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写上“小朋友越来越淘气”之类的话。阿羚住在苏迪家的房子里，与很多尼泊尔家庭相似，几辈人的大家庭生活在同一住所中，在阿羚看来，住在这里很舒服，“气候好，空气和水比北京干净，儿子在这里可以同时学到三种语言，还有一大家子人可以相互照应”。

2010年6月，阿羚结束了6年的互联网运营工作，打算给自己放一次长假，再回到北京重新计划生活，因为“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儿正开”这句歌词，她走完抒情小品似的几个文艺景点后，买了张到达青海的机票，背包还没烂，心情也没有什么期望，或许就是想离开北京去外面走走，阿羚想把年初那次无疾而终的一段无聊的恋爱后续情绪打发掉。伴随着不断循环播放的“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去看那美丽的格桑花呀”的旋律，火车穿过草原越过山川翻过了唐古拉，在西藏，阿羚似乎真的体会到了畅销小说中的那种“升华”。在拉萨办了15天的尼泊尔签证，阿羚买了张最慢的大巴车票，拎着背包去感受不一样的“异国之旅”了。

在拉萨办签证的时候，阿羚搭上了两个一起坐大巴去边境的伴儿。“一个人走久了有点闷，二是，我的英文烂得一塌糊涂，有个英文不错的同伴路上能方便些。”阿羚说。两男一女一路相伴来到了加德满都，从来不做旅行计划的阿羚，也在同伴的热情下定出一些旅行计划。就像所有第一次来尼泊尔旅行的人都会在泰米尔附近玩乐，三人在那选了一家本地人开的花园式家庭旅馆住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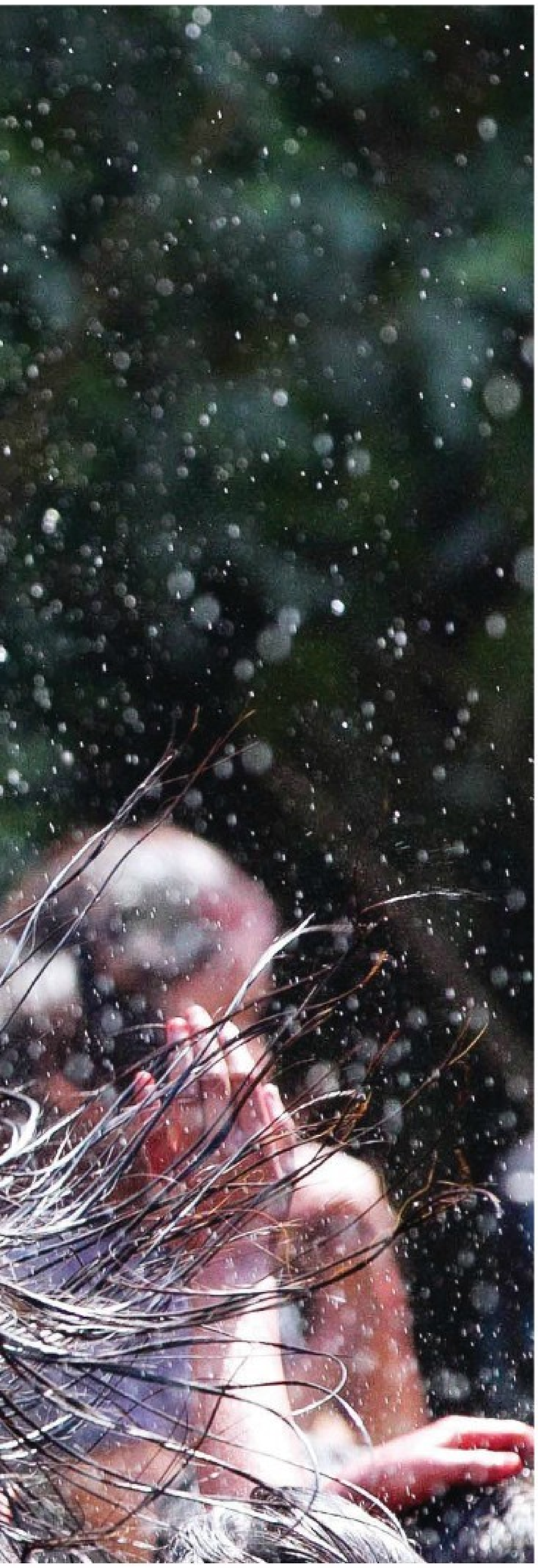
第二天吃早餐时，阿羚建议那个英文不错的同伴打听一下“孤独星球”的推荐在当地是否靠谱。恰好斜对面有两个当地年轻男孩在抽烟聊天，几句对话之后，两个男孩热情地走来，其中一个是苏迪，另一个被他们叫成“马铃薯”。在先后问了对方“你从哪儿来”，“你叫什么名字”之类的初级英语对话之后，所有人相继陷入沉默，只是一直看着彼此傻笑。苏迪一直看着阿羚，像是在安慰“语言不通也没关系我陪你们一块笑吧”。接下来的几天，男孩儿们作为向导带着他们一行开始游览加德满都，性格温和、不善言谈成为阿羚对尼泊尔人苏迪的最初的印象；因为一个劲地傻笑，当初的苏迪也认为阿羚就是那种有些单纯的中国傻姑娘。

此前，阿羚曾经在网上看到过关于尼泊尔男人的传言。“很多人说他们看似无所事事地聚在广场，专瞄一些单身女游客，跟着游客以向导的名义免费吃喝，然后展开爱情攻势，游手好闲的尼泊尔男人凭点姿色和把妹技巧，最终达到结婚目的从而借婚姻之力走出国门，摆脱相对贫困的尼泊尔；



2013 年 3 月 26 日，尼泊尔加德满都的民众参加印度教传统节日胡里节庆祝活动

这些人也会希望你来资助开店，从而过上所谓的好日子。”在想到这些后，阿羚开始对这两个“过度热情”的尼泊尔男孩产生警觉。三个人决定在次日凌晨不辞而别。早上 6 点，天刚擦亮，三个人打好行李退了旅馆，准备前往尼泊尔出入境管理处重新续签，之后前往博卡拉。三个人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从来没操心过如何抵达目的地，结果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才抵达移民局，其间，阿羚收到了苏迪的两条短信，大概意思就是：你们去哪儿了，你在哪儿？接着一条：快点回来，今天计划去我家吃饭。又接着一条：请不要离开，我去找你。一连几条显得很急促。当阿羚三人来到签证处时惊愕地发现，苏迪和马铃薯已经等在了门口，脸上带着一点怨气地向他们笑着。阿



羚回忆道：“当时我觉得我们有些卑鄙，居然还用了逃跑的方法。”苏迪径直走向阿羚，一把抱住她说：“你不要跑掉了。”阿羚在后来才得知，当苏迪来到旅馆发现他们不见了以后，就在泰米尔一路走一路问，并赶在阿羚一行人前到达了签证处。在苏迪期待的眼神下，阿羚决定和伙伴们分开。苏迪不知道从哪搞来了一辆摩托车，他将阿羚的行李绑在摩托车后座，风驰电掣地载着心情略有些糟糕的阿羚回到客栈。

苏迪再次成为向导，又开始载着阿羚游览起来，他总能带着阿羚走偏门的小路，看不常规的风景。在山顶的时候，他用印着字母的塑料珠子在阿羚的手上拼出“I like U”。阿羚回想道：“这个男的这么幼稚啊，才认识几天你就喜欢我，喜欢什么呢？我长得不好看，也不会讲一串一串的英文和你交流，就算喜欢我过几天要离开，能怎样呢？总之并没有心花怒放的感觉，反而有一点点的失落，觉得这样的表白好随意，转头看他的眼神又似乎有点认真，所以慢慢就觉得有点不一样了。”

有天吃完早餐，苏迪站在客栈的楼顶指着远处跟阿羚说：“我的家在那边，你要不要去玩？”阿羚想了想，觉得可以，于是苏迪很高兴的给家里打电话，说有朋友要去家里吃饭，意思是让妈妈做点好吃的。阿羚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苏迪提醒道，他有一个 18 岁的妹妹，刚刚考上大学，如果是第一次去他们家，希望她能够带一个小礼物，于是，阿羚大方地买了一套衣服作为礼物。

从客栈出发需穿过几个狭长的巷子，走出来便看到一座三层小楼，那就是苏迪的家。阿羚挂着一脸微笑来到家中，她似乎也看出了这一家人对她不同寻常的关心与热情，吃过抓饭，苏迪的妈妈还专门给在上班的苏迪爸爸打了电话，叫他回家见见客人，爷爷和奶奶也似乎有很多话想和阿羚谈。后来阿羚才知道，原来是苏迪前一天的表白，并没有遭到阿羚的反对，因此他欣然地以为阿羚接受了他，并希望得到家人的支持。苏迪的爸爸似乎是全家唯一不太高兴的人，他觉得阿羚这个外国女孩很难融入尼泊尔家庭，也会担心宗教、生活习惯和语言的沟

STONY BROOK VILLA

亚龙湾·石溪墅

ดีลาธารา วิลล่า



买石溪墅

看亚龙湾的海

私家泳池别墅 现房热卖

0898-3828 8888



阿羚在加德满都采购当地货品，维持着他们的淘宝网店生意

通。“由于我有限的语言能力，以及担心搅乱这个温馨的家庭场面，就笑着附和着，被苏迪拉着的手，也就一直没有缩回来，这显然给了他更多的鼓励，他也不顾及父亲的反对，我也就那样配合着他，整个下午，他的手都没有松开过。”

傍晚的时候，苏迪和阿羚两人步行来到杜巴广场，这个满是鸽子的广场上还有几对中国的年轻情侣拍着婚纱照，照理说，广场上的士兵是不允许当地情侣在这个广场上做出亲密的举动的，苏迪将拉着阿羚的手移到她的肩膀，穿过广场。

“结婚。也太快了吧！”几天后，在阿羚听到苏迪嘴里嘟囔着这个词儿的时候，她心里就想：“我根本就还没来得及考虑我有没有喜欢你。”虽然有些唐突，阿羚仍旧没有任何反感，她心里默念着：“这只是一次奇妙的艳遇吧。”第二次跟苏迪回家吃饭，家里人已然认定她就是正式女友，苏迪骑着摩托车带阿羚上山看湖，去他觉得最美的地方。“我也适应了他这个一头热的状况，心里边也慢慢地觉得这样也挺好，因为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了讨我开心，为我做那么多事。”苏迪说阿羚的英语不好，那就不用讲话。“那天晚上，我比画着要去博卡拉，苏迪就说要漂流着去，当天他就找来八九个兄弟一起划皮艇，就我一个女的，我们在河里漂了四五个钟头，晚上在河边搭帐篷，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萤火虫，也第一次看见那么多星星。”

最后，苏迪和阿羚还是搭车到了博卡拉。除了费瓦湖以外，阿羚觉得当地很无聊，倒是苏迪每天都兴高采烈地带她去见各种朋友，吃他认为最好吃的东西，听他喜欢的摇滚音乐现场。“他跟身边的所有人说我是他的‘budi’，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尼泊尔人称呼妻子的意思。可能正是我这么稀里糊涂地不搭腔，他才一次又一次地上升了你情我愿的意思。后来，他问了我一句要不要跟他结婚，我说不要。”阿羚说。

“在认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求婚在我心里就像是一个玩笑，虽然想要认真对待，毕竟还是觉得冲动的成分居多，在去博卡拉之前，苏迪妈妈找了一个裁缝给我量体裁衣，我心想阿姨还挺客气的，才来几天就给我做衣服。从博卡拉回来没几天，我才得知……天呢，第二天就是我的婚礼了！家里人居然要安排我们结婚了！我虽然被吓到了，但还是认真地穿上了为我量身定做的纱丽，我就是觉得那衣

服可真好看，穿上拍张照也不错，但我并没有同意马上结婚。我跟兴高采烈的大伙儿说，结婚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必须要和我的家人商量才能做决定。就这样，我就只穿着红色的结婚纱丽拍了拍照片，但是答应了她的妈妈等我和我的家人商量之后，3 个月后会再来尼泊尔完成婚礼的，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给他们稳住，以后的事情再说，反正我回国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也都无法预料。但是这个承诺既然说出来了，内心还是想再过来的，就算不是结婚，也可以来看一看善良热情的家里人，我很喜欢这个和睦的大家庭。虽然苏迪和这个家庭不搭调，他的家人很传统，而他，是个满手臂文身的朋克乐队贝司手，这样的反差也算有趣。他喜欢我，也许觉得结婚了，就像吃了定心丸，他是怕我像上次一样无声无息地跑掉。”

回到北京，阿羚的很多朋友都觉得她疯了，竟然会和一个言语不通的人交往，还是异地恋、姐弟恋、“旅游景点儿”跨国恋。姐妹们也纷纷拿来电视剧里的招式劝她和平分手，或是保持朋友关系，阿羚也想认真考虑一下这段情感，好在阿羚的妈妈对此并不反对，毕竟女儿已到了出嫁的年纪，既然有打算，想清楚就行。阿羚和苏迪仍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通过 Skype 和 Facebook 不间断地聊天。加德满都和北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那里经常停电，网络也没有入户，苏迪几乎住进了泰米尔的网吧里，每天等着这位中国姑娘的出现。阿羚也会时常打开聊天工具和翻译软件，用这样的方式回应他的每一个问候。阿羚偶尔会翻出在尼泊尔的照片，她总觉得这个男孩除了真心倒也没什么特别的，突然她意识到：“真心不是很难得的吗？”阿羚给出自己一个期限——两个月，如果这个小伙子仍旧坚持着，就答应他。“只要心里接受了他，一切就不再是问题了。”阿羚决定两个月后再次去到尼泊尔，尝试一下这段情感。

2010 年的平安夜，阿羚来到了中尼樟木边境，因为天色已晚，她打算第二天一早再出境。抵达樟木旅馆，已经 20 点多了，阿羚想到边境可能有尼泊尔的电信信号，就翻出之前买的电话卡插进手机，不到一分钟，电话就响了，苏迪的声音很激动，他讲自己在友谊桥上，桥已经关闭了。原来苏迪并不知道阿羚几点才能到达边境，从下午就开始呼叫阿羚的号码，几乎每几分钟就会拨一次。此时，阿羚的心里有一点感动：“我大概能够体会他想见到我的心情，远比我试着和他在一起的心情真诚真挚得多。”

第二天一早阿羚还没有过关，正在边境一个小店换钱的时候，苏迪已经出现了。“他一家店一家店地找我，就像我当初逃跑时他找我的心情一样，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从见面后，他就一直拉着我的手，笑着看着我。就是那一刻，我觉得他可爱极了，我能体会到感情之所以珍贵，就在一颗认真待你的心。”

“当我再次从尼泊尔回到北京的时候，是两个人，我打算带着苏迪来中国生活，我还没有想过结婚这事，只是觉得既然两个人确定要谈恋爱了，起码让他了解一下我的生活。对他来说，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办签证、第一次长途飞机、第一次在广州转机时喝到沙县小吃的乌鸡汤，都是很新鲜的事。我想到的是让他看到这边的生活，尝试我们的饮食，见一见我的朋友和家人。虽然苏迪对来中国后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感到好奇，但是在他心中，我们的婚姻生活似乎已经开始生效了。”

回到北京不久，阿羚就怀孕了。“最初没有什么意外的感觉，第一个念头就是既然孩子来了，那就要留下来。”阿羚心中有一点庆幸，她觉得能在刚好 30 岁的时候有个孩子是个挺幸福的事儿，毕竟很多在城市工作的女孩子顾虑多，很多人拖到很大了才生小孩。阿羚说：“很快，抚养孩子、结婚问题都摆到眼前，它们最终替代了孩子到

STONY BROOK VILLA
亚龙湾·石溪墅
ดีลาธารา วิลล่า


买石溪墅
看亚龙湾的海
海景公寓 即买即住
0898-3828 8888



阿羚（左三）和苏迪（左一）的家人合影

来的喜悦感，我开始和妈妈、姐姐商量着去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苏迪还不适应北京的生活，他得靠我。”

或许因为没有太多的感情经验，25岁时开始，阿羚对婚姻家庭的期待比不过生一个小孩。阿羚曾认为自己无法把握住男人们的善变，只有孩子或许更好，可以相依为命，也好共同成长。“在没有想到结婚在前生子在后的顺序，单纯地就是想要一个孩子。”阿羚老早就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妈妈，她妈妈像所有母亲一样开始表现出十分强烈的不认可，但慢慢地，她开始默许了阿羚的某些想法，在女儿如果总也嫁不出去的情况下，有个孩子也算是有了一个相互的依靠。“就这样接受了我不太负责任的念头。”阿羚说。2008年前，阿羚曾怀着对“宅男是高智商物种”的好奇，和一位深居简出的“食草男”谈了两年的恋爱，两年里他从来不见阿羚的任何朋友，理由是“那是你的朋友又不是我的朋友”。阿羚归结为他羞涩的性格。男孩钟情于游戏机、女优写真集，并再无其他爱好。阿羚也认真地告诉他要为了以后的“生活所需”做点什么。彼时，阿羚的月收入已经过万元，养活自己没什么问题，为了嫁出去，阿羚专心地等着宅男的那句“我玩完这部XBOX的《忍龙2》通关就娶你”的兑现。他高超的技艺不久就将游戏全部通关，然后接二连三地打通了几遍，却没再提过结婚的事，最终的结局是他离开北京再也没有回来，从此断掉了所有音讯。阿羚如释重负一般恢复了单身生活，从此变得更加独立。朋友们对阿羚最大的感觉是“这个姑娘有主张、主意大”。很长一段时间，她的“男孩子”性格都会给人一种“她才不会结婚”的感觉。虽然阿羚也向往幸福的爱情，但是当她面对婚姻时，也会呈现出某种逃避。她担心这个家庭的未来，也会担心自己的能力是否能照顾得住这爷俩，甚至会担心在10年后是否能和丈夫顺利地交流，她在思考着从未想过的问题和麻烦。最终，阿羚给自己打气：“我得和我孩子的爸爸结婚，反正结婚就是那么一回事儿。”

阿羚的爸爸在老家选了个好日子，阿羚和苏迪如约赶到老家新乡，在民政局领了结婚证。第二天一早，阿羚和苏迪在影楼盘头换装，拍结婚照，中午在一个亲戚家的酒楼摆了六七桌酒席。“除了熟悉的两桌亲戚以外，我们谁都不认识，倒是宾客们听说我带了个外国女婿回来，都觉得挺稀罕，凑热闹的人就越来越多，苏迪也因为言语上的不通，没有过多交流，大家只是一个劲地敬酒，他总是笑嘻嘻地和人干杯，酒席宴一结束，我们就开

车回了北京，在我印象中，这可真是个非常凑合的婚礼，要不是偶尔有人问起，我几乎忘记了我的结婚也是摆了酒的，但它草率得就像和我没什么关系一样。我看得出苏迪是很开心，这个婚礼让他觉得踏实。”

回到北京，同居的适应期还在继续。复杂的家事、电器的使用、北京的文化……阿羚一时想不出如何表达，此时，光靠单词和手势比画是全然不够的。她表现得有些着急，而苏迪总是表现得很有耐心，或许是尼泊尔人温软的性格，他总是瞪着眼睛认真地听她的语气，试图从那些细微处了解到他应该感悟到的常识。

逐渐地，两个人在家里贴满了便签纸，上面用英语和中文写着家居摆设的名词，苏迪也会在后面标注上类似拼音的音标，此外，他们还把常用的复杂短句写出来，既是为了学习语言，也是为了沟通方便。阿羚说：“一直以来，都是苏迪在习惯我，他习惯着北京的环境，习惯我的家人，习惯我吃的食物和做事的方式。他刚来北京的时候，跟我说，为什么这里的人每天都这么快？追公车也快，吃饭也快，走路也快，超市结账付款也是快快快。他说我回北京也变快了，起床穿衣服很快，吃饭很快，说话很快，就连出门前整理也是要催他。但是苏迪真的很慢，他似乎永远无法适应大城市的节奏，可这就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每个人都要跟得上这个城市的步伐，否则我们就不能负担得起所有的生活成本。逐渐地，我们从一开始的相互喜欢，到忍让，由于习惯的不通和沟通的不顺畅，变得有些不耐烦起来，听到一两句不顺耳的话，苏迪就会抱怨，摆臭脸。相比之下，我的臭脸要比他多，这是因为我要操心的太多，而他似乎只关注我的脸上是否有开心的表情。”

2011 年 9 月 19 日，王熙萌出生了，孩子随阿羚姓王，也随了她的愿。苏迪在产房里一直握着阿羚的手，他的手心微微发热，表情有些激动，他似乎很想说些什么。阿羚问：“你害怕么？”苏迪只是笑着却不出声。阿羚回忆道：“孩子生出来那一刻他竟然眼里含着泪花，当护士把小孩抱过来放在我身边的时候，他把脸凑上去亲了亲，那个时刻我突然开始意识到，孩子不是我一个人说生说抚养就能独自完成的，他有一个父亲，一个很在乎他的父亲，这很重要。”

儿子出生以后，苏迪很自然地转换了自己的角色，他努力地学习做好一个中国爸爸，他学会了换尿布、灌奶瓶、推婴儿车，也开始为阿羚分担一些家务，这似乎是尼泊尔男人甚少接触的工作，苏迪满是朋克文身的手臂也能笨拙地完成阿羚布置的“奶爸任务”。不过，苏迪的脸上仍写有委屈的表情，最初被“关押”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由于言语和网路上的不通畅，他与尼泊尔的生活“划清了界限”。他仍旧搞不懂为什么每个人都忙得要死；搞不懂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抱怨却仍要坚持；他搞不懂现代化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方便；他更搞不懂为什么电视剧里每天都在打仗，却看不到一个好看的音乐节目。

苏迪一边居家，也开始尝试着在北京找工作。阿羚说：“我的态度很鲜明：你是家里的一员，你有责任和义务为我们的家庭付出，我在乎的不是你能够为家里带来多少收入，而是你努力尝试了想要尽一份力的态度。”苏迪去酒吧做服务生，可那里离家太远，挣的钱都花在了打车上，后来阿羚决定从他的兴趣出发，为苏迪添置了一套 DJ 设备，他白天练习，晚上就去一些酒吧练手，逐渐地，他的尼泊尔音乐风格也被一些同好接受，还培养了一部分“粉丝”，在那里也交到了一些朋友。“能够让他交到朋友一直是我的心愿。”阿羚说，“我妈一直嘱咐我，说他从娇生惯养的家里来到这么远，这么陌生的城市，就是为了和我在一

STONY BROOK VILLA
亚龙湾·石溪墅
ดีลาธารา วิลล่า


亚龙湾的精致假期
三亚石溪墅度假酒店
0898-3822 6988

起，让我一定不要欺负他。”

2012年夏末，王熙萌1岁了，阿羚和苏迪之间的误会开始加深，也开始频繁地争吵。虽然言语上不通，却都使用着自己惯用的语言争论，有时俩人吵了很久才发现说的都不是同一件事儿。后来争吵转成了生闷气和冷战。阿羚说：“因为我所埋怨的事情，不知道如何用英文去表达出来，仅有的单词量反而把很多话说得很重，这就增加了更多的误会。我常常表现得不耐烦，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个家庭承担的分量更重一些，我要一边带小孩一边工作，一边体谅着他没有工作，我不可以总是埋怨伤他的自尊，一方面又觉得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分担生活的压力，我每天都感觉到很累的时候，看着他戴着耳机听音乐的时候，就气到不行。这样双重劳累的状况下，我什么也不想做，而他也开始不理解我为什么越来越不接受他对我的拥抱和亲密。”

“在我们第一次带儿子回尼泊尔见他家里人之后，我只带回了儿子，我宁愿浪费掉他的回程机票，也想要分开一段日子，我不想因为他的原因而不能专心工作和照顾熙萌。最初的一段时间，我很自在，觉得单身生活简直太自由了。妈妈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帮我带小孩照顾家里，我也可以多分一些时间给工作，虽说不用坐班，但之前总觉得因为家庭分走了太多时间对工作力不从心，显得有些不负责任，对不起我的团队搭档。”2012年秋天，阿羚对苏迪说：“你在尼泊尔待一阵子再过来吧，或者等到有个工作机会在过来，不然每个月三口人在北京两万元的开销我实在顶不住。你语言现在也不行，还不能帮我什么……”

“但是当一切慢慢顺其自然步入正轨之后，我又总觉得，我的这个家里像是少了点什么，是不是我为自己考虑得太多了，似乎没有在意过他的感受，才让他慢慢觉得我的感情减少，然后失去了共同生活的信心了呢。好像我是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对。我开始检讨自己没有尽到妻子义务。”2012年的冬天，北京开始雾霾，春节时阿羚得了一场重病，她躺在床上开始休息，突然发现自己对所有事都失去了兴趣。“老公在的时候，虽然他没有实际的为家庭带来收入，但是他给我的是他全部的时间来陪伴，陪伴我、陪伴孩子，我仔细想了想，觉得我太自私了。”此时，苏迪也变得冷淡，他不再隔三差五地视频相互汇报生活和问候，在结婚两年纪念日那天，他告诉阿羚，他需要爱。从那以后，两个人的联系变得更加稀疏。

阿羚突然觉得苏迪似乎一个月没有主动联系过自己了，女人的直觉让她有了不好的猜疑，她让苏迪上网，在几番询问之后，苏迪坦白自己认识了一个丹麦的女孩。这个时候，阿羚才意识到，婚姻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忠诚。阿羚表现得很从容，她试着让自己的心情得到平复，但是她找到了最近的工作空当期，并订了去尼泊尔的机票。“我觉得只要我到了那里，两个人就不存在乱七八糟的问题了。”

2013年7月，分居了半年之久的两个人再次相见，而此时，那个丹麦女孩的签证到期，她不得不暂时离开了尼泊尔。在经过了漫长的交流后，阿羚决定重新回到丈夫身边。“一些了解情况的朋友跟我说：‘这你都能忍吗？’遇到这种事情心里不爽自然是常理，但是如果试着去了解对方和自己，就会反问自己，是否自己也有一些责任呢？所以这一次我原谅了他，似乎也原谅了自己。虽说我从未设想过要和谁一起走到生命的终点，我只是觉得再多的设想，都要面对现实惘然，不如过好每日，随心而活，就像我俩最初相识的状态。”

阿羚和苏迪粗略地算了一笔账，北京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生活成本越来越大，很少有人过得开心，一家三口的月开销至少在两万元以上，以自己的工资和苏迪偶尔的DJ表演收入计算，甚至没法承担王熙萌上幼儿园的费用，至少，阿羚不想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拮据。之前的那个一意孤行的阿羚也慢慢转变了态度。他需要更多的沟通和商议，她也开始尊重他的想法，她需要他的意见。渐渐地，阿羚觉得北京不再是她生活的重心，虽然尼泊尔吃不到好吃的中餐，常常停电，但是在现实面前，她也认真地考虑了去尼泊尔的好处。“首先那里的空气和水质都是一流的；生活在那里，省去了租房等生活直接成本；孩子可以得到家人的完整照顾，处于萌芽期的儿子，可以在那里学习中、英、尼三种语言，最关键的是，一家人可以生活在一起了。”阿羚说，在北京的时候，总是需要考虑更多的支撑，从而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感影响到全家的每个成员。2013年秋天，阿羚清空了在北京的全部家当，拎着背包，在云南辗转了一圈后到了尼泊尔。

“尼泊尔并不富裕，但凡来过这里的人留恋的也不只是风景，大城市来的人总会惊叹他们的幸福与快乐。在这里，成功、精英都不是人们生命中所追求的东西。”阿羚说，“很早以前，我在北京和苏迪吵过一次架，最后几乎上升到‘国家级别’，他说：‘你们中国人从来都不幸福，在街上没有人向你微笑，每个人都不满足地忙碌，而我们尼泊尔人没钱却也开心。’”在阿羚看来，他俩的默契是一个人带来快乐，一个人带来生活质量，但如若没了一方，剩余的则毫无疑义。

苏迪每天骑摩托载着阿羚去搜寻当地的手工制品、羊毛、地毯、铜像和唐卡等等，用来维持生计，他们也在搜寻着彼此间的默契，两人仍旧懒得学习彼此的语言，苏迪仍旧靠看阿羚的眼神和脸色来哄她开心，阿羚也懂得：“苏迪给我最多的，就是时间和陪伴。”

过完新年，阿羚的肚子又大了起来，她说这个宝宝比王熙萌安静，她和苏迪都希望是女孩。



比音勒芬，与中国高尔夫共成长！

全国服务热线:400-113-2288　网址：WWW.BIEMLF.COM



杨杨和端端

历尽沧桑，天真依旧

“我觉得男人永远都是孩子，不管你多大岁数，不管你再强，你在生活上肯定是需要一个人能照顾你的，需要一个精神的寄托。我在她身上能找到那个寄托的感觉，最主要的是她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是别人给不了我的。”

主笔 ✎ 朱步冲

杨杨说话的时候，总是喜欢恶作剧式地眯起双眼，狡黠地露出一种灿烂和狡猾共存的笑容，这些特征连同他的寸头、破洞款牛仔裤和运动卫衣，强烈地显示出一种大男孩儿的味道。他说自己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都是个简单直接的人，看不过去就要讲，当机立断，行为紧跟着思想和念头。这是一个周六的下午，身为著名美国户外滑雪运动品牌BURTON中国区媒体兼市场主管的杨杨依旧在位于三里屯SOHO的办公室里忙碌，他回忆说，自己在遇到端端之前，是个“伤害过很多女孩儿的混蛋”以及一枚坚定的不婚主义者，但是在遇到这个“老天爷赐给自己的礼物”后，一切以往坚定的信条和经验都冰消瓦解了。

在彼此意气风发时遇到对方，是一般情侣所憧憬的理想状态，但2013年10月端端和杨杨初识时，杨杨笑言说自己正处在低谷，不安分和漂泊似乎是他的天性：1998年他从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汽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先是在著名汽车引擎开发公司康斯沃思做过一段时间，跟着福特和斯巴鲁两支拉力赛车队，负责数据采集与发动机调校工作，一年只有16天假期，30个星期在旅行出差中度过，有过一次短暂的跨国婚姻。2008年回国后他依旧不安分，工作一年一换，先是去了美国著名滑板装备品牌DC，协助这个刚刚进入中国的企业落地，忙得不可开交。2013年夏天，他辞了职，又和女朋友分了手，于是一横心，决定索性痛痛快快地疯玩一夏天，国内国外地跑，攀岩、远足、文身，把所有手头的积蓄全都花光了，信用卡上还有5万多元人民币的欠款——然后他就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这个比自己大4岁、在圈子里名声在外、神采飞扬的女孩子。

“遇上她以后我觉得特别奇怪，可能就是气场特别和谐。那时候自己也挺没自信的，人家这么漂亮一个女孩，我没工作、没存款、没车、没房，什么都没有，觉得人家条件那么好，应该不会看上像我这样无聊的人。她身边追她的男生特别多，而且条件都特别好，我老觉得像端姐这种女孩吧，如果有一天我对她动了什么私心，可能会有几个人冲出来，拿一大麻袋一套，把我扔护城河里。”杨杨这样回忆。然而这一段邂逅在端端的叙述里，却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聚会时候，我对他是一见钟情。那时候他有女朋友，我也有男朋友，他的女朋友我也认识，我当时觉得他们很般配，就把这个念头给打消了。打消以后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分手了，我也分手了。因为我知道我喜欢他，那个时候我有意无意地老接近他，他后来告诉我，他能感觉得到我喜欢他。但那时候我们两个是互相排斥的。”

端端回忆说，她那时候，也刚刚是从早年的低谷里爬上来。模特出身的她笑称自己在2008年以前都很顺，90年代初走一场服装秀就能有上千元的收入，拍过电影和电视剧，给人做化妆，还开了自己的服装店，“从来不会为钱发愁”。一直到2008年，端端的生活突然遭遇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打击，先是和男朋友分手，然后被合伙开店的闺密骗，失去了苦心经营多年的生意。在灰心丧气之下，她搬回了父母家，消沉了几乎两年，后来下定决心，要重新开始。“我自己搬到了一个20年没装修的老房子里，还是用灯绳和煤气罐那种，用1400块钱起家，在淘宝上开了一个潮流服装店，吃了一年的麦当劳和盒饭，没有跟朋友出去吃过一次饭，没有跟朋友出去玩过一次，终于慢慢感觉自己的生活和存在感又回来了。”

大起大落的生活，总会对人的情感、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产生巨大冲击，自此之后，她很少再去过分关注男性身上那些表层浮夸、捉摸不定的东西。“我看重的不是物质，而是男人的一种担当和责任心。”端端回忆说，有一年冬天最寒冷的时候，她和往常一样早早去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拿货，后来拎着六大塑料袋的衣服站在街边，一个半小时都没打到车，“把自己生生都冻哭了”。拎着袋子踩着厚厚的积雪走了两公里才找到一辆空驶的出租车。“当时我有一个男朋友，还有一个男孩子在追我，但是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在最需要的时候都没有出现在我身边。而我是那种你有一点点小犹豫，我就会说算了的人，我不会去过多地要求你什么，然后慢慢的可能时间长了，堆积的东西很多了，我就会离开了。”她告诉我们，自己第一眼看到杨

杨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担当的男人。

和端端对自己的感觉一样，杨杨也不想做这个比自己大4岁的女生身边的过客，在约会几次后，他一反常态，认真地表示，想发展一段长期、严肃的关系，用两个月的时间调整彼此的生活，把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和关系清理干净，然后好好地在一起。“那是一次滑雪圈儿朋友的聚会，我可能喝多了一点儿，然后我就把她拉到身边说：端姐要不这样，咱俩一人给自己两个月的时间，把身边这些乱七八糟的人都摘干净喽？完了以后，咱俩在一块试试。”杨杨回忆说，当时促使他下定决心的不仅是对方提供的吸引力和新鲜感，而更多的来自长期独自面对整个世界后的疲惫和厌倦：“我觉得男人永远都是孩子，不管你多大岁数，不管你再强，你在生活上肯定是需要一个人能照顾你的，需要一个精神的寄托。我在她身上能找到那个寄托的感觉，最主要的是她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是别人给不了我的。”

2012年12月5日，就在两人初次约会整整两个月后，杨杨下定决心向端端求婚，没想到两个人在饭桌上因为一点小事起了争执，各自回家后，心有不甘的杨杨拨通了端端的电话，两人又聊了将近3小时。端端回忆说，她之所以在这段关系面前突然变得很踌躇，是因为没信心：“因为我岁数大了，我想要的是一个家，我怕他给不了我，我也不想给他这方面的压力。”然而这时，她在电话里突然听到杨杨说，他本来今天精心安排的一切，是为了把她带到从小长大的宿舍大院里，然后求婚的，毫无心理的准备的端端一下就惊呆了，手足无措，她说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去洗了个澡，然后披散着湿漉漉的长发呆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

十几分钟后，杨杨就来了，先有些激动地向她道歉，说以前左臂上曾经有一处前妻名字的文身，然后他把上衣一脱，端端就看到杨杨的右上臂有了一处巨大的紫色玫瑰文身。“我们两个最喜欢的颜色都是紫色。我一看是把以前那个女孩儿的名字遮住了，这时候，他把胳膊一抬，他右上臂的内侧写的英文的一大段话，开头是我名字的两个缩写DW。”端端说，“这时候我就特别着急，因为写的花体我也看不懂，就让他快告诉我什么意思。后来他说，意思是在最低落的时候，‘是你让我找到了新的方向，我会永远爱你，支持你，陪在你身边’。这时候我很感动，眼泪就开始酝酿。这时候他就单膝跪地，一伸手，我又发现他手腕上文了两个‘marry me’，这时候我就已经泪奔了……”

> “当时我有一个男朋友，还有一个男孩子在追我，但是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都没有出现在我身边。”

回想起求婚时的场景，杨杨至今还有点内疚，因为当时他还处于无业状态，唯一的一份工作是在给国际单板极限滑雪赛事“沸雪”(Air style)担任不受薪的运动员经理，每天要工作到晚上零点以后，“根本没有预算买戒指，文身是用了两天时间，每天晚上大概4个多小时，软磨硬泡让一个文身师朋友把这三个文身都给做了”。

虽然杨杨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风风火火、粗心大意“马大哈”型的男人，但端端却认为这个32岁、稚气未脱的运动大男孩身上蕴藏着令自己着迷不已的浪漫因子：2013年情人节，他们和一帮朋友相约去河北张家口附近的崇礼滑雪，身为资深滑手的杨杨在雪道上又犯了急性子，和新手端端发生了争执。“我懂他的意思，一方面怕我摔，一方面因为我动作不正确又跟我着急，结果我越是急，越是摔，疼得不行了，两个人又因为这个吵起来了，一直吵到回酒店，我就一气之下摔门出去别的客房找朋友了。”端端想起当天的事情就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后来焦虑的杨杨在县城街头四处寻找她，回到宾馆，两人重逢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不论怎么样，一定要告诉我你在哪儿，有问题一定要说出来，哪怕你打我骂我，不要让我找不到你。”然后，杨杨郑重其事地拉开自己的防寒服拉链，从怀里拿出了一朵玫瑰花。

一转眼，杨杨和端端已经迎来了结婚整整一周年，杨杨戏称，俩人的感觉现在好像还在谈恋爱一样。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工作都忙，平时能见面的时间也就是从晚上22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所以对这些短暂的相聚时光倍加珍惜。端端说，她的内心其实和外表的独立、霸道南辕北辙，是“一个特别需要安全感的人”，而杨杨给自己的关爱和忍让，让她隐约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家里购买任何大件，从电视到家具，端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做主，而无需担心自己的选择会招致另一半的反对或质疑。每次杨杨脾气上来急了，她就会暂时沉默，但是稍晚时候杨杨肯定会想方设法，用言语、体贴甚至大男孩儿的撒娇“找补”回来，让她觉得自己“特别有存在感”。她说他们两个人都特别不能理解一些情侣之间能够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争执，长时间的怄气。“我们两个都是特别散漫的人，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订了计划，不执行也就不执行了，随性，高兴就好。如果看不成电影，为什么不随便吃个饭，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一辈子在一起有这么多的时间，一些不重要的小事哪天不能干？我们

两个本来相遇就已经很晚了，时间真的不够用。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让自己过得更快乐一些呢？”

在杨杨眼里，和比他大4岁的端端在一起并没有“姐弟恋”的感觉，相反，他感觉对方的一举一动无不带着一种小姑娘的稚气。“有一天我从东北出差回来，飞机晚点，饭店和超市都关门了，可我实在饿得不成，结果回家发现她给我做了一个特别好吃的尖椒肉丝面。但是她因为切完辣椒以后直接用手捧着放到锅里炒，结果10个手指都被辣椒刺激得红肿，当时心里面既是感激，又是心疼。”杨杨说，他最骄傲的一件事是用自己的软磨硬泡“治”好了另一半的拖延症，端端如今被他“收拾”得工作时雷厉风行，到点按时上床，一改往日一边在电脑上修片、上货，一边东看西看的坏毛病。而自己从端端处最大的收获，则是从“一只刺猬”变成了“一块鹅卵石”：“就是一些做人的技巧吧，以前自己都是情绪写在脸上，臭脾气想发就发，四处扎人，但有柔软的腹部，一旦被伤害就无法挽回。但是鹅卵石不一样，表面光滑圆润，但内里坚硬无比的。”杨杨这样描述端端对自己的潜移默化，他说，妻子从来没有跟身边任何朋友吵翻、红过脸，但总是能用一种迂回婉转的方式化解和他人发生的矛盾，从而让自己获益匪浅。

2014年，端端和杨杨的计划是勇敢迈出共同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步骤——要孩子。杨杨大度地说，如果需要，他可以暂时辞职，做一段全职家庭男人，照顾自己和端端的爱情结晶。按照他的话说，双方谁的发展可能会更好，另一方就为家庭牺牲一些，这个很正常。自己辞职后，重新找到一份薪水头衔相当的工作相对容易，但端端的淘宝网店是她3年来的心血一点一点换来的，不进则退，所以自己“肯定会放弃对于我来说特别轻易就能得到的东西”。当我们问及，是喜欢男孩儿还是喜欢女孩儿时，杨杨脸上浮现出了那种父亲才会拥有的微笑，他说自己很招小孩儿喜欢，是男是女无所谓。而端端却故作任性地表示，女儿会分走杨杨对自己一半的爱，所以她希望拥有一个儿子，“这样就有两个男人，或者男孩儿，一起来爱我了”。

市场企划

轻松拥有 轻装上阵：联想扬天 M4400s 助你玩转职场

在随时都会风云骤起的职场，面对层层难关想要轻装上阵，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说话！联想扬天超轻薄笔记本 M4400s 以个性色彩、轻薄之姿、卓越性能，成为你驰骋职场的最佳伴侣。轻松拥有联想扬天 M4400s，定能让你轻装上阵与众不同，毫不费力即可玩转职场。

潮流外观 个性不减

混迹职场，你要有自己的选择。联想扬天超轻薄笔记本 M4400s 延续了扬天笔记本的优良血统，采用独特的 KINK ID 外形设计，外表使用多彩的高品质喷漆，红、灰、黑三色外观提供多种选择。与众不同只做自己，这是步入职场的第一必修课。

不仅如此，联想扬天超轻薄笔记本 M4400s 还搭配了高触感一体化键盘，保证最佳的键盘弹性和键间距，用户使用时不仅输入速度快而且更加舒适。

身轻体薄 随身伴侣

兼具潮流外观的同时，联想扬天超轻薄笔记本 M4400s 更是把“身轻体薄”的功夫练到炉火纯青，将产品机身厚度压至 22.9 毫米，重量减至 1.98 公斤。不论是外出开会，还是出差旅行，随时随地尽显职场专业气质。

联想扬天超轻薄笔记本 M4400s 另外还配备了 USB3.0 接口，新一代接口是传统 USB2.0 接口传输速度的近十倍。笔记本侧面的 HDMI 高清输出接口，可达到 5Gbps 的数据传输速度，还能支持 DVD Audio 等数字音频格式。

内“芯”强悍 性能卓越



联想扬天超轻薄笔记本 M4400s 搭载了英特尔第四代酷睿智能处理器，在显著提高处理器效率之余，还极大地降低了笔记本的功耗和发热，得以让如此轻薄的机身也能够支持连续 4 小时以上的移动办公。该产品还采用 NVIDIA 最新一代拥有 2GB 显存的 GeForce GT 730M 高性能显卡，构建强大的 3D 处理性能。

联想扬天超轻薄笔记本 M4400s 内置联想扬天笔记本电脑软件应用中心，具有软件智能检测、自动维护升级、一键系统备份、USB 接口锁定四大功能，在保证用户系统文件和敏感信息安全的同时，还能根据用户设置，自动完成如系统升级、数据备份、清理缓存，甚至自动开机等工作。不让繁琐的电脑维护工作成为用户的烦恼，省心的智能应用可以帮用户节省大量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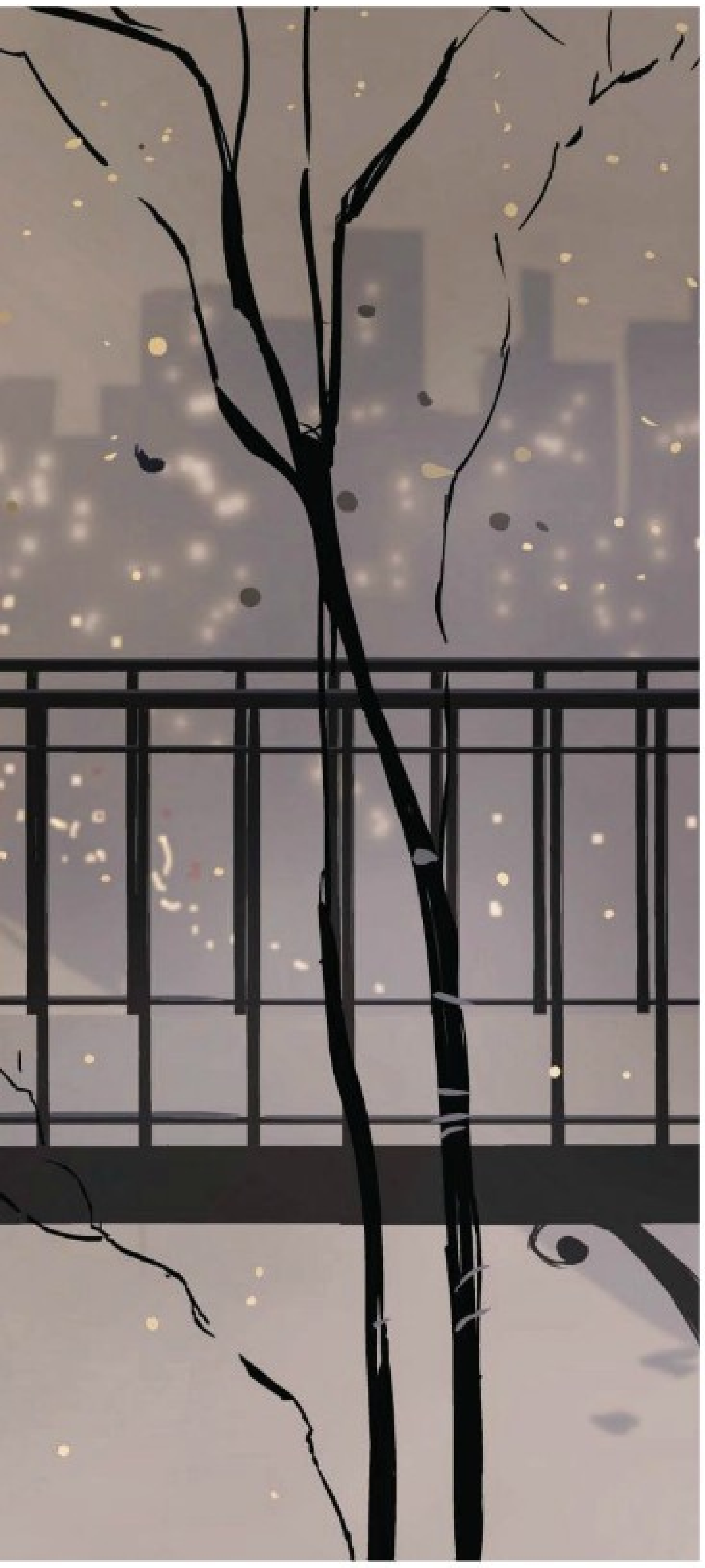


一个苹果

我去超市购物时会发现，每个商品身上都贴了好多标签，我只想要一个苹果，清脆、微甜的一个苹果，也许它并不需要"有机"、"非转基因"、"进口"等如此众多的标签。我想自己寻找到这个苹果，拥有一段去除标签、从零开始的感情。

口述 ✎ **卢暮**（化名） 记者 ✎ **王玄**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2010年秋天的那个周末，在城市东部的一家火锅店里，我和她初次见面。眼前的她25岁，很多女孩儿刚刚走出校园的年纪，却更恬静成熟。鸳鸯火锅蒸腾出的雾气里，不知为什么，我们丝毫没有初次见面的隔膜，我自然而然地向她倾诉了我独自在北京求学、工作、奋斗的经历。她坐在桌边安静地倾听，不时点头应和，我积蓄已久的孤独感被她的眼光拥抱了、融化了，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舒服。一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



在此之前，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象过，究竟会和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伴侣、组成家庭。大学时校园恋情中的女同学，或是工作中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女孩子？我从大学毕业起在一家新闻机构任职记者，至今已12年。在北京这座千万人口的都市，与我有过或多或少接触的人也许数以千计，但却没有一个人真正走进我的生活。

独身生活从24岁正式开始。我在城市东部的一个青年社区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贷款需要偿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房奴。7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被一再克扣，最后实用面积只有50多平方米。在那个虽然狭小却还是空荡的一居室里，我每天都在担忧初入社会的各种问题。生活凑合着过，很孤独的，你知道吗？我的冰箱里面常年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三元牛奶，一样是速冻饺子。速冻饺子煮起来快，煮完后好洗锅，成为我日常饮食的第一选择。当时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几十种速冻饺子我全都吃了个遍。剩下的就是牛奶。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特别渴，想喝水，可我家里连能直接饮用的水都没有，冰箱里只有几包牛奶，我就把牛奶都喝了。

我的邻居是一个搞IT的哥们儿，技术宅，他成了我独居生活中的好友。我们做着完全不同的行业，我一回家，就跟他八卦各种各样采访的经历，他听得开心。反过来，他会给我讲做软件的事情，云山雾罩的，我也听不懂。我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喜欢打《魔兽世界》。夏天天气太热，我们不开空调，把两家的大门打开，各自端坐在自己的客厅里组团打游戏，摆好电脑戴上耳机，桌上放半拉西瓜，伸出脑袋就能看见对方，跟大学宿舍没任何区别。那是两个单身汉光辉灿烂的日子。

但是某些东西好哥们儿是不能给我的。当我关上房门，独自面对那间空荡的小屋，满怀的是对生存的担忧。读书、工作、供房，在陌生的城市，我没有任何其他的资源，一切只能依靠自己。我偶尔会想，要是有一个人能和我一起相扶相携地生活该多好啊！像我的父母那样。但那仅仅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而已，我没有信心能够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承担起两个人共同生活的责任。

就在同一个社区，有无数与我同龄的年轻人，他们从我身旁经过，身上是商品社会所赋予的各种标签：宝马车钥匙、LV包、不断变换的伴侣。我也会被这些标签勾起好奇心：他们每天



做些什么，和什么人交往，怎么挣钱来维持自己光鲜的生活？那些凌晨天蒙蒙亮时，喝得乱七八糟后回到家的踉跄背影，他们身后是什么样的日子？但那超出了我的生活经验，我只知道，他们并不是像我这样日出而作，写稿子、去采访，听不同人的人生，然后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我们住在拍摄电视剧《奋斗》的社区里，但他们不是我在异乡奋斗打拼的同路人。27岁时，我结束了对这个青年社区生活的试探和想象，搬离了那里。新社区居民少了许多，绿化好，社区公园里，老人们常常推着婴儿车带着孙子晒太阳。这样的生活图景让我感到些许安宁。

那一年我出了一个长长的公差，坐着破冰船花了一个半月时间漂去南极，一待就是半年，这是单身汉才会有的待遇。船上的各种科考人员、后勤人员加在一起只有十几人，不是十几个中国人，而是十几个人，或者说，十几个活着的人。眼前一望无垠的南极大陆上，全部都是无机物，大概连细菌都没有吧？更不要说鸟或者虫子了。每天面对着十几张不变的面孔，我们说话打发时间，晚上喝点啤酒，没有别的娱乐，没几天，能说的话就都被掏干净了。剩下的时间，我只能自己跟自己相处，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把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像过电影一样过一遍。然后不自觉地开始拷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反正就这几个终极问题。现实生活中那些也曾让我好奇的重要元素在这里都消失了。我每月要还的6000多元房贷，我们每天从电视、网站上获取的关于这个世界如何丰富多彩的消息，我和IT男关注过的住在同单元的漂亮女孩，曾经觉得娶她回家大概会很有面子……这些全都失去了意义，在我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想到它们，我的内心没有一点儿触动。

在杳无人烟的南极大陆上，我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必须寻找一个终身伴侣。人从根本上来讲是孤独的，我的孤独需要得到慰藉，有另一个人能理解和拥抱我的孤独，这样我才能够幸福。现在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打开微信、微博、平板电脑上几十个APP，他们提供了那么多信息，但仔细想想，这些都是商品社会强推到我们眼前的，他们无法贴近心灵。我更想要过这样的一天，即便我早上起床推开窗户眼前一片雾霾，身后仍站着一个与我心意相知的女人，我们出生不久的孩子在旁边安睡着，生机勃勃，我的心里充满了阳光。

南极之行似乎是个转折。回来后，我觉得自己做好了结婚的准备，不会再像二十四五岁时，与女孩子交往时彼此并不谈论婚姻，或是因为一些生活上琐碎的争执而轻易分开。亲友们会热情地为我介绍婚恋对象，但我逐渐拒绝这种方式。在我与一个女孩儿相识之前，介绍人首先已经帮我进行了一道筛选。而当我被介绍给对方时，也被修饰过，贴上了标签：名牌大学、记者、他对我过往的印象，诸如此类。但我希望剥离掉我过去已有的社会关系，把所有的标签都去掉，重新去认识一个人。现在我去超市购物时会发现，每个商品身上都贴了好多标签，我只想要一个苹果，清脆、微甜的一个苹果，也许它并不需要“有机”、“非转基因”、“进口”等如此众多的标签。我想自己寻找到这个苹果，拥有一段去除标签、从零开始的感情。

那之后我注册成为一家婚恋网站的会员，填上尽量少的基本信息，我就可以跳出自己的社交网络去寻找我的伴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谨慎地与四五位网友见了面，我们通常年龄、学历、收入水平差不多，一般在网上聊上两个星期，才会相约见面，见面后聊天相处，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好像少了些共鸣。直到2010年秋天，我在网站上找到我妻子。我们俩挺合眼缘，在网上没说两句话，发现两个人住得很近，就相约周末一起吃火锅。我特意叫上了一位朋友同行，希望吃饭的氛围更像是朋友聚餐，而不是相亲。朋友成了我们的见证者，他见证着我向一个初识的女孩儿敞开心扉。后来我才了解，她很小就从部队院校毕业，从过军，从过医，转过行，虽然年纪轻，却阅历丰富。我们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从中国的最西部和最东部孤身一人而来，在北京相遇，感怀于相似的奋斗经历，因此彼此倾慕、欣赏，并不像过往亲友介绍时，标签速配式的相识。这一次，我知道一切的细节都对了。

我们很快谈及婚嫁，转年春节，双方父母来到北京会面。除夕夜，妻子按照东北老家的习俗给她父母磕头拜年，她拜完起身，示意我照做。我们老家没有这样的习俗，之前也没听她说起过，我和我父母都愣在那里，相当尴尬。最后这个头还是没磕，我们过后谈起，争执。“你是不是没有把我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她生了气。这样的场景如果发生在过去，或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也许会大吵起来，进而对对方失去信任。但到了今天，在我俩之间，解释一下，矛盾就被融化掉了。我终于知道，我想要一种共同奋斗、相互爱护和扶持的生活，而身边的人，就是与我同行的伴侣，其他障碍都变得微小，不再重要。

我们步入婚姻的速度比身边的许多朋友快得多。他们或是有学生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爱情，总是以工作、住房等为理由而不结婚，或是一直在寻找，每年见二三十个相亲对象，到最后感情麻木。很多单身朋友会抱怨自己选择面小，找不到合适的人，过不上理想的生活。还有一些原来在青年社区的邻居，现在也30多岁了，不知不觉中，就从这个城市消失了。其实我们这个时代，选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那些没有方向感的人，最后会迷失在森林里。





到达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才能捕捉不同以往的风光摄影作品—联想扬天轻薄本M4400s，以轻薄机体，澎湃性能助我和团队轻装上阵，踏上新的征程！

- 轻盈纤薄机身“薄”然出众
- 细腻类肤工艺 质感外观
- 优化硬盘驱动 瞬时响应
- 全新升级平台 性能澎湃

扬天

联想扬天M4400s采用第四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5处理器

"Lenovo 联想"、"联想"、"扬天"及其他联想标识是联想(北京)有限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在中国和/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提及的其他产品、商号和商标名称是其各自持有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版权所有 ©2013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Intel Inside、英特尔酷睿和Core Inside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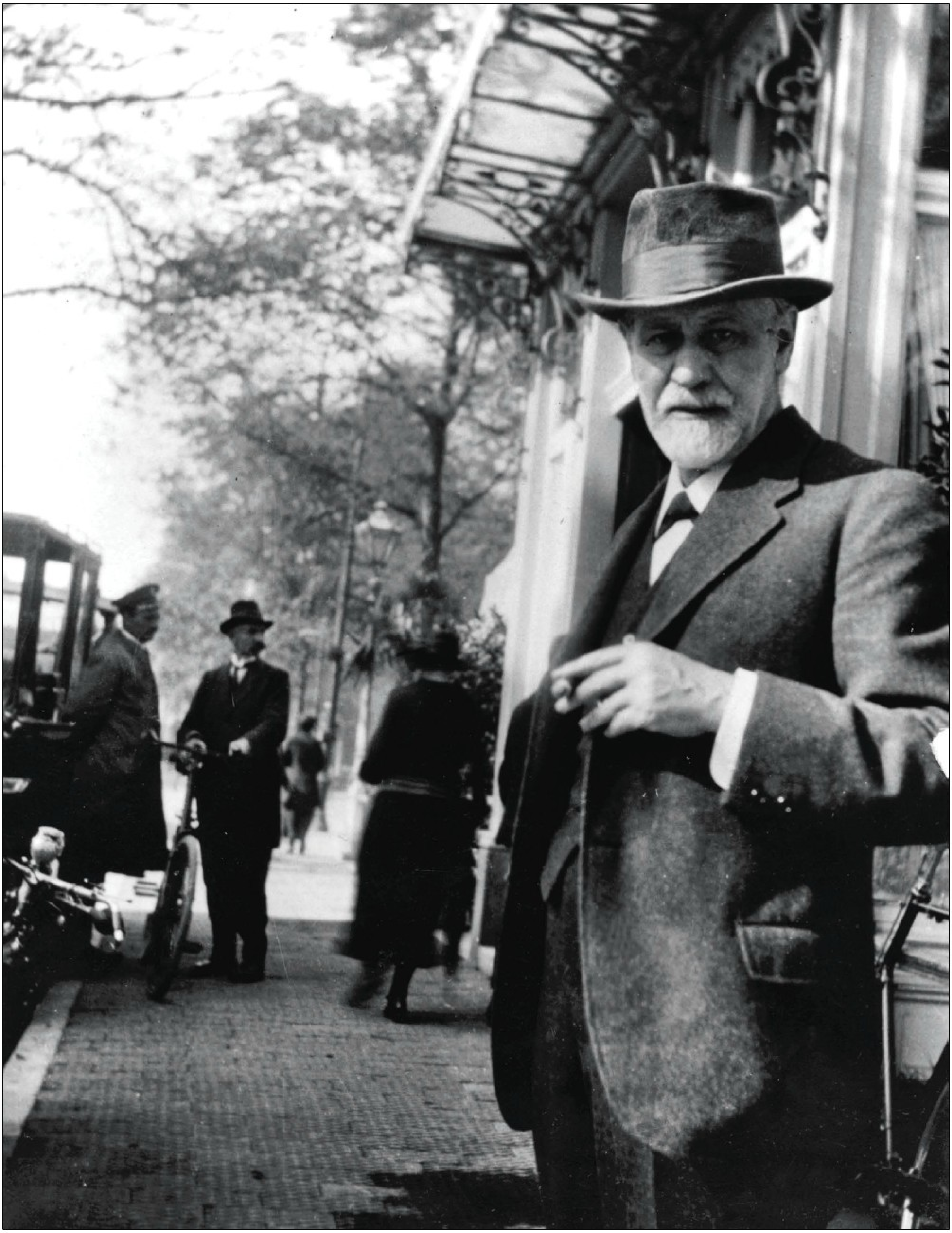
intel inside™ CORE™ i5

英特尔® 酷睿™ i5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和玛莎：完美关系

“弗洛伊德是一个忠诚的丈夫，很少有人能够一生守护自己的妻子而完全不去想别的女人，弗洛伊德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男人如果像弗洛伊德一样选对了对象确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这种男人能不能代表正常的男性呢？这个问题只有社会心理学家或者人类学家能够解答。”

主笔 曾焱

伟人身后的玛莎

与弗洛伊德有过几十年交往的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评价他这位老友拥有绝不动摇的道德观念，根深蒂固得就像他天性中的一部分。

在1915年写给《人类的动机》的作者、哈佛精神分析学家帕特南的信中，弗洛伊德解释了他所说的这种道德观到底是什么。他写道：“我的道德观是通常所说的具有社会意义的道德观，而不是性道德观。社会眼中的性道德似乎很卑鄙下流，正如极端的美国那样，我个人在自己认可的范围之外很少滥用性的自由，但我同样支持那种全然自由的性生活。”

精神分析学说之父洞悉人类性的隐秘，诸如潜意识（Unconsiousness），或者本能（Instinct）和阻力（Resistance）。大概正因为如此，他将自己的婚姻生活保持单纯。欧内斯特回忆：“弗洛伊德通常会说爱与恨的改变会轻易地改变他和男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几次，但是这种令人头疼的感情矛盾却从来没有影响到他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他对女人的态度比较稳定，或者说他的感情是非常传统的。”

“我们可以从他的信件和对爱人的选择上看出，他心中爱慕的对象只有一种，那就是温柔的女性形象。虽然通常来说女性属于弱者，但在他看来，女人却比男人更细腻，更具有高贵而且值得尊敬的气质，有一些表现显示出弗洛伊德希望能够从女人身上学习这种气质。”

“弗洛伊德是一个忠诚的丈夫，很少有人能够一生守护自己的妻子而完全不去想别的女人，弗洛伊德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男人如果像弗洛伊德一样选对了对象确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这种男人能不能代表正常的男性呢？这个问题只有社会心理学家或者人类学家能够解答。”

弗洛伊德选对了的妻子名叫玛莎·贝尔奈斯（Martha Bernays），和他一样，也是犹太人。如果从订婚那年算起，她和弗洛伊德相伴57年，养育了6个孩子。

弗洛伊德几乎从不向外人主动提及自己的家庭生活，这是他严谨个性的一部分。在《我的自传》中，也没有专门的章节留给妻子玛莎。他只是提到给玛莎信中与研究有关的只言片语，也简单说到曾为了和分别两年的未婚妻见面而中断了手头即将完成的可卡因研究，但他从未后悔丢失这次年少成名的机会。但是玛莎保留了900多封他们早年的情书，让人看到弗洛伊德那些热烈的爱。在玛莎于1951年去世后，欧内斯特有幸读到了这些信，他毫不怀疑地告诉人们：

“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玛莎的确是他唯一的对象，甚至被他视若珍宝。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任何人的地位能够超越玛莎。虽然他在婚姻生活中热情的部分比大多数男人都结束得早，但却用他一生的奉献和全心全意的理解弥补了这些遗憾。”

热烈的爱情

少女时代玛莎的样子，有一张半身像留存下来：长发中分，光洁地束在脑后；面庞柔和轮廓清晰，眼睛大而深邃，目光十分专注。

照片拍摄于1883年，也就是他们订婚后的第二年。1882年4月，从维也纳大学拿到医学学位不久，弗洛伊德在自己家中邂逅了妹妹安娜的朋友玛莎，两个月后，两个年轻人做了订婚的决定。这次订婚其实是他们私自呵护的秘密，直到半年后才让双方的家人知晓。这对恋人经历了所有恋人都有过的因深爱而来的敏感、嫉妒、试探、误解、和好，他们准备了一本“秘密记录”，轮流执笔写一些他们订婚前后发生的事情，有日记、学习笔记，也有自我反省之类的话语，他们设想的是以后两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能够读出来，提醒彼此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

玛莎比弗洛伊德小5岁，出身于一个地位很高的犹太家庭：她的祖父伊萨克·贝尔奈斯曾是驻汉堡的犹太正教领袖，也是诗人海涅最尊崇的朋友。玛莎娇小聪慧，弗洛伊德第一眼就喜欢上她。几个星期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展开追求攻势，每天送玛莎一朵红玫瑰，再用拉丁文、德文、西班牙文、英文或德文在附送的卡片上写一句箴言。后来他在一封情书中写道：



弗洛伊德的病人、学生和忠诚的保护者玛丽·波拿巴



弗洛伊德和女儿苏菲的合影

你的外表透露出你内心无比甜蜜、温柔和理性的特质。我对外表的魅力总是不太在意，但我要告诉你，很多人都说你很美丽，我对这点毫不怀疑。他的追求过程，十分符合19世纪末那种中产阶级的“精巧复杂的求爱仪式”，所有浪漫关系都在客厅或前廊里发展，并受到女孩家长的严密监护。

订婚后有两三年时间他们分隔两地。弗洛伊德几乎每天写信，有时一天三封，向玛莎倾诉思念。他们用玛莎喜欢的哥特式文体通信，篇幅没有少于4页的时候，有时会长达十几、二十来页。他也和玛莎分享自己各种转瞬即逝的想法，订婚两周后，他在信中跟她说到了梦的事情：“我有很多不能解释的梦，我从来不会梦到那些白天心里所想的事情，在我梦中的都是那些在白天一闪而过的事物。”这就是后来梦的解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时的弗洛伊德已经进入到维也纳总医院精神病科工作，随后拿到一笔奖学金前往巴黎师从法国神经学家沙尔科，但他仍然是一个清贫的住院医师，父母家的生活环境也极为困难。在订婚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都无法娶回未婚妻玛莎，因为他没有稳定收入可以保障婚后的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维也纳，夫妇一年的生活费用至少需要2500基尔德（约合1000美元），可弗洛伊德全部存款也只有1000基尔德。玛莎的母亲不愿意接受一无所有的女婿。

但他和玛莎的感情愈加深刻。有一次玛莎在信中开玩笑，说她幻想自己洗澡时淹死了，弗洛伊德就很郑重地给她回信：“肯定有人觉得失去爱人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相比简直微乎其微，但我承认，我的态度和看法与他们截然想法，在我看来，失去爱人就像是世界末日，即使生活仍然继续，但我却仿佛置身于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

1886年4月，弗洛伊德终于在维也纳开业行医。这年9月，他和玛莎结婚了。为了筹备婚礼他们花光了几乎所有的钱，而且主要是玛莎姨妈和叔叔赠予的嫁妆，却还是差点连家具都买不起。

沉静的婚姻

对于他们的婚姻生活，年轻的弗洛伊德曾形容为：“从抒情诗时代进入到叙事诗时代。”他喜欢恬淡的日子，为此向玛莎描绘过一幅理想图景：

“我们只需要两三个房间就可以了，足够我们生活起居和招待客人，另外还要有一个不停弄着食物的炉灶，房间里的摆设应该有桌子、椅子、床、一面镜子、一个记录着快乐时光的挂钟、一个可以让我在白天香甜地睡上一个小时的安乐椅，地上铺着几块地毯，让主妇能够更轻松地保持地板干净……总之，每一件东西都应该像一个充满着幸福和快乐的世界，或者可以看作是我们安静的朋友，又或者象征着一个让我们敬重的人性。”



青年弗洛伊德与玛莎・贝尔奈斯订婚后的合影（摄于 1883 年）

从1887到1891年，他们有了三个孩子，好在弗洛伊德的诊所生意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诊疗费已经可以支撑家人生活。玛莎是永远把丈夫放在第一位的主妇，也是愿意躬身去干佣人工作的女主人，但对于玛莎在家简直成了洗衣做饭的保姆的说法，朋友欧内斯特·琼斯是坚决驳斥的。他说玛莎是一位能干的主妇，但绝对不是保姆型的人。“她实际上是一位注重生活格调的高级知识分子，每天晚上她都看书，并且总能赶上最新的学术潮流，直到她死前依旧如此。”在她恋爱和结婚的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欧洲女性的法律地位正在逐渐改进，女权运动赢得自己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正是上演于1879年。但是，玛莎显然无意于接受这些信息，她只是在管好家庭之余，表现出对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格外喜爱，而后者也恰好是她丈夫的朋友和支持者。

1891年，他们从市政街搬到租金更便宜的柏格街19号，租下两层楼：楼下房间是弗洛伊德的书房和诊室，楼上用作家人居住。弗洛伊德在这里又多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也是在这里，他创立了影响整个20世纪思想史的精神分析王国。柏格街19号变成了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门牌号码。

只要在维也纳，弗洛伊德的生活极其规律：早上8点开始接待第一位病人。中午13点是他和全家人一起用午餐的时间。他从来不说话，专心享用食物，如果发现哪个孩子没在座位上，他会用眼神询问玛莎，然后指指空位，玛莎就会告诉他为什么孩子没有出现。下午15点到晚上21点是他下午的诊疗时间，繁忙时会拖延到22点。

每年夏天，他和全家人一起离开维也纳出外度假。他会在年初就讨论旅游路线，复活节的时候自己提前走一遍，然后回来向全家人做个报告。他们对于旅行地的要求非常特别：必



1938年，弗洛伊德（右二）从纳粹占领下的维也纳逃亡英国途中到达巴黎。图为他的小女儿安娜（左一）、希腊王子乔治的妻子玛丽·波拿巴公主（左二）以及波拿巴公主的儿子彼得王子（右）

须是一栋远离名胜古迹的舒适的房子，里面有一个可供弗洛伊德随时写作的房间；必须要在阳光充足、空气新鲜的地方，有一定的海拔高度，附近有森林可供散步，还要有蘑菇可采——采蘑菇是弗洛伊德度假时最大的消遣，在这方面堪称高手。女儿安娜曾向友人描述，当他们的父亲发现一个蘑菇时，会像捕捉蝴蝶一样，飞快地用帽子把它盖住；他还会哄着安娜每天采摘鲜花供奉到树林附近的圣母像那，保佑他们有所收获。



玛莎很少有机会或许也没有兴趣去从事纯学术性的研究，对丈夫事业的具体情况也不是很清楚，但她始终是他最好的完成梦想的伙伴。在她和弗洛伊德恋爱时期共同撰写的那本“秘密笔记”里，弗洛伊德曾写到这样的愿望：“我会和玛莎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我们的一个个心愿，虽然远大的理想遥遥无期，但我们会同心协力地度过这一生。”很显然，他们做到了。

1921年末，追随精神分析之父多年的俄国女作家露·安德里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e）拜访弗洛伊德一家，在日记里她写到对玛莎的印象：“我还很钦佩弗洛伊德夫人，她总是把自己份内的事料理得好好的，总是充满慈爱，拿主意做决定时十分果断，但她从不会干涉属于她丈夫责任范围内的事务；总是充满自信，绝不是一个旁观者。……不管怎样，他的家庭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思考人们通常在‘自由’和‘有了家庭牵绊’之间做出的错误区分。想打破自由和社会义务（其中包括家庭责任义务）间潜在的平衡，这常常是病态的。”

在这个报纸专栏作家都在怀疑“婚姻破产了”的20世纪20年代，践行婚姻和性爱分离的莎乐美觉得自己在弗洛伊德家里看到了平衡的完美关系。

莎乐美和玛丽·波拿巴

弗洛伊德并非对异性没有魅力的男人。欧内斯特描述过，通常那些对弗洛伊德只是稍有了解或者完全不认识他的女人也会觉得他那种包含着体贴、亲切、自信的样子非常吸引人，会觉得他可以信赖和值得托付。

对弗洛伊德和婚姻之外其他女性的关系，不止一次有人做过揣测，其中最常被提起的是他的妻妹明娜。在他们一家搬到柏格街19号的第五个年头，不幸失去未婚夫的明娜就搬过来和姐姐一家人同住了，从此成为家庭一员，终生未嫁。和温柔安静的姐姐相反，明娜伶牙俐齿、开朗幽默，对于学术也表现出比玛莎更多的兴趣。她偶尔会替忙碌的姐姐陪弗洛伊德去旅行，由此带来一些谣言，但是对弗洛伊德十分了解的密友说，明娜不过是有趣的伙伴和家人，他们之间并没有性的吸引，说她取代了玛莎在他感情中的地位完全属于胡说八道。弗洛伊德在和朋友的通信中会提到她，就像提及儿子恩斯特或女儿安娜。其实弗洛伊德一家只是延续了19世纪的标

准婚姻形态：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纽带和夫妻之间的一样，所以未婚姐妹和寡母可以心满意足地和已婚夫妇一起生活。

在不同阶段被传言波及的，还有一些引入瞩目的女性，比如：爱玛·埃克施泰因，勒·卡恩（Loe Kann），露·安德里亚斯－莎乐美，琼·里维埃，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在她们中间，莎乐美和玛丽·波拿巴是两位如此有名的贵妇，她们在不同时期出现在弗洛伊德的学术研究和生活中，和他保持长时间的交往和通信。在欧内斯特看来，她们都是那种“聪明而有男孩气质的女孩子”。“这种类型的女孩在他一生中出现过好几次，但她们与弗洛伊德的关系类似于男人和男人的关系，没有半点色情的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她们和弗洛伊德只是分享对智识的热爱。

莎乐美被称为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知识分子所共享的“玫瑰”。尼采、里尔克和弗洛伊德，三位伟人在不同时间都和她的名字紧密相连。她于1861年生于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祖辈来自德国波罗的海沿岸，据说最早还是法国南部的胡格诺教徒，所以她的家族以德语为第一母语，然后是法语和俄语。她19岁即赴欧洲求学，一生大半时间住在柏林和哥廷堡，俄国只是她地理的故乡。1882年结识尼采是莎乐美进入欧洲文化界的开始，那时她已经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拥有了批评家的身份。12年后，她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尼采与其作品》为她赢得了心理学小说家和随笔作家的名声。

在回忆录《回顾我的一生》中，莎乐美将她和尼采的交往称为深厚的友谊，主导了她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和里尔克，她保持了长久的爱情，在诗人去世后，她写了一本私人回忆录《赖内·马利亚·里尔克》。而在1931年写给弗洛伊德的随笔文集，她取名为《感谢弗洛伊德》。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她是如此坚定的守护者，主导她生命最后一个阶段的人可以说是弗洛伊德，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依据她的日记，她可能是在1911年初的魏玛精神分析学大会上初次见到弗洛伊德，并开始学习精神分析，她那年已50岁，却在好友的陪伴下专程前往维也纳完成了6个月的冬季课程。从那时起，直到1937年去世，她始终都是弗洛伊德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学术圈子里的核心成员。他们的第一封通信开始于1912年9月，最后一封信写在1936年5月，平均每月一到两封。莎乐美始终称呼弗洛伊德为“尊敬的教授”，谈论的话题主要是病例分析、彼此的最新著述，有时也在开头或结尾温情地提到家人。1915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洛伊德的儿子也应征入伍了，他在写给莎乐美的一封信中伤感地抱怨：“写这封信时，我和我的妻子正过着一种通过不懈努力创造出来的田园般的生活，但却不断被这个时代的纷纷扰扰搅乱。”

1921年11月9日至12月中旬，莎乐美专程前往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在他家里客居了月余，这是他们最近距离的一次交流。每天晚上，她都和安娜坐在弗洛伊德的小房间里讨论问题——安娜是弗洛伊德的小女儿，也是一名精神分析学的儿童研究者，后来和莎乐美建立起非常亲密的关系。每一个分析时段结束以后，弗洛伊德会过来待上几分钟，分享她们的讨论结果。弗洛伊德在写给儿子的信中也提到她的拜访：“今天露夫人离开了……她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客人，也是一位出众的女性。……你妈妈对她照顾得细致入微，我每天有9个小时都在工作，根本抽不出很多时间来陪她，但她始终是那么善解人意。”

比起莎乐美，玛丽·波拿巴对弗洛伊德的崇拜更为热烈。她生于1882年，拥有公主头衔，因为她的父亲属于拿破仑家族，她自己也嫁给了希腊王子乔治。在巴黎，玛丽是一名执业心理医师，拥有自己的诊所，但她狂热地信奉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学，在她眼里，弗洛伊德就是巴斯德和康德的综合体。1925年，通过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富尔格（Rene Laforgue）的引荐，玛丽公主曾作为病人向弗洛伊德寻求心理治疗，后来变成他的学生、著述出版赞助人以及忠诚的保护者。他们通过书信交谈，也许是因为感觉到玛丽公主对自己过于执著的靠近，弗洛伊德有时候会拒绝拆看她的来信。

但是，玛丽公主并没有因此消减自己的热爱。精神分析学被引介到法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遭受冷遇，甚至是反对，弗洛伊德在他1925年撰写的自传中就说过，好像敏感的法国人受不了精神分析学说的专有名词，认为这些词会冒犯他们。作为“弗洛伊德理论的传播人”，玛丽不惜动用大量的金钱和社会资源，在法国推广弗洛伊德的著述和观点。

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地利，反犹主义变成了直接迫害和抓捕。弗洛伊德的“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公司”被查封全部财产，他们全家也陷入危险境地。玛丽公主动用大笔财产买通关系，为弗洛伊德一家打开了一条逃亡之路。1938年6月，在被迫签署了一份曾被纳粹善待的声明后，在玛丽公主和欧内斯特等人的帮助下，弗洛伊德携家人经巴黎抵达伦敦。1939年9月23日，弗洛伊德病逝于伦敦。在遗嘱中，他请家人用玛丽公主从前送给他的一个古董骨灰盒来安放自己。

在弗洛伊德去世后，玛莎又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了12年。弗洛伊德和玛莎的最后一张合影摄于1939年，看起来像是在伦敦的住处前面，他们满头白发，亲密地站在一起，弗洛伊德正微微侧过头去，和温柔看向他的妻子目光相接。


窖龄老 酒才好
百年瀘州老窖
窖龄酒
百年泸州老窖 窖龄酒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精心打造的战略次高端品牌，与国窖 1573，
泸州老窖特曲共同组成了泸州老窖
核心的产品体系，是中国首款窖龄酒。
中国探月
CLEP
瀘州老窖
中国探月工程战略合作伙伴
微信扫一扫
更多精彩分享 好礼等你拿
瀘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LUZHOULAOJIAO CO.,LTD
泸州老窖热线：4008881573
全国招商热线：028-62689160
Http://www.lzlj.com



弗里达和里维拉



弗里达和里维拉：“既已如此，终将如此”

他们生而是戏剧化人生的沉迷者，是注定一起面向外部世界的同盟者——这种婚姻关系在20世纪早期的艺术圈并不罕见：它从令人晕眩的爱情展开，却无法以爱情为唯一，最终婚姻习惯了和背叛共处，一起成就两个人的传奇。

主笔 曾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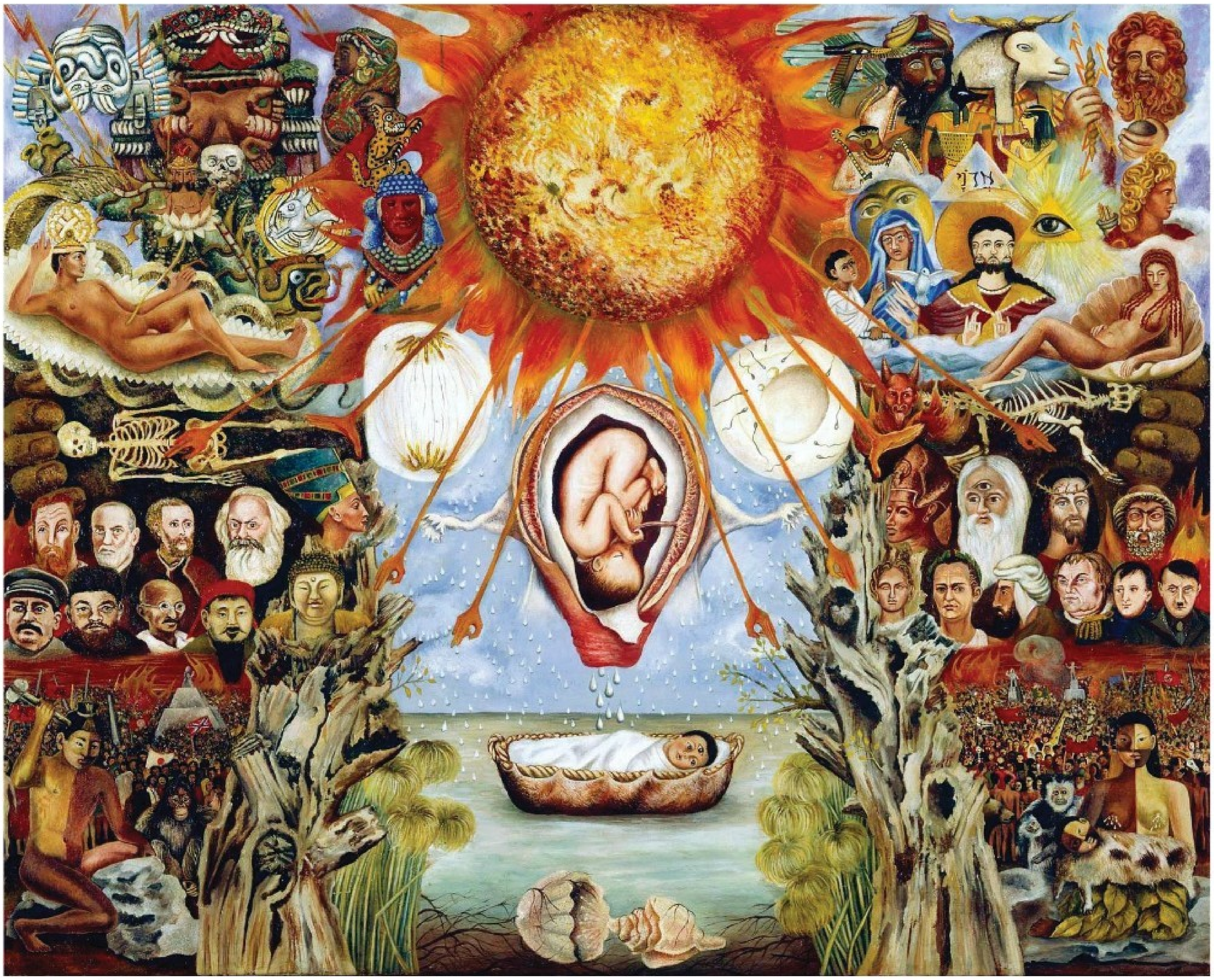
日记里的秘密

“迭戈 创始／迭戈 建设者／迭戈 我的孩子／迭戈 我的男友／迭戈 画家／迭戈 我的情人／迭戈‘我的丈夫’／迭戈 我的朋友／迭戈 我的母亲／迭戈 我的父亲／迭戈 我的儿子／迭戈 我／迭戈 宇宙／单一中的多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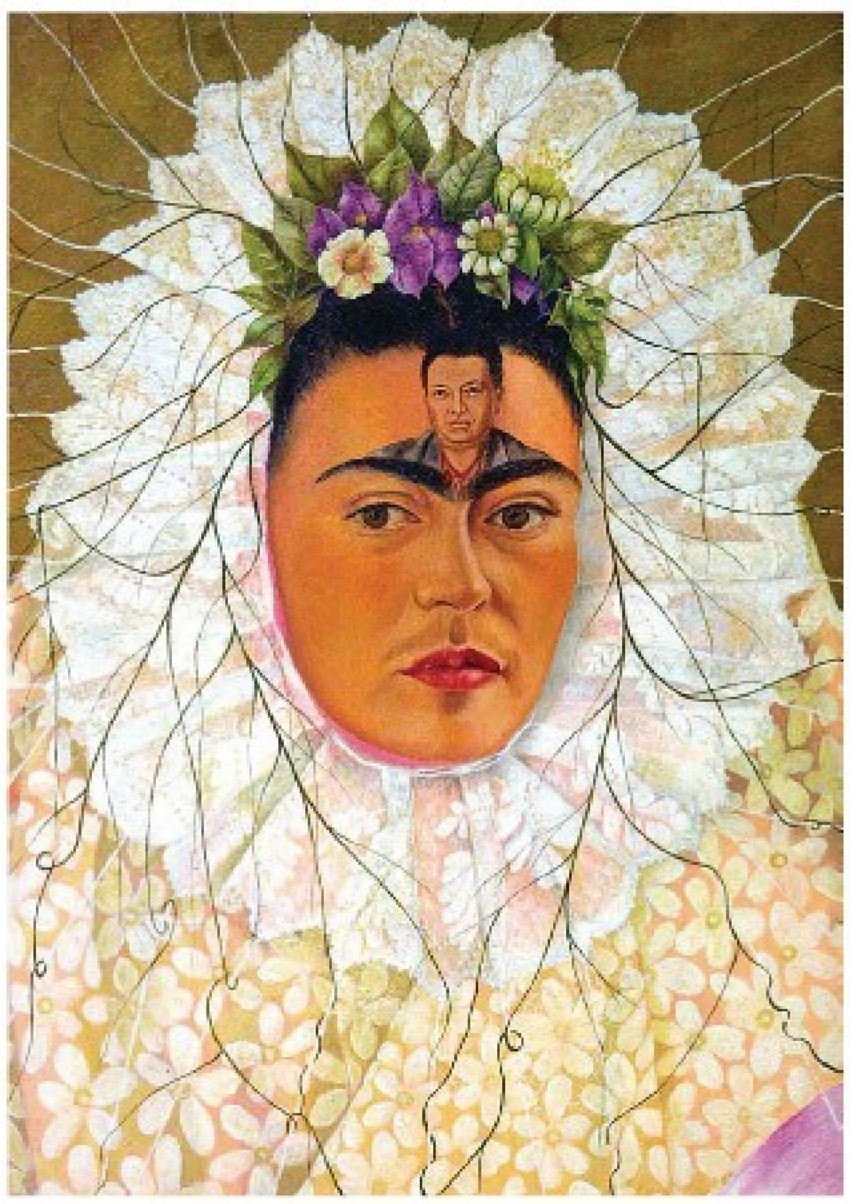
这是弗里达写给丈夫迭戈·里维拉的诗，收在她那本著名的日记里，生前从未示人，包括里维拉本人。170页日记，写在她一生的最后10年——1944至1954年，也是她和里维拉离婚一年又再度复合后的那些日子，她写下对爱人的复杂情感，回忆童年，也记录自己的绘画。弗里达去世后，这些日记先是存放在墨西哥中央银行的一个保险箱里，后来被交给由弗里达故居改成的弗里达·卡洛博物馆收藏。

对于了解20世纪初这对天才艺术家不同凡响又令人迷惑的婚姻，这些日记非常重要。与写给朋友们的书信相比，日记显然更值得信赖：弗里达保持隐秘地书写和拥有，所以最有可能是她真实的心理，甚至偶尔的潜意识。1995年8月，日记被弗里达博物馆授权公开出版，在这之前，除了清理过她遗物的里维拉和极少数工作人员，可能只有美国艺术史家、传记作家海德·赫雷拉（Hayden Herrera）最早获允阅读过：20世纪70年代，海德专程前往墨西哥城的科约阿坎——城郊一个古老的居民区，弗里达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她最后去世的地方——在弗里达博物馆里研读了这本日记，并在她1983年完成的《弗里达·卡洛传》里首次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这本传记因此而被视为了解弗里达生平和艺术的可信任的来源，2002年电影《弗里达》就在诸多传记中选择了海德的书来做改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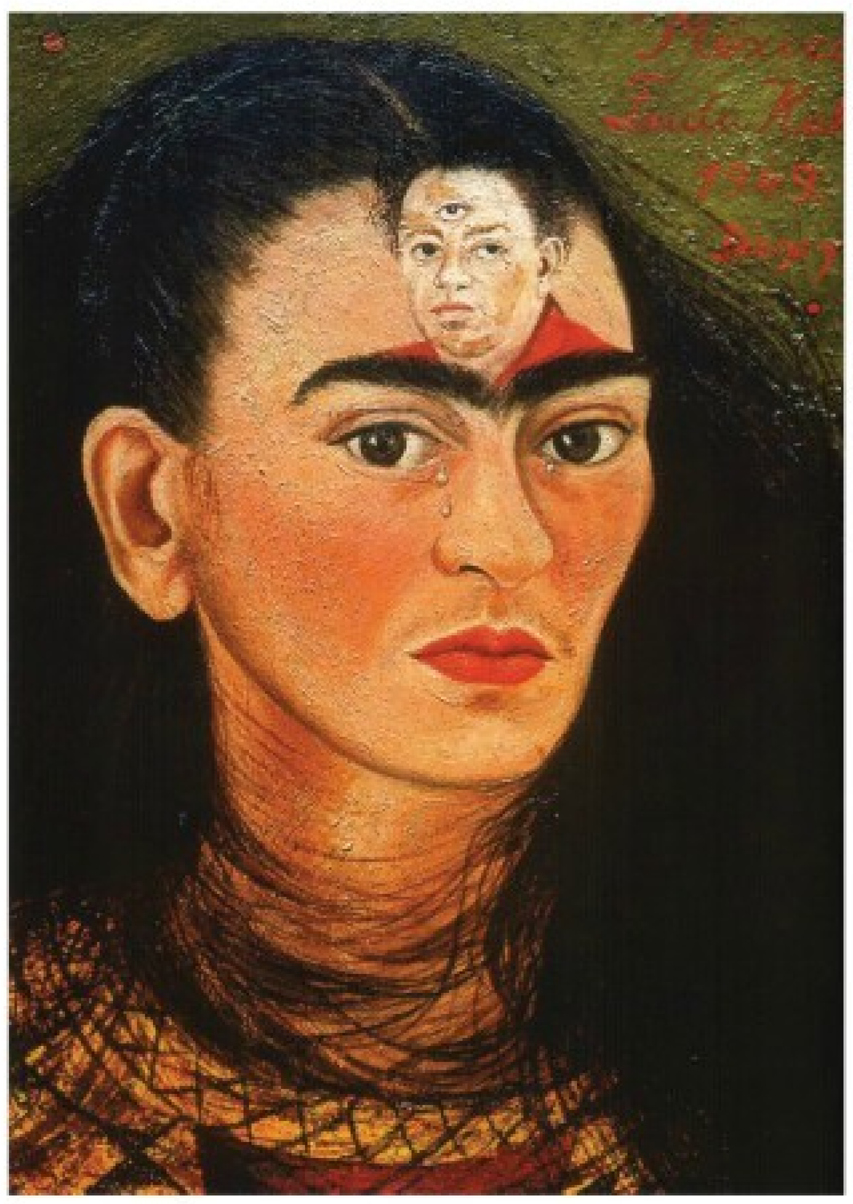
从断续的诗句可以看到，弗里达心目中的迭戈，是她人生各种角色“单一的多重”，是她的宇宙，甚至就是她本体，却唯独不再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丈夫——她为“我的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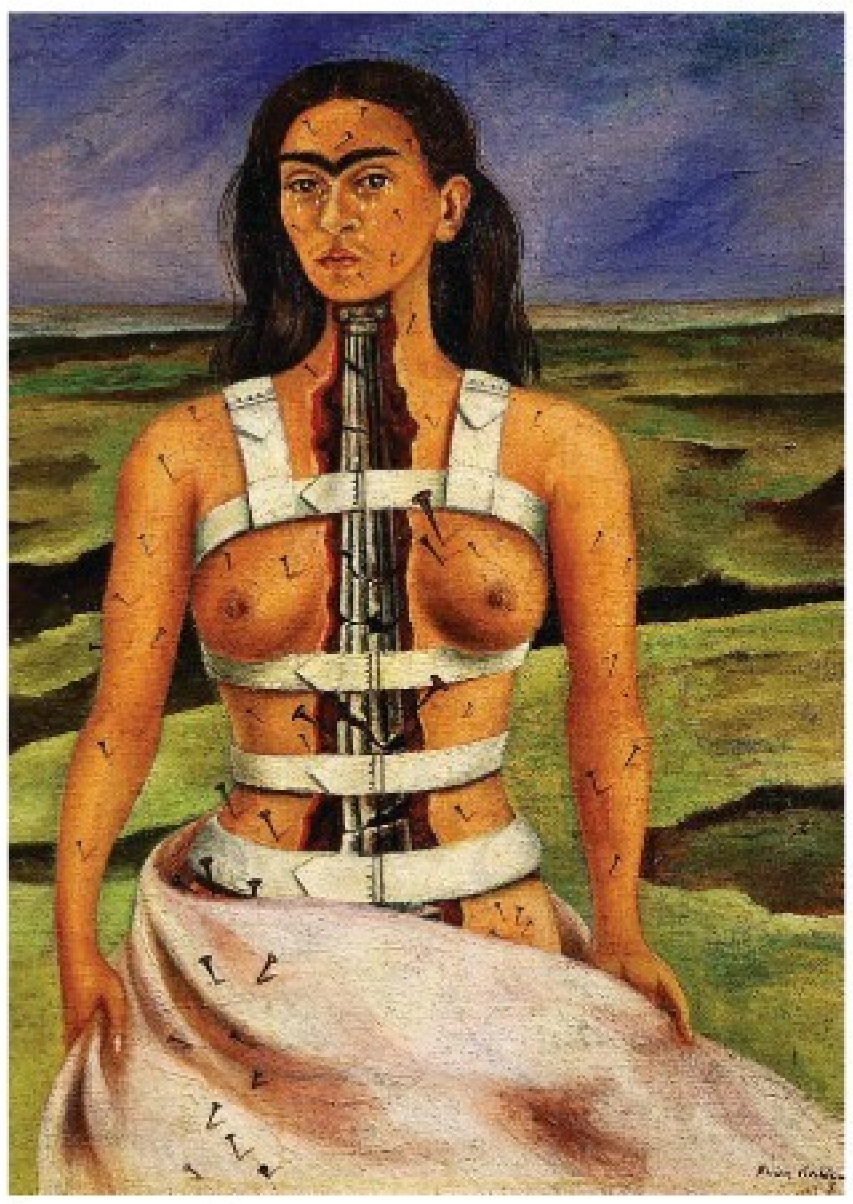
弗里达画作 :《摩西》(1945)



《迭戈在我脑海里》(1943)



《迭戈和我》(1949)



《破裂的脊柱》(1938)

这个词加上了引号。相似的表述也出现在 1949 年，墨西哥艺术学院为他们伟大的壁画大师举办大展，弗里达在画册序言中写下这样一段:“我不谈‘我的丈夫’迭戈,因为那将是很可笑的事。迭戈从来不是，也将不会是任何人的‘丈夫’。我也不谈情人迭戈，因为他的成就超越性的界限。”人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弗里达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赞颂里维拉的伟大，但如果对其之前 20 年的爱情和婚姻经历有所了解，便会体察到在这几行字之下埋伏了难以平息的隐痛。他们绝非那一对在弗里达博物馆里展示给崇拜者的美满婚姻的拥有者。关于他们的生活情况，就算是最亲密朋友的描述也大相径庭。

在开始写这些日记之前，弗里达习惯以画自己来记述情感。1943 年，她画过一幅自画像 :《迭戈在我脑海里》，画家把自己包裹在一袭如新娘花冠一般的白色头巾里，露出无表情的坚硬的面部，而迭戈的半身小像被镶嵌在她的额头正中，蹙于眉心。1949 年，弗里达又画了一幅自画像 :《迭戈和我》，里维拉仍被嵌在她的眉心和前额之间，只是在丈夫的额上她多画了第三只“永恒之眼”，而在她自己脸上，多了三颗泪珠。新娘一般美丽的花冠不见了，她将一把乱发缠绕在画面之上。这是他们复婚后的第九年。弗里达希望迭戈用“第三只眼”看到什么？是她难以言语的内心吗？

在这两幅画之间，1944 年她还画过另一幅《迭戈和弗里达》。在那里面，她将自己和迭戈的脸各取一半再合二为一，用缠绕的树根在两人脖颈处捆系。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理想的婚姻关系，她寄望于古老的阿兹特克神话 :奥梅特库特利和奥梅齐特华尔男女合身为一体，成为所有生命的起源。

很明显，弗里达那些年自囚于极深的困扰之中，她没有一刻逃脱过对自己和里维拉之间的关系的索问，却永无答案。“我不能因为他的缺点而不



《弗里达与迭戈·里维拉》(1931)



《两个弗里达》(1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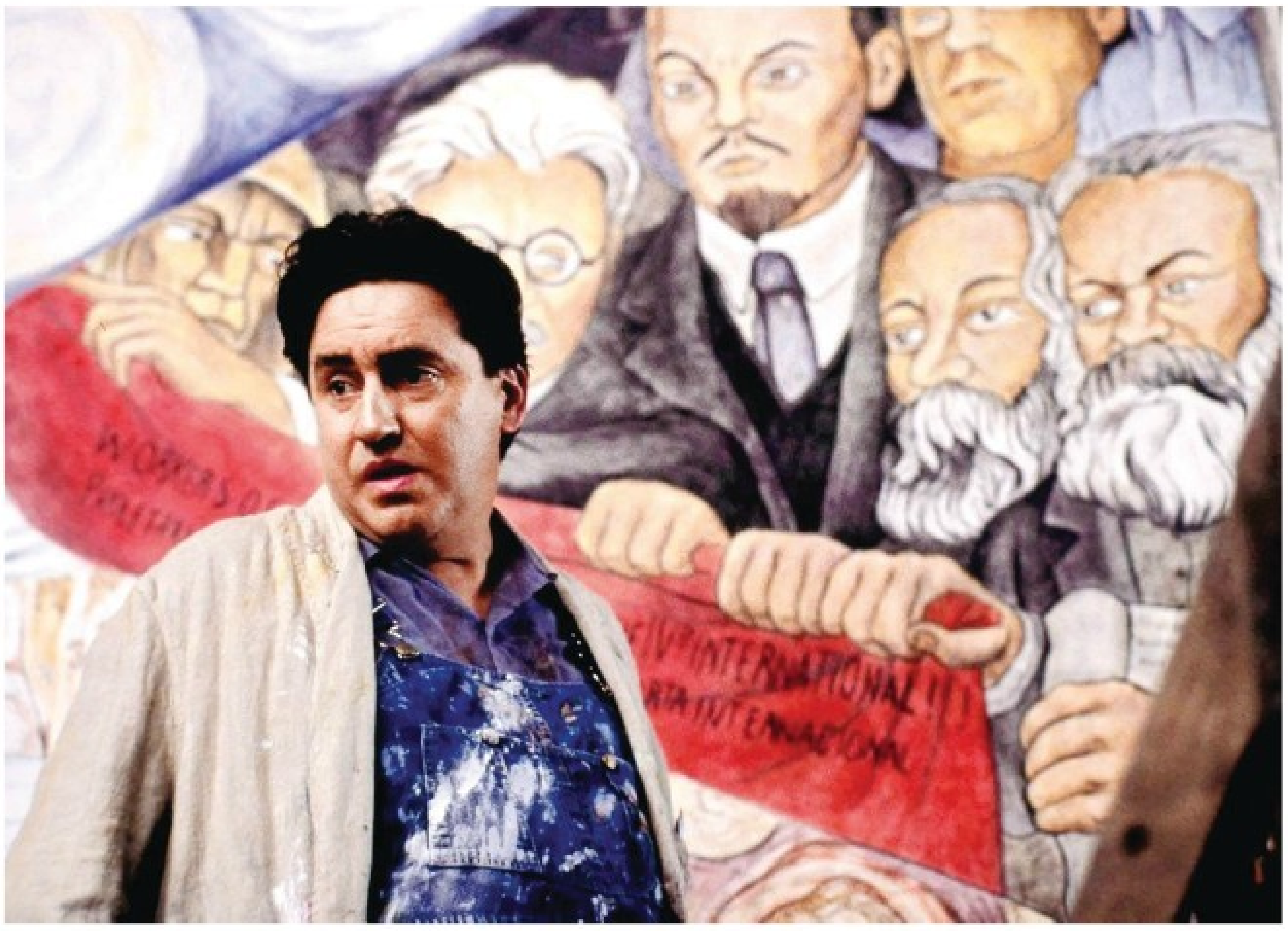
里维拉在墨西哥瓦哈卡州政府大楼内绘制的壁画

爱他。”但她也对丈夫持续不断的不忠感到绝望。里维拉的传记作者玛奇(Gladys March)曾记录里维拉本人的口述，他回忆在1940年复婚的时候，弗里达提出两个条件：对他们共住的房子，她用自己卖画所得来分担一半费用；两人之间不再有性的关系。里维拉只在弗里达的脑海里，在她的婚姻契约里。

那么，他们重新开始第二段婚姻的意义是什么？或许，那是可以让他们在对方生命中担起最重要角色的唯一通道。他们试过关闭这条通道，但很快发现各自都不再完整，也难以再如此光彩夺目。他们生而就是戏剧化人生的沉迷者，是要一起面向外部世界的同盟者——他们终其一生追求重建印第安价值以及势必成功的欲望。这种婚姻关系在20世纪早期的艺术圈里并不罕见：它从令人晕眩的爱情展开，但无法以爱情为唯一，最终婚姻习惯了和背叛共处，一起成就两个人的传奇。

作为一名女性，传记作家海德·赫雷拉更为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她写道：“从他们结婚的那一天起，弗里达和迭戈就开始在对方的生命剧情的







上、下图：电影《弗里达》剧照

展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穿上特旺纳服装是弗里达作为其展开迷人个性的自我创造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作为迭戈完美的伴侣和陪衬。优雅、风情万种、美丽无比，她即是其硕大而丑陋的丈夫的装饰品——他那斯泰森毡帽上的孔雀毛。然而，当她愉快地为迭戈扮演一位印第安女仆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地道的手段和技巧。她并不改变自己的个性来迎合迭戈的期望。相反她创造了这种高度个性化的风格来强化本来就是的那个自我，她知道迭戈也是喜欢的。最后，由于她的过度炫耀而使许多人都觉得这孔雀羽毛要比斯泰森毡帽更引人注目。”

从弗里达 1931 年陪丈夫在旧金山客居时绘画的双人肖像《弗里达与迭戈·里维拉》中——这是他们夫妇被人使用次数最多的一幅画像——海德看到了同样微妙的东西：“里维拉被画成是一个挥动着调色盘和画笔的大画家，弗里达则扮演着其最钟意的角色，即这位天才最钟爱的妻子……她像是中国玩偶一样要飘起来的样子，由巨大的配偶牵着她的手。……这肖像描绘了一位年轻女人——也许看上去有点胆怯，但同时也得意于她对别人的

掌握——通过对伴侣的掌握而达到对世界的掌握。这使人想起墨西哥所常见到的一种类型：故意假装柔顺的妻子，实际上熟练而灵巧地支配了家里的一切，包括丈夫。”他们拉在一起的手被弗里达放在画面最中央的位置，海德认为，这对弗里达来说意味着婚姻契约的重要性，“她生存的支点即是那种成为他的贤妻的动机”。

激情的开始

按照海德的推断，弗里达在第一次遇到里维拉时就认为他是一个好色之徒，但是，“也许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她；也许她掉入了古老的自欺欺人的希望之中：我将拥有他的爱，他将以另一种方式来爱我”。

事实上，里维拉在墨西哥革命时代的巨大名气和领袖魅力对弗里达有着致命吸引力。在还未见过画家之前，国立预科学校的女学生弗里达就跟好友说，她一定会嫁给伟大的迭戈，为他生孩子。他们的年龄相差不止一倍：在弗里达出生的 1907 年，里维拉已经拿到政府的助学金前往欧洲学习艺术，他住在巴黎，与毕加索、斯泰因、阿波利奈尔、爱伦堡他们为伍。1921 年回国后，里维拉开始为墨西哥城的公共建筑绘制巨型壁画，他将印第安传统放进纪念碑式的革命壁画里，很快，在这个被 1910 年那场民族革命激荡不止的国家，他成为了最有名的画家和政治活动家，印第安复兴运动就以他为中心展开。

关于里维拉和弗里达的相遇，有多个版本，来自他们各自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说法，多数时候都是为了让故事变得更加浪漫。其中里维拉在自传《我的艺术，我的生活》中写到的版本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是 1923 年在国立预科学校的阶梯教室里，伟大的壁画家站在脚手架上描绘人类起源，15 岁的女学生毫不畏惧地闯进教室，要求待在那里看他作画。这个有着西班牙、印第安和德国血统的小女孩给里维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眼神中闪烁着奇异的火光”。第二次见面是 1928 年，里维拉在教育部创作壁画，他描述自己仍然站在脚手架高处，突然看到了一个少女，“浓密乌黑的眉毛在鼻子上方相接，像是乌鸦的一对翅膀，犹如两道黑色的弯弓，衬得那双棕色明眸秀美异常”。这是 20 岁的弗里达。不过里维拉此时还不知道，从 15 岁到 20 岁，弗里达在这 5 年里已经历了那场改变她全部人生方向的最惨烈的车祸：1925 年 9 月 17 日，一辆电车撞上了她和男友乘坐的公共汽车，金属扶手从她盆骨位置贯穿身体并穿过她的阴道，脊柱断裂为三截，锁骨和两根肋骨折断，盆骨和右腿分别有 3 处和 11 处碎裂。她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才活下来。从那以后，她的生活就变成了无休止地习惯痛苦，一生经历 30 多次外科手术。为了摆脱被石膏胸衣禁锢在病床上的苦楚，她开始画画，画画从此成为她唯一的天地。肉体上炼狱般的磨难让弗里达的内心成长得坚定而激荡，1928 年最终带来爱情和婚姻的相遇并非邂逅，正是她有意的安排。那时 42 岁的壁画大师身边短暂地缺席女人，弗里达决心成为他的妻子。


电影《弗里达》剧照

不加掩藏的鲜明和炽热，独特绘画所透露出来的强大内心，让里维拉对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产生了一种无法解释的情感，这和从前单纯的爱欲不一样，里面混杂了对一个天才的赞叹和敬慕——在这方面，里维拉比罗丹和毕加索无私很多，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弗里达的才华的呵护、赞美和推崇。他们的恋情迅速发展，弗里达这一时期的绘画也被里维拉影响而逐渐找到方向，她说“迭戈给了我对待生活的革命的态度和对色彩的真实的感觉”。

尽管弗里达的父母对里维拉的年龄、肥胖的形象以及他共产党人的身份都不满意，觉得他们是“大象和鸽子间极不般配的结合”，但最终还是给予了婚事所需要的祝福。说服他们的并不完全是弗里达不顾一切的爱情，也包括古老婚姻的主要前提：他们期待这个慷慨而富有的男人能为家中解决经济困难。后来他也确实做得很好。

1929 年 8 月 21 日，弗里达和里维拉在科约阿坎市政厅举行了婚礼。我们在后来看到的那个弗里达，就“诞生”于这场婚礼之后。从那天起，她换上了里维拉喜欢的墨西哥特旺纳服装，就像她皈依于里维拉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墨西哥主义。服装在她的自我



弗里达在画《迭戈在我脑海里》时，丈夫里维拉陪在身边



弗里达的工作室



弗里达的卧室

形象和革命之间，在她的绘画之间，甚至于她的婚姻，都从此有了不可分离的关系。

婚姻的短暂休克

墨西哥壁画20世纪20年代曾在美国艺术界产生过很大影响，因为这个原因，1930年底到1933年底，里维拉获得机会前往旧金山、底特律和纽约，并在那里为福特汽车、洛克菲勒中心这些现代工业的象征之地创作巨型壁画。这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壁画家在美国西海岸的富有人群中成了明星，也包括陪伴在他身边的弗里达。无论到哪里，弗里达始终穿着她“异乎寻常的墨西哥服装”，而里维拉也为妻子受到关注而感到自豪，他记述弗里达在汽车大亨福特举办的舞会上，“穿着墨西哥服装，看上去非常抢眼，不久就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人物”。但在旅行后期的那一年多，美国之行愉快的基调急转而下。因为坚持把列宁肖像画进壁画，里维拉被赶出洛克菲勒中心，失去了经济来源。在这场政治旋涡之后，紧接着的是他们婚姻生活里的紧张关系：弗里达不幸流产，里维拉和女助手及崇拜者偷情，弗里达厌恶透了纽约，他们为要不要回到墨西哥而不断争吵。

在漂荡4年以后，他们终于回到墨西哥城。里维拉建造了一栋形貌奇怪的新居，似乎预示着他们之间即将开始一种奇怪的相处方式。那是两幢分开的房子，中间由一座天桥连接，里维拉住进粉色的较大房子里，弗里达选了那幢蓝色的，天桥从她房子的平顶处通向丈夫的大画室，中间有门隔断。“里维拉夫妇分住在两幢房子并由一架天桥连接，隐喻了他们之间那种独特和相对独立的奇怪的关系。两幢住宅都属于迭戈，但当弗里达对其不满之时，她就将天桥这端的门紧锁，迫使他走下楼，跨过院子去敲前门。



弗里达和里维拉回到墨西哥城之后居住的形貌奇怪的新居

有一半的情况是仆人告之其妻拒绝他。里维拉就会急巴巴地冲上楼，再过天桥，在紧闭的门外求她原谅。”

就是在这幢房子里，里维拉和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发生了私情，这段关系持续到1935年，在这期间，他将克里斯蒂娜、她的两个孩子和弗里达一起画进了墨西哥国会大厦的壁画中。弗里达极其痛苦，她画了那幅血淋淋的作品：《只是刺了几小刀》，据说故事来自墨西哥城一个醉酒男人谋杀女友的社会新闻，但女人肌体上布满的伤口、无动于衷将手插在口袋里的凶手，无疑都是她自己心里伤痛的投射：床上死去的女人是一头短发的弗里达，男子则显现了和迭戈相似的面孔。她跟朋友说，自己几乎也要“被生活谋杀了”。她还说，自己一生中遭受了两大变故的折磨，其一是那场车祸，其二就是迭戈。

里维拉在遇见弗里达之前，他有过两次婚姻、四个孩子、无数情人，但当里维拉和克里斯蒂娜的背叛事件发生后，弗里达受到了最深的伤害。她崇拜迭戈，她的任性一直屈服于他的任性，但在这以后，她似乎想要改变自己和迭戈在婚姻中相处的方式，她试图放大自己当初征服迭戈的那种炽热和坚决，她放纵自己去获得性自由，变成一个随时随地都散发魅力的女人。1935年，她频繁和年轻英俊的雕塑家伊桑姆·诺古奇约会，直到里维拉暴跳如雷挥舞手枪威胁情敌。1936年，她和来墨西哥寻求政治避难的俄国共产党托派领袖托洛茨基发生短暂的婚外恋情，也许仅仅出于报复心，因为托洛茨基是里维拉的亲密朋友和政治偶像。这段关系可能只维持了几个星期，但旁观者都认为是弗里达在主动引诱60岁的托洛茨基，她将托洛茨基的情书交给密友阅看，似乎很满足于被这个俄国伟人所迷恋。

对弗里达所面对的残忍的婚姻幻灭，法国诺贝尔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迭戈和弗里达》一书中有比海德·赫雷拉更深层的理解。他写道：“迭戈和弗里达的感情破裂，绝不仅仅是夫妻二人生活的一个插曲，它彻底打破了种种伪装的面具。”按照勒克莱齐奥的叙述，从新婚到美国时期，弗里达一直在迭戈身边扮演阿兹特克公主的浪漫角色，但墨西哥的现实其实一直存在。弗里达很清楚迭戈和其他男人并无不同，他不忠、和她亲妹妹偷

欢，其实是墨西哥历史上那个时期的女性在婚姻中共有的痛苦厄运，这种厄运也曾在迭戈自己母亲的身上上演过。他不想失去弗里达，但无法停止游戏：他曾勾引过第一任妻子的好友，和第二个同居女友的妹妹偷情。勒克莱齐奥认为，迭戈无意间沿袭了墨西哥一个古老的习俗，就是一个男人同时与姊妹几个结婚，即所谓“左手的婚姻”。但作为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的艺术家——比起过去的几个世纪，这个时代的人更迫切地表达出对浪漫爱情、亲密关系和共同幸福的理想化愿望——他也渴求构成现代婚姻的最重要因素：爱情。弗里达是他最理想的爱情，但却不能因此束缚他性欲的自由。

“而最让弗里达痛心的，倒并不是因为嫉妒——她一直反对占有欲——而是因为她曾经笃信的恩爱夫妻的关系破裂。她和这个男人至此所经历的灵与肉的结合，在她看来应如血脉般强烈和持久，如今却烟消云散，消失殆尽。”她逃离那幢蓝房子，和里维拉分居了好几个月，最后还是回到他身边。表面上生活重归轨道，但她在1938年画的《一个开裂伤口的回忆》透露了婚姻的深刻裂纹：遍布全身的可怕创伤，如藤蔓一样缠绕她的回忆，还有她脸上那种梦游一般的神情。

他们之间这种筋疲力尽的拉锯持续了4年。1938年后，弗里达以在纽约举办首次画展的机会再次离开迭戈，逃避必定到来的分手。1939年12月，在她从巴黎回到墨西哥城后不久，在里维拉的要求下，他们13年的婚姻关系宣告结束。



在经历18岁那场车祸后，弗里达一生做了30多次外科手术，很多时候都只能躺卧在病床上绘画。图为1936年弗里达正在画《祖父母、父母和我》

重启婚姻

一场意外的政治谋杀事件，给弗里达和里维拉已经死亡的婚姻带来了复活的机会。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的办公室被人用冰镐刺杀。作为托洛茨基曾经最亲近的朋友，里维拉和弗里达都被警方调查询问。他们共同的朋友、旧金山的埃劳塞医生劝说因此精神抑郁的弗里达去他那里治疗，而里维拉正好也在旧金山，他们相见了。埃劳塞认为离婚对弗里达的健康造成了极大伤害，建议里维拉考虑复合，以免她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在这之前，里维拉在为旧金山城市中学绘制壁画时，已经把身穿墨西哥服装的弗里达放在了他的人物之中，证明爱情仍然存在。里维拉劝说弗里达重新嫁给他。这一年的12月8日，



他们在旧金山第二次结婚，不久后一起回到墨西哥，住进科约阿坎的老房子。

在《迭戈和弗里达》一书中，勒克莱齐奥将他们的复合称为“爱情革命”的完成。也许他是想说，弗里达对婚姻和爱情有了不同以往的态度。

复婚后的里维拉仍旧在社交生活中心，仍旧无休止地追逐女人，但也真实并深刻地爱恋弗里达，弗里达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连接世界的图腾。而弗里达，表面上确实不再像从前那样表现出强烈的要占据迭戈全部感情世界的欲望，她住在父亲留下的房子里，大半时间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除了绘画和迭戈，和这个世界少有联系。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她对迭戈全部的爱与痛仅仅诉诸画作，后来又有了日记。她最后解脱的方式，就是抹去迭戈的性别，将他们的婚姻回归于男女混合融于一体的古老墨西哥神话。以这样的方式，她的爱人将不再属于世俗的任何女人。

“这个爱与恨的残忍游戏，弗里达与迭戈玩了很久，如今成了无止境的生命游戏。从虚无中夺取的每一分每一厘，都滋养了她，延续了她的实体，如同祭祀典礼中过于强烈的日光和血腥暴力。于是，弗里达成为一个女神，进入恋人的躯体并占有了他，分享他的一切索取。”

在看似平静的最后10年里，弗里达用绘画来说服自己和修补内心。她把婚姻变成了一种坚固的生活仪式和革命象征，她的身体却像在日记中自述的那样，“我四分五裂”。一年内被迫6次手术之后，1953年4月13日，弗里达在囚禁自己的钢制胸衣外套上华丽的墨西哥服装，被爱人和朋友用救护车护送到当代美术馆，在那里，她躺卧在床上，出席了全墨西哥城为她举办的盛大回顾画展。几个月后，弗里达再次接受残酷的右腿截肢手术。1954年7月13日，她在度过47岁生日之后的第七天离开了人世，留给身边陪护的爱人一个25周年结婚纪念戒指。日记的最后一页，她为自己留下遗言：我希望离去是幸福的——我希望永远不再回来。

在弗里达心中，理想的夫妻所拥有的爱情，就应该像意大利女摄影师蒂娜·莫多蒂和墨西哥革命家胡里奥·安东尼奥·麦拉那样，“爱，将他们的身体结合在一起，也将他们的思想在革命的绝对中连在了一起”。她和迭戈的第二次婚姻，在某种意义上，是她对这一种理想关系竭尽全力的接近。



爱丽丝・门罗



爱丽丝·门罗的主妇之爱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上大学的女人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中途退学，通常是为了结婚。”爱丽丝·门罗就是那三分之二中的一个。从 20 岁到 82 岁，主妇爱丽丝·门罗和其他主妇的区别或许就在于，她依靠“和妻子、母亲的主要角色并不冲突”的永不停止的写作，为内心保持着自我认知。

主笔 曾焱

与我们乐于谈论的苏珊·桑塔格或者汉娜·阿伦特这类女性写作者相比，爱丽丝·门罗（Alice Ann Munro）显得这样家常。她刚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是“活着的最好的短篇小说大师”，可是，传记作家恐怕仍难以从她身上找到令人吁叹的传奇式人生：当了 63 年家庭主妇，出版 11 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类似长篇的故事集，写的都是加拿大郊区小镇的那些平民故事。更主要的是，这也就是她自己生活的样子：住在小地方，没有和伟大人物的交集，没有摩登的恋爱和婚姻，即便成名已久，也从不习惯于对政治、哲学或女权问题发表深刻见地。

在 2007 年 1 月的一个访谈中，门罗谈到一点她的私人生活：我其实三十六七岁才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而我 20 岁时就开始写作，那时我已结婚，有孩子，做家务。即便在没有洗衣机之类的家电时，写作也不成问题。人只要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总能找到时间。

但如果你是个女人，尤其是有家的女人，你就得顾全所有需要你的人，无论是需要你的帮助，还是需要你的陪伴。那时女人的生活，似乎是很无定型的，她们在家里写作，但空余出的时间似乎又有很多非正式的社交活动、电话。

在她波澜不兴的讲述中没有醒世格言，我们只是更多了解到一点关于家庭主妇兼而写作的难处，比如：“乘孩子们午睡时写作是很难的，我不敢讲这个大话，现在的女人恐怕也做不到。这是我年轻时最艰难的地方。”

任教于门罗母校的女作家卡特琳娜·露丝（Catherine Sheldrick Ross）1992 年写过一本她的传记：《爱丽丝·门罗的双重生活》，讲她如何在妻子、母亲和作家的角色之间寻找最大可能的平衡。门罗有过两次婚姻。她现在的姓来自第一个丈夫詹姆斯，他们是大学同学，爱丽丝·门罗在“大二”的时候嫁给了他，当时她只有 20 岁。爱丽丝·门罗的家乡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格姆镇（Wingham）。和安省其他地方一样，温格姆也是移民聚居的小镇：门罗的父亲罗伯特·莱德劳就是 19 世纪苏格兰移民后裔，在位于小镇边缘的农庄养殖银狐和水貂，母亲安娜是老师。作为三个孩子中的老大，门罗分担了养家的义务，她后来回忆，自己从小就习惯了帮母亲做家务，并在 17 岁高中毕业后立刻应考了教师职位，好让家里多一份收入。如果没有拿到西安大略大学英语系提供的奖学金，她就会这样留在老家而不再继续求学了。西安大略大学历史上曾是一所宗教大学，不过在门罗入校的时候，它早已经世俗化了。在她的前辈校友里面，曾有过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名叫弗雷德里克·格兰特·班廷，作为胰岛素的发现者他在 1923 年被授予医学奖。门罗是这所学校培养的第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但学生时期的爱丽丝·门罗十分



2013 年 12 月 10 日，诺贝尔奖颁奖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爱丽丝·门罗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席，由女儿詹妮代她领奖

普通。她以打工来维持求学期间的生活，当过服务生、烟草采摘工和图书馆员。不过从父亲身上遗传的写作天赋没有荒废，进大学第二年，她发表了处女作《影子的尺寸》。她只有两年的奖学金，所以在 1951 年中断学业嫁给了詹姆斯·门罗，婚后她跟随丈夫从东部的安省搬到了遥远西岸，在温哥华附近一个小镇安了家。詹姆斯在多伦多郊区的一个中上层家庭长大，那是农村女孩爱丽丝完全陌生的世界，多年后她在小说《家具》里间接写到了这一社会差异带来的感受："我们家缺乏经常的社交生活——人们不来家里吃饭，更不要说开派对了。也许是阶层问题。餐桌这一幕过去 5 年后，我的公婆邀请和他们没有关系的人来吃饭，他们无意中谈论下午的派对，那是鸡尾酒会。那是一种我在杂志故事里读到的生活。对我来说，我的婆家似乎生活在一个小说中的特权世界里。"

詹姆斯为当地最大的百货公司工作，物质上基本无忧，就像门罗后来跟记者所说："当时我们分别只有 20 岁和 22 岁，很快就过上了某种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我们打算买一栋房子，并生一个孩子。没过多久，我们就梦想成真了。我 21 岁时就生了第一个孩子。"门罗回忆，她怀孕时拼命写作，因为她觉得一旦孩子生下来就没有时间写了，所以必须在此之前写出惊天动地的东西来。结果，她在写第一部小说集里的《多谢载我一程》时，第一个女儿希拉就躺



在身旁的摇篮里看着她。他们很快有了三个女儿，令人难过的是，第二个女儿在出生 15 个小时后夭折了。

1963 年，门罗一家迁居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爱丽丝生下了最小的女儿，她现在需要照顾三个孩子，并每周两天去帮丈夫詹姆斯经营新开的“门罗书店”——虽然他们在 1972 年离了婚，这书店目前仍在营业中。门罗说，书店差点破产，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如从前，但这是她第一段婚姻中最开心的时光，虽然操持繁重的家务，但书店让她有了可以交流的朋友，她也仍然能够坚持写作：孩子们去上学了她就马上开始写，直到她们回来吃午饭。如果不用去书店帮忙，她会争取在傍晚前干完所有家务活，然后开始写。那几年，她写的小说大都发表在一本小众到编辑可以叫出所有读者名字的杂志上，直到 1968 年，她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并获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大奖“总督奖”。1971 年，她出版了第二本故事集《女孩和女人的生活》。门罗曾承认，这本书有很强的自传意义。在和小说集同名的那篇故事里，门罗写到一个乡间小镇上的母亲——她的小说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母亲——严肃地告诫女儿：动脑筋，不要被迷惑。一旦你犯了错误，受到迷惑——被一个男人，你的生活就不再是你的了。你就会负上重担，女人总是这样。女儿内心的回答是：我不是太明白。或者即使我真的明白了，我还是决定反抗它。我会抗拒一切她那么热切、固执、充满希望地告诉我的东西。

在大女儿希拉为门罗撰写的传记《母亲和女儿》里，门罗有时像是一个心不在焉的妈妈，其实她是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一点点写作的空间，不过希拉说，在她身边仍然感受到幸福。门罗成名时，希拉已经十五六岁，比妹妹们更多感受到母亲在打理写作和生活这两件事情时的争夺。她说，虽然自己就生活在母亲的一个故事里，但更多时候，她所了解的关于母亲的一切其实仍是来自母亲的文字。成年后，她像母亲一样走上写作的路，她重复了小时候常见的那样一种场景：悉心照料家人起居饮食，偷空时才能跑到角落里写上一阵。很多时候，门罗都是利用做家务和喝咖啡的时间默想即将动笔的故事，然后在某个能够属于她一个人的时间里再坐下来，把它们写到纸上。在她成名之后，她也很少参加文学圈的社交活动，因为她要为自己的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留出足够时间。她的一天，就像《逃离》中那个小镇主妇朱丽叶的一天：清早被吸尘器的声音吵醒，在厨房里教大女儿为果酱瓶准备方格布罩和准备贴到瓶子上的标签，应付青春期少女的无数问题，同时抱着小女儿为全家准备吃的。“她不想把佩内洛普放下来——好像这里不安全似的——所以她把孩子搁在一边的腿上，同时用只汤勺去把鸡蛋捞出来，就用一只手去磕开它，剥了皮，再把它碾碎。”

这是当时北美地区家庭主妇的平常生活。后来有人问门罗，为什么只写短篇？门罗回答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写作时间有限。20 世纪上半叶美国曾经发布过一项研究数据，表明当时有 90% 的城市主妇每个星期有至少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家务上，乡村主妇花的时间甚至更长。门罗生活的加拿大城郊小镇自然也是类似情形。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妮·库茨在她的《婚姻简史》中指出，在 20 世纪的前 30 年，女人在家庭之外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并未得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更多的认可，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女人应该在婚后回到家里相夫教子。“大多数美国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男人是挣工资的主力，妻子不参与家庭之外的、或跟丈夫联袂搭档的全职劳动，孩子们则上学念书，而不是充当家庭劳力。”大萧条时期的欧洲各国政府曾尝试推出社会计划鼓励男人养家式家庭，“二战”结束后，欧洲和北美的福利国家则为“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婚姻模式提供了更实际的政策，被援引的一个例子就是：1947 年，伊利诺伊大学免除了女学生的学期论文，目的是让她们能够学习做 6 个小时临时保姆，为未来担当妻子、母亲以及主持家庭生活做好准备。另一个数据是：到 1950 年，在美国差不多一半女人在 19 岁的时候就结婚了，到 24 岁有 70% 已婚。“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上大学的女人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中途退学，通常是为了

结婚。”这种对结婚的热情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社会学家称之为“漫长十年”，它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西方婚姻的黄金时代。“迟至1961年，一项针对年轻女性所作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期望到22岁的时候能把自己嫁出去，大多数人希望有4个孩子，所有人都想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永久性地离开工作岗位。”而那些婚姻咨询专家们为女性提供的最好职业选择就是，女人应该从事跟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主要角色并不冲突的工作，比如艺术或者社区志愿工作者。

爱丽丝·门罗就成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然后在“漫长十年”中步入婚姻。结婚、退学，做年轻的全日制主妇，现在看来，她所经历的一切都在她所处的时代中，是那个时期普通女性必须面对的选择。她后来坦承，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结婚这件事在她们那个年代给女人的压力如此之大，她甚至觉得自己当初那么早结婚就是为了能够安定下来，将注意力重新集中于写作。在门罗的回忆里，生活在温哥华北郊的那几年无聊至极，总有难以逃脱的主妇聚会，洗衣服、织毛衣或者羊毛地毯最佳保养方法之类的家长里短令她感到窒息。在她的小说《留存的记忆》里，对这种生活有入骨的描写：“在那个年代，年轻的丈夫们是很一本正经的。不久前他们还是求爱者，几乎是玩物，奴颜婢膝，因为性的痛苦而绝望。当婚姻之实已是板上钉钉，他们就变得果敢、挑剔。每天早上去上班，脸刮得干干净净，年轻的脖子上打着领带，在无名的工作中打发一个又一个白天；晚饭时回家，挑剔地看一眼晚餐，抖开报纸，举着，挡在自己与厨房、疾病、情感和孩子的一团混乱中间……”

虽然成名后被赞誉拥有无人媲美的“精准”描述生活的能力，门罗却从来不是摩登女性和知识精英——不是《第二性》的西蒙·波伏瓦，也不是忧愁的萨冈，她只是尽力做到，即便站在狭窄的厨房里，也用心去看外面不断变化的世界。主妇爱丽丝·门罗和其他主妇的区别或许就在于，她依靠“和妻子、母亲的主要角色并不冲突”的写作，在内心保持着自我认知。

与詹姆斯离异后，爱丽丝·门罗搬回了安大略省，4年后嫁给第二任丈夫杰拉德·弗雷林。和门罗一样，弗雷林也曾就读西安大略大学，他是退伍军人，比门罗高三个年级，在那里取得英语和哲学的学位后，又研读了地理学，成为一名地理学者，曾参与编撰1974年版的《加拿大国家地图集》。在朋友们眼中，他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喜爱绘画和诗歌以及一些在别人眼里毫无意义的事物。有记者问过门罗，他们是怎么相识的？门罗回忆，其实她在18岁时就很迷他，但弗雷林当时有喜欢的女孩，她鼓足勇气将自己写的第一篇小说《影子的尺寸》拿去给他看，他却心不在焉地把她支给了另一位编辑。这篇小说发表时，弗雷林已经毕业了，他给门罗写了一封信，对小说极为称赞，却没有更多的其他表示，门罗因此而失落，他们中断了联系。直到20年后，弗雷林从广播节目里听到对门罗的一次访问，猜测她离婚了，按照电台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她，并约她共进午餐。对这次恋情，门罗跟《巴黎评论》的记者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去了教师俱乐部，居然在午餐时间分别喝了三杯马丁尼酒。当时我俩都挺紧张，不过很快就熟悉彼此了。下午行将结束时，我们就已经在商量要住到一起了。确实是进展神速。”

婚后，弗雷林赞成门罗继续保留前夫的姓氏，两人在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小镇克林顿（Clinton）旁边的一个农场里生活至今，那里是弗雷林母亲的家，离门罗出生的地方也很近。克林顿是个只有3000多人的安静小镇。1994年，《巴黎评论》的两位撰稿人前去拜访门罗，在报道中描述了他们生活的环境：“门罗和她丈夫长大的地方距他们现在的居所均不到20英里。我们所途经、所欣赏乃至用过餐的每一所建筑，他们几乎都对其历史了如指掌。我们询问就近是否有任何种类的文学圈子，然后得知，尽管戈德里奇有一所图书馆，但如果想找一家像样的书店，至少得去30英里开外的斯特拉福德。我们又问及当地是否还有其他作家，于是门罗开车载我们经过一栋年久失修的房子，房后的门廊上坐着一个人，他敞开胸脯、蜷缩在打字机前，周围全是猫咪。门罗说：‘他每天都坐在那里，风雨无阻。我不认识他，但我特别好奇，想知道他到底在忙些什么。’”

在克林顿，她拥有了最安静、最平稳的婚姻。50岁的门罗以每四年一本小说集的密度写作，进入到自己的创作高峰期。《逃离》、《公开的秘密》、《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幸福过了头》……每一本都得到评论界好评，其中《逃离》在2009年获得英国第三届布克国际奖。门罗说她无法想象停止写作，她规定自己每天写够一定的页数，从不间断，就算一篇刚刚完成，也马上进入下一篇。如果哪天将有特殊安排而不能工作，她会提前把那些页数写出来。“住在小城镇里，你能得知更多消息，关于各色人物的消息。”她不再像早期写小镇女孩在成长中和家庭、和小镇生活做出的妥协，她开始写一些中年女性的孤独，写她们如何在日常的消逝中逃离，在家庭责任中努力为自己开辟出一点空间。用门罗自己的话来说，她后期的私人化写作越来越少了，转而写基于观察的小说。就像她所喜爱的美国南方的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门罗写身边的普通人和小镇的边边角角，写中年已逝和老年将至。弗雷林陪伴她从45岁写到82岁，2013年4月，在她获得诺贝尔奖的6个月前，他安然去世于克林顿镇。

OMEGA

Time for Love


图3

欧米茄情人节浪漫臻品

铭刻爱的时光

恒久爱恋，分秒相伴，转变了时间于你的感悟；亦如时光流转，爱情弥坚，赋予爱情于你的领悟。纵使韶光易逝难以捉摸亦铭记于心，繁忙之际亦不能忽略爱意表达。于此充满浓情爱意情人佳节到来之际，请不要仅靠记忆来留存甜蜜时刻，让卓然出众的欧米茄时计臻品来铭刻专属于你俩爱的时光吧。

The Omega Ladymatic

欧米茄Ladymatic珍珠贝母女表（图1）

欧米茄Ladymatic腕表融合了众多令人惊艳的设计元素，低调简约中蕴含卓尔不凡的奢华风格，尽显柔美典雅的女性魅力。

此款腕表表盘由白色珍珠贝母制成。表圈上镶嵌有60颗长形切割钻石，旋入式表冠上镶嵌有“明亮式欧米茄切割”钻石。与此独具匠心的表壳及表盘交相辉映的是以18K Sedna™金打造的表链，玫瑰金色泽永恒持久，表链链节内铺嵌有精致白色珍珠贝母。每处铺嵌的珍珠贝母材质均经过精细切割，使得无需粘合材料便与表链完美相配。

The Omega Seamaster

欧米茄海马系列 Aqua Terra GMT 计时表（图2）

欧米茄海马系列Aqua Terra GMT计时表是广受欢迎的欧米茄海马系列中的全新表款，它所搭载的欧米茄9605同轴机芯正是欧米茄独有的革命性同轴机芯家族中的一员。表盘饰有标志性的“柚木概念”垂直纹理，令人联想到奢华游艇上的柚木甲板。

此款腕表极富创造力的将12小时计时指针和60分钟计时指针同时置于3时位置的小表盘之中。另一个小表盘则同时置有小秒针和GMT指针。GMT指针每24小时旋转一周，从而实现了同时读取两地时间的功能。

The Omega Dewdrop

OMEGA Dewdrop系列吊坠搭配18K白金项链（图3）

细腻柔美的OMEGA Dewdrop系列华贵珠宝的独特设计源自对欧米茄品牌标识Ω的创造性演绎。此系列设计清新出尘，洋溢着一种柔美灵动的女性韵味和优雅气质。

值此情人节，欧米茄特别呈献此款18K白金吊坠，完美贴近肌肤，加倍衬托出佩戴者的自然之美。此款吊坠镶嵌有7颗钻石，总重0.099克拉，绽放流光溢彩。

情人佳节将至，欧米茄与您一起铭刻爱的时光。



图2



图1





2013 年 12 月 21 日，英国达德利的一对新人扮作怪物史莱克与他的新娘菲奥娜公主，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举办了一场童话般的婚礼



婚姻变革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革命，完全像工业革命一样伤筋动骨，一样影响深远，一样不可逆转。像那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一样，婚姻革命也改变了人们如何组织他们的工作和人与人之间的承诺义务，如何利用他们的空闲时间，如何理解他们的性行为，以及如何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它把有些人从限制性的、由遗传而得来的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但它也剥夺了另外一些人的传统支撑体系和行为规范，却没有建立新的体系和规范。”——《婚姻简史》作者斯蒂芬妮·库茨



1970 年，部分“离婚联盟”成员在罗马示威，呼吁意大利引进更为苛刻的离婚法



1937 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聚在街头的无业者

20 世纪初

20 世纪初叶，性行为、两性关系和青年文化中的变化，使得更多的人把婚姻置于他们感情生活的中心。对大多数的个人认同感来说，爱情与婚姻变得至关重要。结婚率上升，非婚生子女数量下降。在大多数国家，人们结婚更早去世更晚，一生中有更多的时间在已婚状态中度过，尽管离婚率也有所上升。

独立青年文化下的自主婚姻

对维多利亚时代性别隔离和性保守的拒斥，在年轻人当中最为明显，一种独立的青年文化的蓬勃成长，是 20 世纪初最富戏剧性的特征之一。年轻人获得了选择自己婚姻配偶的权利，这是一个世纪之前所不能比的。在新世纪的头两个十年里，男女开始平等地交往。

至 20 年代，终生单身的比例下降。大多数支持妇女解放和性观念开放的人认为，这些变化会让夫妻关系更为亲密。但与此同时，离婚率在很多国家再创新高，如果不是坚持限制性的基于过错的婚姻法，离婚率甚至更高。

性态度的转变

20 年代的一项美国调查显示，22% 的女大学生参加过爱抚聚会。历史学家们估计，在 20 年代进入成年的女性当中，至少有 1/3 的人有过婚前性行为。在这一时代，男女活动领域之间的边界被模糊。一位活动家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的性激进主义，是针对 19 世纪婚姻中性压抑的一次“意识形态的过度补偿”。

核心家庭的形成

20 年代末，婚姻比成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观念牢固地确立。与父母一起老少同堂的夫妻，其比例在 1900 至 1950 年之间迅速下降。



看望妻子和刚出生的宝宝（摄于1930年）



“二战”时期，大批英国女性进入工厂成为职业妇女

优生学生育计划

种族主义优生学理念在北美和西欧盛行。20年代，纳粹掌权之前，美国加利福尼亚有着世界上最广泛的优生学计划，执行绝育措施比所有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大多数男人因为没有能力履行养家者的职责而被绝育。3/4被绝育的女人是“犯有性过错者”。1912年，乔治亚州代表希伯恩·罗登伯里提议修改宪法，永远禁止“黑人或有色人种与高加索人种之间通婚”。1913年，美国48个州中有42个州制定了这样的法律。

大萧条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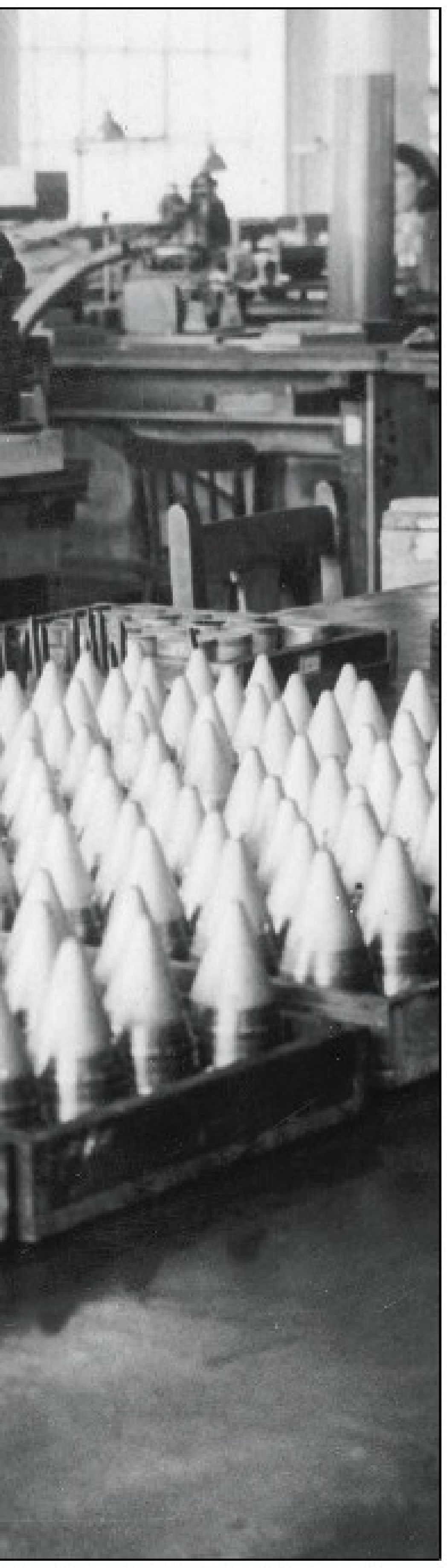
1929年股市崩溃的经济后果迅速而惊人。短短的3年时间里，整个欧洲和北美的失业人数翻了3倍。工业产出下降了将近50%。到1935年，世界贸易跌落到了1929年水平的1/3。人们的生活不得不重新回到以物质生活为主体的状态中，注意力集中在生存问题，对有关婚姻的未来所倾注的热烈关注已渐次冷却。

结婚率与离婚率的双重下降

大学生通常一毕业就加入失业的队伍，这使得年轻人难以承担经济的重负，对婚姻心生畏惧，很多人30岁都没有完成恋爱任务步入婚姻。而正是大萧条毁掉数以万计婚姻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使离婚率在30年代也有所下降。并不是苦难使家庭变得更加稳定，实际上，很多人想离婚，却实在拿不出钱来安置各自的家庭。常见的情况是，人们私自分道扬镳，以不必承受合法离婚的费用。到1940年，美国有超过150万的妻子和丈夫分居。

男性养家式婚姻受到威胁

大萧条加速了已婚女性涌入劳动大军。在美国，1900年在家庭之外工作的已婚女性不到6%，到了30年代中期，超过15%的妻子被登记在雇佣名册上，成千上万的女人打黑市工。但与20年代不同，30年代几乎没有人把已婚女性的工作看作是解放。当一个女人因为丈夫丢掉饭碗而不得不去找工作的时候，大多数男人在20年里所保持的关于男子汉大丈夫的“现代”观念受到了威胁。失业的男人通常也失掉了身份感，变得心灰意冷，很多人开始酗酒、在家里大发脾气。这样





1953 年 4 月，蜜月中的新婚夫妇在英国属地泽西岛海滩上参加集体游戏

的经历削弱了 20 世纪初期出现的对工作女性的社会支持。美国的 26 个州通过了法律，明确禁止或限制在不同领域雇佣已婚女性。同时，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支持男性养家者结婚，欧洲各国政府也试验了一些社会计划，以鼓励男人养家式家庭。

出生率下降

对于 30 年代的出生率下降，各国反应不同。德国纳粹分子走上了两条岔道，他们让“不合格的人”绝育——酒鬼、聋哑人、癫痫病患者、智力残障者等等。同时，取缔了 20 年代出现的节育团体，以确保“雅利安”女人尽可能为“优等民族”生产更多的孩子。在美国，立法者们同大多数家庭一样，热心于避免有“太多嘴要喂养”，联邦政府放松了对节育的禁止，甚至为避孕计划提供了一笔基金。

“二战”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大萧条时期婚姻中的很多趋势加以扭转。

战时：

法西斯专制统治下的血统观念开始盛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第十一章节《国家和种族》大肆渲染血统决定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成就，强制推行血统限制婚，不准德国人与有色人种或者犹太人结婚，于是，不讲爱情只重条件和血统的婚姻风俗开始复辟。

当丈夫走向战场的时候，很多妻子下定决心为战争做出一些实际的贡献。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多已婚女性涌入劳动力大军，经济上的回报和文化上的认可也都比过去要强得多。很多女人在这样的非常时期里，于工作中享受到了乐趣，以及它的经济利益，渴望在战后继续工作（因而，战后欧洲和北美国家需要在福利上提供很多的激励，以保持“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婚姻模式）。

当经济集中于军用产品的时候，生活资料和住房就变得短缺，在战争时期结婚的夫妇常常不得不跟一方父母住在一起。

战后：

美国在战时目睹了未婚出生率的急剧上升，接着是一场离婚大跃进。到 1946 年，有 1/3 以上的婚姻以离婚



2005 年 8 月 14 日，根据著名照片《胜利之吻》创作的巨型雕塑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图中的两位老人即作品原型乔治和伊迪丝



而告终，即使夫妻继续生活，紧张也常常酝酿在表面之下。在美国的一项对战后年轻夫妇所做的研究中表明，在退伍军人当中，充满痛苦的、甚至是伤痕累累的重聚，4 倍于充满快乐的团圆。

20 世纪 50 年代：婚姻的黄金时代

战后经济的繁荣，享乐道德的发展和消费革命，带来了探索婚姻生活的新的可能性。人们蜂拥结婚，开始家庭生活。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及北美各地，结婚率都有所上升，而结婚年龄普遍下降。所谓西方婚姻黄金时代，并非只是对大萧条和战争时期所积压的延期婚姻的临时性调整，这股热潮在北美和西欧持续有 15 年之久。美国开始于 1947 年，持续到 60 年代初。欧洲，人们花了更长的时间来克服战争带来的严重断裂，50 年代中期，欧洲的婚姻范式才得以稳定，同时也持续得更长，1952 年（战时配给制在英国结束）起，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末。

结婚年龄下降、结婚率升高、离婚率下降

50 年代，美国女性的结婚年龄比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任何时期都要低。1959 年，差不多一半的女人在 19 岁就结婚了，到 24 岁已经有 70% 已婚；男人的结婚年龄变得更小，人数更多。然而 1900 年，美国女性在 20 岁至 24 岁之间结婚的只有 22%。同时，美国的离婚率也从战后的高峰迅速下降。到 1958 年，离婚率不到 1947 年的一半。

欧洲以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一时代对结婚都有着同样的热情：结婚年龄降低，结婚率上升，离婚率下降。当离婚发生的时候，它被看作个人的失败，而不是婚姻的失败。50 年代初，在法国和澳大利亚，24 岁结婚的男人所占比例是 50 年前的两倍。

随着结婚年龄的下降，大学生间的婚姻在 50 年代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北美和欧洲的高校不得不修建已婚学生住宅供他们居住。

婚姻中的时间空前延长

到 20 世纪 60 年代，在北美和西欧，结婚占所有适婚人群的 95%。在结婚年龄更小的同时，寿命也更长了，离婚率有所下降或保持稳定，个人一生中在婚姻中度过的时间比此前或此后任何时期都要长。在英国，1850 年出生的女人，其婚姻在丈夫去世之前平均持续了 29 年；而一个出生在 1950 年的女人，其婚姻



朋克情侣（摄于 1980 年）

很可能要持续45年。同样的格局也出现在法国，19世纪60年代的婚姻平均持续28年，而20世纪60年代的婚姻则持续42年。

已婚平均生育率猛增

年轻夫妇有孩子的比率要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高很多。在过去的100年里，已婚夫妇的生育率一直在下降，而50年代却急剧猛增。1957年，美国的人口出生率是每千名女人生育123个婴儿，与1940年的每千人79.5个婴儿形成鲜明对比。婴儿出生的高峰在西欧来得迟一些，但同样变化显著，21岁的西德女人的生育率从1950年的每千人92.2个婴儿，增长到1961年的每千人120个，1969年达到每千人133.8个。

战后生育高峰是由无子或独子家庭的减少而产生的，所以，以夫妻二人为主导的小家庭的理想继续蔓延，大家庭的人数依然在持续下降。此外，由于夫妻生孩子的年龄更小，年纪轻轻就完成了孩子的抚养，因而致力于生孩子养孩子的婚姻，比例一直在下降。

男性养家的婚姻模式达到高潮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整个劳动群体的实际工资迅速增长，增长最快的是处于底层的那一半人。在只有一个人挣钱的家庭里抚养成人的孩子，其比例比任何时期都要高。“男性养家、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模式达到高潮。

大规模消费经济所实现的家庭梦想

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规模消费经济塑造了这一时期的家庭生活。在“二战”之后的5年里，美国在食品上的花销增长了33%。衣服上的支出增长了22%，但购买家具和家用器具的花销却猛增了240%。到60年代，将近2/3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了自己的住宅，87%的家庭有电视机，75%的家庭有汽车。在遭受战争创伤的欧洲，进步更加缓慢一些，但在家庭的生活水平和方便舒适上，每一年都有明显的改观。这是第一次，很多人不得不试着实现私人家庭的浪漫梦想，幸福地躲进他们自己的巢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婚姻的变革之风

基于爱情的男性养家式婚姻奠定自己的优势地位前后花去了150年。拆毁它却只用了不到25年。实际上，改变婚姻的很多力量，早在50年代平静的表面之下就开始运转了。5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末所做的调查显示，支持服从社会角色的人大幅下降，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自我满足、亲昵关系、美丽漂亮和情感满足上。更多的人相信，自主权和自愿合作比服从权威更有价值。战后世界日益增长的繁荣，以及人们的价值观——“从谋求生存到自我实现”的转变，使得独身、未婚同居、无子女、离婚和非婚生子女在北美和西欧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1962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已婚妇女对她们的生活非常满意，但同一项调查中，只有10%的女性希望她们的女儿过与她们一样的生活。相反，她们希望自己的女儿推迟结婚，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些情绪并不是对女性主义的有意识认可。但她们希望孩子们比她们自己有更多自我表现的选择。结合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她们鼓励女儿们的一些行为，到头来，这些行为颠覆了50年代的性别角色和婚姻模式。

从伪装过错离婚到无过错离婚

早在1957年，美国及其他几个国家的离婚率就已经开始再度上升，事实上，在50年代结婚的美国夫妇当中，有1/3的夫妇最终劳燕分飞。离婚率的这次加速，在70年代无过错离婚合法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60年代，通过互相同意离婚——“伪装成过错离婚”——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了“例行的法律程序”。70年代和80年代无过错离婚的蔓延，更多的是不断增长的对婚姻不满的一个结果。

过错离婚（过失离婚）是自由婚制早期的一种离婚制度，规定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定理由才能离婚，比如重婚、通奸、遗弃、犯罪判刑等等，离婚是由一方严重过失而引起的，它对婚姻关系的解体起到严格的限制作用。60至70年代，婚姻的本质属性由经济生活发展成精神文化生活，从而改变了婚姻立法，对离婚不予以限制。196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非过失离婚法。1970年，《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305条把“婚姻关系无可挽回的破裂”定为离婚的依据。1969年，英国也公布了《英国离婚改革法》，规定“婚姻关系中的任何一方，可以向法庭请求离婚的唯一原因是婚姻关系无法挽回的破裂”。1970年在意大利，1973年在瑞典，1975年在法国、澳大利亚，1976年在联邦德国，都通过了离婚法或离婚改革法，使离婚立法变化的趋势由列举具体的法定离婚理由向概括允许离婚根据方向发展，由重视当事人一方的过失向重视夫妻感情状况方向发展。

避孕革命带来的婚姻变革

1960年，避孕药丸异炔诺酮在商业上变得可用。冲击瞬间爆发，永远改变了性与繁殖之间的关系。历史上，第一次，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教育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女人，只要她愿意，就可以把性行为跟生孩子分开。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后的5年内，超过600万美国妇女获得了避孕药。1970年，所有成年女性中，60%的人使用过避孕药或者宫内避孕环，或者做了绝育手术。出生率降到了比大萧条时期还要低的程度。

当大量已婚的夫妇不再生孩子时，婚姻本身也被改变。有效的避孕方法不仅使妻子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

作中去，而且还改变了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此外，不断增长的无儿女婚姻的数量也削弱了婚姻与父母身份之间的联系，侵蚀了把婚姻抬高到所有其他关系之上，并把它局限于异性恋夫妇的传统里。

婚姻中的角色平等

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社会运动，与女人的工作角色和生育权利中的根本性变化遥相呼应，在70年代引发了一系列变革。北美和西欧各地的立法者们以飞快的速度废除了所有残存的“首脑与主人”的法律，把婚姻重新定义为两个平等个体的联合，而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专门角色的结合。丈夫再也不能以工作会妨碍妻子履行她操持家务或抚养孩子的责任为理由禁止她参加工作。而妻子如果有能力保有一份工作的话，也不能主张要由丈夫供养的权利。

非婚生子女权益的扩大

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让孩子为他们的父母所犯下的罪错接受惩罚是错误的。但此前，真正采取行动的国家寥寥无几。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北美和西欧出现了一场改革的雪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8至1978年做出了一系列裁决扩大非婚生子女和未婚妈妈的权利。1969年，西德、瑞典以及英国，赋予非婚生子女继承权。1973年，法国给予所有孩子同样的法定权利。1975年，《欧洲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公约》建议所有国家废除对婚内和婚外子女的区别对待。拆除合法子女与非法子女之间的壁垒，是对古老的不公平所做出的一次人道主义回应。但它也剥夺了婚姻千百年来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削弱了它对人们政治的、经济的权利和义务的控制。

20世纪末的婚姻变迁

性别角色、婚姻行为和性价值观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放慢了步伐，在很多领域，这些变化已经接近饱和点。

婚姻权力的弱化

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它对人民生活所行使的权力比从前更小。大多数西方国家，已婚和未婚个人的法律责任和权利之间都存在模糊不清的区分。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及某些西方国家，家庭合伙关系的法律都被政府和雇主采用。这些法律授予未婚配偶和已婚夫妇同样的保险费、继承权及其他法律特权。美国500家最大的公司中，将近一半公司如今把保险抚恤金扩展到了在一起生活的未婚配偶。在法国和加拿大，个人可以与另一个人建立法律认可的互相照顾或资源共享的关系，并得到很多通常是保留给已婚夫妇的法律利益和经济利益。

单身家庭比例增加

1970至1990年，离婚率在西欧开始下降，但是结婚率下降得更快。1950年，欧洲只有10%的家庭是孤家寡人，50年后，单人家庭占到了英国全部家庭的1/3，瑞典家庭的40%。就连希腊，欧洲单人家庭所占比例最低的国家，到20世纪末的时候，单人家庭也差不多占到了总数的20%。

此时，婚姻规范的变革甚而蔓延到了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双职工的数量自90年代中期以来急剧上升。尽管离婚依然是不怎么光彩的事情，但是结婚率也巨幅下降。25～29岁的西班牙女人中，超过一半的女人独身。意大利的结婚率比美国要低得多。日本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分享了世界上20～40岁未婚女性比例最高的殊荣。

未婚同居

未婚同居率却在继续上升。英国人口统计学家凯瑟琳·基尔南指出，在欧洲和北美，一个由四个阶段组成的过程使得同居在地位上几乎等同于结婚：第一阶段，大部分人并没有先



同居再结婚。第二阶段，有更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人暂时同居，但他们通常会朝着结婚的方向走，如果他们当了父母，则几乎总是会结婚。第三阶段，未婚同居成了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婚姻之外的选择。第四阶段，同居和结婚实际上变得没有差别了，无论是法律意义上，还是社会意义上。20世纪末，美国正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



2013 年 7 月 27 日，新人史蒂文・阿舍和艾米丽・马歇尔在英国布里斯托尔经常约会的麦当劳店举行婚礼

但此时的瑞典已经达到第四阶段。

婚姻家庭中的智力等级制度

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越加重要，从事不同工作性质的人对精神文化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这时，智力等级制度已经萌芽，并对财产等级制度进行着蚕食。

同一等级制度的人，工作条件大致相同，所得到的荣誉、地位、享受也大体上相同，因此，对构成生活内容的诸种因素所占比例的认识与理解大体上是一致的，容易成为工作上的助手与生活上的伴侣，形成恋爱、婚姻关系。20 世纪末开始，新加坡在知识界推广同等学历婚姻，使配偶双方既以爱情为基础，又在学识上相称相配，代表着婚姻关系的发展趋势。在智力等级制度逐渐代替财产等级制度之时，婚姻的发展走向是：受智力支配，以爱情为基础，为事业服务，适应于工作的需要。

（资料来源 :《婚姻简史》，[美] 斯蒂芬妮・库茨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人类婚姻史概论》，刘发岑著，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 ;《人类婚姻史》，[芬兰]E.A. 韦斯特马克著）


电影《包法利夫人》（1949 年版）剧照


越痛苦越要爱



电影《呼啸山庄》(1939 年版)剧照

"既然真心的恋人们永远要受到磨折，似乎是一条命运的定律，那么让我们练习着忍耐吧；因为这种磨折，正和忆念、幻梦、叹息、希望和哭泣一样，都是可怜的爱情缺不了的随从者。"——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

文 倪曼德

说到爱情的痛苦，可能不得不谈到的一部小说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现在许多歌颂浪漫爱情的叙事作品不同，这里面没有一对男女的爱情是幸福的，爱情与相引发的嫉妒乃至仇恨成了小说叙事的主要推动力。不过在那个讲究财产与地位的年代，这样写倒是符合一贯的文学传统的——爱情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危险的力量。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青梅竹马亲密无间，但却因为家庭和财产的原因不得不分



开，凯瑟琳嫁给了来自另外一个庄园的青年埃德加，他在社会地位上更合适。这让人想起《少年维特之烦恼》里面的情节设置，激情澎湃的男主人公能够得到女主人公的芳心，却不能令她和他结婚，在许多类似的小说里，总有这么一个理性、文静的，来自另一个庄园的白净情敌。当希思克利夫偶然听到凯瑟琳说，和他结婚似乎有辱家门，勃然大怒愤而出走。后悔的凯瑟琳遍寻不着自己的旧情人，悲痛欲绝。此后她郁郁寡欢，婚姻一点都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在婚姻的结果——分娩中死去。

《呼啸山庄》在中文世界里有许多模仿作品，其中甚至包括不少肥皂剧，某个人物偶然听到一句话然后愤而出走过了几年回来报复这种桥段在今天已经毫不新鲜。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当然怀着典型的痛苦，而另一种痛苦我们也很熟悉，即《包法利夫人》中的那种无聊。福楼拜在这部小说里写了一个心肠不坏且颇有姿色的外省女人爱玛，她整天想着浪漫小说中的桥段，而她的丈夫根本不能满足她这方面的需求。爱玛后来和巴黎来的罗道耳弗子爵发生了一段三年左右的婚外情，在这段恋情终结的时候，子爵给她写了一封矫揉造作的信，还故意在信纸上滴上一滴水冒充眼泪，但这封信却真的给爱玛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尽管福楼拜在处理这个人物的时候体现了高超的讽刺技巧，在这一处却流露出了同情：

“她靠着窗台，拿起信来又念，气得直发冷笑。不过她越用心看信，心越乱。她恍惚又看见他，听他说话，两只胳膊还搂住她。心在胸脯里跳得像大杠子使劲撞城门一样，不但不匀，而且一次紧似一次。她向四周扫了一眼，恨不得陷下去。为什么不死了拉倒？”

她和罗道耳弗子爵的恋情失败使她很不甘心，反而加重了她之前的心理症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中，爱玛在107页后死去。她始终不满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身份，渴望进入上流社会，最后疯狂地借债消费（她不是沉迷物欲，相反她总是在追求精神层面的爱情），不得不服毒自杀。尽管距离小说写作时间已经有100多年，我们现在看凯瑟琳和爱玛，依然很容易理解她们的痛苦。

不过我们作为现代人，很可能不会有她们那样的命运。在今天与婚姻、爱情有关的社会话语里，门第、财产这些都成了政治不正确的词语。人们只需要听从心的召唤，跟着感觉走。即使像凯瑟琳、爱玛这种婚后不幸福的女人，也不会像小说里那样一直沉沦下去，社会有一整套机制来帮助她们：心理医生、仲裁专家、离婚律师……打开电视机甚至都能看到调解夫妻矛盾的节目。如同福柯所说，人们的身体都被纳入国家规训的范围，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那么她们的痛苦也不再是简单的情绪，后现代的社会仔细阅读了这些痛苦，把它们纳入了社会再生产的轨道。即使人们不想要这些机制的帮助，也可以很简单地找到人倾诉，在互联网的时代，埋藏秘密的树洞简直唾手可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凯瑟琳和爱玛一样会伤心失望，但她们绝对不会那么容易得忧郁症和自杀。“疗伤”这个词经常被人提及，它几乎专指在爱情挫折后的恢复心情（一般来说，如果人们在事业上受挫，不会选择这个词），有一整套专门的自我恢复技术来针对爱情的痛苦。因为爱情去自杀、皈依宗教这些都不是我们当今文化中的选项，如果说在过去这么做的人还带着一些骄傲，那么今天这种做法近乎耻辱，这说明一个人已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了。

对于现代人来说，爱情中的痛苦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在找到真正的公主／王子之前，我们吻过太多的青蛙，每一次都很不舒服。寻找伴侣如同西绪福斯推石上山，每次都不是同一块石头，但过程都一样艰辛，即使到得山顶牵到恋人的手，接踵而来的也可能是无聊、嫉妒、自卑甚至压抑。

进入恋爱状态从来都不是终点，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写过一本《有限和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有限游戏的目的在于在一个有限的边界内赢得胜利，而无限游戏却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有限的游戏具有一个确定的开始和结束，拥有特定的赢家，规则的存在就是为



英国诗人、画家威廉·布莱克画作《仲夏夜之梦》(1786)

了保证游戏会结束。

无限的游戏既没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也没有赢家，它的目的在于延续游戏。我们可以把爱情中的追求过程看成一个有限游戏，而真正的恋爱阶段（包括婚姻）是一个无限游戏，能够追求到心爱的人，并不能保证能与他／她相守，因为一旦有限游戏有一方胜利，除非胜利者是一个唐璜式的登徒子，游戏一般都会自动进入无限阶段，不但规则变化了，游戏的目的也变化了，追求者已经不能靠讨对方欢心来博得好感，他必须要维持相处中的快乐状态，并且把自己定位成合作姿态。双方必须合作把这个恋爱游戏玩下去，否则就会两败俱伤，就像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艺术作品《潜能》。这是艺术家和她的恋人乌雷在1980年横贯欧洲的作品。两个人面对面站立着并专心地注视着对方，手里还同时拉着一个紧绷的弓，在乌雷的手里紧拉着一支带毒的箭，正对着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由于弓箭的张力使他们的身体都向后倾斜，他们稍不留神，那支毒箭就会离弦射出，同时，他们心脏急剧加速的跳动声也通过扩音器播放出来。

在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里，喜剧性是通过爱情的前现代性体现出来的。和人们通常认为的不同，这位《罗密欧与朱丽叶》（与《仲》写于同一年）的作者对于纯浪漫爱情持着一种揶揄态度。《仲夏夜之梦》“乱点鸳鸯谱”的故事模式被后人广泛模仿，即一种非自然非社会性的魔药会导致人们盲目地爱上陌生人。在后来歌德的《浮士德》里，浮士德也是喝下了魔女的药汤才爱上了格蕾琴。魔药的存在暗示了一种非理性状态，用我们现在的科学话语来说，也许这种状态是激素和大脑神经运作的结果，但在当时，这意味着人们不需要在精神层面上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一切都会归结到以财产和权势为标准的婚姻上来，在《仲》的结尾秩序恢复，各位情侣都各司其位，仙后当然不会和织工真正相爱，这不符合时代精神。但在现代这件事就是可能的，各种叙事作品都在讲述

跨越门第超越物质的爱情，人们全都在听从潜意识的呼唤，旧秩序的打破当然提供了很多爱情上的可能，但也同时意味着如果爱情失败，那么不是社会、家庭的问题，而是自己出了差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年代，人们常说的话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果一个人在经济上很窘迫，那么多半是他自己的“问题”，或者懒惰，或者道德败坏。同样道理，弗洛伊德主义成了与之相应的心理学说，虽然在严格的心理治疗领域，弗洛伊德主义早已经淡出舞台，但它的心理学简化版却成了最流行的意识形态。既然人们已经不得不对自己的爱情失败负起责任，那么曾经言听计从的潜意识现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罪魁祸首。人们从报纸杂志、心理节目和电视剧中得到的教训是：那当然是因为我自己有问题。问题不在于显而易见的贫富、美丑，而在于性格和欲望，这些谜一样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童年那段早已经记不清的时期。无法确定症结是否真的存在，但这种泛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趋势却使许多人不得不对自己的内心感到怀疑，这种怀疑本身是无法治愈的。

在现代爱情关系中，人们总是呼唤想象力，别开生面的表白或者富有巧思的礼物都会使人开心。人们越过了物质匮乏的年代，觉得送 99 朵玫瑰不再浪漫，反而显得俗气，因为这种到处都可见的礼物除了贵，本身并没有被注入更多意义，它的意义就是表面一层那么多，是消费主义给玫瑰涂上的含义。但想象力同时也是危险的，它是欲望的工具，在付诸实现之前，它始终都是以白日梦的形式存在。一方面，想象力营造了一种事先准备好的现实，真正的情感经历可能是对这种现实的代入；另一方面，这种先验的现实会影响人们对当下现实的判断。麻烦的是，人们很难保证自己的想象不被消费主义的各种观念侵入，欲望从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这个时代鼓励欲望，把身体的各种欲望纳入了社会再生产的循环里，它成了类似能源一样的东西。

和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清教伦理不同，现代社会里如果一个人没有过剩的欲望，如果没有不满足，反而是不正常的。欲望和消费密不可分，因此想象力的风险在于，一个人要有足够的抵抗和反思意识，才能够成为想象力的主人而不是为之所役。《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想象力把她送进危险的境地，批评家们说这是因为她看了太多爱情小说，脑子里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在 17 世纪，印刷术的发展确实导致了知识的大量传播，也解放了很多人的想象力。这些例子不胜枚举，在奥斯丁的《诺桑觉寺》里，凯瑟琳的想象力也来自哥特小说，以至于在认识真实世界的时候出现了偏差，多荒诞的话也会相信；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里，塔季扬娜是个“精神世界相当狭隘”的乡村姑娘，充满对文化的幻想，极其渴望奥涅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注入自己的爱情。想象力既是私人的，也是社会的，是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的想象力不加辨别地受到外界的过多影响，那么就会如同鲍德里亚所说，他本该有的、自发的想象力被掏空，真实世界反而成为模仿，虚构成为比生活更加有趣的真实。爱玛如果活在现在，在想象的模式上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倒反而在社会意义上变得合理，除了浪漫小说，还有更多电视剧和电影，同时互联网加速了这一切。她也不需要借高利贷，因为有信用卡。人们常常把爱玛和堂吉诃德相提并论，但不同的是，堂吉诃德并未因为想象力放弃任何责任，而爱玛却背弃了自己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她是比堂吉诃德更加严重的病人。

现代人意识到想象力的危险性，想要躲避它。美剧《欲望都市》一集里，女主人公凯莉轻描淡写地说：“如果有男人和我说，他要和我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我就要尖叫了……这么说的意思是，如果有男人对你有什么浪漫的幻想，那么不久当你们熟悉了，你就会变得真实，你也不会再是他幻想的来源，那就没意思了。浪漫的人都很可怕，离他们远点儿。”剧中的四位女主人公都年过三十，显然这代表着许多在爱情上“有经验”的人的一种类似自省的态度：对爱情不要期望太多。这是她们和爱玛•包法利最大的区别。现代个体在关于爱情的经验上（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经验）远远超过他们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前辈，分手、欺骗远不是什么致人于死地的痛苦经历，现代人更有怀疑精神也更享乐主义，这帮助他们在应对爱情的痛苦的时候更有力量，他们的想象力也更加面向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创伤记忆。然而这种力量也使人们更有可能敞开心怀去迎接新的恋爱经验，其中也包括新的怀疑和绝望。总的来说，现代人处于彷徨的境地，更有想象力、更敏感，也更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但防卫意识和爱情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处于反比关系，因此如何去面对爱情，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

每一对情侣也就是一个小共同体，他们之间的互动是社会关系的反应，但也是这两个人之间的创造性活动。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个游戏永远推进下去，每一个决定都将重新定义这个共同体的性质。在此过程中，想象力依旧是最好的工具。譬如浪漫，不应该在对方身上寻求，它应该是双方互相作用、自然产生的结果。避开意识形态的陷阱，想象最独特的自己和对方，只有这样，爱情才不愧为当代最有魅力的文化理想，为它遭受的痛苦也才值得。



在河边约会的美国年轻夫妇
（摄于上世纪 30 年代）



纯粹浪漫批判



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2013年版）剧照

"只有在文化的语境中，爱情才能获得立体的内容和前景，因为它需要在意识中，而非床铺上占据更大的位置。"——布罗茨基《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文 ✎ 霍夫曼



“爱情”和“浪漫”这些概念好像人人都懂，尤其是后者。伴随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情人节来势汹汹并迅速本土化，书本、电视和网络里的爱情故事到处都是，眼下连不少十几岁的中学生都在为这个节欢欣鼓舞了。我们的情人节比西方还多一个，除了要过 2 月 14 日的情人节，农历的七夕也参与到这个狂欢里来。

很多时候，你一不小心表露一个观点就会得罪一群人，而谈浪漫不会。它一直是一种效果出众的舒缓剂和最大公约数，去翻翻微博上各种营销账号，浪漫一定是他们每天贩卖的心灵鸡汤。这似乎说明，“浪漫爱情”这个概念已经司空见惯，成为如数学公理般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东西，但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这个概念，就会发现在它的光环周围，有很多隐藏的切面。首先，“浪漫爱情”这种话语是历史性的，村上春树写过一篇名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民间爱情传说》的散文，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所谓 1960 年代的时代里，的确有某些特别的事物。”他也顺便谈到了性话语的历史性（这个福柯在《性史》里谈得更详细）：“（当时）所谓的处女，和现在比较起来，具有更深刻的意义。”这篇文章还有个副标题叫：“高度资本主义前史”。20 世纪 60 年代，村上春树故乡的发达程度远远不及如今的日本，他这个刻意加上的副标题正好也说明了“浪漫之爱”的社会性，即它是和社会发展形态与经济紧密相连的。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与我们今天所谈的“浪漫爱情”既是一脉相承的（否则这些故事不会依然在流传，而会被像唐璜或者卡萨诺瓦的情史一样压抑在社会主流话语之外），又是不一样的。“浪漫”这个词来自英语 romantic（法语 romantique，德语 romantisch），是个舶来概念，在不同的语言里它还有不同的意思，在德语里这个词还指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思潮，它反思启蒙主义的独裁和追求，推崇神秘体验，以赛亚·柏林在《浪漫主义的起源》里有很详尽的解释。romantic 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被翻译成“罗曼蒂克”，（刘海粟谈见陆小曼：“当时我们都还是翩翩少年，脑子里罗曼蒂克的念头很多。”）它随着现代白话文的发展才发展成如今的模样，从一个外来词到一套话语体系，前后不过 100 多年。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探讨“浪漫爱情”，就必须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把它放到社会整体的文化话语环境里来看待。对于许多人来说，如今生活节奏变快，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传统的人际关系受到新环境的挑战，金钱的威力一览无遗，同时自然环境还在以加速度恶化，这一切都显示出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也容易让人们对自我的位置没有信心。唯有浪漫爱情成了永久保留的伊甸园，在技术、商品化的世界里划出了一块保留着纯真和温暖的飞地。而对于有些学者和女权主义者来说，“浪漫爱情”又成了囚禁女性思想的一种手段，是分配给她们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角色，让她们顺从地扮演从而躲开现实。而从更大的视角也就是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看，浪漫爱情是指一种几乎全民参与的集体的、公开的文化活动，其过程激发人们的感情，是一种主观的生理与心理过程。“浪漫爱情”同时也是一套神话体系，有自己的规矩，对它的遵循则以仪式的方式进行。

那么，究竟什么是“浪漫爱情”呢？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它不是一块没有时间、也没有大环境的飞地，任何一种概念的发生和运作都是在文化框架内

的，爱情也如此，从性冲动到一夫一妻制的建立乃至现代浪漫爱情观的流行，文化至少扮演了三个角色：

第一，它必须给予生理冲动（不仅仅是性冲动）一个名称并注入意义，例如在传统的意义上讲，爱情可能是“两个人互相认定，他们是注定要和对方在一起的”，或者是“激情的，一见钟情的”，在此基础上导致的生殖行为可能是“神圣”的，也可能是“原罪的”，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话语。即使以貌似中立的“科学的”话语系统去评判它，认为它是某种荷尔蒙分泌的紊乱现象，也依然是某种文化认定——谁来判断紊乱应该在什么年龄和什么时候回复到正常水平呢？比如老年人能不能有爱情？如何评判爱情中类似于嫉妒的情感？光靠科学自身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在文化框架内，人们也可以通过主动控制自己的情感来获得许多不一样的感受，在社会规则的禁区内游走。比如《廊桥遗梦》的故事就是这样产生的，发乎情而止于礼，观众们都对这种爱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感觉津津乐道。

第二，文化还对这种贴完标签的生理冲动打分，排出等级座次。例如，何种形式的爱情算是真爱？具体之物如何与爱情发生比附关系？中国古代女子送人一束头发，是至高至诚的示爱方式，如今不但没人送，就算有人送，收到的人也莫名其妙。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各种材料和金属：纸婚、棉婚、木婚、银婚、金婚乃至钻石婚。钻石成为最高的爱情象征，虽说爱情无价，但象征爱情的石头却是最贵的宝石。这很耐人寻味，钻石和爱情的比附是 20 世纪的事，各种宝石商人忙着给钻石附加意义，似乎离开爱情钻石就不那么值钱了——我们国家当然也早就接受了“钻石恒久远”这一套说辞，但过去也不是没有钻石，清朝的时候钻石只是一种劳动工具，宝石象征的是权力与财富而不是爱情，亲王和一品大员帽子上镶嵌的是红宝石而不是钻石。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巴尔扎克

第三，文化最终决定了爱情的发生形式。考虑到资本全球化的威力，今天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人们从相识到吸引，然后在交往和约会过程中产生“浪漫”的感觉，这些过程中都灌注有后现代的享乐主义色素。人们约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解对方是不是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另一方面又在寻找乐趣，并且前一方面的因素看起来有弱化趋势，是不是有乐趣成为更重要的事情。而这两者之间并不总是吻合。乐趣是一种体验，许多体验是必须通过购买甚至是冲动消费获得的，如送花、烛光晚餐、听演唱会、看浪漫爱情片或者去海滨旅游，而人们在婚姻上寻求和侧重的则是另一些东西，比如诚实、包容、节省、吃苦耐劳等品质。婚姻侧重的这些品质有利于保障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稳定性。弗洛姆（德裔美国心理学家，著有《爱的艺术》）说，现代的爱情伴侣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工作小组，共同接受现代经济形式带来的价值观



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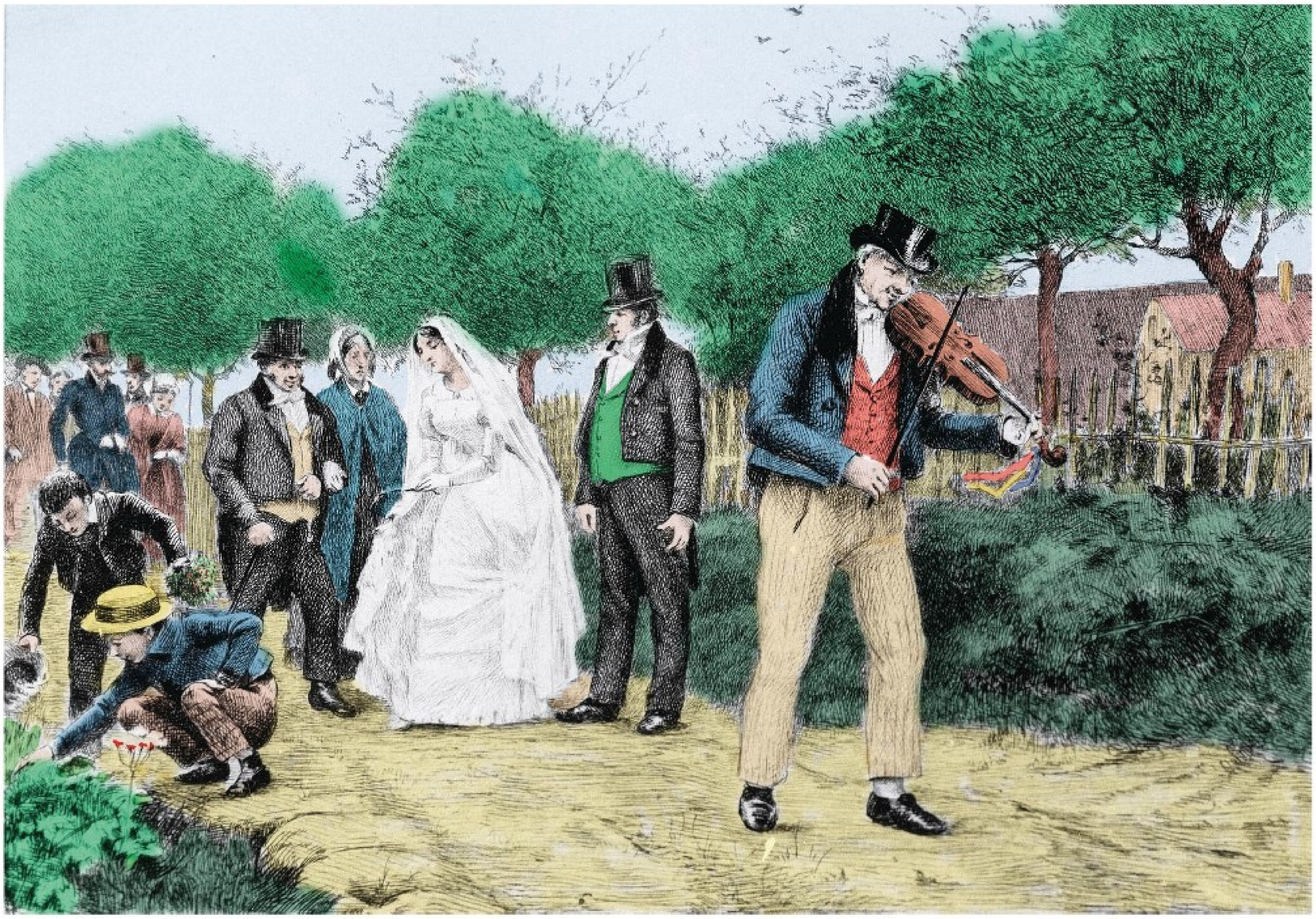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

和思考方式。很多人并不觉得这里面有错位，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花钱去旅游的情侣看到当地的老年夫妇，羡慕地心想："我们老了也能像他们一样就好了。"

利用各种文化形式，人们也生产出大量和爱情有关的歌曲、故事和电影，这是文化工业最大的一片矿床。浪漫之爱被推上机床进行标准化生产，成为不同人之间可以交流和交换的感受。新婚夫妇们像完成任务一样去拍婚纱照，听着摄影师的命令在布景板前摆一个又一个他理解中的和"浪漫"有关的姿势。这是完全流水线式的，一对夫妇和另一对之间在操作程序上没有任何区别。而对于未婚情侣来说，每到情人节前后，瞄准他们钱包的礼品和爱情电影就铺天盖地，这必须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交流的"浪漫"。在这种商品化的浪漫爱情话语中，所有与性有关的元素都被故意隐藏，似乎爱情与性被完全割裂开了。性被规定为是不宜在公开市场上出现的、影响购买欲的，所以在可以流通的爱情中，大家虽然也认可它是爱情的一部分，但它的地位必须要在诸如"认识自我"、"自我实现"、"开心就好"、"心心相印"等价值之下。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无法阻止。正是在约会与家庭、性与爱的沉默的差异中，生产出了意义：这些秘密的缺口，如何塑造了爱情的形式，以及为何是现在这种结果，而不是另一种。

历史和起源

我们今天看浪漫爱情，觉得它是一种温顺的、抚慰人心的东西，整个社会都在提倡它，而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包括工业革命和现代化以前的欧美国家）中，浪漫爱情的面孔与此迥然相异，它可能承载着一种具有暗中颠覆性的力量。它威胁着传统的权力和道德秩序，甚至威胁到种族繁衍。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观察了亚马孙河流域土著民族的生活细节，写出《忧郁的热带》一书。他提到：即使在所谓的对性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野蛮人"中，爱情也并不那么随意。爱情和现在社会里一样，都是规范化后的结果。人们可以交换



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内页插图

女伴，但这个过程也受到部族权力的监控，严禁人们和自己的血亲相爱甚至发生性行为。这不是孤例，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野蛮人的性生活》的观察对象是西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人，他们婚前性行为很随便，单身男女有类似群婚的公房，即使这样，近亲之间也绝没有相爱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我们都很熟悉“门当户对”这一说，这使得浪漫爱情主要是在颠覆财产与社会等级制的权力，《梁山伯与祝英台》里两个青年男女因为家庭地位差异不得不殉情，罗密欧与朱丽叶双双服毒——当然这些故事有负能量版本：西汉人朱买臣的妻子嫌他太穷离开了他，后来他做了大官又腆着脸来重修旧好，朱买臣把水泼在地上羞辱前妻，这便是“覆水难收”的典故。爱情和地位、财产不是锦上添花的事，而是互相对立。到了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的时代，人们开始渐渐意识到跨越阶级和财产的爱不是不可能的事，《简·爱》写于1847年，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不久，当时这算是一本勇敢的书，让一个贫穷的孤儿、家庭女教师说出这么一番宏论:“你以为我穷，低微，不漂亮，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可现在看，这书还是写得畏首畏尾，首先作家把罗切斯特的发妻写成了阁楼上不会说话的疯女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说，这疯女人是男权在生理和语言上双重迫害的结果），又让疯女人放一把火把贵族毁容了，这样这对恋人才能跨过阶级障碍和内疚感，成功结合。这两个情节设置类似此地无银三百两，反倒强调了如果没有这些巧合因素，简·爱最终摆脱不了女家庭教师的身份。

我们看巴尔扎克（1799～1850）的小说，也可以了解当时的很多情况（马克思：“《人间喜剧》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对他的人物来说，嫁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的法国旧贵族还颇有势力，但新贵也已经崛起，《高老头》里，面

粉商人高老头有两个女儿，他省吃俭用给了她们每人80万法郎的陪嫁，让大女儿嫁给了伯爵，小女儿嫁给了银行家。这很显然是小商人想通过婚姻这一手段迅速跻身上流社会。小说里还有个外省青年拉斯蒂涅，他觉得靠诚实劳动出人头地太难，因此也想靠自己的破落贵族身份“去征服几个可以做他的后台的妇女”。从这两个例子基本都能看出，“浪漫爱情”的形态在那个时候还远远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至少远远没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表达了一种向往，但这种向往远没有变成现实，并且莎士比亚也在程序里预留了彩蛋：罗密欧在迷上朱丽叶之前，还迷恋过一个叫罗瑟琳的女孩，但后者对他并没有什么积极回应。他向劳伦斯神父坦白心迹的时候，颇有人生阅历的神父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心思。神父说：“难道你所深爱着的罗瑟琳，就这样一下子被你抛弃了吗？这样看来年轻人的爱情都是见异思迁，不是发于真心的……太阳还没有扫清你吐向苍穹的怨气，我这龙钟的耳朵里还留着你往日的呻吟……罗瑟琳知道你对她的爱情完全抄着人云亦云的老调。”

真正的世界范围内的“浪漫爱情”的发源时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里，这个时间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全面深化和资本主义向纵深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极大地改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它的流行也使得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再次动摇。现代社会学的鼻祖、法国人涂尔干（1858～1917）认为，在这一时期，历来被强调的对上帝和圣母带有宗教体验、神秘的“神圣之爱”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宗教大规模世俗化的背景里，神圣之爱走出了教堂和圣龛，转移到了别的文化领域。这导致了20世纪最大的情感变局：浪漫之爱被新一轮的世俗化浪潮所裹挟，宗教话语转换进私人情感，浪漫之爱被建构成为来自日常又超越日常的乌托邦。

约会和享乐主义

20世纪初，美国曾经爆发过一场关于爱情的大讨论，起因是当时的离婚率达到了历史新高，人们急切需要重新认识何为“爱情”。包括不少大众媒体在内的一方声音认为，是“浪漫爱情”的观念导致了女人变得不切实际并且沉湎享乐，对婚姻怀有越来越多的幻想，使男人在财力上无力满足她们，最后双方矛盾激化不得不离婚。不得不说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男权色彩，考虑到当时的女性对于经济独立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像工人运动要求更多的工资和假期一样，女性也有理由在情感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当时的“专家”们——心理学家、律师和社会学家们纷纷献策，提出了很多两性新关系的可能性：作为朋友、作为政治同志、作为生意伙伴……甚至有人提出应该把爱情看成类似塑像那样的一个艺术品，而伴侣是和你一起完成这个艺术品的人。这些“专家”们的言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希望把不稳定的、流动中的爱情关系定格到一个全新的但却丧失激情和期待的位置，似乎这样就能使人们满足现状不再离婚。作为对这种声音的反驳，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话语，持新思想的人认为爱情和婚姻都应该建立在“快乐原则”上，唯有带来快乐的爱情才是美好的甚至在上帝面前“合法”的爱情，即使人们出于财产的原因结婚，最终无处可逃的无聊也会杀死婚姻。我们看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露丝和她的资本家未婚夫几乎无话可说，剧本作者必须这样安排，因为杰克才是那个快乐原则的化身。这也是文化工业更确切地说娱乐业的标准话语，这种话语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渐渐占据上风，既然“门当户对”的爱情后来会导致高离婚率，那么何不一开始就秉承享乐主义的原则？快感成了资本主义机器不断再生产的重要驱动力，规律的、呈循环状的快感制造行为应当成为爱情与婚姻内部的节拍器。很多公司不鼓励内部员工恋爱和结婚，是因为工作中秉承的清教伦理不能容许私人亲密空间的存在，但在下班后和假日的业余时间，所有与文化工业有关的公司都欢迎情侣成双成对地来消费，对快感的渴望会促使他们付钱。当然最终占了统治地位的还是清教思想，但它是一种与享乐主义联姻后诞生的奇怪的变种。这种清教享乐主义要求人们努力地娱乐（看电影、购物、出国旅游），这样才能维持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



上世纪 40 年代电影院里的亲密情侣

爱情的活力。

享乐主义的流行伴随着“约会”（rendezvous）作为爱情新手段的兴起。这种模式我们如今感到司空见惯，并且知道它是在某个框架之内进行的：一对男女先通过某种契机相识，然后在约会中互相了解试探对方，最后或者分手或者结婚。约会的进程和体验直接影响到爱情的结果。如果一方认为“没有感觉”，那么这一段恋情很可能就要告终。而决定体验的是什么呢？是双方的长相，还是约会时的地点或者谈话内容？我们看到在巴尔扎克和勃朗特的小说里，青年男女基本上没有约会行为，爱娃•包法利也没有约会，她和查理几乎能算是闪婚。她在婚后觉得闷闷不乐，因为在永镇这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刺激的娱乐。她盼望和罗道尔夫子爵约会，地点当然最好在巴黎，因为巴黎除了教堂，还有很多可去的地方。《包法利夫人》写于1857年，福楼拜先知般洞察了青年男女对于娱乐的渴望。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约会已经在大城市普遍开花。历史学家认为，约会的兴起首先要归结于19世纪末性观念的改变、大众消费市场的形成，以及一系列娱乐技术的兴起。以前的恋人（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见面方式主要是在家里，形式除了互相说话背诵情诗之外也没有什么新鲜，曾经在农村以及小城镇，野餐和周日的教会活动是空闲时间的主要活动，具有很强的集体性，在城市里则以封闭圈子的茶会、舞会居多，阶级性很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学者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夫妇注意到，在美国城市里呈现出一种明显趋势，即青年人更多地一一约会，而不是参与集体活动。在当时的大学生中，业余时间的主要娱乐是看电影、开车兜风或者参加舞会。考虑到美国许多大学都地处城郊，由此可见城市周边地区的娱乐受到市中心环境很大的影响，最终趋同。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业余时间”的要求也在这个时期达到顶峰，许多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两个：提高薪水和增加假日。当这些要求都一一实现，那么“休闲”这个概念也逐渐兴起，也就催生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商业，它们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服务业和文化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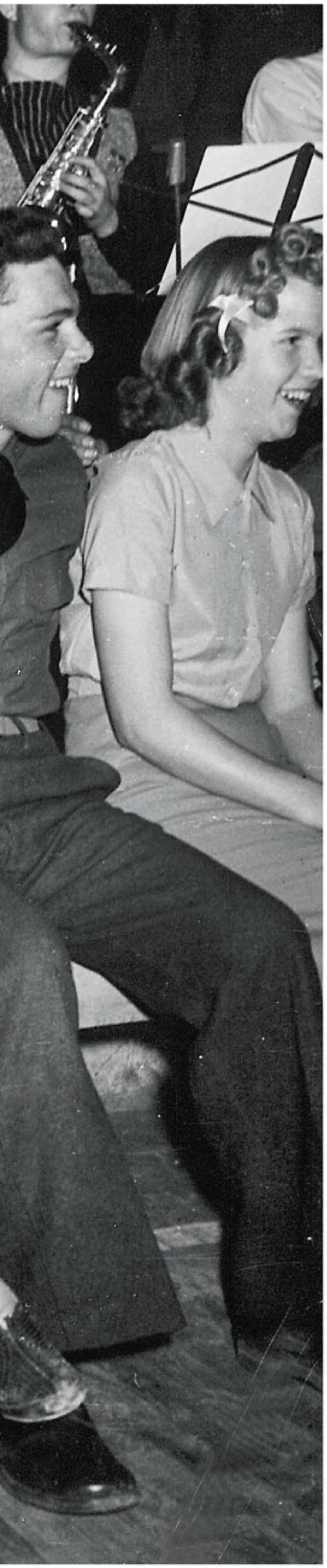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认为，美国社会最大的文化矛盾就是在白天的工作中倡导清教徒般的勤劳，而在下班后和假日又呼唤人们追随享乐主义。另一位美国学者V.W. 布鲁克斯在《美国的成年》里说得更讽刺：“清教徒的酒泼翻以后，酒香变成了超验主义，酒汁本身则变成了商业主义。”人们的爱情顺势被商业化的享乐主义裹挟，成了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工业的最重要的领域。一方面大众文化工业为约会提供了许多便利，另一方面“爱情”又成为文化工业的绝对母题，有一些新技术诱导人们在约会过程中消费。1930年的一本美国杂志上，一个作者这样回忆他的恋爱经历：“我和艾德娜已经在一起4个月了，我们去高档餐馆、买很贵的戏院票、吃巧克力、打车去康尼岛（纽约著名的休闲娱乐区）去看场新电影。”另一个作者抱怨谈恋爱实在太贵了，他过去的一年每周平均要花20美元，一年就是1000美元。而按照金价换算，1930年的1美元相当于如今约48美元。不管是在富人还是穷人之间，渐渐有了不成文的惯例，即男方有义务承担约会期间的绝大部分费用（许多娱乐场所对女性是免费的，这进一步说明了男性在金钱上的义务），而女方则应该在自己掌握尺度的前提下给予男方一些微妙的性利益，如亲吻、拥抱，当然也可能包括过夜。连高中生都迅速意识到钱在恋爱中的价值，当时也有以他们为客户群推出的类似《约会指南》这样的书，把约会的费用分得清清楚楚：男方负责交通、吃饭和一切娱乐费用，女方则需打扮得漂亮，处处给男方留面子。这不意味着女性可以不花钱，化妆品、香水、衣服、配饰都是相关的费用。

同时城市里也出现大量爱情主题的招贴画，出版物里的图片里充斥着各种情侣。这些图片“教会”也限制了人们对爱情的想象，导致人们对于“浪漫”的定义越来越刻板化和形象化。直到今天，在某个被认为是“浪漫”的地方（维也纳、巴黎），一对男女总要在照片和视频里做点什么（例如抚摸、亲吻），可真去了这些城市，在大街上这么做的人却很少。一个隐含的等级制度被建立起来，午夜之吻比下午的吻浪漫，在异国（尤其是在欧洲名城或者海滨度假胜地）要比在国内浪漫，送礼物要比不送浪漫，去餐馆吃饭比在家做饭浪漫……这种刻板等级制度带来的是想象力的匮乏，人们渴望从一些专业人士包装好的想象力罐头里去发掘自身应有的体验，再加上一系列技术革新，爱情电影的流行就成了不可阻挡的事。丹尼尔•贝尔说：“电影作为世界的窗口，首先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林德夫妇10年后对小镇米德尔顿进行了一个历时性的观察，这里的居民曾世代相传，认为性是一件可怕的事，有关性的行为总是被尽可能地排斥在视觉和注意力之外。而在电影里却是例外，年轻人因而都喜欢聚集在银幕之前。“青少年不仅喜欢电影，还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学校。

这些图片“教会”也限制了人们对爱情的想象，导致人们对于“浪漫”的定义越来越刻板化和形象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生的主要娱乐活动是看电影、开车兜风或者参加舞会





1938 年 2 月 14 日，一名男士在情人节这一天购买心形玫瑰

他们模仿电影明星，讲电影上的笑话，摆演员的姿势，学习两性之间的微妙举止，养成了虚饰的老练。”

不过电影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了今天的地位。因为美国的电影工业最发达，因此这里仍以美国为例。起步阶段的电影业远没有如今发达，因为价钱便宜，去看电影的都是下班的工人和其他穷人如新移民。这部分人的性道德要比上层阶级宽松一些，这直接导致影院的调情行为增多。对于这些人来说，电影院主要意味着私人性和亲密，是消费不起其他公众场所如剧院和游乐园的下层阶级最好的去处。而对于中产阶级和更富有的人来说，电影院则名声不好，意味着潜在的伦理上的污点（在欧洲一些国家情况则更极端，甚至在“二战”后几年里，电影都是“下等人”的娱乐）。但当电影技术迅速发展，默片有了对话（1923 年，第一部同步有声电影在纽约公映），黑白片变成彩色（1935 年出现第一部彩色电影，4 年后好莱坞就拍出了至今被许多人奉为经典的《飘》——又是一部爱情片），银幕也变得比以前更亮，使得暧昧行为不得不因此减少，再加上制片商和电影院老板在宣传和促销上做了大量工夫，拍摄时也照顾到中产阶级的趣味并塑造出一系列有人格魅力的明星，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进影院。中产阶级的加入也使得电影院的默认行为规范也逐渐向剧院靠拢，大声说话和走动以及迟到进场都被公认是失礼行为。到了 1935 年，电影工业真正在票房、技术和艺术水平上达到了大繁荣，其中当然主要是“浪漫爱情”的功劳——95% 的电影和爱情有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有人讽刺好莱坞情节剧，说不管什么题材，灾难片、悬疑片、科幻片甚至是战争片，最后的结局都是一对男女在一起。这同时也意味着，“浪漫爱情”的观念

已经开始跨越阶级，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梦想。这种不同社会阶层对于同一种文化的趋同是20世纪30年代的普遍现象，这也反映了消费主义主导下的文化工业的威力：它把不同阶层的人拉到一个梦想下，用中产阶级貌似正确的道德观来修正下层阶级的粗野，同时又保留了催眠机制带来的快感，找到了所有人都喜欢的最大公约数，这种文化上的“妥协”使得批量生产文化产品成为一种新的有利可图的生意，同时把娱乐的价格拉了下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说，资产阶级的爱情用情感掩盖了阶级性，最终变成了风俗而不是真正的爱情。而只有工人阶级，对于物质没有什么奢求，同时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才能发展出真正的爱情。也许他看到美国30年代的情况之后，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而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也在寻求更高的文化层次，这个过程在“二战”前后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1963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约会指南大全》(*Complete guide to dating*)里极为详细地、从方法而不是从原则上叙述了约会中需要注意的种种要点，其中包括高级餐馆法文菜单的英文翻译以及“在听音乐会的时候，最好不要第一个鼓掌”这种建议。这反映出中产阶级对于外在形象的需求，他们不想被认为是只有钱却缺乏品位的人。在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看来，这种需求实际上是一种在文化上跨越阶级的努力。他发明了区别于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这个词，即“知识的类型、技能、教育、任何一种个人可以让他自己在社会上获得较高地位的优势”。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贵族阶级曾经掌握了很强势的文化资本，于是他们制定了一系列壁垒来防止资产阶级进入，并嘲笑他们是土财主。等到贵族基本消亡，壁垒就横亘在了旧富人与新富人之间，最终新旧富人之间的鸿沟渐渐淡化，就形成了文化的趋同：在情感问题上，“浪漫爱情”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

餐馆和舞厅是快感发生的地方，而将人们带向快感的则是汽车，私家车和出租车更代表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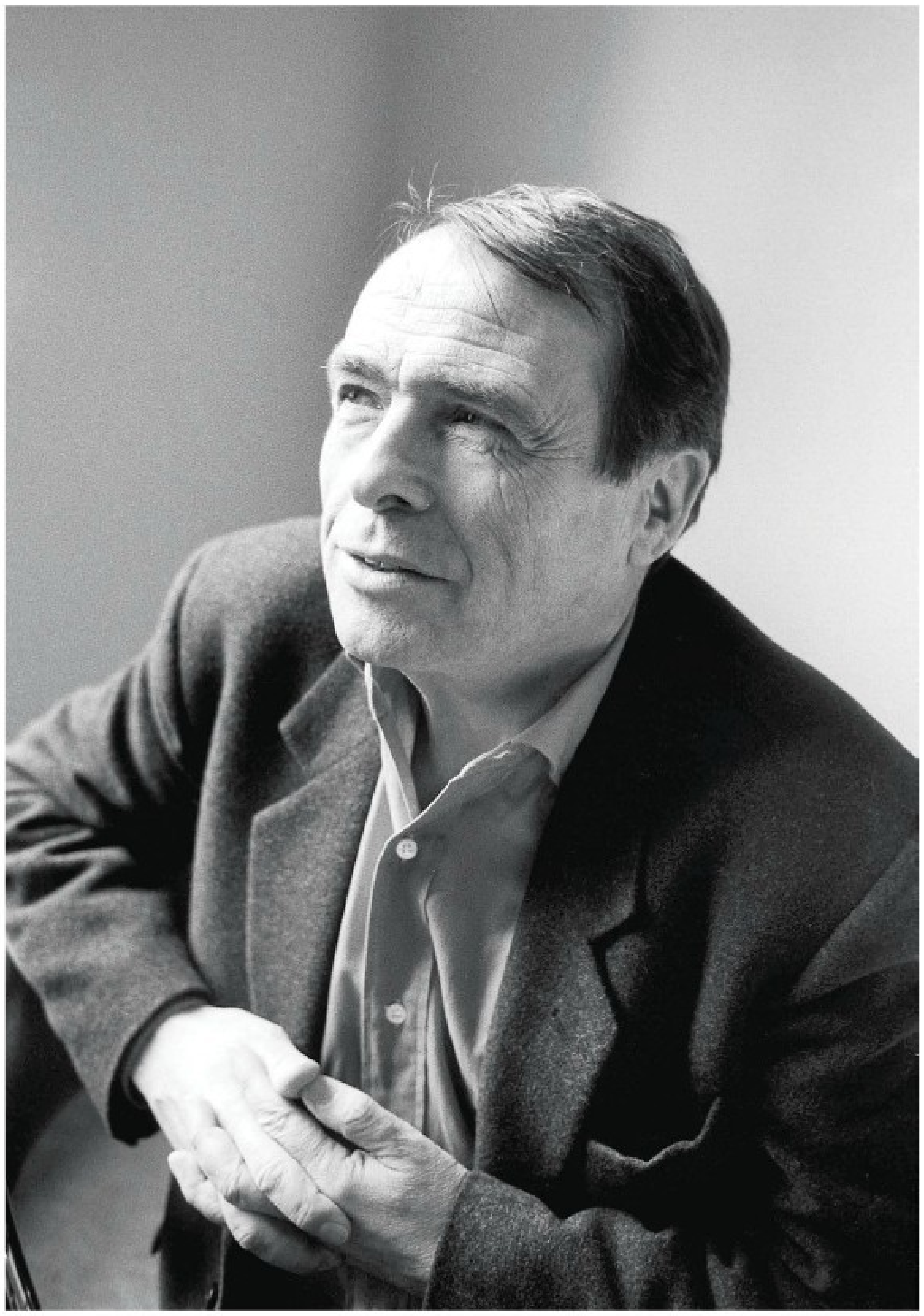
汽车和广告

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前，许多欧美人都觉得自己的财富在增长，买得起越来越多的东西。研究美国20年代历史的学者查尔斯·麦高文说，在餐馆吃饭曾经是很少数人的特权，到了2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社会的大部分人都可以负担了，1900～1930年美国餐馆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并出现了很多更加高档的餐馆，这和基于“浪漫爱情”的消费也很有关系。另一个兴起的场所是舞厅。1910年，美国有500多个舞厅和上百个舞蹈学校，1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几倍。这些学校专门传授年轻人各种舞步，学生们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想借此增加他们结识异性的概率。电影《泰坦尼克号》里，平民杰克就是靠一种新颖的舞蹈赢得了贵族露丝的好感。餐馆和舞厅是快感发生的地方，而将人们带向快感的则是汽车（另一种等级制度：坐公共汽车和地铁没有私家车和出租车浪漫）。福特公司的T型车在1908年问世，到了1914年，经过优化的流水线已经可以在93分钟内生产一部汽车，在这一年里他的第1000万辆汽车问世，此时全世界90%的汽车都是福特公司生产的。T型车大大拉低了汽车的价格，在这一车型流行起来之前，拥有汽车的大部分都是上层阶级，“一战”结束的时候（1918年）美国有800万辆车，到1930年这个数字翻了三番。《了不起的盖茨比》写的是纽约20年代时候的事，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在当时的恋爱生活里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盖茨比、汤姆和黛西不断地在长岛和纽约城之间往返，没有汽车断不可能，盖茨比和汤姆在路上飙车充满火药味，汽车成为男子气概的象征，他们这是在打一场情敌之间的战争。最后浪漫故事也以一场车祸告终。

汽车是公共的，也是封闭和私人的。对于情侣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新技术，它的流行也使得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解放思想有了用武之地。这是在工厂里拧螺丝的工人所没有想到的，他们想的只是给沙发装一个顶篷，而这个顶篷本来只是为了保证乘客和司机在下雨天也能出门。汽车成了亲密又刺激的新玩具，它改变了餐馆、剧院和舞会之间的空间关系，也强行重写了男女的距离，在狭小的空间里，他们不得不紧挨着彼此坐在一起。《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黛西的女伴贝克是在汤姆的车里第一次把身体靠近尼克的，汤姆和威尔逊太太的奸情也是以把她带进一辆出租车开始的。1915年的一首美国流行歌曲这样唱道：

和心爱的女孩一起开车
悠闲地骑着微风的翅膀
像天上的飞鸟
又吻又捏，随你所愿

类似这样的陈词滥调都在暗示，汽车会导向一个充满快乐的场所（舞会、电影院），即便通往快乐的旅途也必须充满快乐。虽然在一些守旧的历史学者看来，汽车不过是配装了内燃机的旧马车，但时代已经大不一样，娱乐场所近在咫尺，何况速度本身就已经能够带来快感。汽车的另一个引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尔迪厄

人注目的功能是，它缩短了娱乐场所之间的距离，更缩短了城乡距离，农村的娱乐方式迅速向城市趋同，也使得城市居民有可能驾车出去旅游。

在30年代初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大规模的公路建设和汽车旅馆的开业曾使该州的旅游业迎来了大幅增长。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除了汽车，人们还可以借助火车和飞机，去他们的父辈想也不敢想的地方旅游。

旅游也是构建浪漫爱情想象的一个重要方式。如今我们看到这样的广告大概都会麻木得没感觉了，因为实在看得太多了：一对情侣坐在露天咖啡座相视而笑（或者在大街上拥抱），背景里就是虚化的埃菲尔铁塔。说是虚化，但这个巨大的背景无疑才是主角，人们才不在乎那对情侣是谁呢。罗兰·巴特说，埃菲尔铁塔已经成了除巴黎市民之外全世界通用的“旅行”的同义词。还得补充一句，世界的大部分地方的年轻人都对法国尤其是巴黎都抱有一种“浪漫的蜜月旅行”的幻想。旅行当然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对类似埃菲尔铁塔这种异国象征的向往是和站在一天八小时的办公室工作的反面，没有人不喜欢。蜜月旅行的最佳去处是巴黎这样的文化异国，也可以是普吉岛、马尔代夫这样的风景秀丽的海岛。人们在报纸杂志、电视剧和电影中到处可以看见旅游胜地，以至于哪怕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也像麦兜一样会念“椰林树影，水清沙白”的词。文化工业的爱情产品喜欢用这些旅游胜地当注脚——想想韩剧《哈佛爱情故事》、《巴黎恋人》、《巴厘岛的故事》，以及分别拿维也纳、巴黎和伯罗奔尼撒南部的小岛为背景的电影《日出之前》三部曲。连伍迪·艾伦也不能免俗，拍了一部《爱在罗马》。虽然情侣和目的地可能隔着好几千公里，语言也不通，但不用担心，这些地方有一套完善的旅游机制，即使是只会几个单词的泰国船工，也知道把船划到一个地方然后停下来指着一块石头对你说：“photo！ photo！”

这是旅游业尤其是蜜月旅行的痼疾之一，即以流水线方式工作的旅行社把这件本来复杂的事简化为几个重要象征，即以蒙娜丽莎代替卢浮宫，以埃菲尔铁塔代替巴黎，以白柱子代替希腊，以金字塔代替埃及。大多数游客习惯于服从，在有限的时间里，人们更乐于拜访他们已经知道的地方。人们的旅游不再是探索未知，而变成了印证他们在旅游杂志和电视节目看到的印象的过程，这几个重要象征与浪漫爱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陈腐的气息也会感染爱情，使它在“浪漫”的同时变得极其缺乏想象力和单调。蜜月旅行成了受洗，只要在巴黎或者伦敦的空气里浸过一下，这份爱就有了一个“浪漫”的授权，就像食品包装上的QS标志。

除了充满异国情调的文化名城，另一个被宣扬的情侣好去处是自然风光。与爱情有关的旅游想象里，森林、草地和海滨是常常出现的元素。人们从小阅读的童话和神话故事构建了对自然的美好想象，潜意识里倾向于把



20 世纪初，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小姐在为自己的家乡拍摄宣传广告



这些环境认定为浪漫爱情的背景，而这些地点也成了高度象征化的符号，它们的功能是把人们身上的社会性角色最小化，同时清除性别政治的角色分配，从而创造出一种感觉，即在此时人们才最真诚地面对了自己，摆脱了城市环境、工作压力和对金钱的渴望，在世界的中心只有乌托邦般的浪漫爱情。然而问题在于，森林、草地和海滨并不是自然的全部，即使是，游客的自然也不是伐木工、农民或者渔民的自然。旅游业制造出的对这些自然环境的想象，类似于人们在 19 世纪的油画里看到的自然，是打包的、标准化的、装在胶囊里的自然风光。这种想象背后隐含了一种粗暴的二分法，即自然和现代文明是界限分明的、对立的，现代文明积重难返，唯有自然才能把人从中解脱出来。这种二分法确实可以在 19 世纪找到根源，大规模的工业化对自然面貌的剧烈改变曾激起很多人的反感，这种内疚一直在折磨着现代人。只不过当时的浪漫主义文学真诚地抗议启蒙思想和理性的专制，如今的浪漫主义旅游只是在享受现代化加工过的自然并同时诅咒现代化（想象一下没有汽车的森林，没有酒店的海滨）。人们在自然－城市的二元对立中的位置很微妙，无论是在哪里，没有地方是真正令人满意的栖居之地，城市人很难在农村长住，如果缺乏必要的卫生设施，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被很多人奉为隐士楷模的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只住了两年，且几乎每周都要进城。他和政治的关系也很密切，因为反对美国侵略墨西哥一直不肯交税，结果进城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监狱。人们很难摆脱对自然的刻板印象，这使得只有适合开发成旅游景点的地方才被认为是“自然的”，在事实上剥夺了真正的山川河流成为“自然”的权利，把它们赶到了城市的边缘地带，成了能源或者蔬菜的供应基地，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的灰烬山谷，虽然也有一条小河流过，可是路过的来自城市的人们只想赶紧离开这里，因为这里是被“美国梦”压抑的让人无法正视的潜意识罪恶感：“一个离奇古怪的农场，在这里灰烬像麦子一样生长，长成小山小丘和奇形怪状的园子。在这里灰烬堆成房屋、烟囱和炊烟的形式，最后，经过超绝的



电影《简·爱》(2011 年版)剧照

努力，堆成一个个灰蒙蒙的人，隐隐约约地在走动，而且已经在尘土飞扬的空气中化为灰烬了。有时一列灰色的货车慢慢沿着一条看不见的轨道爬行，叽嘎一声鬼叫，停了下来，马上那些灰蒙蒙的人就拖着铁铲一窝蜂拥上来，扬起一片尘土，让你看不到他们隐秘的活动。”

广告与仪式

我们今天看到的广告，已经和“广而告之”大不一样。同样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广告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它的重点不再是提供商品的参数信息，而是越来越多地把商品和一些抽象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比如时尚、美、声誉和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广告的逻辑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因果律，即“这件商品好所以我要买它”，它已经更像是以梦的逻辑运行的，最理想的效果就是让人们相信，几样按照时间顺序前后出现的事物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先出现 A，再出现 B 并不意味着 B 是 A 的结果），因为广告里的人穿了某品牌的牛仔裤，接着一个镜头就出现了他的女朋友，那么很多人就会被暗示，是因为他穿了这条裤子所以增添了自身的魅力。这是广告的基本句法，除此之外，广告还创造了一系列语汇和修辞，比如喝酒意味着庆祝和欢乐，抽烟意味着放松和私人世界，钻石意味着永恒爱情。如今在这个方向走得最远的就是房地产广告，它们普遍把需要花费数百万元的购买行为和家庭以及幸福绑在一起。在鲍德里亚看来，广告对于消费者不仅具有物质形态上的使用价值，而且广告观念形态上的符号价值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表达”的主要形式和“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消费者购买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可使用的实用商品，而是暗示消费者本人想成为某种人或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向往。英国文化学家雷蒙德·威廉斯说，这是因为商品已经被广告话语强行提高到了精神层面，商品是像在宗教里一样，“道”（类似魅力、幸福之类的抽象观念）成“肉身”（具体的商品）。浪漫爱情、性欲和家庭幸福是广告里最常用的抽象观念，我们可以从一个例子来看它是如何运作的。美国汉堡品牌卡乐星（Charbroided）拍过一个大西洋鳕鱼汉堡的广告，这个短片可以在我们国



电影《悲惨世界》（2012 年版）剧照

内的视频网站看到。一位浑身湿透、穿着泳装的美女在类似马尔代夫一样的小岛上吃汉堡，导演特意用慢镜头和特写来拍她吃汉堡的样子，接着就是一系列情欲暗示：她吮吸自己的手指，并从背后解开胸衣的带子（这时候她的上身已经没有衣服了），然后一个英俊男子在美女的侧面出现搭讪她，说了一句“nice sandwich”（不错的汉堡），女主角不但没有遮住自己的裸体，反而还报以莞尔一笑。广告结束。先是在汉堡和性欲之间搭建起联系，接着又是汉堡和浪漫爱情。一个普通的、食用的汉堡就这样被附加了属性。还有一些更简单粗暴的例子。一家整形医院的户外广告上印着一个美女和一行字：“男人的变心源自女人的变形。”换一个说法就是：性吸引力是爱情的前提。这当然是一个拙劣的广告，这类广告的逻辑简单地说就是：“买我，你会得到爱。”在很多更高级的广告里，观众（潜在的消费者）被带到一个类似窥淫的位置，他在这里看到的是日常不会看到的亲密行为和潜在的消费。在某法国品牌白兰地酒的一个广告里，男女主人公激情地拥抱接吻，下面的文字写着：“如果你曾经被吻过，你就应该熟悉轩尼诗白兰地的感觉。”这句广告词在商品的使用体验和亲吻的感觉之间建立了等同关系，也就是说，喝酒也可以成为爱情的替代。接着男女主人公拥抱的剪影形成了一个酒瓶的形状，这个视觉游戏不仅暗示了爱情和消费已经不可分割，而且也升华了产品，让人们感觉有酒的爱情比没有酒的更加美好。

虽然婚姻是爱情的一部分，但广告在采用“爱情”主题时很少出现夫妇与家庭生活。即使出现也是经过美化的版本，家庭琐事和柴米油盐是在这种广告句法之外的。许多汽车广告里会出现事业有成的三口之家，这是因为这样的人群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是汽车商的主要客户。“爱情”主题的广告更像是在演示一个仪式，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话说，其中“采用了大量的超仪式化的性符号”，拥抱、亲吻的演员拿着化妆品、酒和钻戒这些法器，最终的目的就是召唤出爱情。拍摄与“爱情”有关的广告时，摄影机经常使用柔光，这是为了营造高贵、亲密的氛围，但也从另一个角度暗示了广告文本本身的不真实性。“浪漫爱情”的自洽性也是个假象，它得到强

调并不是因为其本身是目的，而是因为它掌握了通向一系列专属的快感的钥匙。想想人们在爱情中能得到多少欢乐吧，这些欢乐被商业逻辑拿来和他们的商品比附。这就是拜物教的秘密：先是把浪漫商品化，然后再把商品浪漫化。第一步，先让人们对浪漫构成某种刻板印象，让几种商品成为浪漫的象征和公认的法器，比如情人节的99朵玫瑰，求婚时的钻戒，这样购买行为就成了仪式中的关键，只有跨过这个门槛才能到达彼岸，否则你永远在看着广告里别人的爱情。第二步就是给某些商品附魔，给予它们法器的身份，巧克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一家巧克力厂把情人节的风俗传到日本，推荐将巧克力作为爱情表白时的礼物，但当年取得的销售业绩并不理想。到战后的50年代末，日本对于欧美文化更加认同，另一个巧克力厂家也做了类似的活动，一炮而红，以至于在如今的中国，巧克力成了最流行的情人节礼物。

涂尔干这样总结仪式："以这种方式，人们突破了熟悉的生活，并且在此时也感觉到，必须把自己提升到日常伦理的上方和外方。"日常的仪式是如此之多和普遍，以至于我们很难意识到它们来源于很久以前的宗教形式，但爱情唯有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时，才会获得最大的"浪漫"效果。仪式通常在四个维度影响人们：时间、情感、空间和人为因素。我们通常觉得夜晚比白天要浪漫一些，是因为这时人们远离了紧张的工作环境，更容易放松并且"回归自我"，夜晚是属于私人的时间。在空间上看，"浪漫"的事情一般不发生在家里，通常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即使类似烛光晚餐这种在家里的浪漫事件，人们也要关掉电灯点上蜡烛，营造出一种和日常家居生活不一样的气氛。这也是人们觉得异国旅游很浪漫的原因。人为因素是指礼物、着装、昂贵的晚饭这些通常被认为"浪漫"的法器，而情感因素则更简单：人们必须投入想象，做好即将迎来"浪漫"的准备（"情人节就要来了，得有些'浪漫'才行"）。哪怕不那么狂热，受仪式影响的人们也至少是认同"浪漫爱情"这种情感模式的。


人们一方面认为"一见钟情"是浪漫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它不太现实，不太可能最后走向婚姻

以餐厅为例。在情人节，许多情侣会去平时不会考虑的昂贵餐厅吃一顿饭，许多人也能够认识到，花这么多钱购买的不单是一碟碟菜，也有餐厅的环境和气氛。高级餐厅的浪漫之处在于，它使人们走出日常（吃饭本来是多么日常的事），来到一个充满仪式意味的陌生场所，餐厅的装修和布置强化了人们在时间、情感、空间等方面的决心，要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只有自己和爱侣的孤岛里。高级餐厅的上菜速度远远比在家做饭要慢，人们



什么呢？一定不是家常菜或者风味小吃，典型的选择是异国的正餐，例如西餐尤其是法餐，红酒也是常见的选择。他们手里拿着的菜单里充满着密集的符号，食物被抽象化从而解构了日常的“吃”这一行为，情侣们要做的通常是把这些符号再次还原成食物：香槟比啤酒浪漫，鱼子酱比汉堡浪漫，提拉米苏比绿豆沙浪漫……食物的所指方向不是味蕾，而是意义。当侍者摆上刀叉，一道一道地（其中的时间间隔很可能是计算过的）把精致的菜品端上来的时候，人们是不可能像在家吃饭一样随意吃的，盘子里的菜和刀叉都经过文化环境严厉的编码，如果将它们视为普通的食物将会受到鄙视。对于那些不熟悉这一套规则的人来说，这顿饭将吃得如履薄冰，喝醉、把刀叉掉到地上或者噎着了不停打嗝都会严重破坏仪式气氛，把“浪漫”拉回到日常世界。

仪式是不断重复的，它被编码进文化工业的不断再生产中，当人们的身体感到渴望浪漫的感觉时，生理循环就加入了资本的循环。在和“浪漫爱情”有关的消费中，只有极少数像购买钻戒这样的一次性消费，大部分都是如同看电影、去豪华餐厅以及旅游这样周期性的。这也回应了文化工业主导下的享乐主义呼唤：填满相处的每一刻时间，否则无聊会杀死爱情。

也不能狼吞虎咽地吃——用餐时间被拉长了。这种扭曲时间的效果带来的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在吃饭过程中吃这件事不再重要，坐在桌子对面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中心。如果在吃饭过程中不发生点什么“化学反应”，那么这顿饭就算失败了。时间会成为沉重的负担。“浪漫”的餐厅在价格和整体定位上也一般都是准确的，这类餐厅里不会出现十几岁的青少年和带着哭闹孩子的父母。餐桌的摆放一定是稀疏的，甚至还有许多小包间，人们在空间上被有意地隔离开，同时不太明亮的灯光（这和广告中的柔光有相同的功效）也制造了他人的目光达不到的角落。音乐、柔和的光，白色的桌布和桌上的鲜花，这些都到位后接下来就是情侣落座。他们会点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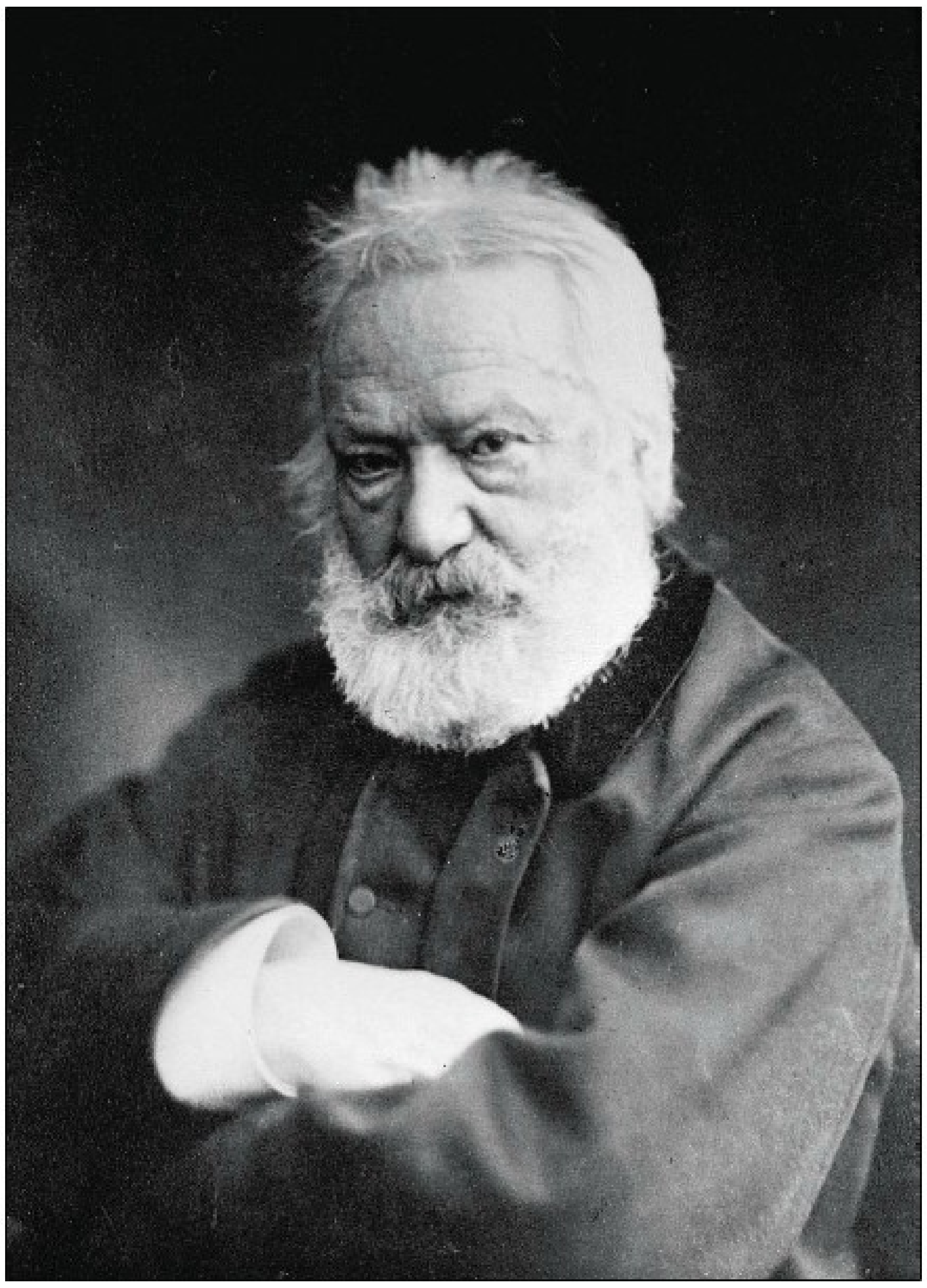
一见钟情和文化资本

先来看看这段文字：“一天，空气温和，卢森堡公园中一片阳光和绿影，天空明净，仿佛天使们一早便把它洗过了似的，小鸟在栗林深处轻轻地叫着，马吕斯把整个胸怀向这良辰美景敞开了。他什么也不想，他活着，呼吸着。他从那条板凳旁边走过，那年轻姑娘抬起了眼睛向着他，他们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了。”

再来看看这段：“是办公室主任带

我去的，他让我坐在一个女孩旁边。她的父母也在，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没什么好隐瞒的，我的收入和前途在同龄人里都是不错的。我和她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后来慢慢彼此就很熟了。我们双方家里凑了些钱，再加上我们的积蓄，买了房子后就结婚了。”

第一段是雨果在《悲惨世界》里的描写，马吕斯和珂赛特在卢森堡公园首次对视，就爱上了对方。这是非常典型的“一见钟情”。第二段是一个受访者的回忆，他所在公司的上级很赏识他，在自己朋友的孩子中找了一个教育程度和收入都与他相当的女孩来和他相亲。这两对男女最终都结婚了，似乎结果是一样的，但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两个故事有高低之别。后者的爱情故事过于平淡无奇，在浪漫爱情的话语系统里，这样的爱情太实际、平庸，甚至政治不正确。经过别人安排的相亲首先要经过他人眼光的过滤，接着在能够保证财政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的情况下，爱情走向了婚姻。这是旧时代“门当户对”的爱情的翻版吗？一直以来，“浪漫爱情”对于“门当户对”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浪漫爱情”重写了19世纪式的、以财产为基础的婚姻中爱情的内涵，“爱情”这个词的意义不再指向悲剧，而指向了幸福、快乐；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差距悬殊的爱情也是不大可能持久的。人们一方面认为“一见钟情”是浪漫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它不太现实，不太可能最后走向婚姻。在双方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尽管人的谈吐和举止方式等文化因素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些角色，一见钟情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外表/性的吸引力的，实际上是“一见钟性”。其中又一层的暧昧意义在于，浪漫爱情的话语对于性尤其是婚前性行为是压抑的，“一见钟情”的神话绝不会祭出性行为作为开头，它只能在故事结尾“提升”爱情的层次。许多人甚至觉得性是“不浪漫”的，一是社会话语的影响，二是因为浪漫爱情在性的阶段被剥除了意识形态的光环。《悲惨世界》里说：“要不，他便得谈到珂赛特的吊袜带，那在他是不可能的。这里有一道无形的堤岸，一涉及肉体问题，自有一种神圣的畏惧心使这天真豪迈的情人向后退缩。”所以尽管一见钟情是一种文化想象，它却是基于生理而不是心灵的反应。马吕斯一开始看见珂赛特的时候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但过了几天看到珂赛特的裙子被风吹起，一个流浪汉也盯着她看，他就恨不得杀了流浪汉。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

“一见钟情”是一种白日梦的修辞，它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日常秩序的厌弃。在文化工业关于它的话语里，我们能够普遍看到，叙事时间是被变形和切碎了的。例如这段：“我们的眼里只有对方，你知道吗，就像在电影里一样，周围所有人和所有的东西都成了背景，只有我和她。”“像电影一样”说明，说话的主体在这个时候采用了电影的修辞，他的主观感受是慢镜头式的。这可能使他想开展一段“像在电影里一样”的爱情。但问题在于，他的爱情除了这个瞬间，都必须遵守日常的时间流。当时间又成了编年史式的，他就失去了当时的深度体验。在叙事作品里，这件事很好操作，只需要另起一段，电影也只要切一个镜头，就可以从容地把故事进行下去，一个事件完毕，又可以立刻开始一段新事件。而在真实世界里，人们不得不面对时间无聊的连续性。所以在一段感情（尤其是婚外情）里，短暂的关系通常比持续的关系要“浪漫”一些，日常是无法忍受的，而永恒更是可怕。即使真处于其中，人们也想找出一些戏剧性和浪漫的瞬间来。“一见钟情”的爱情类似于冒险故事，在心理、生理和社会性上都唤起了人们的兴趣，而真正的爱情却没有这样的传播力。经济学家提伯尔·赛托夫斯基把感受分为“刺激的”和“舒服的”，我们看“一见钟情”都是刺激的，而缓慢的爱情甚至合适的相亲则可能带来“舒服”的感受。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说，浪漫爱情是一种“文化习得的期待”，是知识结构对生理的文化编码，人们将编码结束后的产品再扔回到日常生活的维度，提供了一个人们可以在其中游戏和做白日梦的空间。

“一见钟情”用性吸引力取代了财产和地位，然后再通过对“浪漫爱情”的宣扬压抑了自身的性含义，在它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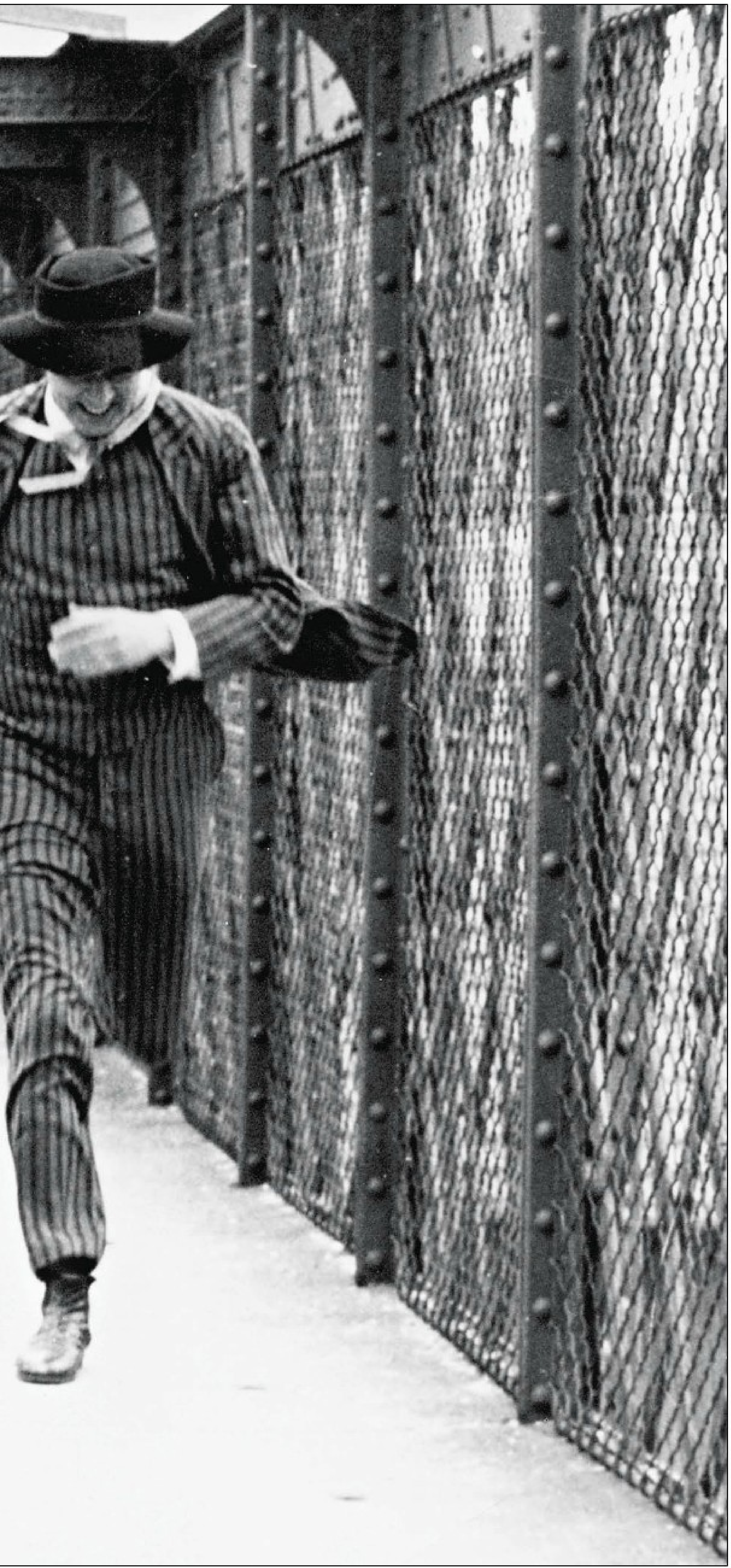
前，似乎爱情变成了完全非理性的、任意的、无法预知和控制的激情。而“有理由”的爱情都成了不正当的、遭鄙视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尽管大多数人都是“自发地”在自己同阶层的人之间选择配偶，婚姻仍然是阶层之间流动的一个重要手段，这种说法和许多人在生活中的认知相悖，爱情应该是对另外一个人“无法解释的”迷恋。卢梭小说《新爱洛漪斯》的主人公原型是12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亚伯拉德和他的学生爱洛漪斯，他们之间的书信如今依然存留。在一封信中爱洛漪斯写道：“上帝知道，我在你身上只寻找你，我只想念你而不是你拥有的那些。”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对于那个时代的女人而言，“浪漫”是一种极其奢侈并且危险的权利。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女人不如男人“浪漫”，这是社会地位决定的。而当女人实现了经济独立之后，她们对于浪漫的需求就会急剧增加。但是，我们要问爱洛漪斯的是，是什么使一个人成为他现在的样子呢？这也令人想起古老的“特修斯之船”的悖论：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被新部件代替。最终这艘船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在恋爱中，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最终能和他的生活环境以及意识形态完全分离吗？这个问题可能就像《威尼斯商人》里面犹太人夏洛克的难题：如何割下一磅肉但不流血呢？

布尔迪厄在这方面是悲观的。他说：“真正幸福的爱情是两个社会阶层相同的人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自发’地相爱。”社会阶层不是爱情的前提条件，但来自同样阶层的人却更容易“偶然”地相遇并发展一段深入的关系。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成了新的界定人群的鸿沟，在文化资本影响下的人形成了各自的习性(Habitus)，也就是人们的行为、感知和思维模式，最终习性会慢慢地渗透进身体，并以观点和审美偏好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于餐馆里桌布的颜色和质地、点菜的偏好及对红酒的了解，在电影院时对影片的选择，这些都会因人而异。习性是行为方式、观念和性格的集合，人们据此来定位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爱憎，并与他人交流。布尔迪厄的观点也解释了在后资本主义时期，为什么富人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渴望通过努力把自己的财产最大化，因为每个人在文化资本影响下的习性不同。这也就注定了，习性接近的人才容易发展出深入的关系，并且他们会认为这是“自发的”，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的。爱玛对于自己丈夫的厌弃并不在经济层面上，而是出于“习性”的差异。她觉得查理“谈吐像人行道一样平板，见解庸俗，如同来往行人一般衣着寻常，激不起情绪，也激不起笑或者梦想”。查理不会游泳、不会比剑，不会放枪。有一次爱玛用传奇小说中一个骑马的术语问他，他瞠目不知所对。这使她悔恨自己为什么要结婚。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有紧密的关系，前者的累积也意味着相当程度对消费的介入，余钱和闲暇是必不可少的。子爵的雪茄匣代表了他消费高级烟的经济能力，但在爱玛看来，里面除了烟草味，还有美女樱的味道。精美的雪茄匣象征了子爵的文化资本，令爱玛不停幻想。她“希望死，又希望住到巴黎”。后来伍迪·艾伦还依照这本小说重新写了一个戏仿版本(《库格麦斯插曲》)，一个现代大学教授通过时光门来到了爱玛的家，把她从“单调乏味的粗俗乡村生活拯救出去”，一起来到了纽约的布鲁克林。他给她讲奥斯卡奖，买拉尔夫·劳伦的裤子、吃鱼子酱喝香槟酒，总之就是看起来很浪漫的那一套。这些把戏很快俘获了爱玛的心，她是如此投入现代的浪漫关系，以至于教授后来完全招架不住。爱玛说：“把我送回小说里，要么和我结婚……另外，我想找个工作，或者去上学，天天看电视烦透了。”爱玛的厌烦和教授的拮据恰好发生在同时，后来教授不得不把爱玛送回了永镇，他自己则因为传送门故障流落异乡。

在布尔迪厄看来，貌似公开自由的恋爱系统只是在表面上掩饰了传统观念，即依靠婚姻保持或改善社会地位的愿望。“浪漫爱情”是商业意识形态的面具，人们再追求浪漫爱情，最终也还是能做出“理性”的决定，在无意识中追求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其中一个例子是人们在寻找恋爱对象的时候，脑海中都有一个理想爱人的形象。这个人必须有形象好、聪明，品德上也靠得住，但最重要的是要“合适”。这种观念如此流行，以至于许多恋爱参考书都以此为基石，甚至在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那里找到了源头：男女原来是一体的，后来才被神分开。因此人们的使命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半，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因此寻找的另一半也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合适”。但什么是合适呢？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伴侣，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很了解自己的处境和需求。我们可以想象，在收入较低的人那里，他们希望的另一半应该是吃苦耐劳、勤俭和可靠的，这些品质和家庭的经济稳定性直接联系到了一起。而对于那些已经超越了经济稳定的人来说，只有这些品质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更看重的是对方在文化和审美上是不是与自己一致。换言之，他们的要求是更加精神化、更加意识形态化的。这也就是鲁迅说的那样，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考虑到我们社会在享乐主义主导下的文化工业生产，我们也可以说，文化资本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浪漫”的能力。这才是浪漫爱情的最终动力。



电影《朱尔和吉姆》剧照（1962）



法国电影里的那些爱与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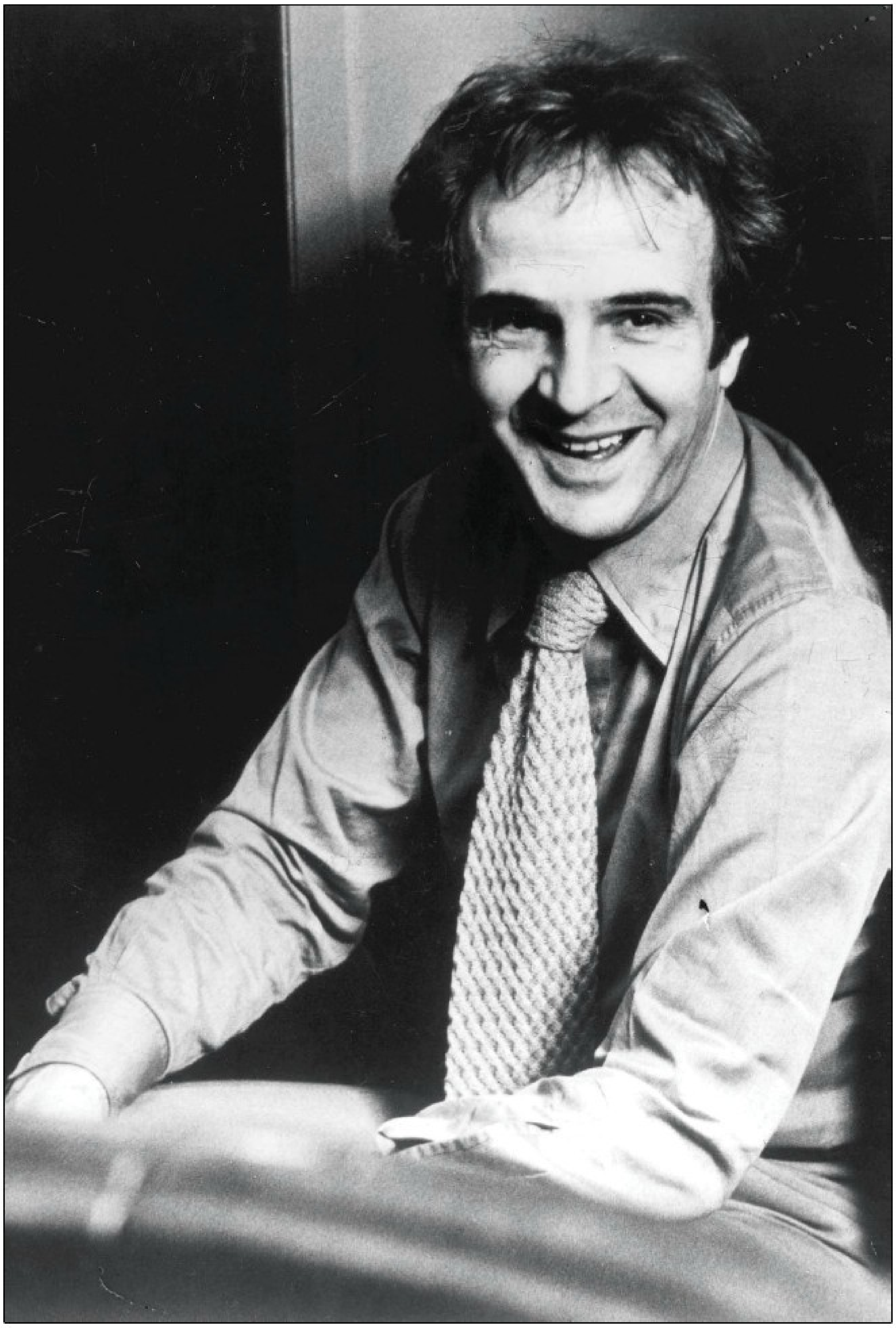
世界电影史上恐怕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导演能像特吕弗一样，用20年的时间，追看一个名叫安托万的男人的感情成长史。

文 / 贾淼

关于友情和爱情、爱情和婚姻、友情和婚姻之间那种渴望共存又难以实现的竭尽全力和无比幻灭，恐怕没有哪部电影比《朱尔和吉姆》（*Jules et Jim*）更让人难忘。

1962年上映的《朱尔与吉姆》并未赢得戛纳金棕榈，只得了意大利一个国际电影记者联盟奖，但评论仍认为它是新浪潮大导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为电影史贡献的经典文本，不逊成名作《四百击》。

影片的故事来自法国作家亨利·皮埃尔-罗什的小说，背景在20世纪的前20年，“一战”前后的巴黎。德国青年朱尔遇见法国青年吉姆，对诗歌和雕塑的同好让两人成为恨不能分享一切所爱的知己。他们结识了貌似没心没肺的美丽德国女孩卡特琳娜，一段快乐的相处过后，感情慢慢变得微妙，三人行在卡特琳娜有意无意间的游移中维系。战争改变了一切，两个好朋友各自应征入伍去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吉姆有意退出，朱尔和卡特琳娜结了婚。战后，吉姆到他们夫妇家中做客，三个五年不见的好友重聚，彻夜谈笑，弹琴唱歌，好像又回到了三人在巴黎同行的日子。但实际上，一切早都不同了：卡特琳娜已经变成一个厌倦的主妇，和朱尔的婚姻名存实亡。面对试图帮助他们的吉姆，卡特琳娜重复着过去那种有意无意的游移，吉姆再次陷落在三个人的感情里。这次是朱尔选择离开，他希望吉姆能和卡特琳娜一起生活，好让三个人继续理想中的相处方式。可是，一旦被抽离了友情，剩下这两个人的爱情又莫名地陷入混乱不堪，已婚的吉姆在巴黎家人与卡特琳娜之间徘徊不定。卡特琳娜在痛苦中想起朱尔，邀他速来见面，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见面





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

可以解决什么，也许是奢望有奇迹再次发生。最后的结局，却是朱尔目睹卡特琳娜带着年轻时一样的灿烂笑容，驾车和吉姆坠落桥下，一切烟消云散。

在影片开头的地方，卡特琳娜留过这么一句画外音："你说：我爱你。我说：留下来。我差点说：占有我。你却说：走吧。"女主角让·莫罗的声音就像她的脸，美而挑衅，但充满倦意。

他们的三人行，远非简单的俗世肉体之爱。特吕弗是在讲述一段青春幻灭和三个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相爱的灵魂的年轻人。两个人的爱不难，三个人的爱也并非没有可能，难以成全的其实是爱本身。到影片末尾，朱尔、吉姆和卡特琳娜，他们都已经意识到三人编织的感情乌托邦在现实中根本没有可能实现，即便倾尽所有也回不到过去。

特吕弗是平静的解剖者，他从不确定自己看到了爱情和婚姻的真相，只是在复活一种他所理解的生活。如果要在银幕上看一出爱和婚姻的连续剧，那无疑就是特吕弗的"自传体"



特吕弗导演的电影《朱尔和吉姆》剧照

系列。世界电影史上恐怕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导演能像特吕弗一样，用20年的时间追看一个名叫安托万的男人的感情成长史：五部电影，拍摄长度延续了20年，连演员让－皮埃尔·雷奥(Jean Pierre-Leon)都没有更换过，他跟随着银幕上的自己一起成人，从上世纪60年代进入70年代，那也是法国各种社会思潮对婚姻关系进行急剧改变的时期。

《四百击》中的安托万还是问题少年，这之后，他在四部电影里完整经历了一个男人的暗恋、恋爱和婚姻：1962年的《二十岁之恋》，是不同导演同题执导的五部短片之一，特吕弗的副题取名《安托万与克莱特》。在60年代早期，法国婴儿潮一代人进入青春期，安托万就在其中。他在片中暗恋比自己年纪稍大的女孩柯莱特，却只被对方当作弟弟来看待。早恋就这样怅惘地消散了，他从中长大，学到和父母怎样相处。在1968年的《偷吻》中，青年安托万已经服完兵役回到巴黎，为谋生他在旅店做了接待员，又



上、下图：特吕弗导演的电影：《四百击》剧照





电影《二十岁之恋》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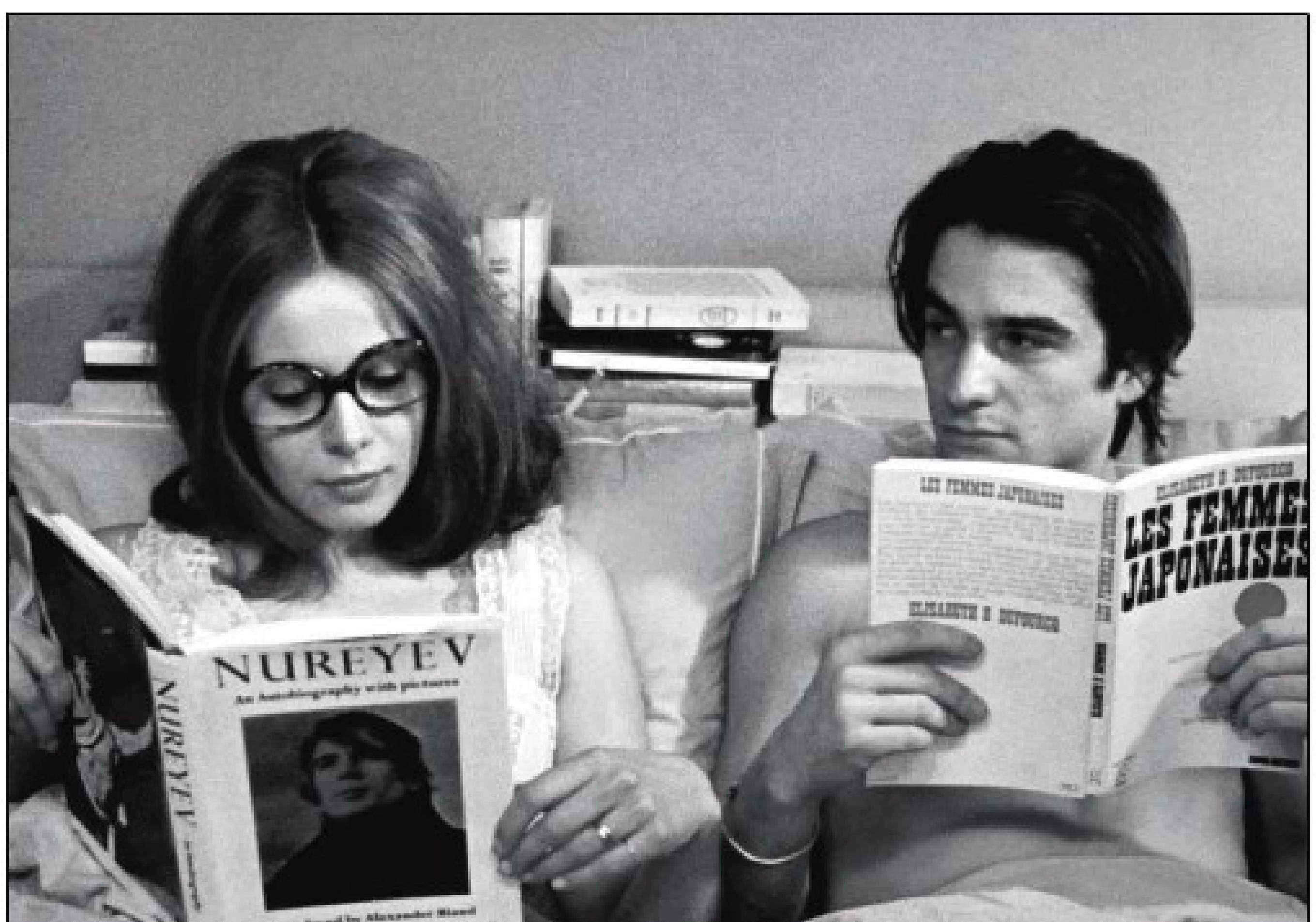
碰巧被一个私人侦探所笼络去做了小侦探。他需要恋爱，所以爱上朋友克里斯蒂娜，在努力追求她的同时，却又被鞋店老板风情的妻子所诱惑，那是无数少男都经历过的对成熟女子的迷恋。好一阵意乱情迷过去后，安托万终于还是回到克里斯蒂娜身边，守着单纯的小未婚妻，变成一个生活平静的电视维修工。1970 年，特吕弗用第四部《夫妻之间》讲述了安托万结婚与离婚的故事：婚后安托万在自己楼下开了一家花店，他身边那些忙忙碌碌的小人物邻居，也就是法国社会婚姻百态。花店失败后，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一个日本女孩又让厌烦了平淡生活的安托万爱心萌动，他和小妻子克里斯蒂娜的婚姻受到一次考验，纷纷扰扰，分了又和。到 1978 年的《爱情狂奔》，中年男子安托万到底还是离婚了，克里斯蒂娜成了他前妻。安托万变成了一个事业成功的作家，对爱



特吕弗导演的电影：《爱情狂奔》剧照



电影《偷吻》剧照



电影《夫妻之间》剧照

和婚姻却仍是不知所求，他在前妻克里斯蒂娜、已经成为律师的少年暗恋对象克莱特以及新近倾心的女子萨宾娜之间摇摇摆摆，最终也没能摆脱爱之无奈。

整个系列便在这种无奈的情绪中终结了。爱和婚姻怎会有确凿的答案？对于惯于从小人物视角去看待人和事的特吕弗，那就更不可能。

如果说特吕弗处理家庭题材是以细腻和温情的细节构成——就像他早期那部影片《柔肤》，痛也痛得柔情万种——那么另一位大导路易斯·布努埃尔（Louis Bunuel）就如凿冰刀一般冷酷解构。1966 年，他拍摄了《白昼美人》（*Belle de Jour*）。这部影片获得第 32 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被认为是表现人的潜意识的超现实主义代表作，评论家也大都把重点放在对梦境和现实平行交错的心理表现手法的分析，执著于何为梦境又何为现实。但它给另一部分观众留下的最深印象，却是那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空洞婚姻以及人妻卡特琳娜·德诺芙的寂寞焦虑。对于没有温度的婚姻，这部片子可以说表现入骨。

德诺芙在影片中的角色是中产阶级女子塞弗琳娜，除了美得无可挑剔，她的一切个人信息在影片中都很模糊，在丈夫面前，在朋友中，在大街上，她都无异于一件可以行走的优雅摆设。塞弗琳娜嫁给了英俊而有教养的外科医生皮埃尔，物质优渥，生活看似十分完美。可是在这种相敬如宾的生活中，塞弗琳娜无所事事，寂寞无聊，尤其在性爱上得不到满足，却很难对丈夫启齿。长期的压抑之下，她经常做些被丈夫凌辱的白日怪梦。塞弗琳娜在婚姻内的强烈性压抑，有影片中闪过的童年阴影的影响，也来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常识，这种常识从 19 世纪延续下来，认为“有道德的”女人根本就缺乏任何性动力，所以她们不会因为任何种类的性激情而自寻烦恼;如果与之相反，那就是缺乏道德的。接下来影片为塞弗琳娜安排的出口，则有可能是受到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的一种极端观点的暗示，这个人曾宣称：在主妇和妓女之间，不存在中间地带。被这种潜意识引导，不安于做主妇的塞弗琳娜只有一种选择。

于是，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在一



西班牙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

次滑雪中她遇到女友，无意中听说巴黎有位“夫人”在经营地下妓院。塞弗琳娜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一番改装后，主动找到“夫人”去做应征女郎。每天下午14点到17点，她变身为“白昼美人”，接待各种各样的客人：肥胖粗俗的商人、受虐狂教授、没落变态的贵族伯爵……傍晚回到家，她把这些痕迹全部抹去，又做回陪伴丈夫共进晚餐的优雅贵妇，对丈夫朋友的示爱仍能表现得丝毫不为所动。在两种角色之间，塞弗琳娜感到释放后的极大满足。但有一天，她在“夫人”寓所遇到了职业杀手马塞尔，他们陷入到肉体的欢愉，随之而来的是马塞尔爱上了她。塞弗琳娜开始感到不安和恐惧，和给了她安逸生活的婚姻相比，欲望满足变得不重要，马塞尔也无足轻重。四处打听“白昼美人”下落的马塞尔终于知晓了她的真实身份，一厢情愿地找上门来，将男主人皮埃尔射成重伤，他自己也被警察射杀在街头。影片最后，仍然美丽的塞弗琳娜用轮椅推着瘫痪的皮埃尔，像从前一样，看似平静地生活着。



布努埃尔导演的电影《白昼美人》剧照

塞弗琳娜、皮埃尔，他们可能就住在特吕弗的男孩安托万的隔壁街区里，那些高尚住宅有着更为雕饰的外墙和厚重的大门，没有上班下班的闲聊，听不见邻居夫妇为了一件睡衣争吵的声音，那是另一个巴黎。

几年后，轰动西方影坛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其实也涉及相似主题。由于对性爱场面表现得过于露骨，这部影片在导演贝尔纳托·贝尔托鲁奇自己的国家意大利遭到15年禁映，但美国人从一开始就视其为深刻之作。

影片里的主人公换成了一个美国中年作家保罗：他旅居巴黎，和一家旅馆女老板结了婚，但是两人之间却很隔膜。妻子在有了情人后又突然自杀，保罗坠入噩梦一般的空虚和痛苦。在街头，他遇到一个年轻美丽的巴黎女孩让娜。让娜已有婚约，未婚夫是电影导演，但她却和《白昼美人》塞弗琳娜一样，一心要在体面的生活之下寻求刺激。他们是两个陌生人，也无意询问彼此姓名，在租来的破旧公寓里一次次约会。通过放纵的性，保罗似乎从让娜身上找到绝望生活之中的一点生机，他向让娜提出结婚，却被断然拒绝。让娜和保罗在舞厅里跳了最后一曲探戈，告知他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今天必须分手，保罗却如同《白昼美人》中的那个年轻匪徒马塞尔，疯狂地追到让娜家里纠缠，让娜拿起父亲的手枪，将保罗打死在阳台上。对保罗的死让娜竟不觉得内疚，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个中年男人是谁，她只是在游戏，而他破坏了规则。让娜和保罗其实是两代人，但他们同样经历着对生活的幻灭，试图通过不被限制的性爱得到慰藉。两位导演以不同的风格来表现中产阶级婚姻内外扭曲的心理和古怪的欲望，这也契合了20世纪60年代欧美性解放运动的社会背景。

虽然布努埃尔是西班牙人，贝尔托鲁奇是意大利人，但这确是两部以巴黎为故事发生地的影片，它们带有典型的法国情感范式——日常道德并非黑白分明。它可能是悲伤的蓝，也可能是混沌的灰，或者，红色的疯狂。

《三联生活周刊》2014 年更多精彩，订阅更优惠

2014 订阅全年净省208元

全年52期，零售单价12元 | 订阅单价8元 | 订阅年价416元

内容更全面、深入地关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热点

一支高质量的主笔、编辑、记者队伍，更加大采访成本投入，更强调原创性

可读性更强，内容更丰富，涉及投资、理财、收藏、家居、健康 ……方方面面的实用生活指导

一本高端综合类周刊承载更多理想，以坚持不懈的成长回报读者厚爱，证明自己值得期待



三联生活周刊荣获

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中国“百强报刊”

中国期刊协会颁发——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邮发代号： 82-20 / 拨打 11185 上门收订

委托声明： 三联生活周刊订阅服务由邮政部门独家代理，未委托其他机构订阅本刊。

杂志社咨询电话： 010-84050425 / 84050451

联系信箱： dzfw@lifeweek.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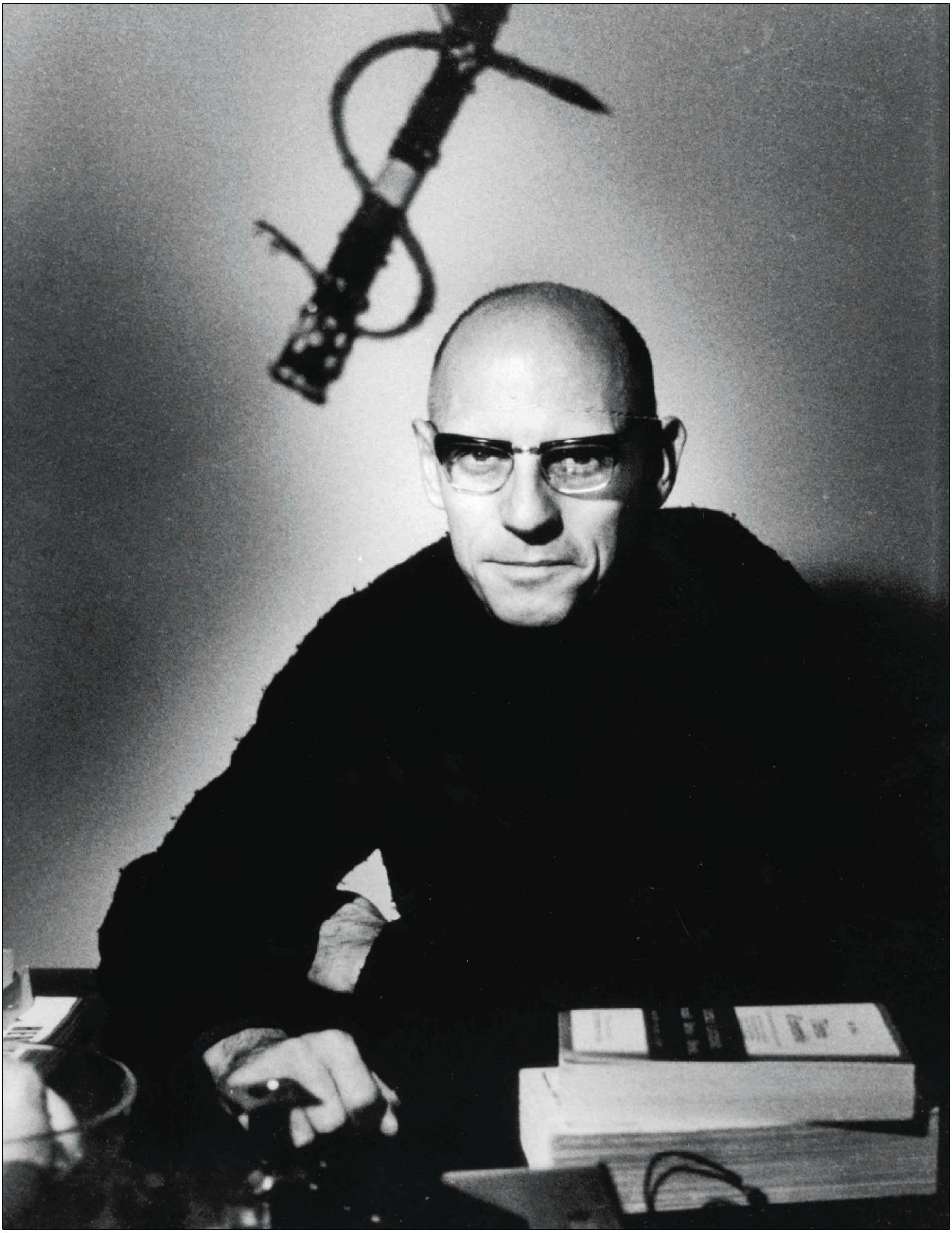
福柯、《性史》与生活的艺术

文 / 汪民安



古罗马花神节景象。花神节在每年的 4 月底到 5 月初举行，象征生命循环的更新





法国哲学家福柯

你敢探讨自己吗？

福柯总是以追溯历史的方式来讨论现在，对他来说，“现在”的形成，总是历史的结果和效应。“现在”是如何形成的，现在的“我”，又是如何从历史中一步步地变化而成？这就是他从尼采那里发展而来的一种独特的历史谱系学。因此，他总是以历史学家的面孔出现。因此，我们看到，福柯的著作总是历史著作：疯癫的历史；知识的历史；监狱的历史；最后，他毫不意外地回到了性的历史。而《性史》成为他的绝作。为什么会写一部性的历史？对于福柯而言，他的同性恋取向，在年轻的时候长久地折磨着他，他备感痛苦，痛苦得发疯，甚至有过多次自杀念头和行为。为此，他在父亲的带领下去看过精神分析医生，“他的一生都伴随着疯癫”，这或许可以解释福柯为什么会写一部疯癫的历史。而疯癫或者同性恋为什么会被排斥？会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人群类型？这又是怎样的知识观念在背后起着主导作用？这大概可以去理解福柯为什么会去写一部关于知识的历史（《词与物》）。而疯癫或者同性恋，或者罪犯，或者各种“不正常的人”，总是被社会所区隔开来，甚至被关押起来，因此，一部监狱的历史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福柯的著作中。最后，到了晚年，他必定要写一部性的历史来认识自身。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同性恋者，总是借助自己的“性”来认识自己，总是通过自己的“性”来建构自己的主体，正是性的取向，性的各种实践技术，对性的态度，才让一个人意识到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怎样一个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主体。

对于福柯来说，哲学的最终目的如果是讨论“现在”的话，那么，最主要的是要讨论现在的自己。他自己说过，他想探讨他自身。哲学就是探讨自己。他的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他自己的谱系学，他需要探讨他身上所有的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但是，他不是将这一切置放在一个有关自我的生物学或者医学的知识内部，而是将它放在一个宽阔的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来看待。因此，一部性的历史，既是理解自己的主体的形成过程，也是理解人类的伦理主题的形成过程。或许，伟大的哲学家到了晚年总是要去理解自己。

用性去讨论权力

福柯的《性史》共有三卷。第一卷《求知意志》出版于 1976 年，第二卷《快感的运用》和第三卷《关注自我》出版于 1984 年。福柯那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艾滋病这种不治之症。他拼命地工作，反复地修改，终于在 6 月 25 日病逝前不久看到了这两卷的出版。当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关于这两卷的第一批评论文章已经在报纸上出现了。幸运的是，福柯生前目睹了《性史》的出版和最初的传播。

《性史》虽然都以性为讨论的主题，但是，第一卷和后两卷的差异甚大，它们关心的问题并不一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甚至并不构成一个系列。因为两者间隔的时间太长（8 年），福柯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思路，他的兴趣点也发生了变化。在写第一卷《求知意志》的 70 年代中期，福柯沉浸在他最著名的权力技术的分析中，因此，福柯在这本书中虽然讨论了性，但是，更恰当地说，他是借用性去讨论权力，是将性和权力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从书名上可以看出，第一卷《求知意志》是福柯向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致敬之作。这本书多少带有一点论战的性质，它要去反驳的观点是：人们通常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压抑的时代，权力总是要去压抑性，但是，福柯对这种“压抑说法”表示了质疑：从历史的角度看，性确实受到了压抑吗？权力机构真的只是压制性的吗？权力的禁律和否定真的是权力的普遍流行形式？福柯正是从权力出发，即研究权力的运作方式，它的流通渠道，它对个体的渗透形式，它的扩散踪迹，从而表明，权力有可能对性进行压制、拒绝，但同样也可能在激励、引发人们谈论性，扩散性的话语，加快性的影响，并使性得以广为流传，最终建立性的科学和知识。总之，话语生产、权力生产、知识生产，这些“权力的多样化技术”成为福柯要考察和讨论的核心，而对权力进行这种考察后的结论是，权力和权力机构并未压制住性，而是促使性话语增加，鼓励人们谈论性，表达性，并最终建立性的知识，“围绕着性，曾经出现过真正的话语爆炸”。

福柯是怎样得出这一与“压抑说”截然相反的结论呢？福柯对 17 世纪以来的有关性的宗教忏悔和自白进行了研究。这种忏悔和自白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要消除肉体享乐，要让性的欲念成为羞耻的根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为了检查灵魂中的每个角落，为了不放过一丝一毫的邪念细节，教士守则要求忏悔务必事无巨细，“性的方方面面，它的枝枝节节，它的事后效应都应追根究底，白日梦中的幻觉，难以驱散的意象，身体和灵魂的魔力般的合谋，所有这些，都应细细道来”。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为了忏悔和反省，人们必须无休无止地谈论性、谈论与肉体享乐相关的事情，人们将与性有关的一切置放于话语的折磨之下。而且，在 18 世纪前后，人们不仅在忏悔中谈论性，而且为了研究、计算、解释、说明性，这一次人们还在政治、经济、技术的范畴中谈论性。人们既从伦理的角度，也从理性的角度谈论性，人们将性作为对象进行妥善的管理，进行适当的调节，进行恰如其分的“治安”。这种性的“治安”，并不是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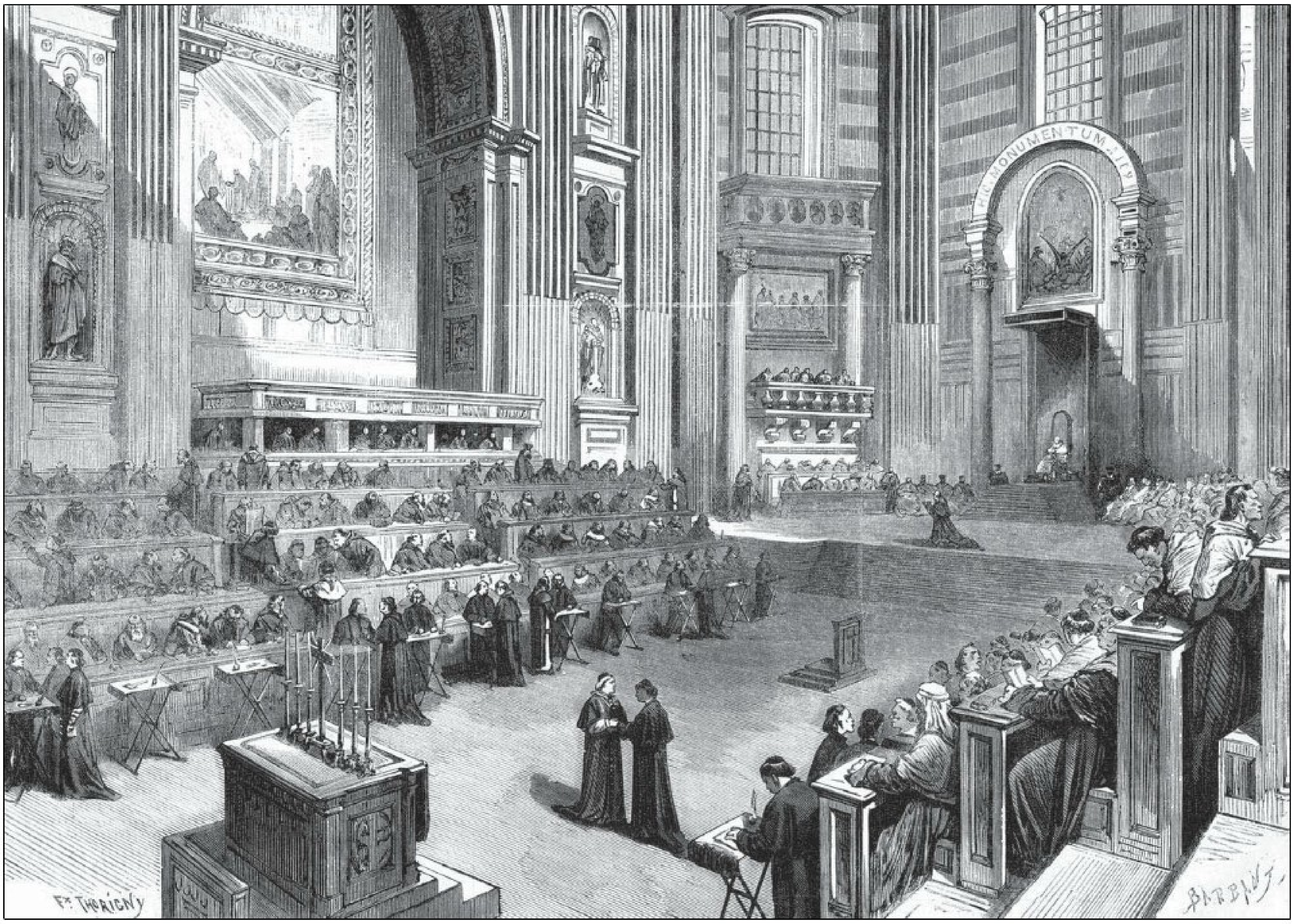
进行严酷的抑制，而是用公共话语治理性，使性促进公共力量，服务公共利益。具体而言，就是使公民恰当地运用和控制自己的性。权力机构借此生产了性的知识。

事实上，在几乎所有被认为性被迫陷入沉默的地方，福柯都发现性话语的繁殖。福柯否认教育机构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性抑制。围绕着儿童的性活动，教育学家、医生、家长全都动员起来，试图消除儿童的手淫。为此，他们反复地谈论性，自己谈，也让儿童讲出来，让他们坦白和招供。他们谈论手淫的事实、范围及危害，设置监督机构，设想教育手法，他们在家庭内部建立了一整套防范性的性医学措施。事实上，福柯挑战性地指出，这类意在消除手淫的行为和话语，却在滋生儿童的性行为，在传播性话语和性知识。儿童的手淫不仅从未得到根除，反而在这种性话语的围剿下加快发展，加快逃逸，加快渗透和扩散。手淫就此成为永恒的痼疾，似隐似现地存在下去，权力体制不仅仅未能消除和镇压儿童手淫，在生产性话语的同时，它还启示和扩散了手淫。


《忏悔》（皮特罗·朗基绘，18 世纪）

同样，几乎所有的性反常形式都受到了权力的生产。人们的最终目的也许是想要抑制反常的、夫妻之外的性活动，从而将性纳入正常的生育轨道，让性保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持社会的现有关系和体制。那么，怎样抑制反常性活动呢？首先，权力要明确界定那些本来模糊的无人问津的反常性活动形式，要对它们进行描述，为它们分类，给它们命名，要让它们有一个范围，一个看得见的能够分析的存在形式。而所有这些不是抹去了反常的性实践，不是根除了它们，也不是抑制了它们。权力和权力机构的所作所为恰恰是确定了它们，肯定了它们的存在，强化了它们的处境，让它们从匿名的状态中浮现出来，从沉默的状态中暴露出来。权力使它们定型了，使它们根植在社会中。福柯问，这难道是在消灭性反常？“不，这不是排斥这些异常的性状态，而是将它们具体化，局部性地强化。”

这些反常性实践一旦获得了可见性形式，权力就介入其中，权力试图对其进行监督，它要检查、提问，要做出报告，它想制止这些非生育性的性实践，但是，实际上呢？权力对性的干涉和介入使它自身也被色情化了，在干预性的同时，它也被性反咬一口，肉体的快感散播到权力上。权力对性的监督、窥视、干涉、检查、提问、审讯、抚摸，带有不可自制的兴奋感，它获得的每一份享乐细节，它搜寻到的每一个快感猎物，都使权力享受到了肉体乐趣，都使它色情化。权力和性实践的角逐反复进行，从不间断，它们相互诱惑，而又躲闪回避。就在这种无尽的追逐中，权力并没有制服性实践，并没有与它隔断、分开，而是和性实践，和反常的爱欲形式进行反复的螺旋般的渗透游戏。事实上，“权力繁殖了独特的性态，它并不设置性的边界，它扩展了性的形式，并通过无限的渗透线路追逐它们；权力不排斥性，它生产和决定了多姿多彩的性形式”。“过去三个世纪的明显特征，不是关心如何掩盖性，也不是普遍地在语言上谨小慎微，而是发明了广泛多样的机制来谈论性、迫使人谈论性、诱导性自己谈论，来倾听、记录、改写和重新分配有关性的言谈。围绕着性，一张多变的确定和强制性制造的



1869 年 12 月召开的第一次梵蒂冈理事会会议

话语网络织成了。”确切地说，这三个世纪，社会是通过权力和权力机制有计划地刺激性话语的生产。

由于性被视作人的秘密，人的普遍问题，视作自我和主体的深渊，性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就至关重要。显然，在这个社会中，性以及性话语是受到权力机制的驱使、生产和激发的，这个权力机制不是否定性的，而是“一个话语、特定知识、性感和权力组织起来的一个复杂网络的起动操作。它不是将粗俗的性推至模糊和无法抵抗的区域，而是相反，它将性传播到身体和事物的表面，唤取它，刻画它，让它开口，将它根植在现实中并让它诉说真理：这完全是一个熠熠发光的性阵列，它在快感和知识的互动中，在固执的权力中，在庞杂的话语中闪烁不已”。

纯粹的个人实践

显然，《性史》第一卷是谈论权力和性的关系的，而且是谈论 16 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中权力是如何对待性的——这与同一时期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主题较为接近，后者主要讨论的是权力如何对待罪犯。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权力不是或者说不单纯是压制性的，权力也是创造性和生产性的。《求知意志》讨论的是权力如何生产“性”和性话语，《规训与惩罚》讨论的是权力如何生产和改造罪犯。但是，数年之后，福柯的重心已经从权力方面转移到伦理主题方面，转移到他所谓的“自我技术”方面。《性史》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仍旧是将性作为讨论的对象，但是，不再是将性和权力相关联，而是将性和主体的形成，和伦理问题相关联。如果说第一卷讨论的是现代社会的性的历史，第二卷和第三卷则是讨论古代社会（希腊罗马时期）的性的历史。后两卷的主题一以贯之，因此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它们分头讨论了希腊时期和罗马时期的性的状况。

希腊伦理学将性作为它的反思和关注对象，但是，它最注重的是性的哪一方面？福柯发现，希腊人的伦理关注的要点不是性行为本身，不是这些性行为采用的种种方式；也不是性



《苏格拉底寻找阿尔西比亚德斯》(西米尔拉德斯基 绘)

欲望的起源和目的，甚至也不是快感。相反，伦理学实质上关注的是性的力度和强度，这种力度以一种连环的方式将行为、欲望、快感连接起来（欲望导致了行为，行为同快感相关，快感又引发欲望）。这样，伦理问题就不是问 :“哪种欲望？哪种行为？哪种快感？而是问快感和欲望借助何种力量使人销魂……性行为伦理学涉及的本体论即是力量的本体论，这种力是与行为、快感和欲望相连。”福柯在此表明，希腊伦理学的道德关注，它最为迫切注意的性的一面，是性行为的强度问题，而非性行为的方式问题，也就是说，它关注的是性活动的量度问



题，是性行为是否过度的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而言，对男人所作的区分，主要是看他们的性活动是强还是弱，是节制还是过度，性活动的强度和量度问题正是希腊伦理学的本体论。

如果说，伦理学的实质内容就是由快感、欲望和行为环绕在一起的性的力量和强度，那么，接着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运用这种力度和强度，也就是说，怎样利用这种快感才是恰当的。由于性的力量和强度从本质上而言就有可能过度，因此，如何看待这种力，控制这种力，以什么样的方式对这种力加以节制就成为问题，也就是说，如何运用快感就成为伦理学的问题。

快感的运用实际上是个人对自己性活动的管理方式、他给自己制定的养生方的审慎反思。快感的运用是典型的自我技艺，是自我控制自我的方案，是自我的主动践行。福柯指出了希腊人在运用快感时所要注意的三种策略：要求、合时、地位。只有在需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性活动，运用快感。这种需要刚好可以使快感的力量保持平衡：既使之满足，又不使之放纵过度。同样，也只应在合时的情况下，在恰当的时机运用快感。最后，运用快感同人的地位也有关系，一个人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性别，他就应当采用与此相符的快感运用策略。总之，快感的运用因人而异，它并没有统一的法规和制度让所有人被迫遵从。相反，它是纯粹的个人实践，是一种技艺，也是“一种态度和追求，这种态度和追求使他的行为个性化，并铸造了这种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表现出的合理和审慎的结构可能赋予他一种特殊的辉光”。换言之，自我对快感的驾驭和恰当运用，最终会创造一种个人的美学风格。

但是，对快感的这种恰当自如的运用，对性活动的灵活管理，这种节制式自我实践和技艺并非唾手可得，相反，要自如地掌握快感的合理享用方式，需要自我的反复训练，需要自我对自我的控制努力。福柯发现，这种自我控制乃是一种操练，其目的就是为了使自我不再被快感和欲望所统治，相反，是要让自我成为它们的主人，从而为恰当而自主地运用快感打下基础。怎样才能控制自己的快感和欲望？首先，要将快感和欲望视作一种可怕的力量，自我应与之展开无情的战斗，

人和欲望的关系类似于一种战争关系。这种战斗就发生在个体的内部，是个体的自我与自我的交锋。自我一旦战胜了自己的欲望，控制了欲望和快感的暴烈，就是胜利，也是德行和至善。对欲望和快感的胜利，也就是说，自我控制的成功，并不是要消灭欲望，让欲望弃绝，相反，它承认欲望的存在，但是它能够自如地驾驭这种欲望。在此，自我不是被欲望和快感所奴役，而是相反，欲望和快感则为自我所奴役。

这样，相对于快感和欲望而言，自我就是它的主人，自我能够自如地驾驭自己的快感，自我也就实现了对于快感的自由，在此，对希腊人而言，对欲望的自我控制正是自我的自由实践，这种自由是对快感的控制，因而也是一种力。自由和力量结合起来，对快感和欲望进行管制，这就是有节制的人的品质特点，是男性气的表现，也是男人具有至善德行的表现。同时，这种节制和自我控制也是通向真理和智慧的必然途径。福柯发现，希腊人相信，节制的人的心灵部分协调一致，他们能够获得真理和知识，而不节制的人因为被欲望所主宰，就显得既盲目又愚蠢。

福柯指出，希腊人的性行为并没有受到外在因素的干预，也没有什么教会机构和医学机构去禁止和决定性活动。一般而言，性的问题越出了城邦法律的视野之外，只是受到伦理学的观照。性在那个时候比中世纪的基督教和现代的欧洲人更容易接受，也甚少招致诽谤，性行为是活跃、宽松和无拘无束的，它既不受到压制，也不被认为是病态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主动地去节制，为什么要精心地控制自己的快感？这样自我控制的苦行目的何在？希腊人这么做——对妻子忠贞，不碰男童——是因为“他们想有一个美的存在”，“想有一个好名声”，“能够统治他人”，“所以，他们为了存在的美和荣光有意地接受了这些义务，这是一种选择，既是美学选择，又是政治选择”。

同时，这也体现了个体的自由实践，表达了个体的风格化态度。这就是希腊伦理学的目的论。希腊人的苦行、自我技术、道德实践都以风格化的美学存在为目的，或者说，这些性节制和性控制的自我技术创造出了一种个人的美学风格，它既具有美学价值，也具有道德价值和真理价值。这种伦理学的目的同基督教伦理目的仍旧截然不同，基督教的目的在于来世，在于不朽和纯洁，它旨在摒弃欲望的自我而不是创造一个美的自我。希腊伦理的节制是为了创造一种生活风格，是一种自由的践行，而基督教的节制则是为了保持纯洁，保持对欲望的净化。希腊伦理的节制采用的是自我主动控制的技术，而基督教的节制是被动控制的技术。对基督教来说，死后是重要的问题，但是，希腊伦理很少关注宗教问题和来世问题。在基督教这里，通常有法律或社会、宗教机构关注伦理问题，但希腊伦理与制度没有关系，与法律没有关系。伦理行为都是个人自身的行为，“应该摆脱掉伦理观同其他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相联系的观点”。

这样，个人才能自主地选择，才有可能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一个风格化的存在形态。这一风格化的存在形态，这一日臻完善的伦理主体，既不是借助于宗教的力量，也不是借助于法规的支配来建立和完成的。相反，他的形成只通过恰当的自我控制行为，只是通过自己对自己的绝对统治来完成的。这种自我统治就是对快感的统治，就是对快感的自主和自由，也就是自制和克制，就是苦行，就是对欲望所取得的战争胜利。最终，这是自我对自我的态度。所有这些自我施加于自我的控制行为，都是德行，也是审美，它们的结果和目的就是生存的艺术，就是为了获得一种熠熠生辉的存在模式。这也是福柯所说的生存美学。

但是，自基督教诞生以来，这样的美学主体寥若晨星，文艺复兴时期曾经有过短暂的闪现，波德莱尔笔下的花花公子也曾偶尔为之，除此之外，福柯没有看到自我对自我的美学锻造。但是，他最后的希腊之旅，却发现了这种态度的一个样板，一种我们今天完全遗失的“气质”。但是，这种态度和气质是怎样遗失的？或者，我们更具体地说，这种古代世界的希腊气质怎样开始遗失于基督教世界中的呢？这就是《关注自我》要回答的问题。

福柯发现，在希腊——主要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伊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等人的希腊——的以快感为内容的伦理学中，自我技术、生存美学的标准主要运用于希腊人的三个日常生活领域：身体的养生法；婚姻；成年男子与男孩的爱情。在这四个领域中，生存美学一直在发挥着功能。这四个领域中对快感进行控制和节制的自我技术都是以一种风格化的自我存在形态为目标的，而且，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比如，在养生法中，人们之所以主动地节制，之所以对性行为进行调节和妥适的安排，这并非因为性行为是邪恶的，是人们固有的污点，相反，这既是因为人们担心过度的性消耗会危及身体的健康，使人精力锐减，甚至对生命造成威胁，同时也是为了保持道德主体的完整性，保持住能控制自己精力而获得的美名。在婚姻关系中，男人对妻子保持忠贞，并非因为这是他务必服从的义务，也非婚姻的内在本质对他的规定，同样也非他的妻子对他有这样的要求，相反，这是他的主动意愿选择，只有这样主动的节制，“他的声名，他和别人的关系，他在城邦中的威望，他获得一种至善存在的意愿才能取得”。这里，节制同样是因为一种美学存在目的而



正在刺绣的希腊女人

做出的刻意选择。在成年男人同男童的恋爱关系中，情况稍稍复杂一些，因为对这种同性恋关系的节制比养生法和婚姻中的节制更为严厉，更为紧迫。但是，不能因此说在希腊文化和伦理中同性恋关系就是非法的，相反，“希腊人赋予它合法性，我们也乐于将其看作是希腊人在这个领域享有自由的证据”，虽然他们对此采取了最严厉的节制态度，但“除了几种情况外，他们并不对之谴责和禁止”。那么，这种节制，或者说这种“苦行”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它并非取消对男孩的爱情，而是相反，“它是让这种爱情风格化的手段，并因此为这种爱情赋形，让其赋值”。同时，也让这些男孩更具有男子气，使他们将来可能享有自由的人的地位。“这已不单单是男人控制其快感的问题，它还是这样一个认知问题：在个人对自己的控制，在个人的真正爱情中，他如何允许别人的自由？”也就是说，这种极其严厉的自我控制不仅仅是使自身，使这种爱情风格化，同时，它还担当着让别人获取自由的责任。在此，爱情、快感和真理的复杂关系得以确认。

我们看到，在希腊人的性伦理学所实践的三个日常领域中，节制和自我控制，这些苦行式的自我技术总是表示着一种态度，即将自身美学化，将自己的生活艺术化，将自己的行为风格化的态度。这种节制、控制和苦行在以后的漫长历史中得到了强化。与人们的一般想法相反，这些苦行实践并非起源于基督教，相反，“基督教后来直接从希腊借用了这些苦行实践”。如果是这样，如果苦行实践自始至终贯穿于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欧洲，那么，它们的伦理实践和伦理观有何区别呢？

区别即在于这种苦行实践所表达的态度和目的中。虽然都是苦行实践，但是其态度和目的并不一样，也就是说，伦理学的内容是一致的，但目的不一致。对希腊人而言，苦行是关注自我、锻造自我、创造自我的手段。它意在让自我获得一种雕琢的独特的风格化的审美形态，意在让自己的生活成为艺术品。希腊人的苦行是一种坚忍的态度选择。但基督教这里，苦行不是自我的态度，它不是创造自我，而恰恰是自我的摒弃，是自我欲望的弃绝，其目的是符合上帝的意志从而使自身保持纯洁。这样的自我是被动的、服从的、萎缩的、单调的、他律的，他既不风格化，也不美学化。在此，关注自我，福柯提出的这一哲学批判气质和哲学态度荡然无存。基督教的苦行不是主动的苦行，而是严格禁律下的被迫苦行。在基督教这里，性通常受到法规和准则的压抑，这些法规和准则是针对所有人的，它通常表现为禁令，且常常有宗教机构来执行这些禁令，依照法律对违禁进行惩罚。但是，对希腊人而言，不与妻子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这并不是有明确的禁令迫使男人如此行事，相反，这是男人的主动选择行为，是他们有意的节制，是他们为了某种目的而做出的选择。而在基督教这里，婚外性行为



《芙里尼在伊琉西斯的波塞冬庆典上》(西米尔拉德斯基 绘)

是必须禁止的，所有男人必须服从这道禁令，男人之所以要保持忠贞，不是因为他的主动节制，也不是他的有意选择，而是被迫屈从于这道法律般的禁令，“是对牧师权威的遵从”。对希腊人而言，发生了婚外性行为仅仅是缺乏节制的表现，是个体被欲望和快感所控制的结果，但他们并不因为违禁而受到处罚，也没有禁令阻止他们这么做。但在基督教这里，这不单单是欲望失控的结果，它还是违法行为，且要因为违法而受到处罚。在希腊人这里，节制和控制都是个体的主动行为，而在基督教这里，节制或者控制常常是禁律使个体被动使然。

我们看到，在希腊人的主动苦行和基督教的更为严厉的被动苦行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一个中介，这，就是古罗马时期的关注自我的苦行实践。正是在此时，养生法、婚姻、对男孩的爱情既继承了希腊人节制所表现出的风格化的美学态度，又预示了基督教日后有关节制的严酷禁律。也就是说，罗马时期是希腊时期的主动节制到基督教时期的被迫节制的一个过渡环节。

希腊人那里发现的“格调”、“气质”、“态度”，怎么消失了

这就是《性史》第三卷《自我关注》



的主题。福柯对罗马帝国时期苦行实践的探讨主要限定于公元头两个世纪的斯多葛派中。在他看来，这些自我实践仍旧内在于希腊时期的自我—控制伦理学的传统中，但是，它同那个时期还是发生了变化，在方向上，在着重点上发生了变化。在罗马时期，自我实践的重点转到了自我培养这一领域。正是在自我培养的实践中，伦理主体性的构成要素发生了变化。虽然这种自我培养的目的仍旧是生存艺术，“但这种艺术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理性或自然的普遍原则，所有人无论地位如何，他们都应以同一种方式看待这一原则”。这一原则虽然不是加固的禁令，但较之希腊时期显然变得更严肃、更苛刻。同样，个人仍旧要同快感的力量做斗争，仍旧想制服快感，但是，个人的主动性，他的控制力减弱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个人的脆弱性和虚弱性方面，转移到他的自我保护的需求方面。有关个人的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与此相关，自我考验、自我检查、自我控制，其任务当然和风格化的存在形态有关，但它更强调自我的认知真理。“最后，这种自我制作的最终结果仍旧为个体的自我统治所确定，但这种统治扩充进这样一种经验中：自我与自我的关系不仅仅采取支配的形式，还采取无欲望、无麻烦的享乐形式。”

所有这一切，福柯试图表明，希腊时期的关注自我实践和罗马时期的关注自我实践虽然同在生存美学的大框架内，但是二者已经发生了偏离。罗马的自我培养实践是在向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迈进，虽然它们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希腊的实践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美学化的自我，这种实践并不关注身体的内在知识，它不需要去解释身体的知识和真理，希腊的实践按照谱系学的方式同目的接连起来。而罗马的实践的目的除此之外，还表现对身体的知识性解释，对身体虚弱性的关注，这样，对性的控制不仅仅是自由的实践，还是一种出于身体忧虑而采取的控制措施，这就预示了基督教禁律的形成——禁律总是为了某个信念而采取的压制。希腊人的生存艺术本身是变动不居的，没有固定形态的。但是，罗马的生存艺术则与一些普遍的法则相关，这样，生存艺术一旦被明确地界定下来，它就失去其艺术性了，而成为一些制度的原则，最终成为基督教伦理中的律令。最后，在罗马时期，“性行为本质上和实际上并非恶，但其形式和效果与恶相连”。而丈夫的忠贞不仅仅是他为了获得美名而进行主动的节制，他现在还得考虑婚姻的关系本质和夫妻间的相互关系，因而这种节制就不再完全是主动的了。在与男孩的关系中，节制“越来越不被看成是赋予这种爱情以最高的精神价值的方式，而更多地被视作性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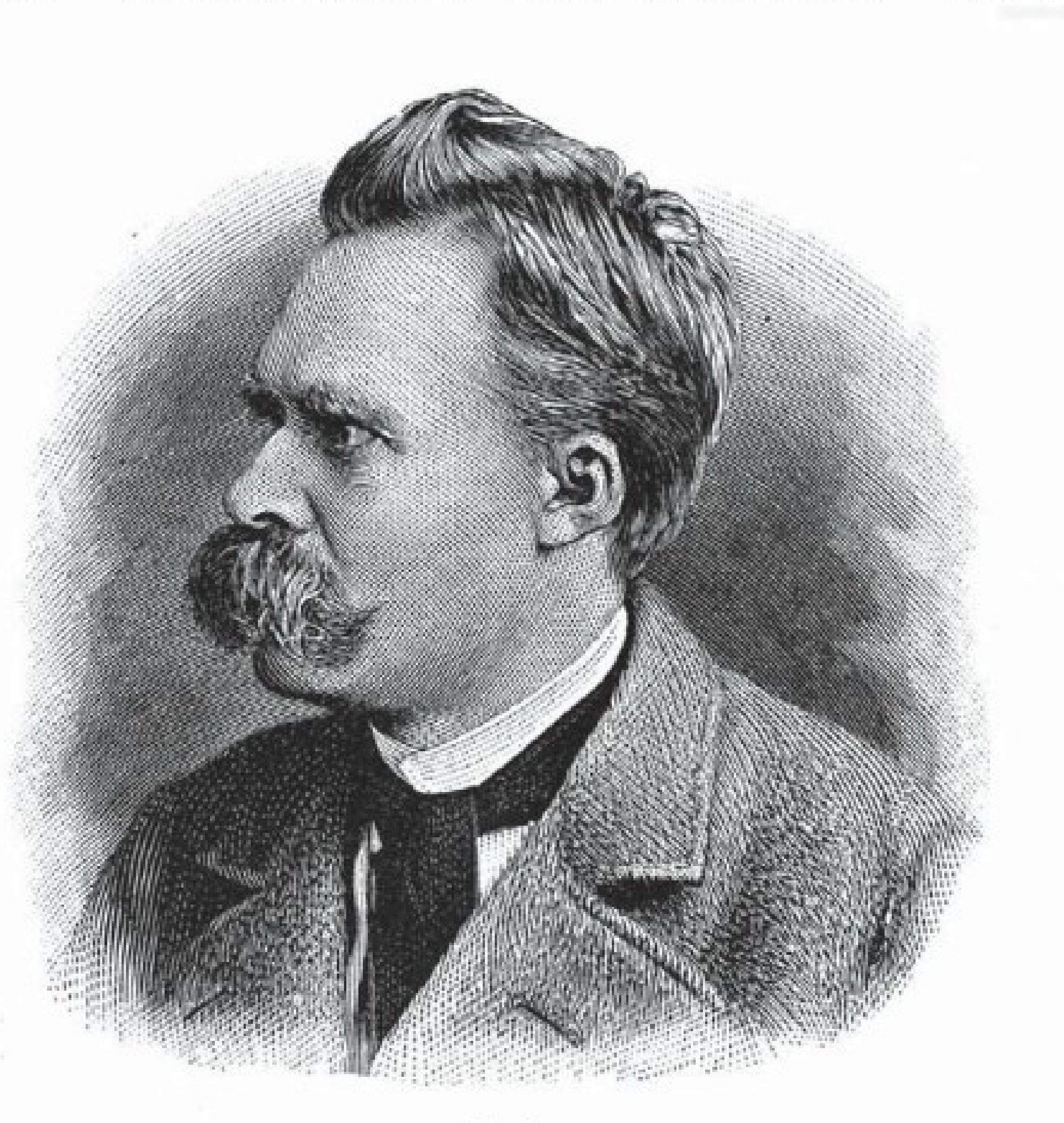
所特有的不完善标记”。

总之，在罗马时期，节制和控制的主动性减弱了，也就是说，节制和控制中所表现的自由淡化了，节制和控制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被动性、服从性。因为身体可能的疾病和虚弱而节制，因为夫妻间的义务而节制，因为对男孩的爱是不完美的而节制，因为性和所有这些不光彩的行为和想法相联系而必须节制。这样，这些节制似乎是迫不得已的，是必须做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屈从于外在要求的。节制就这样由希腊的完全主动的个人选择逐渐向被迫的服从滑动，逐渐从自由实践变成被动屈从。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福柯并没有将男子的这些节制实践等同于后来的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相反，这些节制实践终究是在希腊的生存美学的框架中，它仍以生存美学为标准，它只是孕育着未来基督教道德的种子。福柯在《性史》的第四卷《肉欲的忏悔》讨论了基督教的道德体系，可惜，福柯生前不让出版这部关于基督教时期的性的著作。他只是在《关注自我》的结尾勾勒了它的抽象架构：“以限度、堕落和罪恶为基础的伦理实质；臣服于普遍法律和人格神的意志的屈从模式；对灵魂进行探究，对欲望进行升华式解释的自我实践类型；意在自我摒弃的伦理完善模式。”在这种禁律—屈从的基督教道德体系中，福柯在希腊人那里发现的“格调”、“气质”、“态度”，完全地烟消云散了。

人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了艺术品

《快感的运用》和《关注自我》是《知识意志》出版8年后的产物，在这期间，福柯没有新书问世。按照德勒兹的推测，这期间福柯的思想发生了危机。他先前对权力的淋漓尽致的研究很可能使他陷入权力的死胡同中：到处都是权力，有没有权力之外的东西？如果确实如此，福柯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承认权力的无限肆虐，然后搁笔停止写作；要么重新开始，在权力之外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福柯选择了后者，并将这种可能性的探究目光投向了古代的希腊。为什么转向了希腊？转向了福柯曾经毫无兴趣的希腊？——他曾对尼采、海德格尔对希腊的求助抱以善意的揶揄。如果说福柯分析的权力，主要是16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进程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体制化权力，那么，在现代社会



尼采

之前，在种种现代机制及各种权力技术尚未出现之前，西方人是如何确立自己的主体性的？如果主体不是被权力所打造，那么，主体是如何自己改变自己的？也就是说，如果权力技术的功用并不显著，如果权力不是无孔不入，如果权力并没有完全主宰着个体的成型，那么，个体，希腊的这些自由民是怎样为自我造型的呢？

这就是《快感的运用》和《关注自我》的研究前提和动机，它和《何为启蒙》中的问题是一致的：个体怎样溢出权力—知识的界线之外？福柯试图通过《性史》中的“生存美学”所指出的，存在着一个自我尝试的主体化过程。即，不是去对个体进行自我解释，不是将个体作为知识对象，去挖掘它的隐秘存在，而是将个体视作具有多种可能性的主体化过程，是一个主体的成型过程，是一种新主体性的可能性实践。也就是说，主体能够处在一种创造和发明的过程中。它也正是通过自我创造，而具备一种美学化的风格，它是一种自由的实践。就此，主体也是一种艺术品。

但是，希腊人的节制式的自由实践是我们今天的样板吗？不，福柯坚定地认为，希腊人并不是榜样，也不值得赞赏。而且，“我认为古代道德还存着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对某种生存风格的不倦探索，另一方面又努力地使这种风格适用于所有人”。这种不倦探索也许是福柯所推崇的哲学气质，但是建立一种普遍性的风格原则就接近于宗教原则，而这则是一个“深刻的错误”。“在我看来，过去某些特殊人群开始对存在风格的追求的原则之一即是探究每个人彼此不同的存在风格，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勉力以求的。而追求一种每个人都接受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服从的道德，在我看来，那是一场灾难。”也就是说，少数希腊人的那种奠基于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批判气质是现代人所需要的，而那种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则是令人厌恶的。对希腊人而言，福柯推崇的是那种以风格化为旨归的态度，是追求生存艺术的气质，而不是这种风格化的技术本身，不是他们对节制的具体运用，不是自我实践的内容，也不是有可能模式化的存在艺术形态，尤其不是那种普遍性的通用道德。在福柯这里，古代的伦理大任决不能成为今天的重续，当代的问题和答案也

决不可能在古代中找到，但是，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在有着巨大沟壑的古希腊和今天里，有一张纸牌“在一只全新的手中重现：一张牌——自我对自我的精雕细琢，主体的美学化——在两种迥异的道德体系和迥异的社会中”。这张牌就是自我实验中蕴含的哲学生活，就是因为渴望自由而进行的耐心劳作。不要去问如何进行自我的反复实践和检验，而是要保持这种不断自我实践和检验的态度和意志。

试验自己，这是尼采的要求。尼采在《曙光》中说：“我们重新鼓起了勇气。正由于此，个体，或一代人现在都紧紧盯住一些伟大的，在前人看来是些疯狂的任务，这即是对天堂和地狱的嘲弄。我们可以试验我们自己！是的，人有权这样做！我们尚未为知识做出最大的牺牲。”对天堂和地狱的嘲弄，用直截了当的话说，就是对既定的普遍道德的嘲弄，就是义无反顾地甩掉我们身上的道德界线和历史包袱，甩掉包围着我们的善恶纠缠，就是发现我们身上的无限可能性。这就是存在艺术的真谛：不是去承认和接受一个既定的主体现实，而是将自己作为一个不定的可塑性对象，去不断地考验它、试验它、创造它，将它作为一个艺术品来创造。但是，这样的自我风格化创造差不多被人淡忘了，福柯忍不住问：“令我震惊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变成了只与客体相关的东西，它和个体、生命没有关系。这种艺术变得专业化了，而且只能由艺术家来完成。但，人们的生活为什么不能成为艺术品？为什么房子或灯是艺术对象，而我们的生活却不是？”这几乎是对尼采的这句话的呼应：“赋予个性一种‘风格’，实在是伟大而稀有的艺术！”

尼采将那些将自己的天性作艺术性规划的，将那些憎恨束缚和役使的人称为奇才，这些人天天辛劳地演练，尼采宣称：“总是旨在把自己和周围的人塑造和解释为自由天性，即粗野、专横，富于想象、混乱无序，令人惊异的天性，他们乐此不疲地追求这一宗旨，唯其如此才感到惬意。”在创造自我的风格这一点上，福柯又一次和尼采对接上了。这就像德勒兹所说的：“尼采说，思想家总是放出一支箭，像是无的放矢，另一个思想家将此箭拾起，射向另一个方向，福柯即是如此。”尼采的片断，被福柯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改造，这就是尼采和福柯的关系，尼采已经在古希腊人那里发现了美学化的生活，福柯将此再次提及，但同样做了修改。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人轻歌曼舞，“他陶然忘步忘言，飘飘然乘风飞”。此时此刻，“人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了艺术品……在这里被捏制和雕琢”。作为艺术品的人是在希腊的酒神艺术中出现的。对尼采来说，人不是艺术的创造者，更不是艺术和现实的中介，相反，他就是艺术品本身，他等待着被创造，在酒神的精神的作用下，人和艺术混然交融。人的价值，就在于他作为艺术品的价值，就在于他的审美价值，“因为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也就是说，在生活的一切领域内，审美态度是决定性态度，要以审美的眼光打量一切，要以审美的标准评价一切，要将整个世界、整个日常生活美学化。尼采正是在酒神的宇宙艺术那里，发现了世界浑然于审美的狂欢节日之中。

如果采纳的是唯美学标准，那么真理标准和道德标准就应该待在一边。尼采之所以回到希腊悲剧，就在于希腊悲剧为审美的酒神艺术所主宰，它的题材是酒神的受苦，它的主角就是酒神。但是，希腊的这种酒神化和美学化态度被苏格拉底打断了，苏格拉底精神和酒神精神势不两立，理性精神打断了美学精神。苏格拉底崇尚的逻辑、理性、认知、辩证法和真理彻底毁了悲剧艺术，也毁了一个美学世界。这是科学和真理的最早显现，但是以屠戮诗和神话的刽子手的形象显现，对尼采来说，苏格拉底是个恶棍。不仅如此，道德标准也应该放弃。理性毁了艺术和生命，道德——当然是基督教道德——同样毁了艺术和生命。尼采为了捍卫美学标准，他左右开弓，既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宣战，也向耶稣基督宣战。前者是以理性和科学的名义毁了审美，后者则以伦理和道德的名义毁了审美，在基督教这里生命绝非为一个美学的力量所充斥、主宰而显得生机勃勃，相反，生命因为负疚、责任和良知的颤抖而变得负荷累累，变得死气沉沉。在尼采这里，生命、审美和力是同质性的，它们都是流动的、生成性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在希腊人这里，它们彼此交织，相融一体，但是，苏格拉底的理性和耶稣基督的道德使之荡然无存。

从尼采的这个诊断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出福柯对生存艺术的选择。这种生存的艺术同样是出于挣脱自我的奴役界线的目的而设想的。自我的界线，一方面是外在的规训权力，它同理性的漫长发展相关——福柯事实上远远超出了启蒙运动，将它追溯到了希腊的城邦制；另一条界线与个人内在道德相关，福柯对牧师权力的探讨就是对这条界线的谱系学追踪。显然，设置于个人头上的界线同样是理性界线和道德界线，它们的最初源头仍旧在希腊的城邦制和基督教的起源中找到。生存的艺术，以美学为标准的生存、自我实践和日常生活，当然不可能像尼采那样指望在希腊悲剧中复活，福柯只寄希望于自我的极限体验，寄希望于自我对自我反复尝试，寄希望于各种各样的僭越实验。在这方面，福柯并非一个说教者，他是伟大的身体力行的哲学家，同时，因为这种身体力行的美学目标——这也是唯一的目标——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艺术家。



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1928~2014）



1 月 13 日，以色列为 11 日去世的前总理沙龙举行国葬。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在沙龙的葬礼上献花圈

沙龙谢幕

与极端沙龙对应的是复杂的格局。

记者 ✎ 徐菁菁

农夫与土地

1977 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历史性地访问耶路撒冷。他在那里见到了沙龙。这是一对老对手。在 1973 年阿以战争中，沙龙率军越过西奈半岛，包围埃及第三军，扭转了以色列被动的战局。“在你越过运河到我们这边来时，我曾经试图捕获你。”萨达特告诉沙龙。沙龙回答：“那么现在，你有机会‘捕获’我这个朋友。”

这年年底，萨达特和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和谈。萨达特要求“西奈每一寸土”，而贝京曾向西奈的犹太居民保证过绝不会出卖自己的同胞。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当双方对峙不下时，正是当时任犹太定居点委员会主席的沙龙提出，如果其他问题能够解决的话，他主张让出西奈。以色列归还西奈奠定了历史性的埃以和平协议的基础。2005 年 8 月，总理沙龙下令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撤军。人们揣测沙龙是否还会改变历史。但这种揣测始终未能被现实所检验。5 个月后，沙龙中风，再也没能离开病榻。

在中东，沙龙比任何人都富有争议。他以“第一个不再宣称以色列有权占领全部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总理”的身份离开，但他的一生都以为以色列开拓疆界为己任。他参与了以色列建国后的所有战争，每一场战争都在扩大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土地。在贝京政府中，沙龙推出了“沙龙计划”，在西岸建立



1973 年 10 月 18 日“赎罪日战争”期间，沙龙（左）陪同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中）在苏伊士运河西岸视察部队



新的人口走廊，推进以城市为中心，扩建卫星城镇的定居点扩散方式，大肆鼓励犹太人外迁定居。为此沙龙被称作“犹太人定居者之父”。

在阿拉伯世界，沙龙从来都是“魔鬼”的代名词。在以色列，左翼唾弃他在战争中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右翼斥责他出卖犹太人的利益，是个叛徒。沙龙究竟是谁？1982 年，国防部长沙龙率军入侵黎巴嫩。在一次记者见面会上，一位西方记者指责沙龙是“战争狂”。沙龙“噌”地站立起来，大声喊道：“我憎恨战争，它使我多次负伤，甚至差点丢了性命！我宁愿回我的农场，开拖拉机，照看羊群！”

2014 年 1 月 14 日，沙龙的遗体在锡卡莫尔农场下葬。锡卡莫尔农场占地 1000 英亩，是以色列最大的农场之一，位于内盖夫沙漠的边缘，是沙龙家族的财产。沙龙一生背负“战士”的标签，但也许“农民”身份更应该是理解沙龙的起点。

“在战士之外，沙龙是个农民，他有着对土地的深刻认识，并紧密地与土地联系在一起。他对农业深感兴趣，对《圣经》上对土地的描述了熟于心。”美国智库伍罗德·威尔逊中心中东项目副主席艾伦·大卫·米勒是沙龙的老相识，他在文章中回忆，“沙龙谈起这些时总是充满了自豪感。1998 年，克林顿总统斡旋召开怀伊河峰会。在会上，沙龙拒绝和阿拉法特握手。即使和巴勒斯坦人坐在一张桌子上，他也坚持用第三人称称呼他们。事实上，相对于谈判，他对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在怀伊河农场养殖的珍贵的安格斯牛更感兴趣。他在自己的农场里待客，在谈正事之前，他总是要先谈论鲜花和牲口。”

沙龙一生喜爱吃鱼子酱，喝伏特加。哪怕在行军时，他的装甲车里，这两件也是必备之物。这并不是父亲对沙龙的全部影响。

1928 年，沙龙生于特拉维夫附近沙龙地区的卡法马拉勒村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沙龙的父亲萨缪尔·沙因诺曼曾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农艺学校学习，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的里托夫斯克做过希伯来语教员，是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沙龙的母亲维拉什涅罗夫出生在白俄罗斯莫西莱夫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

萨缪尔与维拉新婚不久，正赶上世界范围内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风潮。格鲁吉亚把大批要求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视为“分离主义者”，



2005 年 8 月 1 日的加沙，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释放催泪弹。这一日，沙龙政府下令以色列军队单方面撤出加沙

全部押送到西伯利亚流放，萨缪尔侥幸逃脱。1922 年 2 月，他和妻子怀着对“应许之地”的情感，躲过安全部门的检查，从著名海港巴库登上轮船，来到当时还未建国的以色列。

萨缪尔夫妇带着一把小提琴和一把高加索刀，拒绝了犹太集体农庄“基布兹”的盛情接纳，一眼选中特拉维夫西南收获归个人的单干移民点。

老萨缪尔是一个成功的农夫。他工作勤勉，善于采用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农具，逐渐拥有了大面积的土地，成了当地首富。对于土地，他有自己的原则：他从不与村民往来，拒绝土地共享的古老犹太传统。他在土地四周架起篱笆，用武力捍卫私有田产不受侵犯。即使子女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依然严厉要求他们在农场辛苦劳作。

在萨缪尔看来，暴力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1929 年，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阿拉伯人打到了沙龙家附近，父母亲拿着棍棒守在院子门口，沙龙被母亲维拉裹在毯子里，放在牲口棚里才躲过这一灾难。在沙龙 6 岁的时候，萨缪尔交给他一根大棒，让他看守他家的农场果园，并告诉他，发现有进来偷窃的阿拉伯孩子，就抡起大棒教训他们。他告诫沙龙，在以色列这个特殊的生存环境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你不战胜阿拉伯人，就会被阿拉伯人置于死地，因此绝不能心慈手软。很快，沙龙就被当地人奉上了“大棒小子”的称号。

战场逻辑

14 岁时，沙龙加入了犹太人秘密组织“哈里纳”。“哈里纳”最早是犹太人移民自发建立的军事组织，分布在各地的定居点中，后来逐渐向以色列正规军方向发展，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预备学校。少年沙龙在这里经过了基本的军事和情报训练，并对军事深感着迷。他在自传中写道，军队令他找回了童年在农场中的乐趣，他对工作极为专注，以致“迷失其中”。

艾伦·米勒指出，在某个时刻，美国情报机构曾经通过估算沙龙的体重来推测他可能采取的行动——沙龙身材不高，刚刚 1.7 米，但体重长期在 100 公斤以上，他在餐桌上毫无节制，这被视作是根深蒂固的不受约束的个性的体现。在情报机构看来，他吃得越多时，就越有可能冒险。

这种不受约束的冒险精神为沙龙在以色列军中的发展开拓了无尽的空

间。1948年5月5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在一次交战中，阿拉伯联军抓住了两名以色列士兵。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决定抓获几个阿拉伯联军士兵，以便交换以军士兵。参谋们为制定各种营救方案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时。军衔仅为排长的沙龙带了几个士兵，穿上阿拉伯的长袍，伪装成约旦的农民，开着吉普车穿过了火线。一小时后，达扬的桌上留有沙龙的纸条："摩西，俘虏在地下室。"许多年后，达扬在回忆录《我的故事》中还念念不忘当年沙龙给他的巨大震撼。

在战场上，沙龙永远只相信自己的判断。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总参谋长摩西·达扬让沙龙的师担负着中路进攻的艰巨任务。沙龙的部队负责攻克的阿吉拉赫是西奈的中心轴和南北交通要冲。埃及人受过苏联式的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把兵力部署在牢固的钢筋水泥掩体内。沙龙发现，埃及主力步兵第二师防守的阿布奥格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南面有连绵峭壁的岩石山为依托，北面以无法通行的沙丘作为屏障，控制着西奈半岛的中心轴，扼守着向北通往埃及重镇阿里什、向南通往克赛伊马的公路。埃及人在阿布奥格拉的有利地形上，修建了有名的卡泰夫基地，配备各种轻重武器，声称这是攻不破的防线。

为了攻克阿吉拉赫，沙龙制订了16种方案，后经反复考虑选定其中一种。战斗打响之前，以色列总参谋部来电话说，要求沙龙将进攻日期推后，以等待空军支援。沙龙拒不领命。1967年6月5日晚22点，沙龙命令炮兵猛烈轰击阿吉拉赫地带，20分钟内向该地区发射了3.6万多发炮弹。炮击结束后，埃及步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沙龙的伞兵部队进攻受阻。沙龙突然命令各部队打开聚光灯，霎时间暗夜变为白昼，刺得阿拉伯士兵睁不开眼，沙龙乘机命令他的三个旅展开进攻，突破对方两道防线，以战死40人、负伤120人的代价，取得歼敌千余人的战果。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东区、加沙地带、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夺取了6.5万平方公里土地，使以色列土地猛增了3倍。豪赌成功的沙龙成为以色列国防军南部军区指挥官，控制了以色列南部地区和整个西奈半岛。

从军使沙龙的目标从保卫自家果园和农场变成了保卫整个国家。而不同目标都以暴力为手段，以胜利为最高原则。"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世界怎么评论以色列无关紧要，"沙龙说，"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在祖先的土地上生存下去。除非我们向阿拉伯人显示：谋杀犹太人要付出巨大代价。否则，我们将没有立足之地。"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沙龙



1948年2月拍摄的士兵沙龙

的信条很快让他在中东获得了“魔鬼”的称号。1953 年阿拉伯渗入者采取行动，杀了一名以色列人和他的两个孩子，以色列最高领导人下令实施报复行动。沙龙主动请战。他率领突击队深夜出动，把小城基布亚包围得水泄不通。沙龙象征性地喊了一声：“喂，城里有人吗？”然后就下令进攻，把 1300 磅炸弹发射出去。这场报复行动杀死了 69 个阿拉伯人，其中包括不少妇孺。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沙龙睡在他的南部军区指挥部里，以疯狂的热情投入工作。对于部分以色列人来说，他对粉碎在加沙地带活动的“恐怖主义机构”功不可没，终于使西奈半岛的局势稳定下来，但他的残酷镇压手段引起以色列军队内部人士的异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给以色列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甚至在政府会议上对沙龙表示强烈不满。沙龙不以为然，他拜会摩西·达扬：“我什么时候能当总参谋长？”达扬告诉他，这是不能实现的愿望，1973 年底，沙龙的南部军区指挥官任职 3 年期一满就将被解除职务。沙龙强烈要求再服役 10 年，但几天之后，就接到总参谋部人事局的电话：总参谋长巴列夫拒绝延长沙龙的服役期限。

国防部长之路

多年之后，沙龙在《开罗之路》中写道：“1973 年 7 月 15 日，比尔谢巴南部军区司令部，我在房里可以听到口令、步伐、鼓声齐鸣。仪仗兵正在演练司令交接仪式。我竭力自制，强作微笑，但我发现腿在发抖，因为我的路已到尽头。为期 3 年的南部军区司令行将届满，我 45 岁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可我申请服役的报告竟被拒绝……我参加过以色列的每一场战争，风云变幻紧要关头，我被授予特权为国效力 25 年之久。”“我一直避免介入任何特殊集团，为此我一直独自工作。我一直主张一个男人必须勇于说出自己的观点，然后为之奋战……一切结束，我将回到农场照顾我的羊群、羊羔和马匹。25 年来我一直充任战士，可归根到底我仍是一个农民。”

但实际上，沙龙并不甘心回家守卫自己的小小农场。在好朋友、财政部长萨皮尔的建议下，沙龙开始认真考虑在政界的发展。

在战场上，沙龙的敏锐嗅觉总是能让他看似“鲁莽”的行动大获成功。在政界，沙龙也同样具有独到的眼光。他发现，以色列的政治舞台主





1982 年 9 月 14 日，开进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的以色列坦克。当天，以色列扶持的黎总统巴希尔・杰马耶勒被炸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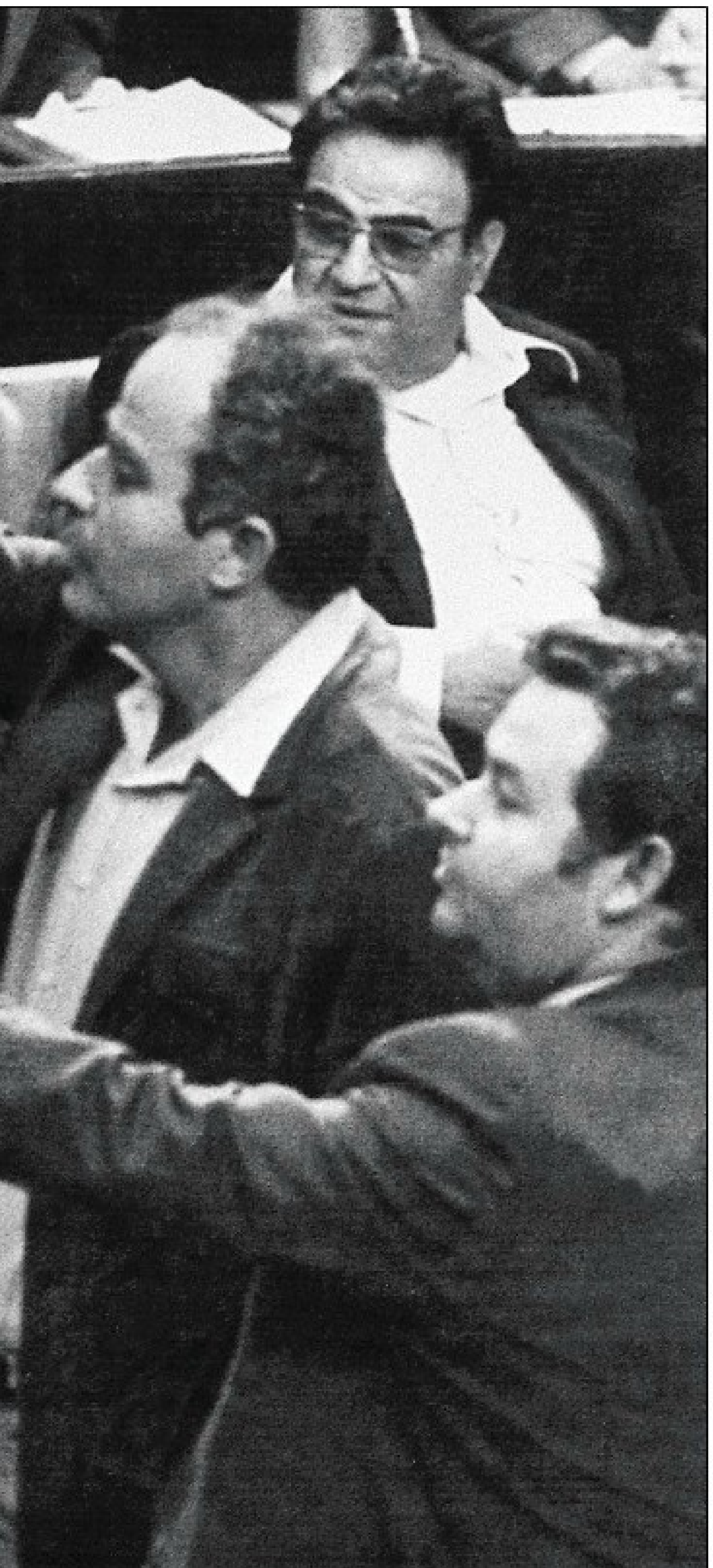


1983 年 2 月 14 日，以色列总理贝京（前左）在议会上支持免去沙龙（中）国防部长的职务

要是由联合了不同劳工政党的工党联盟所支配，要取代工党夺取国家政权，就要把所有的右翼政党组织起来，建立一个“以色列全国自由联盟”，即利库德集团。沙龙还意识到，要说服右翼各派别进行联合，必须得到以色列政界重量级人物、反对派自由党领袖贝京的支持。贝京 10 岁就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活动。沙龙知道贝京想要什么。他对贝京大谈自己的大以色列理想，并表示愿意在他手下工作。贝京欣赏沙龙为实践国家目标无所畏惧的作风，也发现他在一定情况下能屈能伸，具备政治家的条件。两人一拍即合。

另一面，沙龙为筹集充足的活动资金，飞往美国，拜会美国犹太人富商梅舒拉姆•里克利斯和萨姆•沙克斯。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沙龙曾以战斗英雄的身份，孤身被派往世界各地，向犹太组织和个人募集资金，建立扎实的个人网络。里克利斯和沙克斯告诫沙龙：以色列的外交和内政要严格分开，对外要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对内要设法投选民所好。

利库德集团太过年轻，在 1973 年的大选中尚无法撼动工党的统治。对于沙龙来说，从政之处的“水土不服”





1973 年，以色列空军 A-4 天鹰战斗机准备投入战斗

也令他颇为狼狈。沙龙当选议员，作为利库德集团政策委员会主席进入国会活动。在很多国会议员看来，沙龙犹如一头暴怒的公牛，拒绝进行平心静气的持久讨论，反对彬彬有礼的相互辩论，缺乏政界人士之间的相互尊重。他经常用近乎野蛮的方式反对他的对手，威胁、警告、诅咒、嘲弄甚至侮辱对方，使对方难以接受。

他对无休止的国会辩论和处处需要妥协的党派政治也感到厌烦。他甚至公开表示不赞成利库德集团的政治纲领，主张解散组成利库德集团的四个政党，重新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遭到大多数成员的反对。1974 年 3 月，沙龙一怒之下辞去利库德集团政策委员会主席职务。

在政界屡屡碰壁的沙龙还是在战场上找到了自己的机会。1973 年 10 月 3 日，沙龙向总参谋部一些朋友提出他的看法：埃及、叙利亚正在谋求对以色列发动进攻，战争一两天内就会爆发。但是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参加的总参谋部作战会否定了这种观点。

10 月 6 日又是犹太人圣节“赎罪日”斋戒开始的日子，以色列全国忙于宗教祈祷，连军人也全都参加宗教活动在家里过节。兵营空无一人，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巴列夫防线上，有一半防御工事里空无一人，值班的以色列坦克兵也冻得跑到坦克外活动取暖。下午 14 时 20 分，苏伊士运河畔突然炮声隆隆，埃及启用了 2000 门大炮、200 多架战斗轰炸机，以每分钟 1.05 万发的炮弹和炸弹连续轰击 53 分钟，整个巴列夫防线顿时被炸成一片火海。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10 万埃及军队浩浩荡荡开过苏伊士运河。叙利亚军队也对戈兰高地发起猛攻。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以色列从未经历这样的惨败。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提出后退设防、与埃及人谈判的建议。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则躲在屋子里失声痛哭。

10 月 6 日深夜，作为预备役军官的沙龙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向以色列南部军区报告部队动员情况，迅即率领部队开往前线。沙龙指出，自开战以来，以色列国防军从未采取过主动行为。他提出：“我们应该大胆地穿越两支埃及部队间的真空地带，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建立一个桥头堡，否则，运河西岸会被埃及军队占领，为他们大举进攻提供方便！”沙龙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在西奈半岛拥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在毫不伤害特拉维夫的情况下，抢渡苏伊士运河发动一场强大的进攻。1973 年 10 月 24 日，沙龙率领 2.7 万名以军士兵在西奈半岛突围，关闭

了通往苏伊士运河东岸的淡水输送管道的阀门，使埃及军团陷入了绝境。英国一位将军事后评价说，这是军事史上最大胆的行动之一。这场眼看以色列必败的战争的结果是：以色列摧毁阿拉伯方面坦克2200辆，击落飞机400多架，攻占苏伊士运河西岸埃及国土1900余平方公里，新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以东440平方公里的土地。

1977年大选，报纸在头版报道了利库德集团必胜无疑的消息。贝京政府国防部长的两个候选人将是魏茨曼和沙龙。沙龙同意让魏茨曼担任国防部长。他提出，除国防部长外，最愿意担任的职务是农业部长和负责定居点问题的内阁委员会主席。贝京满足了他的要求。

1981年6月，贝京第二届内阁组成的时候，沙龙终于当上国防部长。

美国外交理事会专家罗伯特·达宁评价说：“沙龙在战场上和政坛上的最重要原则是以色列必须获得主动权，而不是简单对事件进行回应。他比许多人都更能领会以色列的安全困境：尽管有一支强大的积极的军队，但在这个充满了敌视的地区，无论面积还是人口，以色列都是个弱小的国家。”

国防部长沙龙决定主动出击。沙龙上任的第四天，就沿着北部边界进行侦察参观。他首先把矛头指向黎巴嫩。1982年6月，沙龙亲自指挥以色列10万大军，仅用8天时间，就向前推进了90余公里，侵占了黎巴嫩约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摧毁了巴解游击队在黎巴嫩南部的全部基地，占领了巴解在黎巴嫩南部的全部仓库，并将军队开至黎巴嫩首都也是巴解组织总部所在地——贝鲁特的大门口。在这场战争中，沙龙再次显露了自己的一意孤行。

围困贝鲁特后，以色列政府签订停火协议，在6月12日生效。13日，在以色列内阁会议上，内政部长伯格忧虑地质问道：“停火协议昨天就生效了，为什么战斗还没有停止？”沙龙理直气壮地回答：“恐怖分子并没有停止射击！”伯格警告沙龙不要进攻贝鲁特——进入阿拉伯国家的首都意味着最严重的挑衅。沙龙表面答应，但仍决定对贝鲁特施以重兵。这一次，沙龙再次达到自己的目的：8月，在美国的斡旋下，1000多名巴解组织





2012 年 11 月 4 日，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图为军事行动后的悲惨景象

士兵被迫撤离贝鲁特这个大本营。

但沙龙很快就遇到了武力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巴解游击队撤出黎巴嫩后，贝京和沙龙决定扶持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首领巴希尔·杰马耶勒。沙龙命令以色列军官开动军车，把黎巴嫩议员们请到议会，又派出军队监督，将杰马耶勒扶上黎巴嫩总统的宝座。沙龙原希望，在杰马耶勒的6年总统任期内，巩固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成果，把叙利亚人赶出贝鲁特，防止巴解游击队在贝鲁特再度生根发芽，再与杰马耶勒签订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条约，在两国之间实现“40年的和平”。但杰马耶勒上任不到3周，就在9月14日的一次爆炸中丧生。

杰马耶勒遇难身亡让暴怒的沙龙把对美国的承诺扔到一边，将装甲车开进了贝鲁特西区。他开除了规劝自己考虑政治成本和国际影响的装甲兵部队指挥官埃里·瓦，以清查2000至3000名巴解组织藏匿的游击队员为借口，包围了夏蒂拉和卜拉两个难民营。

9月16日，黎巴嫩长枪党民兵1000多人，在以色列坦克和装甲车护送下，开进夏蒂拉和萨卜拉两个难民营。两个难民营上空被照明弹照得雪亮。一个幸存者回忆说:“17日那一夜，这里简直是座地狱，天空始终没有黑下来，枪声也始终没有停止过，恐怖的尖叫声始终没有间歇过。”这场大屠杀造成1500多人死亡。

联合国安理会1982年9月19日通过决议，谴责在贝鲁特对巴勒斯坦人的血腥屠杀。特拉维夫爆发了各界人士参加的30万人示威游行。示威者高举的标语牌上赫然写着醒目的口号：“沙龙＝杀人凶手！”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贝京政府成立了贝鲁特难民营屠杀事件调查委员会，承认对黎巴嫩长枪党部队进入萨卜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的野蛮行径，以色列国防军是知情并予以同意与合作的。

美国总统里根及其高级顾问们的观点也极为明确：沙龙必须被解职。



1977年8月9日，以色列总统贝京（左）与时任农业部长沙龙交谈

1983年2月14日，以色列内阁进行了近5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结果是，16票要求沙龙辞职，只有一票对他表示支持，这一票来自沙龙自己。

变与不变

沙龙引咎辞去国防部长一职时，他多年的顾问乌里·丹说：“那些不想看到沙龙担任参谋长的人，看到他当上国防部长。而现在，我要说，那些不想让他当国防部长的人，将不得不接受他有一天当总理的事实。”2001年2月这变成了现实：沙龙以利库德集团领导人身份赢得总理大选。艾伦·米勒指出，沙龙对工党领袖巴拉克的这次胜选，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大优势的胜利，这源于以色列公众的不安全感



和恐惧。整个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饱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袭击之苦。1996年，内塔尼亚胡击败元老佩雷斯，就是因为他在安全问题上大做文章。但他没能阻止第一次巴勒斯坦人暴动的发生。巴拉克接任内塔尼亚胡后尝试较为温和的政策，依然没有取得效果，被民众视为软弱无能。2000年9月28日，沙龙在1000名军警的护卫下强行参观位于东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重新引爆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

在安全受到威胁时，以色列人转向了沙龙。而沙龙在政治上也变得更为成熟。他的竞选班子将沙龙作为和蔼可亲的祖父和忠于家庭的形象展现出来。电视广告上播放着这样的画面：在落日的余晖中，这位72岁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怀抱着一只小羊羔，驮着他的小孙子，在麦田里漫步。在竞选活动中，沙龙的口号是："只有沙龙才能带来和平。"沙龙做出了"确保所有犹太定居点原封不动、保持耶路撒冷的完整统一以及绝不放弃约旦河谷"的承诺，也发出需要做出"痛苦让步"的信号。2000年12月底，他向阿拉法特发出了一个友好的信息，他在信中表达了希望实现和平的愿望。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学者加蒂·陶布评论说，沙龙对和平的谈论只是为了获得美国和以色列温和中间派别的支持。事实上他不断在用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推行他自己的政策，加强以色列对土地的控制。

很显然，沙龙从黎巴嫩战争中学到了东西。"作为总理的沙龙更为成熟。"艾伦·米勒指出，"他学会了以色列政治中的关键两点：第一，他必须正确解读民意，不能因为过于雄心勃勃而失败。第二，如果能够做大，而且代价不至于太大，他就必须讨得美国的欢心。"

2005年，沙龙以自己的政治权威为资本，以政治生命为代价使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撤军。沙龙曾说："一个人为了前后一致，一直坚持同一种观点并没有什么好处。变化了的环境要求有变化的观点相适应。""有人评价他从战争转向和平。这种说法不准确。其实，他从未改变。"沙龙死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接受采访时说，"当保护以色列意味着战争时，他就打仗；当这意味着讲和时，他就寻求和平。"

在担任总理期间，沙龙从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转到可以接受巴勒斯坦建国。但是，他的立场是有条件的。他强调，独立的巴勒斯坦只能拥有数量有限的警察，不能拥有武装部队，巴边界必须置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同时以色列有权使用巴领空。在东耶路撒冷主权问题上，沙龙的态度更为强硬，多次批评巴拉克提出的耶路撒冷"一城两都"方案。艾伦·米勒指出，事实上，沙龙一直怀疑巴勒斯坦国家



1982 年 1 月 19 日，任职国防部长的沙龙偕妻子莉莉和儿子访问苏伊士运河地区

的生存。“他曾经问我，如果可能，我是否愿意成为第一任以色列驻巴勒斯坦国大使，我说不想。他大笑起来，说，这是好事，因为这根本不会发生。”

对于沙龙来说，撤离加沙并不是一次退让，而是重新规划以色列的安全布局。从 2002 年起，以色列开始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修建隔离墙。这是新的“战略游戏规则”：以色列划定边界，巴勒斯坦接受现实。

尽管单方面撤军给沙龙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以色列媒体当时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70% 的被调查者支持撤军行动。

被撤离的加沙 21 个定居点和西岸地区 4 个定居点都处于巴勒斯坦人口密集地区，是以色列政府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批准修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以色列的防御纵深，阻止巴勒斯坦建国。2003 年 6 月，以色列正式接受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表明以色列已经接受了巴勒斯坦必须建国的现实。从此，那些为了控制巴勒斯坦和阻止巴建国而修建的定居点已经失去了其战略价值。在加沙，21 个定居点居住着 8000 余人，却需要至少 1 万名以色列士兵保卫。一些深入巴勒斯坦人中间的定居点，甚至就是 1 名定居者生活，需要 10 名以色列士兵保卫。





沙龙在他自家的农场中

加沙地带的人口结构，也是以色列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口有130万，而犹太人只有大约8000人。在解释以色列为何要撤离加沙时，沙龙就回答："我们不能永远控制加沙，那里有超过100万名巴勒斯坦人，每过一代人口将增加一倍。他们住在拥挤不堪的难民营里，感到贫困与绝望，他们在仇恨情绪高涨的温床上，觉得地平线上没有任何希望。"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沙龙接受巴勒斯坦国建国也是不得已的考虑。据估计到2020年，以色列本土和被占领土上的人口将达到640万犹太人、850万阿拉伯人。如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继续杂居在一起而不进行分离的话，那么以色列就难以保证今天的国家身份：如果它想保住犹太国家的身份，就势必无法施行民主国家的制度；如果施行民主国家制度，以色列就将不再是一个犹太国家。在单边撤离计划获内阁通过后，沙龙在讲话中指出：单边撤离计划对今天的以色列人民来说也许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但从长远来看，单边撤离计划能确保以色列国土内犹太人口的集中，确保犹太国家的特性，同时有利于加强国家的安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促进地区和平，确保耶路撒冷的地位不动摇。

在一些人看来，沙龙的决策是巨大的进步，令以色列退还了侵占领土；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沙龙的本质在于"单方面"，一切以以色列的意志为基准，不利于和谈的展开。美国纽约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学者乔弗里·列文撰文指出："沙龙计划的根本在于围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并非合作。他逐渐确信只有'隔离'巴勒斯坦人才能拯救以色列。他也成功地说服以色列人接受了他的概念——以色列能够基于自己的安全需求把自己孤立于巴勒斯坦问题之外，不用理会巴勒斯坦人的需求。8年后，巴以问题依然是个死结。不管是否缘于沙龙，在隔离政策后，从2002年的264人到2007年的7人，以色列公民被巴勒斯坦人杀死的数量不断减少。主要的伤亡都是由加沙地区射来的火箭弹造成的，而不再是由于自杀性袭击。在同一时期，和谈毫无进展。"列文指出：沙龙的最持久遗产根植在以色列人的意识里。就像他曾经说过的一样，许多以色列人现在都认为"和谈已经不再具有伙伴"，既然隔离能够实现安全，那么与其支持左派达成和平协议，或者敦促右派并吞约旦河西岸，还不如保持没有正式和平协议的现状。在2013年的大选中，竞选者们争论的焦点是伊朗问题和国内问题，巴勒斯坦甚至被抛到了台面以下。(参考书籍：付金柱：《以色列王——沙龙传》)



1 月 13 日，伊恩·罗伯森博士在北美车展宝马发布会现场

宝马如何快些跑

去年是宝马在销售业绩上最为成功的一年，总销量达到 196 万辆。其中，BMW 品牌销量达 165 万辆，而宝马品牌在中国销量贡献了 39 万辆的份额。

主笔 李三

展厅外，是北美几十年不遇的寒潮，展厅内，各大参展商纷纷释放着自己的热度。记得 2009 年金融危机处在最严重的时候，当时底特律迎来了尴尬的车展，一些愤怒的汽车产业工人出现在几个美国主要厂商的展位，展厅成了表达愤怒和无奈的场所，完全盖住了展品的风头。在经历的几年的恢复以后，去年，北美的车市总量达到了 1588 万辆，汽车市场的增长速度也达到了 7.4%。就在同一个时间，美国官方也宣布 2013 年失业率降低到 7.4%，是近 5 年来失业率最低的一次。

2014 年北美车展，有超过 50 款新车亮相，通用汽车、大众、丰田等行业巨头，以及奔驰、宝马、奥迪等都推出了不少量产车型。当然即使在北美车展上，德国豪华车三驾马车依然是整场最耀眼的明星。

宝马的展台上，伊恩·罗伯森仿佛是来享受胜利的，他一改往常矜持的做派，由衷地连声说："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身为负责 BMW 品牌销售和市场营销的集团董事，他总是对 BMW 有自己的感性表达，"M——这是最具力量的字母"，BMW 在 2013 年的销售数据无疑是对"M"最好的加冕。

三联生活周刊：底特律车展是否依然是全球市场的风向标？

伊恩·罗伯森：我认为北美市场从危机中已经恢复了很多，这得益于消费者对经济的信心增强，今年我们期待市场会持续性增长。我认为底特律的环境正经受着考验，好在美国本土的三大汽车厂商给予其很大的支撑。记得 2009 年我来底特律，那时的环境与现在迥然不同，那届车展几乎没有任何令人感到兴奋和激励的事情。现在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这显示美国的经济比往年有所进步。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的一年，宝马将如何捍卫豪华车全球销售榜首的地位？

伊恩·罗伯森：宝马的成功表现

得益于每一款出色的产品，新的一年，我们不但有多款出色的新产品，也将进一步开拓此前尚未涉足的细分市场。今年我们即将推出全新BMW 4系敞篷轿跑车、BMW运动旅行轿车和全新BMW X4等新车型。全新BMW X4将在宝马的美国斯帕坦堡工厂投入生产。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推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零排放BMW i汽车。BMW i品牌在宝马的发展策略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去年11月，我们在欧洲市场率先销售BMW i3，截止到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收到大约1.1万份BMW i3订单，这款车必定在市场扮演重要角色。此外，BMW i家族的第二款产品BMW i8将于今年夏天上市。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宝马品牌在细分市场上下了很大的功夫，2014年将会有哪些车型推出？

伊恩·罗伯森：不但有细分车型同时也有传统车型上市，比如全新BMW X5，这是宝马X家族最强劲也是最大型的车型。BMW的M系列有很长的历史，今年，大家已经看到了全新的BMW M3和M4，通过在轻量化方面做出的优化，这两款车型最大功率输出达到了431马力，同时比上代车型增强了25%的燃油经济性、降低了25%的二氧化碳排放。前半年我们也会上市宝马品牌的第一款前驱车型——BMW Active Tourer，年中还会带来BMW X4。此外，我们还将为大家带来敞篷车型。总之，在我们的上市计划内，2014年会有很多细分车型和传统车型。

三联生活周刊：在2014年宝马新车名单里，哪些会在中国市场看到？

伊恩·罗伯森：不包括年度改款车型，宝马集团2014年将在中国推出10款全新车型，有10款宝马品牌车型和1款全新MINI车型。10款在国内上市的宝马品牌车型中有2013年推出的全新X5、M3轿车、M4 Coupe、2系，以及稍后亮相的4系敞篷、全新X6、全新X4、宝马首款前驱车Active Tourer，和宝马i系列的i3、i8。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市场对环保的重视程度显而易见，宝马为此也推出了i3车型。目前在中国纯电动车型的售价不菲，宝马如何平衡这个问题？

伊恩·罗伯森：i3上市的同时我们也会推出其他车型来平衡市场的需求。在技术层面上，我们在传动、材料上都尽了最大努力去优化，大家也知道，这是需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才能实现的，在未来几年内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的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型。我个人认为，在未来10年内，新能源车的占比将达到20%到30%，电动汽车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宝马i系列未来的产品有哪些具体规划？

伊恩·罗伯森：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会看到i8将重新定义跑车的细分市场，i8会在2014年上市。宝马的产品家族从最初的M到今天的i系列，我们都将推出更加细分的车型。在宝马的产品序列里，i系列将和M并行发展，M已经有了约40年的历史，i系列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计划。

三联生活周刊：宝马一直以“后轮驱动”的驾驶乐趣著称，对于即将推出的前驱车型，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改变？未来会在哪些系列上发展前驱车型？

伊恩·罗伯森：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还是非常重视后驱车的，宝马在后轮驱动上已经积攒了多年的经验与实力，宝马的后驱车依然是动感、强劲的代表。除此之外，宝马还有很多的四驱车型，例如3系、5系、7系等。事实上，宝马的产品线非常丰富，你也可以看到，在MINI上我们也积攒了很多前驱车的经验，而在MINI上大家依然能体验到丰富的驾驶乐趣。我们将这一经验拓展到宝马品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获得更多的车内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因此做出妥协，我们依然注重驾驶乐趣，同时驾乘者可以获得更舒适的体验。

三联生活周刊：宝马和丰田的合作目前进展如何？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伊恩·罗伯森：我们刚刚和丰田在柴油发动机方面展开了合作，这是为了多数的欧洲车型。未来，我们将和丰田在电池技术方面共同努力，以便今后电动车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此外，在氢能利用方面也有合作。事实上，我们还将共同搭建一个平台，利用这一平台，我们将研发一款运动车型，只是目前对外宣布还为时尚早。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和丰田的合作关系非常良好。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知道，宝马已经在慕尼黑、巴黎等城市建立了品牌旗舰店，打造未来零售的概念，宝马品牌旗舰店的概念将何时进入中国？

伊恩·罗伯森：我们确实在世界上主要的城市建立了品牌旗舰店，包括慕尼黑、苏黎世、巴黎、纽约、布鲁塞尔，马上会在伦敦建立品牌旗舰店，上海也将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在其他城市，我们也将逐步建立品牌旗舰店，其目的是让我们的产品更加贴近客户。未来在中国肯定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品牌旗舰店，而具体建立的时间还在商讨之中。

我们将继续在中国加强品牌建设，我非常欣赏“宝马之悦”的营销策略，“悦”是品牌价值的中心，我们希望人们能够从中体验到车、技术、创新和成功。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评价宝马2013年在中国市场的表现？

伊恩·罗伯森：从销量方面来讲，宝马在中国市场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39万多辆的销量；在品牌建设方面，宝马的中国团队在市场上做出了很多可圈可点的成绩，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了超过400家经销商网点。未来，我们依然会延续这种发展势头，并将迈向一个全新的高度。

曲面屏幕能否成为UHD TV竞赛杀手锏

2014年的CES消费电子展览现场，又一次遇到了CEA总裁加里·夏培罗，当年就不多的头发已经尽显灰白。此时4K电视已经不再是新鲜名词，消费电子业界更乐于采用超高清画质概念的UHD TV来称呼。可穿戴设备和汽车电子制造商都乐于跑到拉斯维加斯凑凑热闹，CES消费电子展上涌来了越来越多传统意义消费电子之外的跨界力量，但紧贴娱乐业的感官类消费电子产品，依旧是CES的根基。

主笔 ✎ 尚进



1月6日，美国拉斯维加斯2014年CES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上，三星电子推出了一系列重新定义品类标准的全新产品，包括世界最大的曲面UHD TV、三星U9000曲面UHD TV等

“我死后考虑立块16：9的墓碑。”已经没有多少人再能想起加里·夏培罗在2005年为推动高清分辨率电视时的调侃，正是2006年的CES，他急于推动全球电视制作领域能够认可1080P，并且为此多次在美国国会推动高清电视升级的听证会上滔滔不绝。尽管2014年CES开幕式展场街头的偶遇，没有时间再问问夏培罗的墓碑是否升级了，但至少按照2014年CES上的潮流，他的那块16：9的墓碑，最起码得升级成弧形曲面的了，并且有可能对角线长度动辄数百英寸了。

“2015年柔性屏幕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1亿美元，并于2020年进一步飙升至420亿美元。平板显示市场中将有16%的份额被柔性屏幕占据。”产业调研咨询机构Displaybank如此估计。这种分析背后源自三星电子已趋成熟的OLED屏幕生产工艺，可以预期的生产工艺改良将彻底降低柔性屏幕成本，也正是在这种判断下，三星电子在2014年的CES上大肆展示自己的曲面屏幕电视，试图在跟随整个消费电子领域的UHD TV大潮之外，再利用自身屏幕制造能力上的独特优势，以曲面屏幕电视混合UHD TV实现双管齐下，从而彻底占据全球高端电视市场的先机。与三星利用自身制造工艺和核心屏幕技术作为突破不同，索尼在与三星争夺UHD TV市场领导地位中，更强调自身的4K产业链条，毕竟索尼拥有两家好莱坞制片公司，并且在专业影视器材和民用摄像器材领域迫切需要注入4K概念。也正是基于这种不同优势战略选择，三星更期望保持自身作为消费电子设备制造商的技术纯粹性，按照三星电子联席CEO尹富根在CES现场的说法：“消费者洞察力和设计制造工艺创新，才是三星成为全球科技领导者的要诀。”

另一方面三星选择在2014年推

动已经酝酿多时的曲面屏幕走向客厅，不只是图谋霸占高端电视领域，更是希望通过曲面屏幕逐步成规模生产后，利用电视屏幕生产规模效应来拉动曲面屏幕走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2014年CES展之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两款弧形屏幕的智能手机，从左向右弯曲5.7英寸屏幕的三星Galaxy Round，以及自上而下弯曲屏幕的LG G Flex。正如市场研究机构Lux Research的技术分析师乔纳森·梅克尼（Jonathan Melnick）早前评估的那样："曲面屏幕一旦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有可能带来目前消费电子设计领域的一个新高潮，可弯曲屏幕意味着全新的人机交互创新机会。"

本刊就此专访了三星电子大中华区彩电营销部部长区文生。

三联生活周刊：迷恋尺寸无疑是过去几年电视制造界的趋势，而个人电脑和显示器领域则是大幅提升像素密度，多种因素综合酝酿下我们看到超大屏幕高分辨率的UHD TV在逐渐成熟，三星认为2014年视觉产品领域战略焦点何在？

区文生：2014年全球平板显示设备市场将继续保持增长，我们预计增长率会在3.1%，也就是2.25亿台的规模。UHD TV所代表的超高清电视在2013年已经崭露头角，3840×2160以上分辨率的技术规格直接刺激了更大屏幕尺寸的延展，不用再为60英寸以上屏幕1080P高清条件下像素密度问题发愁。2013年三星在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UHD TV市场都占据了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全球巩固超高清屏幕的市场地位无疑是2014年的战略焦点之一。而在2014年初CES上，三星电子正式推动的曲面屏幕，注定将要开辟一个全新的视觉显示行业产品类别。我们注意到当屏幕越来越大时，人眼视觉体验的视觉角度需要变形，人们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视觉焦点，尤其是当一个人沉浸式地体验视觉内容时。三星借助OLED面板技术成熟的契机，设计出全景效果的曲面电视以创造出一种真正能带来身临其境的极致体验，其中85英寸的Bendable OLED利用柔性屏幕的特征，可以在平面和曲面之间实现调整，以满足不同视觉需求。这届CES三星大大扩容了UHD TV的产品线，超大屏幕顶级UHD TV和曲面屏幕的创新，无疑彰显了三星电子在视觉显示领域的全球技术领先优势。在我看来，2014年注定是消费电子领域不同凡响的一年。

三联生活周刊：屏幕尺寸规格多样化选择的UHD TV，三星在CES上的众多展示产品无疑在强调UHD TV的大潮流，甚至我们注意到了98英寸的8K超高清概念产品，7680×4320的分辨率有些高得可怕了。目前看UHD TV未来注定将是市场主流方向，距离其价格更易于大众市场接受还有多远的距离？

区文生：为激活2014年的全球UHD TV市场，我们决定扩大UHD的产品线阵容，U8500、U9000和S9三个系列，从50英寸一直到85英寸，2014年UHD TV的价格将更合理，更易于接近中高端消费群体。UHD TV和现在三星主要销售的LED TV并不矛盾，LED TV在很长一段时间依旧是全球家庭消费的主要选择，我们认为UHD TV和LED TV会将并行发展。整个视觉显示领域的商业周期有自身独特的规律，回望过去近10年推动从标清电视向高清电视的产业变化，包括近两年平板和智能手机屏幕的超像素密度潮流，都是有自身技术周期和商业规律的，UHD TV距离爆发性流行的临界点，还有一点点距离。

三联生活周刊：自从2013年秋天在德国IFA消费电子展上第一次公布曲面电视概念，三星缘何决定在CES上公布如此之多的曲面屏幕样机，你们认为曲面屏幕电视已经完善成熟，大范围商品化的空间如何？

区文生：我们坚信三星曲面电视所创造的身临其境视觉体验，是以往任何平面屏幕产品所无法比拟的。曲面电视的设计构思集合了光学和人体工程学上的诸多研究，真正物理结构方式地创造出沉浸式视觉体验环境。在自发光的OLED柔性屏幕基础上，为将曲面电视的优势最大化，三星工程师试验出4200R的最优曲度，使用户在正常的3到4米观看距离内，可以享受最优质的视觉画质体验。曲面电视研发上取得突破，包含了诸多新材料和设计工艺上的创新，除了硬件上的工艺，软件角度上也进行了非常多的优化性调试，为的就是获取最极致的曲面视觉体验。从技术角度我们有能力生产更大尺寸的曲面屏幕，但短时间内其成本还比较高，这类高端电视早期还是针对顶级消费群体，但无须置疑，曲面屏幕方向非常诱人，只有真正体验过其视觉效果，才可以领悟其视觉震撼性，所以我们认为，今年将是曲面UHD TV元年。

三联生活周刊：上一个时代推动1080P高清电视时，伴随着蓝光DVD和HD DVD的争夺，以及好莱坞和全球电视制作方集体向高清规格的产业升级，目前针对UHD TV的内容还不多，就像10年前1080P内容稀少一样。三星作为UHD TV的推动者，如何看待内容制约的阶段性问题？

区文生：超高清内容生产是一个系统性的升级过程，目前全球电视台也才分阶段在播放高清内容，甚至有些还是1080i格式。这无疑需要一个周期，但很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互联网带宽资源越来越充沛，不用再像10年前推动高清电视时，需要依赖开发高容量的蓝光DVD作为介质载体。我们计划为用户提供包含50部UHD内容资源的三星UHD视频包，其中包括派拉蒙和福克斯合作推出的20部电影及30部纪录片，让消费者能够先真正体验到UHD TV的内容震撼性。此外我们还将继续与M-GO、Comcast、DirecTV等广播电视公司合作，还有与亚马逊和Netflix在内的在线内容供应商保持合作，逐渐提供越来越多的UHD品质内容。



（王超斯 摄）

自 2 月 11 日起，国航自北京飞往美国本土全部 4 条直飞航线全线使用波音 777-300ER 运营，令旅客获得更舒适体验

国航春运：无人陪伴儿童的温馨之旅

春运期间，国航的首都机场特殊服务人员一天之内要照顾 200 多个 5 到 12 岁的无成人陪伴儿童办理转机。

记者 王珑锟

春运开锣

1 月 16 日是今年春运的第一天。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航”）在首都机场的第一班国内航班于早晨 6 点 40 分顺利起飞，搭载着 91 位乘客的 CA1601 从北京前往沈阳，春运帷幕正式拉开。

一大早，北京空气污染指数“爆表”，多条出京方向高速被迫封闭。国航航班运行控制室高级经理张洪涛告诉我们：“当天上午人工观测能见度最低值出现在 8 点 30 分，能见度是 1000 米，符合起降标准，严重雾霾对国航春运暂未造成影响。”

为了应对春运期间繁重的运输任务，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航在春运期间预计将投入航班约 4.13 万班次，其中国内航线约 3.46 万班次，国际及地区航线约 6700 班次，投入座位数共计约 776.3 万个，运力投放总量比 2013 年春运同期相比增长约 6.2%。国航副总裁冯润娥说：“增长比例看似不多，但要考虑到庞大的运力基数。”

在国航 AOC（Airline Operation Center）大厅里 108 位座席上，机务、机组、运控、签派、性能、货航等各部门协作联动，紧张有序。AOC 大厅相当于航班运行控制的大脑，每天有大约 1100 个航班的总体计划与局部调



无人陪伴儿童在飞机上有空乘人员专门照顾，中转时有地面服务人员陪伴休息

整的指令在这里发出。根据统计，在去年高峰时段，每小时有107架飞机起落。国航运行控制中心副总经理温志东告诉我们："运控中心员工24小时值守岗位，在安全第一位的前提下，尽全力保障飞机准点。"

经过调配运力，增加班次，国航的春运计划基本覆盖了探亲、返乡和旅游人群较为集中的热点航线。在购票环节上，国航分别推出"悦入家门"、"悦动新春"与"悦游世界"三个专场，针对回家共叙亲情，接家人到"北上广深"第二故乡过年，春节假期出国旅游的旅客需求。1月21日，国航新开北京至夏威夷直飞航线，春节旅客又增上佳选择。另外，自2月11日起，国航自北京飞往美国本土全部4条直飞航线（北京—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休斯敦）全线使用波音777-300ER运营，这种机型将令旅客获得更舒适体验。

特殊服务

在旅客出行高峰期，国航在各个服务界面都将增加人力物力配置，确保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顺畅。针对"春运"期间无成人陪伴儿童数量较集中的特点，为无成人陪伴儿童安排了独立的休息等待区，并在等待区内配备了饮水、玩具和图书；为方便残疾旅客、携带婴幼儿的家庭旅客、老年旅客等特殊旅客办理乘机手续，在北京T3航站楼J岛02、03区域开设了"爱心"柜台，在J岛17、18区域设立急客柜台；在1月24日至2月6日的旅客出行高峰期间，国航在北京T3航站楼国内航班值机柜台的开放时间将提前至4时30分，以方便乘坐早班航班的旅客提前办理手续。

国航特殊服务部门工作人员卜凡雪告诉我们："越是快过年的时候，越是我们一年里最忙的。"特殊服务部的服务对象包括无成人陪伴的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等。其中，无成人陪伴儿童是指年龄满5周岁未满12周岁的单独乘机的儿童。

卜凡雪在国航工作7年了，其中5年在特殊服务部门度过。她告诉我们："孩子们已经放寒假了，家长还没放假或者春节也没法回家过年，就单独把孩子送上飞机，一是让小孩陪着家里老人过年，二是让小孩有个锻炼。春运期间，我们首都机场的特服一天之内要帮助200多个无人陪伴儿童办理

转机手续。”

无人陪伴儿童的脖子上会挂着一个白色纸袋，上面写着“UM”标识（无人陪伴儿童代码），以方便工作人员与其他旅客辨认。无人陪伴儿童在飞机上有空乘专门照顾，飞机中转时有地面服务人员陪伴休息，如果遇到不利天气条件、流量控制、大面积禁航等情况需要住宿时也有专人陪同。因为这项服务责任重大，环节复杂，需要空乘与地面服务点对点对接，所以办理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必须提前联系。除了关于儿童的个人信息、饮食习惯、注意事项之外，无人陪伴儿童携带的登记信息还包括送站人与接站人的姓名、电话、地址、身份证号与关系等。

国航产品服务部副总经理梁爽说：“无成人陪伴儿童是春运期间工作量较重的服务任务之一。我们也在海外做了宣传，比如曾有从圣保罗到北京中转回温州这样长距离的无人陪伴案例。国航也是国内首家推出无人陪伴服务的航空公司。这项服务为那些工作忙无法脱身、孩子又必须乘坐飞机旅行的家长提供了便利，特别受欢迎。”

温馨之旅

从家长这里接了孩子，到无人陪伴儿童办公室休息，再把孩子送到登机口的工作流程看起来琐碎，其实充满了小波折与小温暖。卜凡雪告诉我们：“每个孩子性格不同，有的很内向，不怎么说话，需要我们哄他逗他，陪着聊天。有的很淘气，想在我们的办公电脑上玩游戏，在提供餐食的时间不吃饭，之后又说肚子饿，这需要耐心说服，有时候我们也会迁就一下小孩子。当你用心去做，他们会回报给你一个天真的微笑，那种感觉特别温暖。”

最让卜凡雪记忆深刻的一次看护无人陪伴儿童的经历发生在去年暑假期间。“两个日本小男孩，哥哥7岁，弟弟5岁，他们的妈妈是中国人，送两个孩子到国内的姨妈家。当时从大阪到北京的CA162航班11点多就抵达了，飞往大连的CA8906航班16点35分才起飞。两个孩子可能并不知道需要中转等待，就是不愿意进休息室，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哥哥只能听懂一点点汉语。”

卜凡雪说，初见两个小男孩，他们很乖很腼腆的样子，都低着头，背着深蓝色的小书包。对接的乘务长告诉卜凡雪他们还有两件托运的行李。等走到T3航站楼4层的特殊服务部办公室时，两个孩子表现出有点害怕的神情。弟弟蹲在门口，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只听哥哥说话，不愿意听工作人员说话，也不愿让别人碰他。尽管屋里正在播放动画片，但两个小朋友就是不进门。


（王旭摄）
无人陪伴的小旅客在独立休息区

旅客信息上写了孩子姨妈的手机号，但中间两位不清楚，特服人员尝试着拨打了多次才联系上，可是姨妈也不会说日语，于是卜凡雪辗转联系到孩子的妈妈。妈妈在电话里向两个小朋友解释了转机的时间，让他们放心跟卜凡雪玩，还让哥哥照顾弟弟，说包里放了很多零食和寿司。原来妈妈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晚两天再来大连，就让两个小孩自己坐飞机锻炼一下。

打完电话，两个孩子高兴起来。哥哥进屋拿出作业本写起来，弟弟和卜凡雪也热络起来，依偎在她身上吃着零食，看起《喜羊羊》、《熊出没》等中国动画片。卜凡雪说，她还带着两个孩子去逛书店。打开了心理界限后，弟弟还要她帮忙拆包装，要她抱。等到登机送别，小兄弟俩一边摇着小手，一边用汉语向卜凡雪说了“谢谢”和“再见”，甚至有些依依不舍。

卜凡雪的确很招孩子喜欢，来自新疆的她说话时柔声细语。她说，有一次她陪一个9岁小女孩中转住宿，等待第二天登机，当晚两人聊得很开心，第二天醒来，她发现小女孩拿宾馆里的纸笔，画了一幅卜凡雪的肖像，放在她床头边。她谦虚地说：“我们特殊服务部32个工作人员每一个都有故事，每一个都能做到像对自己家孩子一样，愿意陪他们做游戏，有时候自愿给孩子买东西。”

特殊服务部的工作充满了不确定性，对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提出很高要求。卜凡雪说，曾有一位怀孕三个多月的孕妇在等待登机时发现流血，虽然并不严重，她仍搀着她乘车到机场医院，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检查，等医生为她出具了乘机证明，此时已过夜里零点。陪同住宿后，第二天再带她回到机场，办理了10点起飞去欧洲的值机手续。

对于特殊服务部工作人员而言，没有节假日，只有连续加班和随叫随到。国航同时重视对员工与旅客的服务工作，讲求“双服务、双满意”，让员工满意根本还是为了让旅客满意。卜凡雪告诉我们：“领导对我们特别好，同事也会主动查第二天的系统信息，在特服对象多的时候赶来单位帮忙，非常团结。虽然我们的工作很普通，但春运期间显得更重要一些，一个孩子牵着全家人的心，将心比心，我们付出的爱心都是值得的。”

健康家电与美的净水攻略

在 2013 年的家电回暖潮中，净水器以 57% 的增长迅速崛起，在这个高速成长的分散市场上，美的能否成为领导品牌？

记者 黄燕

如何在火爆而混乱的净水市场上赢得消费者信任？美的试图以“免费试用”吸引更多人体验并接受净水器。1 月 7 日，美的净水机宣布冠名江苏卫视“一站到底”节目，同时在 2014 年全年启动“一站到底、不净则退”的 30 天免费试用活动，消费者在卖场和专卖店签约后即可享受 30 天免费试用净水器，试用期间不满意可退回产品，不收取任何费用。“目前净水器市场关注度很高，但产品价格偏高，企业良莠不齐，存在夸大宣传、售后服务缺位的问题，消费者对净水器认知度低。美的希望用免费试用的方式让大家切身体验，引导人们接纳这种健康家电。”美的生活电器部国内营销公司总经理马刚说。

按照中怡康的统计，2013 年净水设备国内市场规模达到 428 万台，同比增长 57%，在各大家电品类中增长最快，同期空调的销售增长为 28%，冰箱为 11%，彩电为 8.4%。“相对于其他已进入成熟期的家电产品，净水设备虽然市场规模不大，2013 年销售额约为 180 亿元，但正处于快速成长期，且产品单价高，已经成为国内家电企业争相进入的行业热点。预计未来几年净水市场的增长率不会低于 45%。”中怡康总经理贾东升告诉本刊。告别了 2012 年的负增长，2013 年中国家电市场终于重回两位数增长，传统彩电和“冰洗空”进入平稳发展期，而主打健康的净化类产品和高端小家电则高速增长。在净水器市场上，以美的、安吉尔、沁园为代表的国产品牌已经领先于进口品牌，中怡康数据显示美的净水器市场占有率达到 27%，安吉尔也有 15%。美的集团整体上市后，生活电器事业部下辖的净水器和厨房小家电由于成长迅速获得了更多关注与投入，而净水器则是其中的发展重点。

按照马刚的说法，在技术上中国企业已经实现了和国外零差距。“美的做净水器 13 年了，我们和世界一流的水处理企业韩国清湖合作，采用美国陶氏 RO 反渗透膜，通过四重过滤系统去除水中的重金属等杂质。美的还开发了自己的专利产品第三代防尘滤芯，在安装和更换滤芯时人手不会接触到滤芯，杜绝了二次污染。”马刚告诉本刊。净水器属于典型的多次销售产品，整个使用过程需要持续更换滤芯，这对企业的售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些进口品牌在进入中国初期销售不错，但由于售后跟不上近两年已逐渐淡出市场，而售后正是国内企业的强项。据马刚透露，美的净水器目前有 3000 个服务网点，为 100 万客户服务超过 6 年，积累了详细的客户数据库。“今后我们要做到城市服务响应时间不超过 3 小时。”2014 年美的如何进一步开拓净水市场？我们专访了美的生活电器部国内营销公司总经理马刚。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净水器仍然是小众产品？

马刚：净水器市场虽然在中国增长很快，但普及率依然很低，欧美国家净水器普及率已经达到 90%，日、韩也有 70% 左右，而中国目前是 2%，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消费者对生活品质和健康的追求促使净水器市场近年来快速扩大，但这个市场依然很分散，从业企业达到 3000 家，其中良莠不齐，存在夸大宣传、缺乏售后服务的情况，使消费者对净水产品认知度偏低。美的这次免费试用活动就是希望打消消费者的顾虑，切身体验净水器。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净水器均价较高，且需长期更换滤芯，这会不会阻碍消费者接受净水器？

马刚：2013 年从整体市场销售来看反而是价格更高的净水器卖得更好，目前 2500 元到 3000 元的产品占到了 17.5%，3000 元到 3500 元为 17.8%，比 2012 年明显增长。2014 年美的净水器的销售目标是翻一倍，主推价位依然是 3000 元左右的产品；目前我们的滤芯是每半年更换一次，每次更换费用约为 500 元左右。净水器的长期使用成本其实并不高，我们计算过每升水的价格约为桶装水的十分之一，大部分消费者都能接受。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美的产品以净水器为主，在整个水家电布局上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马刚：其实目前的水家电发展还是比较单一的，消费者还停留在净水环节，而未来水家电的发展一定是多元化的。你可以在家庭总管道安装一个净化总阀门，在浴室安装软水机，厨房有净水机，要饮茶和咖啡还需要一部纯水机，组成整体水家电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目前净水器净化水与排出废水的比例大约是 1 ∶ 2 到 1 ∶ 3，我们希望在 2014 年把废水比例降低到 1 ∶ 1。对于排出的废水也要想办法二次利用，在提高生活品质的同时更加节能环保。



世界最大的天然储酒溶洞——郎酒天宝洞

郎酒故事

二郎镇日记

一

从重庆去二郎镇，驱车七小时。高速公路走了一半，就是贵州境内的公路了，路盘旋，弯多，大客车小车挤在一条道上，冷不防还有性急的载重车迎面驶来。还未到郎酒，便想，要喝郎酒真不容易哦，一瓶一瓶都要翻山越岭运出来，要是能在大城市酿造就好了。可是不行！早就听说郎酒、茅台的酱香都出自赤水河，没了那水就不是那味儿了，太神奇！

第一眼见郎酒是在望郎台，一个望字，说明此时我仍站在贵州的地盘上。左手一指就是习酒，跟山的体积相比，建筑竟有同样的分量。酒厂平出一大片地基，车间层层叠起，烟囱吐出一股浓郁的白烟。这样的阵势，排着效率列着速度，更像是躲在山里的兵工厂。

站在贵州往二郎望去，山形更奇，轮廓若案头的灵璧。浅赭色的岩石，有水墨画的笔意。向上看，草木葱郁，气象蔚然，还系一条缥缥缈缈的白围巾，要说此山就是一轩昂又儒雅的青花俊郎，确有九分神似。老天画出二郎山水，人在上面画出二郎镇来。前人画老街，用的是与老天同样的墨汁。老二郎镇从赤水河原来的老码头，顺山势蜿蜒，站于一片倾斜的绝壁之上。除平整屋基之外，其他一切顺其自然。因此，它的走势起伏全依了地势，成为山形的和声。砖瓦木石都是就近的自然材料，树木与房屋相互礼让，同样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般。

郎酒厂的产业，并不集中于一处，更有藏富于民的理念。从镇子到山上，除了民宅，都是郎酒厂的作坊。厂房民房杂集在一起，似乎每个人都有质变的能力,似乎全镇都在悄悄发酵。这个过程，有的是看出来的，更多是闻出来的。

看这两岸厂房和住房的比例，感觉一边是在为生产而生活，一边是在为生活而生产。只是令我无限神往的赤水河，夹在中间，并不浩荡激越，远处看，甚至可称涓细孱弱，当时就想，倘若这河流的都是美酒，怕也不够全国人民喝吧。

二

宾馆里放着贾平凹的书，他描写二郎老街的石板路布满了云纹，走上去如行云上，这句话我记住了。石总是让人好奇，一看，果然。那纹理用云来形容，最为贴切。这纹理不是平面的图形，而是凹凸的，雕出来的，老天雕刻出来的。突出来的地方已磨得温润如古玉，任意取出一块置于案头都能启发想象力。

地上的云看了，抬头看天上的云。这会儿天上的云已由缥缈变为饱满，胖乎乎如童话世界的充气城堡。满眼云纹，连天接地。镇上的云也在升腾，细看，却是酒厂车间放出的蒸汽。蒸汽渐渐升高，流腾渐渐放缓，与山上的云融合，最后全部涌进一个洞里。

酒气在酿着云，云在酿着酒，酒气如云云如酒。我再次相信二郎这地方，唯有酿酒一事，与天地最相契合。

酿酒之奇妙和珍贵，其实全在一个慢字。雷平阳有诗：最慢是活着。在这里可称作：最慢是酿酒。一切过程都慢慢地变化，催它不得。变、化二字，用于酿酒，最准确不过。人不喝水活不成，人不喝酒活得不爽，人生无以慰藉。因此，酿酒应该属于艺术的行为。酿酒的过程也的确像是一个行为艺术，水哦粮哦蒸哦发酵哦，水就变成醉了。

说着说着你就醉了，我握着你的手，就是握着赤水河，握着一手的醉了。

而这过程需要多少聪明的人，憨实的人，通灵的人来参与，每年的端午制曲重阳投粮，酿酒人心怀敬意，给酒神烧香进贡，都带着庄严的仪式感。酿酒是天人合一的劳作，因此还得有天的参与。天宝洞是这场行为艺术最重要的一环。那些精灵们诞生时，叽叽喳喳，天真烂漫，兴奋莫名，其实对这世界和自己茫然无知。然后，必得来到天宝洞，认识别的精灵，渐渐静下来，学习坐禅、面壁、修炼。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或许更长，修得目光柔和，喜悦静穆，方能洞悉自己的前世今生，方能“步入万物的圆融统一中”。

一群诗人就在此时来到天宝洞。见到酒的千军万马，其中一个张口结舌，痴呆呆傻呆呆，她只会说一句：这么多坛子，这么多这么多坛子啊！站在结满酒菌酒苔的坛子中间，又一个诗人说，他不想走了，就让他和他的诗歌在洞里一起封存五十年吧！我想如果真的可以这样，说不定就会封存出一个诺奖来。诗人们举起一杯窖藏四十年的基酒，在灯光下细细端详，这液体，清澈、微黄，原来就是时间的颜色哦！就是沉淀、修炼、滤掉一切杂质后，诗歌应该具有的品质哦！哦哦！写诗几十年，仿佛都懵懵懂懂，此刻才幡然醒悟，一个个竟眼眶潮湿，有步入新学堂的庄严感。

三

我们就这样一路醉过去，至少醉到年底，我说。我们是富有的，因为我们有酒、有诗、有友情。这些柔软的液体的金子，今夜全部属于神奇的赤水河，属于喀斯特地貌川贵交界的高原。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经济时代，诗人是寂寞的。雷平阳说得好，我们要彼此给予温暖，相互颁奖。主人为响应雷平阳的号召，晚宴时都给我们几位诗人颁了“郎酒诗歌奖”。虽是娱乐性质，却平添几分喜悦。我还渴望得到更多的奖，李琦诗歌奖、刘立云诗歌奖、雷平阳诗歌奖、张新泉诗歌奖……打开一个奖就是打开一颗心灵，打开一个世界。我要怎样才能得到呢？——梦回二郎镇，神游天宝洞，诚挚地谦逊地向酒学习。

每天喝一点，三天加起来已不止二两。现在我胸中存有二两窖藏五十年的郎酒，一两压过千斤，一两压过半世的风云。

（作者为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柠檬叶子》）



鲁迅文学奖获奖诗人傅天琳站在望郎台上远眺郎酒工厂



当人们还在祝福“新年进步”
你已向未来迈出全新一步
——奥迪A6L 2014年型重磅上市，梦享座驾助你晋阶未来
Audi A6L
是谁创造了未来？是那些敢梦想并驾驭未来的人。奥迪A6L 2014年型全新晋阶，多款车型标配平视显示系统等13项卓越配置，带给你非同凡享的“新年进步”；领先同级的通风按摩座椅再度升级，多种按压模式坐享全方位舒适体验；BOSE环绕音响系统让你在喧嚣之外尽聆天籁。现在，A6家族全系车型新春致礼盛大开启，助你超值超前拥有梦享座驾，在新的一年，向未来更进一程！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www.audi.cn
扫一扫，获知更多详情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 · 长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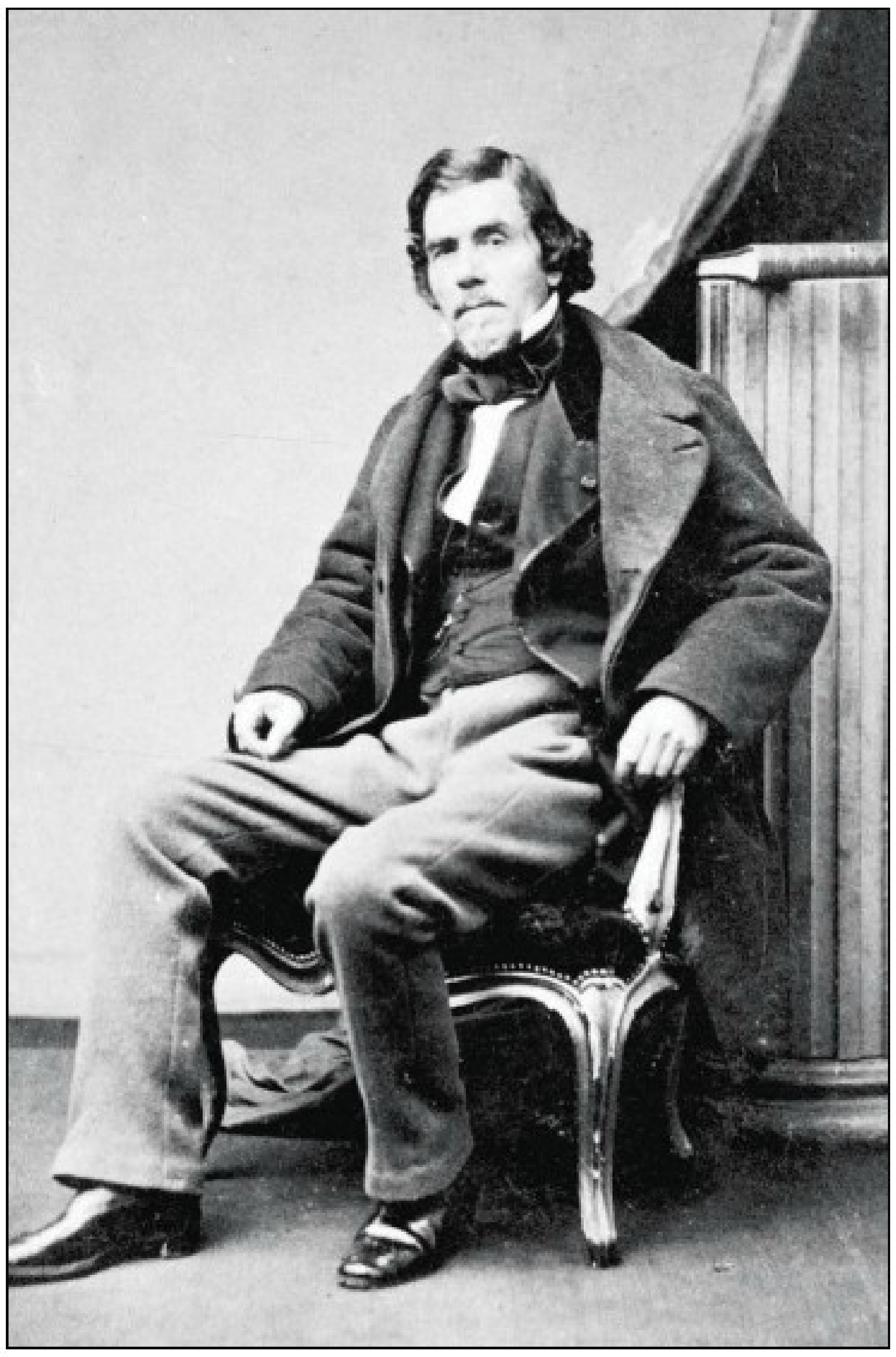


详情垂询，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171-888 (0431)85990888



卢浮宫里收藏的德拉克洛瓦名画《自由引导人民》





德拉克洛瓦

《自由引导人民》不再走出卢浮宫？

2014 年 1 月 3 日，法国爱丽舍宫正式表态尊重卢浮宫的专家报告，将取消出借《自由引导人民》到中国展览的计划。是否出借德拉克洛瓦这幅名画，本是在博物馆界内部讨论的话题，《世界报》、《费加罗报》等主流媒体跟进报道后，变成了公共事件。

主笔 曾焱

关于这幅画借还是不借的讨论，其实已经持续了几个月。2014 年是中法正式建交 50 周年，作为系列庆祝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法国政府计划从本土各国家博物馆里借出一批名画送往中国展览，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还主动表示，将把卢浮宫里的德拉克洛瓦名画《自由引导人民》带到中国。没想到，这一提议遭到了卢浮宫专家的强烈反对。作为该馆的巨幅藏画之一，专家认为，《自由引导人民》目前状况“过于脆弱”，不宜再做挪动。

争论实际上在 2013 年底就公开化了。法国文化部长奥雷利·菲莉佩蒂（Aurélie Filippetti）12 月 12 日在法国国际电台的节目中表示反对画作外借。《世界报》、《费加罗报》等主流媒体跟进报道后，是否出借德拉克洛瓦名画这一本在博物馆界内部讨论的话题，变成了公共关注的事件。



德拉克洛瓦画作：《墓地少女》



《哈姆雷特和赫瑞修在墓地》

出借艺术品对卢浮宫来说，近年并非新闻。2013年4月卸任的前馆长亨利·卢瓦耶特（Henri Loyrette ），在借展馆藏艺术品方面一直十分大胆，为此不止一次引起博物馆界非议，其中最起风波的两次：一次是在2008年，他签约以400万欧元的价格，将包括戈雅、波提切利、伦勃朗、鲁本斯、拉斐尔等大师作品在内的130件绘画和雕塑出借到意大利展览5个月。另一次就是和阿联酋合作打造的“卢浮宫阿布扎比”项目，这个由法国人设计的博物馆计划在2015年落成开放，阿联酋被曝为此将支付的回报为10亿欧元，通过协议借展艺术品，其中4亿欧元交付给卢浮宫。但卢瓦耶特任馆长12年，卢浮宫的游客接待量已经翻番到了千万人次。

而刚获得总统奥德朗任命的卢浮宫新任馆长让－吕克·马丁内兹（Jean-Luc Martinez），是一位在欧洲考古界和艺术史界都很受推崇的权威专家，他曾有6年时间担任该馆古希腊、古伊特鲁斯克和古罗马部主任，带领团队修复过包括维纳斯像在内的5件馆藏珍宝。与在社交界、政治界都长袖善舞的前任卢瓦耶特比，马丁内兹被评价为严谨和低调。在出借《自由引导人民》的争论过程中，他似乎已经显现了自己的处事风格。

《自由引导人民》入藏卢浮宫140年，总共有过两次出宫旅行。第一次是在1999年，也和亚洲有关：法国和日本举办国家文化年活动，时任总统希拉克应诺将这幅画借到日本展览。据《世界报》报道，当时卢浮宫的专家团队也曾反对借展，但希拉克出于外交和政治需要，坚持借给了日本，结果画作回国后，发现受到损害。第二次是卢浮宫在法国北部地区建造的朗斯分馆（Louvre Lens）开馆，《自由引导人民》被借展过去。虽然只是一次国内移送，却又出了事故：2013年2月7日，一位28岁的女性观众用黑色光标笔在画的右下角签了一行字：“AE911”。女观众被展厅保安和一名观众当场逮住，警方介入调查后，宣布女观众患有精神障碍，不再追究其责。让卢浮宫高层庆幸的是，这次涂划对整幅作品没有造成重大损伤，据专家说，签名只是附着在表面的清漆层上，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完全去除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媒体报道修复过程只进行了不到两小时，一天后，这幅画被重新挂上了展墙。

对于卢浮宫和法国，《自由引导人民》已经不只是一幅名画的意义。进入20世纪后，它成了法国革命或者自由平等的象征，甚至代表了法国本身，所以才会有政界给予它像“法国大使”一样的出访期待。其实，法国人现在对这幅画作有多护爱，当年的争议和攻击就有多大。和德拉克洛瓦24岁时绘画的《但丁和维吉尔共渡冥河》一样，《自由引导人民》最初在巴黎展示也是引起一片混乱、惊讶、欢呼和咒骂，

而并非多年后它获得的这种无可置疑的崇高地位。

德拉克洛瓦一生画过很多包含寓意、宗教和历史的主题，这些作品被展示在国家议会的国王沙龙、贵族院、卢森堡图书馆、巴黎市政厅、卢浮宫等处，有人统计是77幅。但在很多年中，他感受到学院派对他的恶意，他的画作被波德莱尔这样的现代派诗人热爱，在上层却卖得十分不好，他本人也没能进入法兰西学院。直到1863年去世前，画家的最大忧虑之一仍是后世的评价。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这样描述德拉克洛瓦的绘画于他那个时代的处境：德拉克洛瓦是魔鬼出没的血湖／掩映在四周茂绿的冷杉之中／怪异的乐曲穿过阴霾的天空／如同韦伯那抑郁的叹息。

同时代人难以理解他对美和寓意的复杂表达，唯有波德莱尔，曾经准确地捕捉到并始终赞颂他的伟大和独创："如果允许谈论绘画中的道德，那么，他作品的道德意义也带有明显的摩罗教的性质，他的作品中只有破坏、屠杀、火灾，一切都在为反对人的永恒的、不可救药的野蛮而佐证。被烧毁的、冒着烟的城市，被割喉杀死的受害者，被强暴的妇女，被扔在马蹄下或发了狂的母亲的匕首下的孩子。我认为，全部作品像是为命运和不可救药的痛苦而写的一首恐怖的颂歌。"

这些场景，在《自由引导人民》的画面中几乎全部具备。画作完成于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德拉克洛瓦以三块画布拼接为2.6米×3.25米的巨大画幅。画家当时32岁，他反对波旁王朝查理十世的专制统治，颂扬个人自由，但对革命的态度其实十分模糊。他随民众上了街，但作家大仲马目睹到，画家和自己一样，只是"混乱中的兴奋旁观者"。在画中，自由女神被描绘为一个立于街垒之上的袒露胸臂的普通妇女，手中挥舞着三色旗和武器，头上戴着大革命时期象征自由的弗里吉亚软帽，而她脚下死难者遍地，有起义者，也有被起义者杀死的军官，画面让人感受到革命喷薄的激情，却也有和激情并存的恐怖、野蛮。正如法兰西学院院士勒内·于热曾指出的那样，德拉克洛瓦虽然画了《自由引导人民》颂扬自由，不过几年后他就表示反对暴力革命，开始谴责这种大多数人的胜利，"因为，他们认为，在上升的民主制度中，大多数人对个人的威胁更严重"。

所以，当画作在1831年的官方沙龙中首次展出时，保守者自是深恶此画颂扬的反抗和自由，革命派不喜欢它过于真实表现的破坏和痛苦，而在艺术界，拥有话语权的学院派人士批评它毫无美感，画面脏乱。最终，《自由引导人民》并未获得胜利者推崇，取得政权的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政府以3000法郎从沙龙购得此画，很快将它从卢森堡馆中撤下，变得不知去向。据说后来画作还是还给了德拉克洛瓦本人，被搁置在他一个亲戚的乡下别墅里。


德拉克洛瓦画作：《希俄斯岛的屠杀》

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德拉克洛瓦在画界的地位已经上升，可以接到不少政府的重要装饰工程。但奇怪的是，《自由引导人民》仍无法得到公开展示的机会。1855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那届的美术展示部分有两个法国展厅，一个属于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安格尔，另一个给了引领浪漫主义的德拉克洛瓦。为了争取展示《自由引导人民》，德拉克洛瓦曾亲自去向拿破仑三世申诉，却未能获准。4年后，1859年的沙龙画展是德拉克洛瓦参加的最后一届，他送去8幅作品，其中有《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圣塞巴斯蒂安》、《劫持吕蓓卡》、《哈姆雷特》等代表作，但是，《自由引导人民》仍然不能获得展览资格。直到1874年，在德拉克洛瓦去世11年后，《自由引导人民》才终于进入卢浮宫画廊，成为国家永久收藏。

"博物馆给予了政治社会一种共同崇拜共有历史的凝聚力"，在这以后，这幅画作的地位不断提升：它出现在法国政府1980年推出的邮票上，也被印在了1983～1992年的100法郎钞票上。

《自由引导人民》可以算是博物馆以图像诠释历史的经典案例。而在当年，倾力赞颂德拉克洛瓦的波德莱尔在那些炽热的评论中也只是偶尔提到这幅画，在他心目中，德拉克洛瓦最伟大的杰作属于《但丁和维吉尔共渡冥河》、《希俄斯岛的屠杀》，或者《沙尔丹纳帕勒之死》。



阿布

另一种钢琴少年，另一种声音

2013 年末，14 岁阿布完成了年内的最后一场钢琴音乐会，阿布和他的爵士三重奏乐队演出了米樹·卡米洛（Michel Camilo）的经典曲目，熟悉阿布的老师们看到了他的成长，而在场的一些家长听到了一位中国钢琴少年正在演奏的不一样的声音。

记者 ✎ 黑麦


（王旭华 摄）

走进阿布的琴房，墙壁上贴满了各个流派音乐家的照片，墙下是一排吉他和贝斯，一把低音提琴横卧一旁，靠窗一侧摆放着一架三角钢琴，下面堆着橙色的吉他音箱，旁边的琴架上是他演出时常用的一把罗兰电钢琴和电脑，创作音乐时，阿布总会坐在这里。和大多数钢琴少年一样，他每天至少在琴房度过 4 小时，并且“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在阿布看来，这 4 小时并不漫长，因为他已经开始摸到练琴的诀窍，这种练习方法使他事半功倍。

阿布总是戴着耳机，耳机里最近放着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闲下来从兜里掏出手机也像是“某种习惯动作”，他似乎很在意发型，在姜文的新电影中客串了一把钢琴手后，他抱怨自己的头发被剪得太短了。除了乐器，阿布还喜欢收集乐高玩具，和同学们打“三国杀”，玩 iPhone 上的“部落战争”，阿布说：“我很少有时间玩游戏，之所以打‘部落战争’是因为我的同学和老师们都在游戏里。”几乎每隔半小时，他就会拿起手机看一下，面对游戏画面时，他的脸上仍是大男孩一般的稚气。

阿布并没有出生在音乐世家，但喜欢音乐的父母从未让阿布的生活缺少音乐的陪伴。阿布的爸爸是一位爵士乐爱好者，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会泡在 CD cafe 等演出现场，也由此结识了一些圈内好友。2003 年，4 岁的阿布开始了随鲍蕙荞、张式谷两位老师的学习之路。或许，最初的学习尚带有某种“家长的期许”，但是很快，父母更希望他“在音乐中获得乐趣”。两年下来，阿布长进不小，但是在阿布看来，“漫长的练习仍旧枯燥”。2007 年，阿布的爸爸也开始有意识地带着他到爵士酒吧，在看了几次孔宏伟和刘元的现场后，阿布觉得“他们的弹奏和古典技法不太一样，音乐更是听不懂”。又过了两年，此时的阿布已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学生，孔宏伟也觉得“是时候让阿布接触一下古典之外的音乐了”。

阿布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上爵士钢琴课时的场景：父亲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才找到孔老师家，坐在琴房里，有点发呆，因为既看不懂节奏谱，也不知道爵士钢琴的弹法。孔宏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也是国内较早一批爵士音乐家，他说：“一个古典琴童转到学爵士音乐不是容易的事。”为了“衔接教学方法”，被称作“小侏儒”的法国钢琴家米契尔·派卓西安尼（Michel Petrucciani）成了阿布的“第一本教材”。这是孔宏伟最初弹爵士钢琴时学习的音乐，他说：“80 年代时我们能接触到的音乐太少了，能听到的爵士乐几乎都扒下来，小侏儒的音乐中有一点古典，相对好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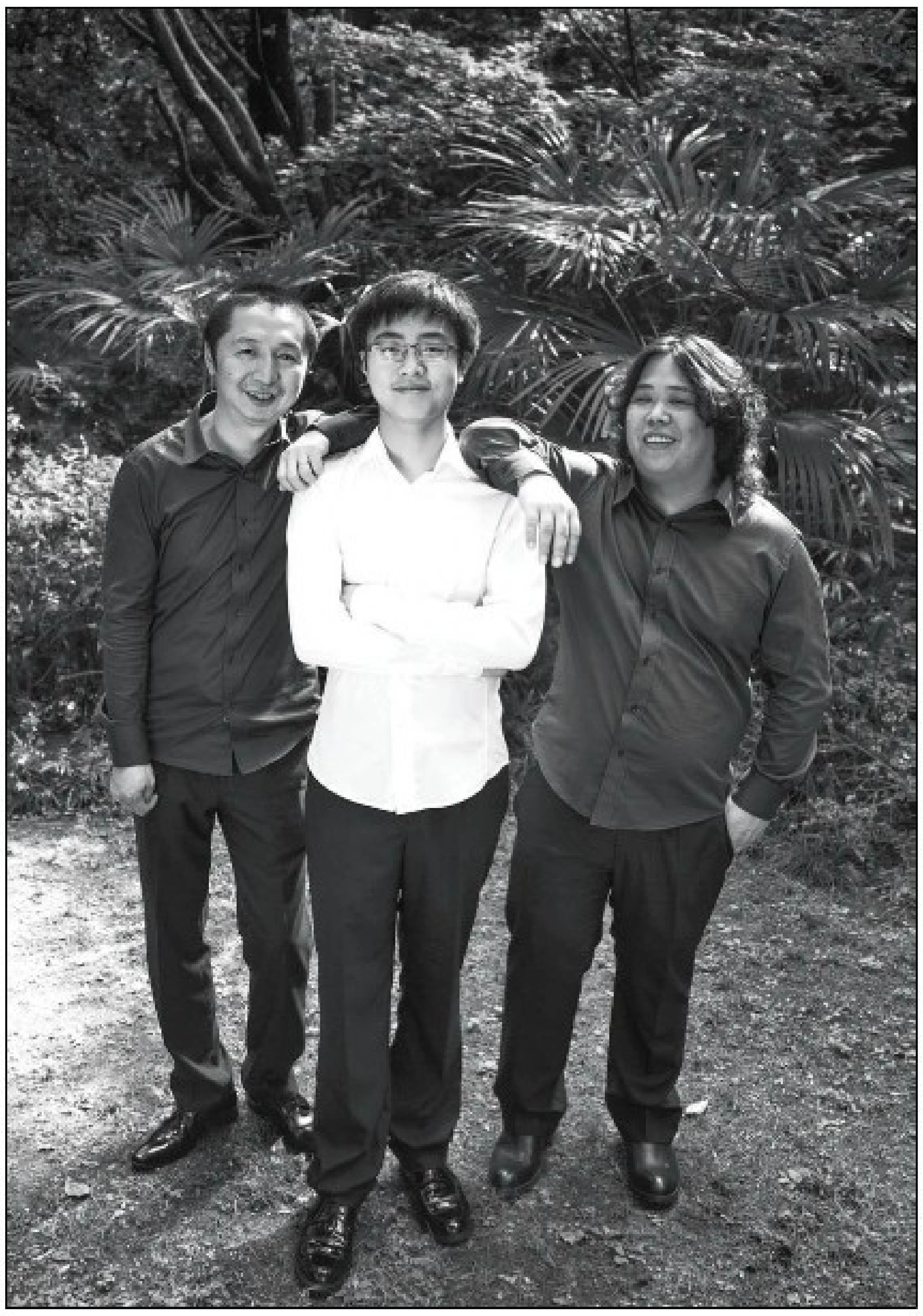
上了三个月课，孔宏伟给阿布布置了一项作业：“扒《你是一切》（*All The Things You Are*）。”这是阿布第一次接触一首完整的爵士曲子，两周后，阿布已经可以丝毫不差地在钢琴上弹奏这首曲子，这个速度让孔宏伟有点吃惊。一年后，孔宏伟开始鼓励阿布走出琴房，去“听、看、玩爵士”。有那么几次，《你是一切》成为阿布最喜欢即兴演奏的曲目，虽然现场的乐队并没有完全跟上他的弹奏，但他还是在现场中找到了乐趣。在 CD cafe 的一次即兴后，九门国际爵士音乐节创始人黄勇告诉阿布，你弹的是爵士，听起来仍像古典，应该试着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

阿布并没有因为学习爵士而放弃古典，他仍旧坚持随古典钢琴老师张志伟学习，阿布的爸爸也时常提醒他，“古典音乐是基础”。阿布钟情古典似乎并不只是为了提升技法，在孔宏伟让他开始弹奏米榭·卡米洛的《突尼斯之夜》后，他开始在古典与爵士音乐之间找到一种契合。此后，孔宏伟也开始让阿布动脑筋，在练习传统的爵士手法的同时，也加强拉丁爵士的训练。“拉丁是孩子比较喜欢的练习手法，因为律动很强，有意思。”孔宏伟说，“学习两年后，我就带着阿布开始双钢琴演奏，第一次弹下来传统爵士的曲子后，他表现出了兴趣，开始想把以前学的东西都加入进来，虽然那时还没有形成理性的乐句，但我已经小有成就感。”

马锴是现代音乐学院的爵士老师，他回忆道，在北京农展馆的老 CD 爵士酒吧演出时，总能看到一个没事就来

"芥末"(Jam,即兴合作)的小孩。"从他最开始弹的传统布鲁斯看来，他一定经常在家练琴，却没有与其他乐手的合作经验。"而半年后，"阿布已经成为一名很职业的钢琴手了，因为学习古典音乐的小孩技术基本是无懈可击的"，于是两个人开始结识。2011年，孔宏伟开始为阿布物色乐手，他请来了马锴和自己乐队的鼓手邵哈哈，从而正式组建了阿布三重奏团。

每周四、周五，阿布三重奏出现在天音排练室的时候，在马锴和邵哈哈的脸上总能看到一种欢乐的状态。马锴把三重奏排练时间看成"每个星期最快乐的时光"，他说："我和邵哈哈都很喜欢和阿布在一起排练。"这似乎不光是因为阿布有着过人的天分和演奏技巧，在马锴看来，演奏爵士的乐手必须有足够的想象力，"阿布总能为乐队带来一种新的尝试，使每个乐队成员都乐在其中"。


阿布爵士三重奏成员：（左起）邵哈哈、阿布、马锴

第一次得到认可，是在2012年的九门国际爵士音乐节上，阿布的三重奏团和20岁萨克斯手李高阳成为开场乐队，那一天，很多人看到了中国爵士的"新希望"，老一辈音乐人似乎也坚定了信心。那一天，森海塞尔的大中华区总裁马克·文森特（Marc Vincent）专程来到现场，两人在演出后成为朋友，马克希望自己的品牌能与这个年轻人有些合作。一年后，马克从德国请来了数届格莱美奖得主、曾与卡拉扬合作过的雅各布·亨德尔（Jakob Haendel），他准备为阿布的乐队录制一张唱片，并亲自出任现场监制。阿布列出以传统爵士为主的曲目单，并与乐队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中，在专辑中，阿布演奏了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的高难度作品《大脚印》（*Giant Steps*）。专辑录音完成后，马克把专辑母带送到德国老虎鱼（Stockfisch）唱片公司缩混，孔宏伟在听过唱片后说："这是我在中国听到过的最好的钢琴声。"

2013年夏天，阿布参加了上海爵士节，在演出时，他结识了美国钢琴大师奇克·柯瑞亚（Chick Corea）。柯瑞亚1960年是迈尔斯·戴维斯乐队的一分子，也是过去30年间美国最重要的爵士乐音乐家。在柯瑞亚演出前，阿布与他一起用餐，其间，柯瑞亚只是简单询问了阿布几个问题，这种交流似乎并不能满足阿布，此时的他还幻想着"能与这位大师一同在舞台上表演双钢琴"。柯瑞亚的演出进行到下半场时，突然说他要请上一位本土的年轻钢琴家四手联弹，阿布吃了一惊，然后走上舞台。两人在"A小"和弦上开始了"另一种对话"，直至表演结束，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柯瑞亚对阿布说："你做得很好。""其实我对柯瑞亚有一点儿防备，我是巨蟹座，想事儿会比较多，我以前看过他的演出视频，他在纽约演出时偶尔会抓自己的学生上台即兴，但是我从来没有和人四手联弹过，也不知道他会和我弹什么。"在阿布看来，柯瑞亚是个神一样的家伙。"他从来没有上过任何音乐学院，但是对音乐的研究功底相当深厚。他不仅是个伟大的音乐家，还是个知名的数学家，他也会用数学的方式来分析爵士乐。"回到北京后，阿布看了几遍演出视频，仍有些兴奋，为此他创作了一首《遇见柯瑞亚先生》（*Meet Mr.Chick Corea*）。

2013年的9月到11月，阿布经历了人生中最忙碌的一段时间，那时，中央音乐附中刚刚开学，阿布连续在上海、深圳、杭州、纽约等地表演。11月，他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第一次表演了《遇见柯瑞亚先生》，此时的阿布已经没有了之前登台的羞涩，他的演出曲目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拉丁音乐。为此，亨德尔又一次来到北京，为阿布录制了整场演出。孔宏伟认为，阿布进步很大，对于爵士音乐的一些演奏手法与技巧很轻松就可以驾驭。"最近一年多，阿布已经开始自己学习，也按部就班地选择学习一些大师的音乐。"在马锴看来，"阿布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作品，往小音乐家的路上行走了。在学校，他组建合唱团，指挥乐队排练，一年前我还要教他音乐上的知识，现在他已经开始和我们探讨，并且有了自己的见解。"

今年夏天，阿布将前往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The Juilliard School），他觉得自己会在那里组建一支大乐队。他说，他会在那里与当地的乐手尝试着做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音乐。

三联生活周刊 新媒体
www.lifeweek.com.cn



【节气风物 · 随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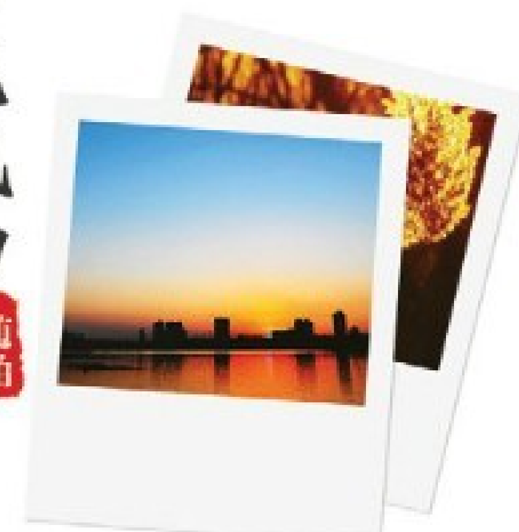
参与方式：
关注@三联生活节气，用手机或者相机拍摄反映当下节气风景或者物体的图片，将图片发布到微博上（配简单说明），并@三联生活节气，且加注#节气随拍#。

获奖说明：
每个节气选出10名参与活动的用户。中奖名单于节气当日发布在“三联生活节气”微博上。每个用户会获得由竹叶青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获奖作品有机会登上《三联生活节气》。

节气风物 随拍

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

无论是枝头枯叶、静夜圆月，还是杯中茶汤、碗中赏味，身边的一切风物都在时刻流露季节的变换，节气已不单单只是二十四个符号，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生活方式。你习以为常的点滴，可能是我们眼中最美的风景。拿起你的相机或手机，把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一器一物的美妙都记录下来。



三联生活 · 节气

平板客户端：
在苹果商店搜索“三联生活节气”
手机客户端，即将上线！

三联生活周刊

平板/手机客户端，在苹果商店或安卓市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微博@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搜索：lifeweek
三联生活网www.lifeweek.com.cn

生活者Club

三联生活周刊读者俱乐部“生活者Club”邀你加入我们倡导 的品质生活。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实用贴心的会员增值服务，详情见：
www.lifeweek.com.cn/club

扫描二维码直接下载客户端
或手机发送短信“三联生活周刊”
到12114获取下载地址

彩信手机报

每周六期，当周杂志核心内容。8元包月（需开通彩信服务，价格不含通信费，前72小时免费试读）
移动：发送SLZK到10658000订阅　联通：发送SL到10655111订阅　电信：发送SLZK到10659000订阅



豪庄·赛格拉城堡

波尔多葡园中的枪炮玫瑰

“在风调雨顺的年份里，我们不过是忠实展现自然本身的杰作；在并非如此顺利的年份里，酿酒师的人为因素得以更充分呈现，每个酒庄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只有在这样的考验下才真正绽放。”

主笔 ✎ 王星

每一年的年份对于葡萄酒来说都是一个年度话题，“2013”对于法国葡萄酒尤其是波尔多地区的葡萄酒而言，实在是一个只能用“艰难”来形容的年份。2013 年收获季结束后，法国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CIVB）表示：由于春季的糟糕气候和夏季的严重暴雨灾害，波尔多 2013 年的葡萄收成减产 20%，达到自 1991 年以来的最低值。





克拉萨



翻新过的豪庄·赛格拉城堡

美国《商业周刊》则报道，2014 年对 2013 年产自波尔多的葡萄酒期酒定价时，降价幅度将达到 25%。

尽管如此，在一些已经历经几世纪风雨的老酒庄看来，2013 年的一切不顺只是验证了在酿酒师圈子里世代传继的一句老话："在风调雨顺的年份里，我们不过是忠实展现自然本身的杰作；在并非如此顺利的年份里，酿酒师的人为因素得以更充分呈现，每个酒庄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只有在这样的考验下才真正绽放。"豪庄·赛格拉城堡（Château Rauzan-Ségla）与开隆庄园（Château Canon）是波尔多诸多正在为这个年份努力的超百龄酒庄中的两个。

虽然在中国不及以拉菲（Château Lafite Rothschild）、玛歌（Château Margaux）为首的几大名庄出名，但这两家酒庄在波尔多远非无名之辈。1855 年，为世博会宣传方便而确定了波尔多酒庄分级制度，这一后世以"1855 列级"简称的五个分级已经成为近似米其林餐厅指南的波尔多酒庄基本"阶梯表"。"二战"期间曾有逸闻：德国集中营中一名法国波尔多裔战俘每日以背诵 1855 列级酒庄消遣，当一日发现遗忘了几家时他潸然泪下——在他看来，战争已经泯灭了他心灵中最后一片净土。当这位富于诗意的战俘可以顺畅背诵时，豪庄·赛格拉城堡出现在列级名单的第六位。豪庄·赛格拉城堡位于波尔多左岸的玛歌，当



开隆葡萄园

年排名仅次于后来升入一级的木桐酒庄（Château Mouton Rothschild），如今位列二级庄之首，在法国以外有绰号“超级二级”。开隆庄园则位于波尔多右岸，属圣艾米利永一级庄B组（Saint-Emilion Premiers Grands Crus Classés B）。早在因为电影广为人知数百年前，圣艾米利永（Saint-Emilion）就已经以葡萄酒产区闻名。1955年，该产区正式成立分级制度，与不再更改的1855列级不同，这一制度每10年左右评审修改一次。开隆庄园虽然距一级庄A组尚有一步之遥，但当时的A组毕竟只有欧颂（Château Ausone）和白马（Château Cheval Blanc）两家，而且在B组身后还有63家列级庄（Grands Crus Classés）和众多只有权标识“Grands Crus”的地区酒庄。2006年之后围绕圣艾米利永分级制度出现的种种争论也未曾撼动开隆庄园的地位，它称得上波尔多右岸的名门望族。

现今63岁、已经在酿酒行业中历练了20多年的克拉萨（John Kolasa）目前身兼豪庄·赛格拉城堡和开隆庄园两家的总经理和酿酒师。对于多灾多难的2013年，克拉萨的看法是：“春季反常的低温与连绵细雨将葡萄的开花时间推迟了将近三个星期，7月的天气却报复般地忽然变成了炎炎夏日，8月也同样骄阳似火。与此同时，法国几乎所有葡萄酒产区都无一幸免地遭到冰雹袭击，临近收获季节同样反常的阴冷使我们丧失了最后的救星。所有欠佳的年份都会再度提醒我们对自然应有的敬畏，2013年春季的反常其实也可以算作一种幸运，因为它促使我们从最初就做好应对准备。事实上，我们经历过更加坎坷的年份。”

克拉萨所说的“应有的敬畏”其实也并不限于酿酒师行业或者单纯“自然”本身。即便有辉煌，“坎坷”同样适合形容豪庄·赛格拉城堡与开隆庄园的历史，这两家已经平均近300岁“高龄”的酒庄确实经历过自己“更糟糕”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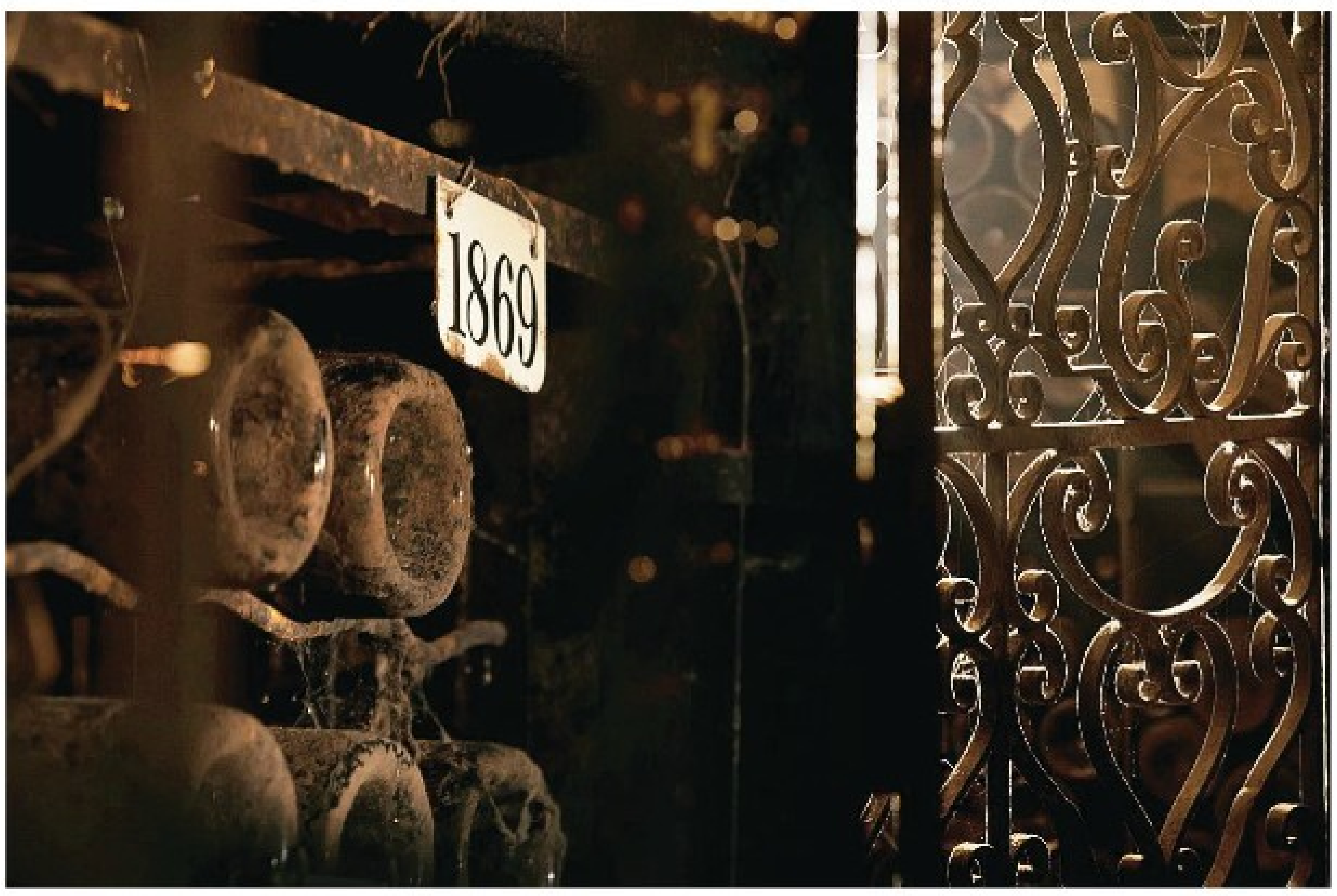
克拉萨原籍苏格兰，大学的专业是法语与平面设计，1971年来到波尔多后，逐渐开始了从英语教师到酿酒师的身份转换。在波尔多左岸波亚克（Pauillac）著名的拉图酒庄（Château Latour）任职24年、富于变革精神的著名酿酒师加德尔（Jean-Paul Gardere）是克拉萨在酿酒领域的导师与“教父”。供职

豪庄·赛格拉城堡和开隆庄园前，克拉萨曾在拉图酒庄担任了7年总经理。或许是命运的某种机缘巧合，豪庄·赛格拉城堡的创始人德·豪庄（Pierre Desmesures de Rauzan）数百年前也是拉图酒庄的“经理”。

作为波尔多葡萄酒业的开拓先驱之一，德·豪庄对于土地的选择事实上见证了未来波尔多数家1855列级名庄的缘起。早在1650年，也即成为拉图酒庄葡萄园的“承租者”近30年前，德·豪庄就开始着手收购自己看中的土地。1661年9月7日，德·豪庄从德·加斯科家族（de Gascq）手中收购了位于玛歌的一片土地，这就是豪庄·赛格拉城堡的前身，德·豪庄自豪地以家族的姓氏“Rauzan”为这片土地命名。德·加斯科家族是波尔多的望族之一，最初的采邑在圣朱里安（St. Julien）的“雄狮村”（Léoville）。德·加斯科家族在圣朱里安的领地后来即将分散成1855列级中三个都以“Léoville”命名的纠缠不清的二级酒庄，在玛歌的领地却似乎被德·豪庄占了先手，1855年分级时只占据了一个位列三级的宝玛酒庄（Château Palmer）。置办下玛歌这片土地时，德·豪庄已经以玛歌酒庄“承租者”身份工作了数年，他的理念是：尽量收购临近自己“承租”葡萄园的土地，大面积开垦种植葡萄，构建出独具地域风格的酒园。带着这一在当时极具前卫色彩的梦想，德·豪庄在玛歌酒庄一直工作到1663年。1679年，德·豪庄开始在拉图酒庄担任同样的职务，并将类似的土地并购理念带到了拉图酒庄周边，直至1692年去世。

去世时，玛歌周边被德·豪庄称为“Cru de Gassies”的酒园已经达到40公顷，在拉图酒庄周边也出现一片被他称为“Cru de Pichon”的酒园。“Gassies”得自土地最初的拥有者嘉西家族（Gassies）。嘉西家族本是玛歌男爵的附庸骑士，祖传采邑也位于玛歌。这是一个因军火贸易而发达的家族，16世纪初出了一位著名的洛昂（Laurent de Gassies），他因前往美洲贩卖私货回程时消灭了一条西班牙走私船盗而一夜成名。但这个家族自此之后几乎湮没无闻，原先骑士领地上“觐见室”（Noble House of Gassies）周边的葡萄园也四散出售，辗转德·加斯科家族之手而于1661年易名“Rauzan”的土地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德·豪庄的遗嘱，拉图酒庄周边的酒园由女儿特雷莎（Thérèse）继承。这片至今仍环绕在拉图酒庄标志性瞭望台周边的葡萄园在1850年时又因继承问题分裂为两个酒庄，在1855列级中，它们成为并列二级的碧尚男爵酒庄（Château Pichon Longueville Baron）和碧尚女爵酒庄（Château Pichon Longueville Comtesse de Lalande）。德·豪庄留下的玛歌周边的葡萄园由三个儿子共同继承，后来长子与次子另谋他业，只有最小的儿子继续父亲的葡萄酒事业，并将“嘉西勋爵（Sieur de Gassies）”的名号正式引入家族。1785年，在历经22年对酿酒技术的争执后，一场波尔多特色的婚姻最终将酒庄一分为二：与赛格拉男爵（Baron of Ségla）的联姻赋予豪庄·赛格拉城堡今日的全称，余留在嘉西勋爵名下的产业更名为“露仙歌酒庄”（Château Rauzan-Gassies）。在1855列级中，露仙歌酒庄的排名紧随豪庄·赛格拉城堡之后。归算下来，德·豪庄大半生为日后波尔多的两家1855一级酒庄效力，身后留下，4座位具二级庄前列的酒庄。

直至20世纪初，与豪庄·赛格拉城堡相伴的大多是辉煌。城堡出产的葡萄酒在德·豪庄在世时就已经被誉为教区内最出色的之一。1661年前后，德·加斯科家族掌握着波尔多议会的大权；近100年后，则是德·豪庄家族充当着波尔多议会各代大法官的摇篮。1787年，时任驻法大使的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到访波尔多时拜访豪庄·赛格拉城堡，随后又在1790年9月6日向酒庄订购10箱葡萄酒，这在当时必定是一种令双方满意的友好表示，特别是考虑到它发生在1789年之后。赛格拉男爵将自己的名号带给了豪庄·赛格拉城堡，但他本人不久就在大革命期间死于暗杀，留下德·豪庄与赛格拉封号的唯一继承人凯瑟琳（Madame de Rauzan-Ségla）。



开隆酒窖



豪庄·赛格拉各款年份佳酿，中间一款为香奈尔首席设计师拉格菲尔德专门设计的 2009 年份酒标（中）



豪庄酒窖

由德·豪庄的女儿特雷莎一支衍生出的碧尚女爵酒庄经常被视为波尔多女性在葡萄酒领域成就的典范，但经常与豪庄·赛格拉城堡相伴的玫瑰图案也绝非空穴来风：在动荡的18世纪末，正是凯瑟琳母女以近乎钢铁的意志把控了酒庄的命运。

至今很多波尔多人还会津津乐道德·豪庄在泰晤士河上的壮举：为确保自己产品在英国的售价，他宁肯将一船最好的葡萄酒倒入泰晤士河也不降价。德·豪庄的孙媳妇玛丽一安（Madame Marie-Anne de Briet）显然承继了他的这一铁腕手法。当时波尔多的酒商间有不成文的规矩：二流酒庄每桶葡萄酒的售价不能超过一流酒庄售价的3/4，而玛丽一安坚持两者间的价格差不能多于7/8。最终如同她的祖父一样，玛丽一安获得了成功。玛丽一安的商业头脑显然得到了她的公公的认可，虽然她在结婚10年后与丈夫分手，但仍在1778年后完全掌控了酒庄的管理。1816年玛丽一安去世后，她的长女、孀居的凯瑟琳与妹妹共同继承了酒庄。凯瑟琳自1828年后成为酒庄的唯一拥有者，她没有看到1855列级，但在她有生之年，豪庄·赛格拉城堡拥有了仅次于玛歌酒庄的声誉。

豪庄·赛格拉城堡在德·豪庄后代的手中保留至1866年，随后以73万法郎的价格出让给在波尔多的参议员、新教牧师杜兰一达西（Eugène Durand-Dassier）。杜兰一达西本身是波尔多地区建筑最宏伟的克雷孟一碧尚堡酒庄（Château Clément-Pichon）的始建者，在杜兰一达西的照管下，豪庄·赛格拉城堡继续着它在国际范围的盛名。1903年，杜兰一达西的女婿克鲁斯（Frédéric Cruse）接手酒庄的管理并建成今日人们所见的城堡，取代了之前老派的黄绿色查特风格（Chartreuse）建筑，酒庄周边的葡萄园也进行了重新布局。然而，20世纪3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使葡萄园面积锐减至20公顷，此后的25年更是灾难性的。回顾豪庄·赛格拉城堡当年的辉煌，它在这一时期的落魄相比就更显突出：酒庄的日常运作几乎停顿，1956年2月那场波尔多历史上最冷的初春摧毁了葡萄园中更多的葡萄。20世纪后半期的近40年里，豪庄·赛格拉城堡像不受欢迎的半熟山芋一样被数次转手封藏，尽管也曾有过诸如“更换不锈钢酿酒罐”等现代化尝试，但在克拉萨1994年走进酒庄时，他只能感慨“百废待兴”：“办公室里没有计算机，没有对讲系统，相反葡萄却使用机械采摘。发酵罐全部是220升的，这意味着无论是来自哪块地的哪种葡萄，只能把它们混杂进一个罐里发酵。”

分别在1994年与1996年以“收购”的形式赋予豪庄·赛格拉城堡与开隆庄园重生的是香奈儿（CHANEL）公司。在今天那些迫不及待地在波尔多四处寻觅可收购的酒庄的投资者看来，香奈儿公司当年的做法堪称这家以香水成名的家族企业在另一个液体领域极富前瞻性的决策。然而，一个葡萄酒庄并非一件买下后束之高阁也无不可的纯奢侈品。香奈儿公司在1993年与拉图酒庄擦肩而过，在竞价中输给了PPG集团，但它一年后为自己的新酒庄挖来了在拉图酒庄效力多年的克拉萨。从纯粹葡萄酒的意义上说，克拉萨成了豪庄·赛格拉城堡与开隆庄园之间的精神纽带。

1996年，当克拉萨走进对岸的开隆庄园时，他看到的景象也决不更令人鼓舞。开隆庄园同样经受了20世纪种种来自社会与自然的冲击，但80年代末葡萄园遭受的真菌疫情格外雪上加霜，大量老树龄的葡萄藤被感染致死，仿佛以一种异常惨烈的景象宣告这座右岸一级酒庄终究无缘于它之前的辉煌年代。开隆庄园始建于1760年，比豪庄·赛格拉城堡晚近一个世纪。如今东方视角中的圣艾米利永小镇已然成为浪漫柔情的代名词，波尔多右岸的葡萄酒也更容易被赋予种种阴性化的形容词，但开隆庄园的缘起却远没有对岸德·豪庄的故事那般老辣沉稳。尽管对酒庄名称的由来还存在不同说法，但它与“大炮”在含意上的联系以及与创始人卡农（Jacques Kanon）在发音上的关联都是后人难以忽视的。

卡农堪称那个年代造就的“英雄”之一。他出生在波尔多西北部的布雷(Blaye)，如果要划分职业，该算是“privateer”，这实际上是18世纪对“海盗”的委婉说法。史书中有关卡农最早的记载是在1756年，当时他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路易十五完成了一次在法国北部海岸的枪械走私。卡农最著名的“功勋”恰好成就于1759年，也即他在圣艾米利永购置地产前一年。当时法国与英国为争夺现今加拿大的魁北克进行最后一战，熟悉航路的卡农担负了护送法国战船与补给船自波尔多前往魁北克的任务。海战的结果使魁北克多了法语，作为回报，卡农从波尔多当局获得了减免税收等优惠。不过，没有文件表明圣艾米利永的这片土地在“回报”之列，将它设想为一名法国冒险家为满足自己“归园田居”的梦想的努力也许更容易让人接受。

卡农确实对自己的酒庄很认真。他所接手的是石灰岩坡地上的一小片开垦于18世纪初的土地，当时大面积单一种植葡萄在波尔多右岸还是不大令人理解的行为，卡农却为拓展葡萄园、建造新城堡花费了不少努力。出乎后人意料的是，卡农在1770年将刚建好不久的酒庄转手卖给了波尔多酒商封特莫因（Raymond Fontémoing）。史书上有关卡农的最后记载也停留在这一年，据说他应召指挥一次预计为期，4个月的航行，此后再无音讯。卡农留给封特莫因的是一座尚且名为“圣马丁园”（Clos St. Martin）的酒庄。关于酒庄命名为何改用“Canon”，现存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是卡农姓名的谐音，另一种认为这是酒商封特莫因使的小伎俩：他们在隔壁的弗龙萨克（Fronsac）拥有一处已经命名为“Château Canon”的酒庄，希望以名称上的相通扩大自己产品的销路。

无论如何，圣艾米利永的开隆庄园以葡萄酒在1770年前后确立了自己的名望，1853年起，开隆庄园开始正式使用“Château Canon”的命名。然而，开隆庄园在封特莫因家族手中只停留至1857年，与豪庄·赛格拉城堡比，开隆庄园早近100年就开始了自己被数次转手的历史。1919年，弗尼埃尔（Fournier）家族收购开隆庄园，他们在整个20世纪对酒庄的改造和品质的提升有目共睹，开隆庄园在1955年的圣艾米利永分级中被选入一级也是实至名归。1980年，弗尼埃尔家族为酒庄建造了全新的大橡木发酵桶，令葡萄酒的品质有了较稳定的表现，但80年代末的真菌灾害似乎是压在弗尼埃尔家族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1996年香奈儿公司的出现仿佛是200多年前那位海上浪子留下的葡萄酒梦想的最后救主。

对于豪庄·赛格拉城堡，克拉萨先在66公顷的葡萄园新建了长达15公里的排水系统，准备逐步恢复1904年时对葡萄园的规划。与此同时，克拉萨将酿造车间内尺寸单一的发酵罐改换为大小有别，使不同地块的葡萄得以实行单独发酵和酿制。对于开隆庄园，克拉萨的工作显然更困难：酿酒设施的更新自不必说，最繁重的是葡萄园中50%的葡萄需要重新种植。自2009年开始，首批被重新栽种的葡萄所结出的果实被再次用于开隆庄园一标葡萄酒的调配。2011年，同处圣艾米利永的玛塔堡（Château Matras）被收购，它的12公顷葡萄园将作为开隆庄园35公顷葡萄园的补充，主要用于副标酒的酿造。

同样是历经磨难，开隆庄园显然比豪庄·赛格拉城堡更伤筋动骨，在诸如2005年这样“超级好年份”中，馥郁的黑莓味中也带着几分不自信，仿佛挂在客房而不是画廊中的无名油画，反倒不如2006年更加收放自如。相形之下，劫后的豪庄·赛格拉城堡依旧以典型的玛歌风格我行我素地散发着优雅而深邃的果香，令人想起历史与虚构中那些为自己的理念不惜一切的女性。在克拉萨看来，2001年的豪庄·赛格拉城堡堪称酒庄风格的典型代表：西梅、胡椒的香气中带有香料的芬芳；口感柔软而馥郁，带有新鲜的单宁；酒体结构优雅；回味悠长而平衡。倘若以女性来形容，英国亨利八世那位原配、阿拉贡的凯瑟琳或许足以担当。

如果“罗伯特·帕克”的名字确实能意味着什么的话，帕克给2010年的豪庄·赛格拉城堡打出的95分也就确实意味着些东西。开隆庄园的副标酒“Clos Canon”即将更名为“开隆十字”（Croix Canon），据说部分原因是如今波尔多的酒庄们倾向于避免“Clos”这种“过于勃艮第”的说法。对于豪庄·赛格拉城堡与开隆庄园来说，这样未免有些遗憾，毕竟“clos”这样的古典式“园地”概念已经嵌入它们的年轮。无论是德·豪庄家族秘密花园式的我行我素还是卡农带着硝烟醉舟味道的梦想，它们都见证了波尔多葡萄酒的早期历史，如今的人们只能想象。数百年后，在2013年底的品鉴会上，克拉萨打开了一瓶1978年的开隆庄园。1978年遭受了与2013年相似的寒冷的初春，唯有收获季节天气比2013略为有利。克拉萨希望宾客能从中品尝出酿酒师在一个不利年份可能达到的成就。1978年的开隆庄园已呈砖红色，虽然香味中带有暗红玫瑰的遗韵，口中浆果的香辛中另有一丝奇特的铁血风味。克拉萨理应还没听说过中国的干将莫邪之类的传说，但他不断重复的祖辈酿酒师们的训诫中带有某种源自波尔多初年的真实：“我所做的许多事是为下一代，假如你继承了很多，这也就意味着你必须留给后人更多。”

定义“中国式商务智能手机”
金立天鉴战略及新品发布

2014 年 1 月 7 日，金立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办“中国式商务智能手机”天鉴战略及新品发布会，两大新品天鉴 T1 以及天鉴 W808 同时亮相，并且全部搭载最新的天鉴系统。天鉴新品皆为金立在深度研究中国商务人士用机需求之后，为中国商务人群量身定制的产品，金立就此定义了“中国式商务智能手机”的概念。本次发布会由央视知名主持人陈伟鸿担纲主持工作，金立合作伙伴、渠道商、行业嘉宾、媒体等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中国式商务智能手机”的诞生。



金立集团董事长刘立荣

为中国商务人士专属定制

本次发布的两大旗舰新品——天鉴 T1、天鉴 W808，不仅继承了天鉴系列原有的优秀品质，还深度围绕中国商务人群的使用习惯、审美需求进行量身定制。

天鉴 T1 是业内首款将“原笔迹手写”和“指纹触控”两大技术同时应用的手机产品。T1 的“原笔迹手写”功能彻底演绎出中国式的手机人文科技，它配备高灵敏感应电磁笔，书写、输入便捷自如，尺寸之间尽显优雅从容。而取笔唤醒功能，实现了取笔亮屏，更加智能人性。同时，政商人士可通过原笔迹手写在字里行间展现个性标签，还原最真实的政商本色。而在安全方面，T1 更加懂得如何保护商务人士的机密信息，采用新一代指纹识别技术，实现指纹加密解锁，更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隐私安全。T1 还革命性地利用指纹识别系统实现背部触控，单手操作易如反掌。

另一款新品天鉴 W808 可谓是“奢于外而敛于心”。W808 延续了天鉴经典的折叠翻盖造型，屏幕特别由精选的蓝宝石制作而成。蓝宝石又名“命运之石”，是财富、成功和智慧的象征，尤其适合成功人士使用。天然蓝宝石无法切割成巨大尺寸屏幕，研发人员模拟天然蓝宝石生成环境，利用高科技合成蓝宝石晶体作为屏幕材料，每一颗蓝宝石都由纯度高达 99.999% 的三氧化二铝在 2600℃高温下历经 18 天结晶而成，每个部件都经过顶级工匠手工切割打磨，弥足珍贵。W808 选用如此珍贵的材质制成，尊贵之感，油然而生。手机的背面则别出心裁地采用陶瓷材质，不但具备超高的强度和稳定性，更是别具中国特色。此外，W808 采用了“八双四核”配置，具体包括“双屏”、“双触摸”、“双卡双待”、“双摄像头”、“双输入”、“双转轴”以及“双电”、“双充”，完美满足商务人士办公、生活过程的各种所需。

定义中国式商务智能手机

金立天鉴系列一直被许多精英成功人士所青睐，尊贵外观、易用软件、强大的安全隐私保护以及便捷的商务功能，成为该系列产品的核心优势。此次与新品同时发布的全新天鉴系统，除延续了原有的“好易用”、“手机盾”及“商旅通”三大核心应用外，还特别为政商人士量身定制了一个专属 APP——“国学汇”，它集“国学类”、“健康养生类”、“品鉴收藏类”三大资讯中心为一体，方便用户随时随地了解所关注的信息。

天鉴 T1、天鉴 W808 以及全新天鉴系统的推出，进一步体现出天鉴系列手机“便捷”、“安全”、“易用”、“尊贵”的形象。也正因为如此，天鉴系列定义“中国式商务智能手机”，开创出商务智能手机新品类。

金立集团总裁卢伟冰表示：“在深刻理解广泛中国商务人群需求的基础上，我们不断升级优化天鉴系列产品，致力于创造最懂中国商务人士的智能手机。”金立作为屹立手机行业长达 11 年的知名厂商，在商务手机的研发销售工作上，一直坚持以消费者为导向，不断推出更加契合用户需求的产品。

“中国式商务智能手机”这一新品类的成功开创，也进一步凸显出金立天鉴的品牌内涵。未来，金立天鉴品牌将在 T 和 W 两大系列的支持下更加强大，紧握住中国商务人群的消费需求，量身定做属于中国自己的商务智能手机，创造中国式商务智能手机的辉煌。


金立天鉴 W808
金立天鉴 T1



陨石面手表的归宿

一块好表兜兜转转找到一个“好归宿”的确需要点缘分。

文 ✎ 郄凤卿

在劳力士手表的圈子里习惯了，眼睛就不向普通的香槟面文字盘上看了。所谓香槟面就是金黄表盘，和表有一体感，但久而久之让人感到平凡。如果不是收藏者而是一个普通的佩戴者，我倒认为平凡反而不易生厌。我自己也不知如何喜欢上宝石的，只是朦胧记得，年少时就喜欢一种墨绿的颜色，这种颜色给我以心理上极大的满足及宁静。这种内心的颜色，最终因为进入了表圈而被唤醒，才知道喜欢是以某种形式来拥有，而最好的喜欢方式就是拥有和收藏。

大约在1999年8月的香港展会上，我的宝石手表情结第一次被唤醒。那时，世界各地的名表让我目不暇接。就在展会结束那天，来了几个没有摊位的表贩兜售名表，他们站在一旁，腕上戴着2块或3块表向客人展示。我知道这些人是不想付摊位费蹭展，而且没发票也不会有什么保障。即便如此，当我发现某贩手上有一块墨绿色面盘的劳力士时，还是压抑不住好奇，拿过来瞧了瞧，这一看就被吸引了，以至于不能自持。它正是我心中期待的颜色，而且，盘面绿的基调之上，还有很多鲜红的点状物，像血点，点缀得非常微妙。时间刻度用的是罗马字金钉，为整个表盘增添了一些神秘。其实，本人不那么喜欢罗马时标，但对表的爱和对人一样，在喜欢的时候，看不到缺点。

这块宝石面的劳力士，我可以说印到脑子里了。可惜，在散场前，我没有足够的钱买到这只表，留下了那个人的名片后，托朋友拉关系才最

终入手。我曾在川崎医大的书店里买了一本书叫《世界的宝石》。按照这本书的说法和照片，这块宝石应当是血玉髓，译成中文为基督血石(Bloodstone)，又称为血星石。它是石英结晶体的碧玉的一种，其红色或褐色的斑点是酸化铁，自古以来是基督教用来做圣像用，其中的血斑用来暗喻耶稣殉难的血液。就这样，我的收藏中永远多了一个宝石盘面腕表的位置。说实话，宝石面表我不经常戴，但我也从未有过转让的念头。它静静地在抽屉里、保险柜里躺过一年又一年。我也经常拿出来把玩，那宁静、深邃的感觉会融化到血液里，这就是宝石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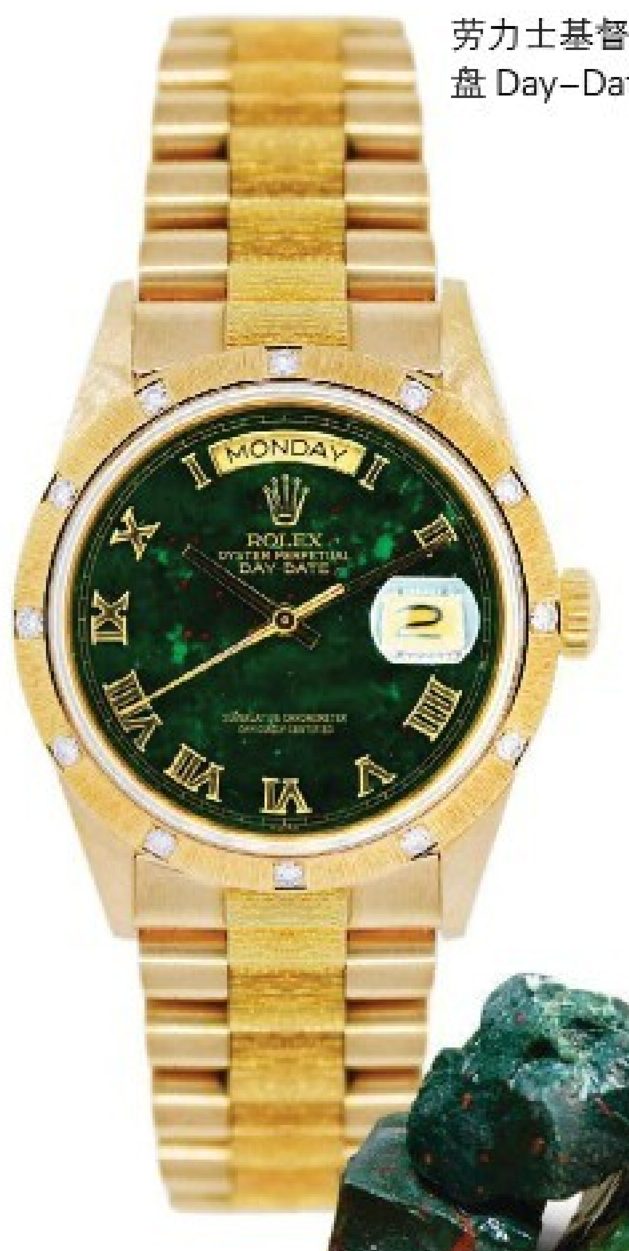
另一块与我颇有渊源的宝石面腕表是从台湾朋友的网站上拍到的尊达万年历表，它还给我带来了一次无比折腾的卖表经历。说起这枚腕表也非常特别：陨石面盘，月相部分用镶嵌金边的青金石做成。青金石上用金字写了一个欧洲著名的钟表店的名字，而尊达的标识则刻在表背上。表带是用黄金和白金的金丝编成，长约18.7厘米，对我来说也非常合适。入手时，朋友特别告诉我，这表的机芯是著名的偏心自动结构FP 71超薄机器，制造精良。

可上手戴了几天，我发现自己又犯了一贯的毛病：没有发现这只表的时间刻度是罗马字。常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喜欢罗马时标？其实自己也说不清。一般讲，罗马时标更受欢迎一些，但本人喜欢简约的条钉字，只有在对面板特别感兴趣的情况下，才会一叶障目，完全看不见是条钉还是罗马字。

戴够了，怎么办？卖掉它。可尊达不同于劳力士，大部分人并不知晓，知道的人也只是说：“呵，尊达，不就是三问声音特别好听的那个表吗？”而对尊达的特殊八角、特殊面盘材料充耳不闻。既然国内不识货，我只好上日本雅虎的名表拍卖网，把它出售给懂行的日本表友。不过国内野蛮的装卸让我为陨石面能否平安到达日本而担忧。想想自己的购表经历，王永昌古董表的陈小姐每次邮寄表时，总是不厌其烦地打上一页满纸的文字，介绍历次的事故，用以委婉地告诉鄙人：你的表要是丢了或坏了，本店绝不负责。

终于还是找到机会托日本朋友把表“戴”回了东京，表是安全了可是戴表的人却发生了一些小插曲，破天荒地让海关扣下了行李中的日元现金。外汇被没收，是常有的事，但没收中国人持币出境的时候多，没收外国人的少之又少，申诉无门。

我玩笑地想他与这陨石万年历气场不和。无独有偶，这枚陨石腕表曲折的出售经历才刚刚开始。表在日本雅虎拍卖网上出品了，我用最大的智慧希望日本人戴上这只旷世之作。首先这陨石已不知在宇宙星空中运转了多少亿年才落到地球上，又不知辗转多久被尊达找到，选中作了表盘。当然，青金石也是优中之优，以及订作此表的珠宝商也十分著名。万年历功能，自动上链。



劳力士基督血石表盘 Day-Date 腕表


基督血石

日本也好，雅虎拍卖也好，都是提倡依规办事，照理我应把这枚表出在尊达栏目中，但一看栏目中的战友，太寒酸了，我不忍心让尊达万年历跻身一堆垃圾中。偶尔也看到有把不知名，但很漂亮的贵金属宝石表放在伯爵里卖，把劳力士ref.1803放到百达翡丽里卖。虽有违规之嫌，但大家都没说什么，雅虎公司也没说什么。我一想这表盘上并没有尊达字样，刚好可以钻空子把它放在百达翡丽栏中。当然，我并非有意欺瞒品牌，在文字说明中，注明了尊达的字样。果然，出品二天后，观看者已达到200人。

金额达到15万日元的时候，来了第一个询问邮件。这位仁兄看来很有兴趣，先问了关于腕表标识位置的问题，是不是有改装过等等，我据实作答。接着又有人问：“虽然你说是陨石面，但我看纹路太规矩了，我见到的昆仑、劳力士的陨石面都是不规则型的。如果您想看看的话，可以看本拍卖会劳力士双窗第九页，还有乐天市场表网拍卖，昆仑第二页。”这个问题，我解答不了。仔细看看手中的表，盘面确实是从中心向周围发射出很规则的条纹。一时心慌，怕在雅虎拍卖上丢了面子，信用分数打折扣。

此时已经是晚上22点，我冒雨半夜来到王品生师傅的店里求证。王师傅用一个加倍的放大镜，清楚看到了陨石被大气燃烧后留下的小岩洞。可以说，这块陨石差不多在高温下成了灰，但仍很坚硬。有了底气，我立即上网回复对方：“谢谢你的咨询，这块陨石是经过表面特殊加工的，做成了射线状。加工者是尊达本厂，还是负责装饰腕表的珠宝商Mouamad一时难以辨明，但是陨石面无误，希你继续参与。”

此时已近凌晨1点，我本想早点养精蓄锐，没想到遇到个缠

人的家伙：“关于万年历，我知道有正规万年历和简易万年历，简易的只能表示闰年，但本件不仅没有2位数或4位数的年历，连表示闰年的机构也没有，请给予说明。”

对于这个问题，记得北京吉祥阁表友李志华也有一只同样的表，是万年历不错。但外表看不出来，只要你买表时戴在手上，并保证不停，就会永远正确一天不差地走下去，到了闰年的2月29日，可以正确表示出来，据说这叫隐形万年历。作为二手的隐形万年历，初次上手的调校，及今后持续使用自动上链机，非常重要。

李志华的那只表，由于那年恰巧是闰年，调到2月份出了29日便无争议了，现在不是闰年，怎么办？无论如何，我今天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要讲明白估计要到天亮。明天下午再回答也不迟。



鄢凤卿

但第二天出诊时，好几次脑海中出现尊达万年历的问题，我自嘲是患了焦虑症——因为任务还没完成而焦虑，和我面前的患者一样。下午，已筋疲力尽，本想尽最大努力说明简易万年历一事，偏偏计算机的日文输入系统又出了故障，等管理员修好系统，我的精力更所剩无几，只好做了最简单的回答。

在网络竞拍最终一锤定音后，这枚腕表终于被这位“执著”的表友从另外4个人手中以59.6万日元标中。除去付给雅虎的手续费，我多少赔了一点儿。对方来了电邮。“我是落扎者大木。请告知账户及汇款金额，邮费是多少一并计入，希望是一次愉快的交易。”看样子，是个直爽的人，所住的神奈川县藤泽市，也是个富人居住区。

本以为一切就这样圆满结束了，没想到10天后，大木又来了邮件：“我是前些日子买尊达万年历的大木。有点小事想和您商量。这款表确是万年历，但要想调准日期很困难，调准一次要按钮300～1500次，我有许多表，不能总戴这一只。每次调的时候，由于本人性急，都恨不得把表摔了。仔细想与其把表摔了，还不如转给喜欢表的人。您如果有意，我愿以40万日元的价格转让给您，请您参考一下。多谢！”

真让人哭笑不得，10天他赔了近20万日元。这事儿其实也简单，你那么多表，可以先不戴尊达，等到闰年时再调可以省很多事。就算不是闰年，调一次日历就可以了，为什么那么较真呢？我出于善意，给了他一个更好的建议：“40万日元转让，太便宜了。你试试把手表再一次放到雅虎出品，开始价格40万日元，我一定竞投。如果别人能高一些更好，若没有更高的价格我就买下，如何？”就这样，尊达的二次拍卖我全程关注，最终名为BW123的表友以53.8万日元的价格成交。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喝了一口白兰地为尊达同志又一次找到归宿庆祝，同时心想，为了补尊达之憾，我一定要入手一只尊达三问。

没想到事情还没完。

大木又来了邮件：“先生：你好，我是久违的大木，再次麻烦你。BW123买到了尊达后，调整好了日期，但放到上链机上运行两天后，表却停了。离开了上链机，手动上链或用手晃晃表就可正常运行。请问这是不是手表本身的毛病？BW123等我的回音，我也回答不了，只好请教您。”

这叫什么事儿？我成了售后客服了吗？但庆幸的是，这个问题我能回答。自动上链机大体分两种：一种是每隔几分钟就改变转动方向，顺逆时针交替进行，这种上链机多为电池式；另一种是交流电式，可以通过按钮固定单一的转动方向。如果碰上单向上链的机芯，选错上链机转动模式就可能上不了弦，换一方向就应当没有问题了。

这次我没发电邮，而是亲自打电话给大木，说明原因。作为同一块手表的前后老板，他暗自透露了将腕表转手的真正原因，他认为自己和尊达表这块陨石“相克”：第一天戴尊达上班汽车就在高速上灭了火，第二天去赴宴又突然不胜酒力。也许是我们都太敏感，听后的第一反应就想起了当日帮我把表“戴”回日本的朋友那段点背的事，但对大木我只字未提。我们还“煞有介事”地约定半年后问问BW123平安与否。

一场苦战，终于谢幕。最后那段关于“相克”的结束曲成了弦外之音，对于宝石是否有灵性在此不做深究，但一块好表兜兜转转找到一个“好归宿”的确需要点缘分。

澎湃性能 稳定大局

——ThinkServer RD640 服务器新品发布



近日，联想集团正式发布了 ThinkServer RD640 双路机架式服务器新品。作为最新一代明星产品，RD640 延续了 ThinkServer 家族可靠品质、创新引领、全程关怀三大基因，以极致性能、超低能耗、灵活扩展等优势，为金融、政府、教育、大中型企业等行业客户带来更高应用价值，充分满足其对于 IT 平台稳定性、安全性以及性能的高要求，助力客户成功应对云计算、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全新挑战和机遇。

ThinkServer RD640 采用全新的英特尔 Xeon E5-2600 V2 系列处理器，计算能力整体提升 27%。同时，RD640 存储容量可高达 32TB，并针对海量数据吞吐性能进一步优化，实现超过 12 倍的数据读写性能提升，为需要海量数据处理的行业客户带来可靠保障。

强劲动力 为企业注入全新活力

作为 ThinkServer 家族新品的最新力作，RD640 可搭载两颗 Intel 最新 Ivy Bridge 平台的 Xeon E5-2600 V2 系列高端处理器，最高可达 24 颗处理核心带来强劲计算动力；采用 20 DIMM 内存，容量可高达 320GB，用户还可选配低功耗 LV-RDIMM 内存，满足业务严苛性能需求的同时，进一步优化能效。

在存储空间方面，ThinkServer RD640 不仅支持传统的 SATA、SAS 硬盘，还支持高性能 SSD 固态硬盘，最大可实现 32TB 的存储容量，数据读写性能超过 12 倍的提升，轻松满足企业关键应用对于系统性能的苛刻要求。此外，ThinkServer RD640 新品还拥有 2 个 ×16、4 个 ×8 共 6 条 PCI-E 扩展口，为用户提供更强大的 I/O 扩展力，实现灵活扩展。

极致能效 有效降低企业 TCO

对于很多大型企业和机构类客户而言，能耗是 IT 运行中的一项重大成本，其中据统计，企业数据中心 40% 的能耗被服务器所消耗。ThinkServer RD640 利用联想创新的“智节能技术”，显著提升系统能效。在权威的 SpecPower 标准测试中，RD640 以出色的低能耗表现，以及软硬结合的能效管理系统，为用户提供绝佳的能耗管理，为用户节省 30% 的电费。同时，RD640 还采用了领先的动态承载电源，配备业界最高标准的 Redundant hot-swap（白金电源），达到 94% 的电源转换效率。

ThinkServer RD640 采用家族创新的智能能效管理技术（Smart Grid）。该系统采用无人值守化设计，用户可利用 Web 端的独立管理界面，经过简单的几步配置流程，轻松远程管理数据中心能耗。此外，ThinkServer RD640 采用 ThinkServer 家族独有的超缓震技术，有效降低 40% 因震动引起的系统故障，大幅提升系统稳定性。其机箱采用双体设计，强度比普通机箱提升 20%；硬盘仓则采用双层加固设计，强度比普通硬盘仓提升 50%。

无缝融合 助力企业灵活易管理

对于企业 IT 管理者来讲，数据中心扩展是件十分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设备品牌不同，就需要进行多协议调节，该过程极为繁琐和浪费时间。为此，ThinkServer RD640 为用户打造了真正开放式管理，采用开放的工业标准和协议、兼容多品牌产品环境，与应用环境无缝集成；通过 ThinkServer 家族的整机免工具设计，令管理员无需任何工具即可完成对服务器的拆装，60 秒上架，快速修复故障。

ThinkServer RD640 为用户提供了一系列实用管理工具，可以轻松实现批量部署、警报、系统管理。全新的 ThinkServer 服务器导航工具软件 Easy Startup 可以帮助 IT 管理员同时部署大批量服务器，只需点击两次鼠标即可完成业界所有主流操作系统的安装，并可在安装过程中配置 RAID，无需单独配置，大幅降低部署整体成本。而联想独创的 DIT 故障自诊断技术，可对 CPU、内存、电源、风扇等主要部件进行精确故障定位，缩短故障时间。

联想 ThinkServer RD640 除了拥有特有的固件智能升级系统，帮助 IT 管理员随时随地升级系统固件，持续优化服务器的运行效率外，还有 VMware vCenter 和 Microsoft SCE 最新的插件工具，以及采用 VMware vSphere Operations Management 管理软件和 Lenovo|EMC 存储技术打造的完整虚拟化管理解决方案均可以进一步帮助 IT 管理者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主笔 ✎ 鲁伊



不容忽视的细菌

通常而言，细菌在物体表面很难长期生存，而清洗和消毒会进一步加速其死亡。然而，美国布法罗大学的研究小组在最新一期《感染与免疫》杂志上发出警告，可能导致儿童耳道感染和链球菌性喉炎的细菌可以在学校、托儿所和医院中的毛绒玩具及婴儿床表面长期存在，从而增加潜在的感染风险。

研究者在一家幼儿园早上开门前对其中的毛绒玩具和多种家具及物体表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5个毛绒玩具中有4个带有肺炎链球菌，而在前一天已经清洁过的婴儿床表面，也检出了化脓链球菌的存在。研究者指出，这些致病菌离开人体宿主后比预想中存活更长时间的关键在于其聚合形成的“生物膜”，在这一状态下，它们能够在书本、玩具和物体表面上停留数小时甚至数天。在此前的研究中，在被污染表面上存活了一个月之久的肺炎链球菌和化脓链球菌仍可迅速感染实验室小鼠，令其生病。

吃什么？随大流

想要在新年中让自己的饮食变得健康起来？或许你该试试多和追求清淡饮食的人一起外出就餐，减少与饕餮之徒吃饭的机会，顺便拉黑那些经常在微博上深夜发吃的损友。根据以英国利物浦大学为首的研究小组日前发表于《美国营养和饮食学会杂志》上的调查结果，朋友圈会对个体的食物选择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研究者对此前发表的15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后发现，当知道其他人选择的是高能量密度的食物时，被调查对象通常也会选择类似的食物。此外，如果一道就餐的人都开怀大吃，人们也会在不自觉间摄入更多的食物。研究者指出，饮食习惯是相当重要的一项社会规范，为了避免在群体中显得特立独行，人们通常都会对个体行为做出修正以取悦他人，但在食物充裕热量横流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因此而付出肥胖及罹患慢性疾病的代价。





为了视力请戒烟

对于那些每天至少吸 15 根香烟的中年男性来说，如果可以下定决心告别烟草，则在未来的 20 年中患白内障的风险可以显著降低。这是瑞典欧博拉大学附属医院的研究小组在最新一期《美国医学联合会杂志·眼科学》上发表的研究结果。因晶状体混浊而导致的白内障是全球首位致盲性眼病，半数以上的失明者受累于白内障。

医学界很早就发现，除了烟草所带来的常见危害，重度吸烟者视力受损的风险也会相应提高。在该项研究所涉及的 44371 名年龄在 45 到 79 岁之间的瑞典男性中，与从不吸烟者相比，每天吸食 15 根香烟的人在研究持续的 12 年中患需手术治疗的重度白内障的风险要高出 42%。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研究者也发现，那些成功戒烟的重度吸烟者患白内障的风险只会高出对照组 21%。

规律生活助安眠

朝九晚五的生活听起来刻板无味，但对于成年人来说，这却可能是保证一晚安眠的重要条件。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小组日前发现，与工作时间弹性、食无定时的人相比，那些每天大致在同一时间上班工作、下班就餐的成年人，上床后通常很快便能进入梦乡，他们的睡眠质量相对较高，夜里醒来的次数也相对较少。

研究者在发表于《老年学杂志·B 辑》的论文中指出，关键在于规律的形成与保持，而不在于上班、用餐的具体时间。有趣的是，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规律的生活对老年人更重要，但在该项研究中，晚餐时间经常变动的老年人反而是夜晚睡眠时间最长的一群人。

健康食谱

莓子酸奶乳酪冻
Berry Yogurt Cheese Parfaits



在法语中，“parfait”的意思是“完美”，这充分表明了该款经典甜点在人们心目中受欢迎的程度。这个配方用希腊酸奶和布里奶酪替代了通常做法中的重奶油，让人在一饱口福的同时还能摄入大量促进肠道健康的益生菌。

原料（8 人份）

布里奶酪 200 克，希腊酸奶 200 克，蜂蜜 2 汤匙，莓子（蓝莓、蔓越莓或黑加仑）5 杯，波特酒味果冻 2 杯，松仁 1 杯





做法

❶ 布里奶酪入微波炉中加热 60 秒令其软化，去掉外皮，放入希腊酸奶，用手持搅拌棒中速搅打均匀，拌入蜂蜜，形成大理石花纹。

❷ 莓子洗净沥干水分，表面可撒少许糖粉增加甜味。

❸ 取专用 Parfait 杯（也可用大号红酒杯代替），分层放入莓子、酸奶乳酪和果冻，表面点缀莓子和松仁，即可食用。

小贴士

❶ 如果时间允许，布里奶酪表面刷蜂蜜，在 160 摄氏度的烤箱中烤 10 到 12 分钟，可获得最理想的风味。

❷ 这个方子中使用的波特酒味果冻（Port Wine Jelly）用市售的果冻粉制成，本身较甜。如用吉利丁粉和果汁自制，需要在果冻中和酸奶乳酪中视口味加糖。

转基因鱼油

文 / 袁越



鱼油被认为是一种对健康有益的食品，原因在于里面富含Omega-3脂肪酸。这是一类不饱和脂肪酸的统称，其中最有益的是两种，分别简称为EPA和DHA，前者对于血液循环系统有好处，可以降低心脏病的发病率，后者则对神经系统的健康发育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每人每天至少需要吃400～1000毫克Omega-3脂肪酸的原因。问题在于，目前的生产水平只能保证全世界一半人口的需求，剩下的一半就没有办法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就要从Omega-3脂肪酸的代谢途径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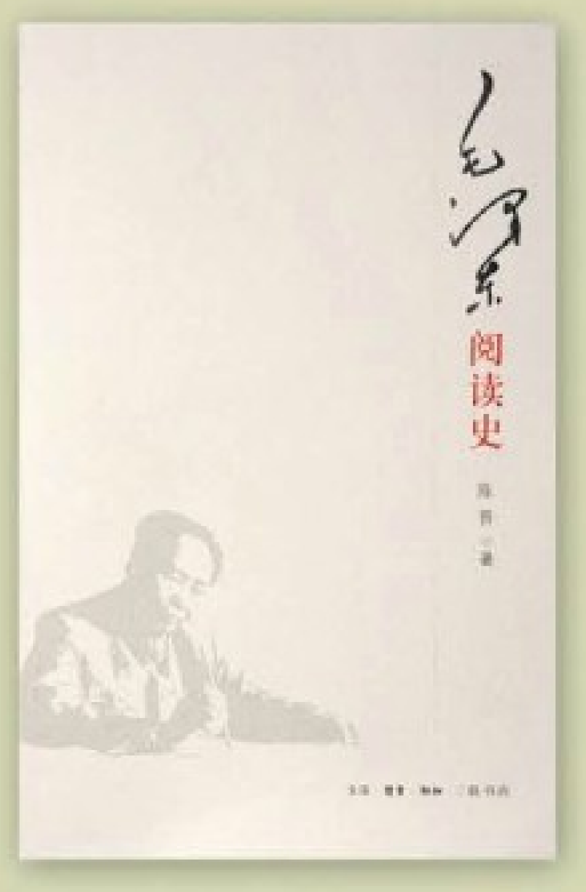
首先，人体无法直接合成Omega-3脂肪酸，虽然可以把植物油或者坚果中含有的亚麻酸（ALA）转化成EPA或者DHA，但转化效率很低，无法满足人体自身的需要，因此Omega-3被称为人体必需脂肪酸，基本上只能从食物中获取。

其次，鱼类是自然界中唯一含有大量Omega-3脂肪酸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吃鱼有益健康的原因。但是鱼类本身也不会合成Omega-3脂肪酸，它们是靠吃海藻获得这种宝贵脂肪酸的。事实上直接吃海藻的小鱼体内的Omega-3脂肪酸含量也不高，但这种脂肪酸会随着食物链的上升而被富集，所以自然界含有这种脂肪酸最多的食物是深海肉食鱼类，比如三文鱼、鲱鱼和沙丁鱼等。但是，随着食物链的上升而富集的不仅仅是Omega-3脂肪酸，还有汞、二恶英和多氯联苯（PCBs）等有害物质，所以深海鱼类不宜吃得太多，这就是为什么深海鱼油成为一种非常畅销的膳食补充剂的原因——正规厂家生产的深海鱼油只是把Omega-3提取出来，有害物质则被去掉了，所以效果比直接吃鱼肉要好。

那么，有没有办法在工厂里生产Omega-3脂肪酸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太贵了，消费者吃不起。最好的方法是让某种高产的农作物自己合成，但这就需要用到转基因技术了。美国孟山都公司把Omega-3合成酶基因转入了大豆当中，研制成功一种富含这种宝贵脂肪酸的大豆。用这种大豆榨出来的油所含的Omega-3脂肪酸几乎和鱼油一样，但却比鱼油廉价多了。可惜的是，由于来自民间的反转运动声势太过浩大，这种大豆一直没能进入市场。

为了绕过这个政治障碍，来自英国洛桑研究所的植物学家乔纳森·纳皮尔（Johnathan Napier）博士及其同事们成功地把Omega-3合成酶基因转入了一种荠蓝（Camelina）的基因组当中，把这种植物变成了Omega-3的生物工厂。这种荠蓝是一种高产的油料作物，很适合用来生产鱼饲料。目前全世界每年从捕捞上来的海鱼下脚料当中能够提取出大约100万吨Omega-3脂肪酸，其中只有大约十分之一被做成了深海鱼油丸，其余的都被当作添加剂混入了鱼饲料当中。由于世界人口飞速上涨，对鱼的需求越来越大，鱼饲料越来越不够用了。但是如果我们能从这种植物中提取Omega-3脂肪酸的话，不但会极大地减轻海洋的负担，而且还能扩大Omega-3的来源，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这种有益的脂肪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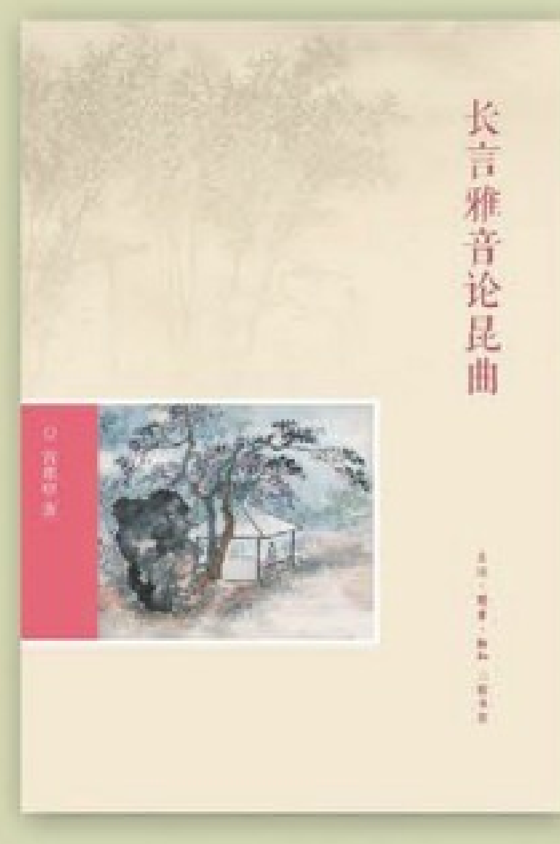
纳皮尔博士把这项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3年12月6日出版的《植物学杂志》（*The Plant Journal*）上。据纳皮尔估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种转基因油料作物将会在10年内实现商品化。



毛泽东阅读史

陈晋 著 定价：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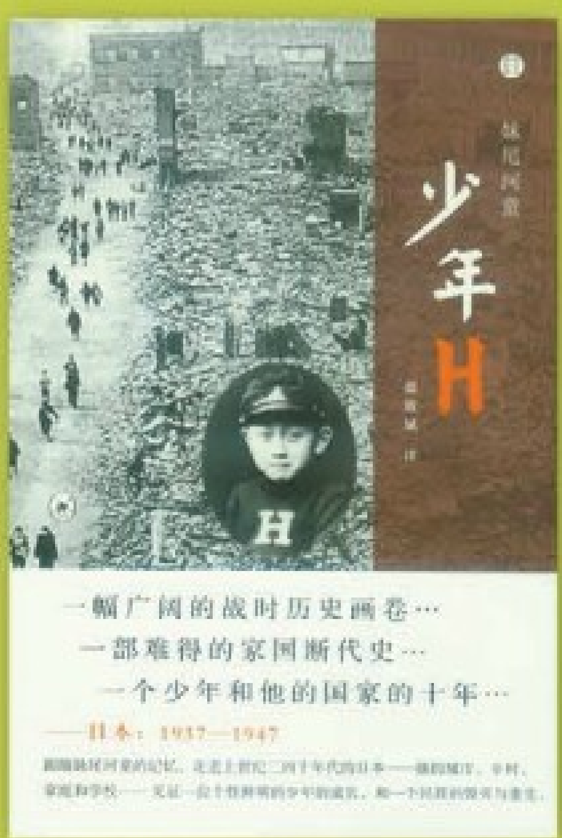
毛泽东的阅读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认识发展、思想升华、知识愉悦和情感表达。他的阅读和实践，总是相互守望，因而其阅读史，也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



长言雅音论昆曲

古兆申 著 定价：27.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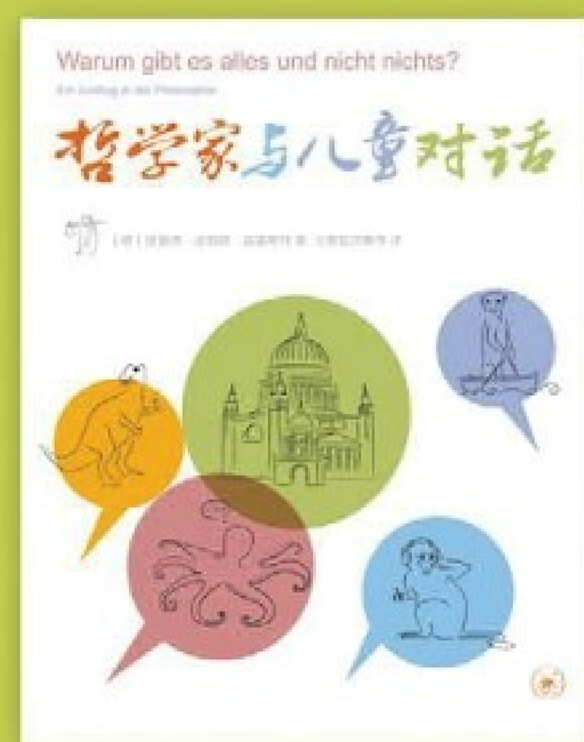
集中于对昆曲音乐性、演唱的审美传统的研究以及曲唱理论的梳理，此外还从净末丑等角色的演变、剧本的当代改编和昆剧生态环境的重建几个方面探讨昆曲该如何传承、保护和发展。



少年H

【日】妹尾河童 著 张致斌 译 定价：43.00元

日本知名舞台设计家、作家妹尾河童的自传性作品。他以一个少年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身份，为自己，也为大变迁时代的日本保留了一份特别珍贵的记忆。跟随他的记忆，我们走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见证一位个性鲜明的少年的成长，和一个民族的毁灭与重生。



哲学家与儿童对话

【德】里夏德•达维德•普雷希特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定价：37.00元

儿童天真烂漫，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常常在不经意中提出各种各样有趣的问题。有的看似简单，却道出真实；有的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发人深省。父母该如何向孩子解释这个世界？



“六大名著”导读

陈洪 著 定价：45.00元

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六部长篇白话小说为主要内容，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个角度对每部名著进行深入解读，多有新见。



中国的脉动——近现代史名家讲演录

多国丽 康狄 主编 定价：39.00元

集中了杨天石、张宪文、沈志华、雷颐、马勇、余戈等近现代史学界的十二位学者，发挥各自专长，向知识大众与文化读者展现了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光荣与梦想、风云与诡谲。

图书营销中心：01064002692　邮购部：01084010542　地址：北京美术馆东街22号　邮编 100010　淘宝旗舰店：http://beijingsanlian.tmall.com/

金牌的代价

文 ✒ 张斌

ESPN纪念自己开播30周年的30/30纪录片计划还在持续不断进行着，第一季30部播完之后，如今已经迈进第二季，第16部了。1月16日，周五，《金牌的代价》播出，美国人的思绪一时之间被拉回了20年前的这个月份，那时候距离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只有六个星期。故事发生在底特律，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如期举行，想去冬奥会的选手都要在这个比赛中脱颖而出。

您大约已经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震惊全美的袭击案，当年美国花样滑冰的女一号南希·克里根在底特律赛前训练时突然遭到陌生男子的袭击，高高挥起的木棍打向克里根的膝盖。现场目击者称，被打伤的克里根当即连声高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众人围拢过来后，泣不成声的克里根声音颤抖地问道："为什么会是我？"此次袭击使克里根未能参加全国锦标赛，但最终还是获得了宝贵的冬奥会参赛资格。

袭击者慌乱逃走，警方认定并非职业凶犯，医生判定，如果木棍击打部位再低几厘米的话，那么克里根的膝盖就要报废，可能落下终身残疾。此案敏感，FBI介入，效率还算高，案情在冬奥会前基本被描摹清楚。与克里根存在明显竞争关系的托尼娅·哈丁存在重大嫌疑，她的丈夫雇凶袭击美国的金牌希望克里根，证据确凿。时至今日，FBI和法庭都未明确掌握哈丁事前知晓雇凶过程的证据，因此克里根与哈丁最终同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结果，克里根获得银牌以英雄身份回国，而哈丁仅仅名列第八名，两人都泪洒冰场，一时成为最具围观价值的新闻事件。

想当年，在利勒哈默尔的赛场边，你能看到著名电视主持人宗毓华的身影，她和团队紧密地注视着克里根与哈丁，希望能够尽快讲出"为什么？"之后更多的隐秘故事，那是电视台期待已久的戏剧性话题。20年后，我们才知道1994年冬奥会女子花样滑冰自由滑比赛的收视率居然是美国历史上体育赛事排行榜上列第三位，前五名中的另外四个赛事都是美国人偏爱的超级碗。

这桩奇案在冬奥会之后总算结案，哈丁的丈夫以及参与袭击案的两位帮凶锒铛入狱，哈丁因为妨碍司法公正而被罚款16万美元，终身禁止参加滑冰运动。那一年，哈丁23岁，克里根24岁，人生就此画出完全不同的轨迹。那之后，两人曾在一次电视节目中相遇，但是没有任何交流，主持人艰难地想开掘出奇案内幕，但效果并不理想。这桩奇案抑或是体育丑闻20年来并未被人们轻易忘记，一部小说，一出歌剧，一首歌曲都曾将其作为主题。看过《宋飞正传》的朋友也许依稀还记得剧中对于奇案的拙劣模仿。直到2007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他的演说里还曾提及此案，哈丁是彻头彻尾的大反派，而克里根则是悲情受害者。

事发20年之后，纪录片导演希望复原当年案件情境，已经是三个孩子妈妈的克里根拒绝接受采访，她不愿意与当年的纷扰纠缠在一起。下个月，她受聘于NBC电视台将奔赴索契担任花样滑冰转播的评论顾问，平静生活中不断有亮色闪现。从照片上看，44岁的克里根变化不大，而如今的哈丁则已面目全非，发胖，脱发，在镜头前接受采访时，要用厚厚的脂粉来遮盖衰老的容颜。

没有克里根的讲述，自然是份遗憾，哈丁对于命运的抱怨不绝于耳，至今她仍然否认自己知晓前夫雇凶伤人，坚称这桩丑闻以及此后媒体的过度关注彻底毁掉了她的人生，失去了一切。2010年，哈丁再婚，如今与丈夫和2岁的儿子躲开公众视线试图安静生活，她也曾向克里根深深致歉，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在片子中，导演沿着哈丁对于自己生活轨迹的描述，自然而然地就描摹出了另外一个悲剧人物，那就是哈丁本人。出身苦寒，哈丁一直渴望用花样滑冰的成绩换取全家的"饭票"，很小的时候，在众人眼中，克里根就是高傲的公主，而她不过是"一堆垃圾"。匆忙嫁人后，才发现所托非人，饱尝家暴之苦，疯狂的丈夫毁掉了一切。这一切会让观众唏嘘不已呢，还是眼前飘过的猎奇故事呢？哈丁诉说过后，也未必可以得到解脱，克里根用沉默表达着自己的不原谅。

大多数美国人都未曾想到，这桩奇案居然对于美国花样滑冰的发展起到了奇特的推动作用，几乎是一夜之间让公众倾心于一个并不热门的运动，青少年参与和商业化悄然萌动，关颖珊等一代名将就是被那股奇特热潮裹挟迈上冰面的。真是个奇特的时代，是一个古怪的国度吗？

空军对你撒了谎

文✒宋晓军

2014年1月8日，原《连线》杂志的军事撰稿人埃克斯（David Axe）在《外交政策》网站上写了一篇博客。在这篇题为《空军在隐性轰炸机失火事故上完全对你撒了谎》的博客中，埃克斯先用了美国空军隐瞒2010年12月26日B-2隐形轰炸机在关岛发动机失火的例子，接着又例举了F-22和“V-22鱼鹰”等先进战机的常见事故后得出了结论：五角大楼似乎想让美国人认为先进战机很少发生故障，但事实上这些科技含量高的战机的故障不仅是常见的，而且是昂贵和致命的。

埃克斯的博客让人想起去年美国新锐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两个报告。一个报告是去年9月发布的《颠覆性技术与美国国防战略》，另一份是去年12月发布的《通过先进制造技术转变作战平台生成模式》。前一个报告提出的一种观点是：规模优势可能再次取代质量优势。即随着对手可能拥有与美国在射程、精度和隐身性能接近的武器平台，发展高度网络化、自主能力强、价格低廉的小型平台，以规模取得优势可能是一种选择。第二个报告提出的一种观点是：用先进制造技术降低和缩短武器平台的生产成本和研制周期。报告以F-22研制的高成本、长周期为例，认为以往靠投资强度与对手在战机上拉开“代差”的做法已不可持续。如果把这两份报告的观点浓缩一下，其实就是要集成网络和3D打印、机器人等技术优势，发展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廉价的、研制周期短的武器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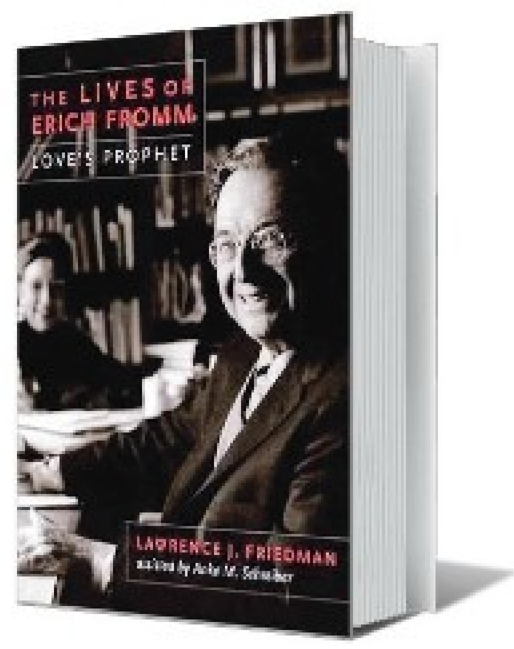
从目前美国削减国防费的宏观背景，以及企业裁员、削减退伍军人福利的微观背景上看，作为奥巴马政府军事智库的“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这两份报告是不无道理的。美国1947年才成立独立的空军（之前是陆军航空队），1948年通过《追加国防拨款法案》后，1949年军用飞机的产量已是1946年的3倍。1953年，战机的研制周期已经是“二战”时的27倍。1954年，军方实施以空军为主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时，技术人员在战机生产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已从1945年的9%上升到15%，管理人员是1945年的200%。在这样的投入下，按照上述第二份报告中的举例，1956年开始研制的第二代战机F-4从设计到服役只用了6年，而目前美军在役的最先进的F-22战机则用了22年。从费用上看，F-4只相当于F-22的5%，而F-22按不变美元计价则相当于当年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的60%，达392亿美元（F-4仅为22亿美元）。从产量上看，F-4生产了2078架，F-22只生产了187架。



美军F-22隐形轰炸机

说了半天，基本结论就是，因战机设计和制造的复杂性，持续的人力和财力成本已让美国不堪重负。为此必须设法通过技术创新，改变军备发展和作战模式的游戏规则。那么这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今年1月2日《外交政策》在一篇缩写“新美国安全中心”第二份报告的文章中，给出了一个兰德公司报告的链接。这份研究未来台海两岸军力平衡、长达157页的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大陆先进战机数量的提升（2014年1月，全球知名航空专业杂志《国际飞行》已将中国空中力量排名列为第二），即使在美国空军F-22战机的介入下，面对中国大陆使用导弹攻击东亚一线机场的情况下，台海上空的军事优势将很快会被中国大陆斩获。而这恰恰也是近来美国军火商和海、空军纷纷把目光投向无人机的研发与作战使用上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的问题是，一旦未来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空采用少数先进战机与大量廉价无人机搭配的方式，进而在空中形成一种新的数量和规模优势后，中国空中力量的建设会有什么对策？





艾里希·弗洛姆和《艾里希·弗洛姆的生活：爱的预言家》

弗洛姆的生活艺术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经过对档案、书信的挖掘，写出了《艾里希·弗洛姆的生活：爱的预言家》一书。

主笔 薛巍

爱的艺术与三段婚姻

1958年，主持人迈克·华莱士采访了弗洛姆。他在介绍弗洛姆时说，弗洛姆有两种人生——他是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学家，又是倡导跟苏联和平共存的主要人物。弗洛姆对这一说法做了扩展，说他自己首先是一位懂精神分析的临床医师，其次是政治活动家，然后还是社会评论家和致力于指导社会的作家。弗洛姆强调，他这四种角色之间不是相互排斥、毫无联系的，而是被他的“爱的预言家”这一身份联系在了一起。

弗洛姆于1980年去世。至今仍有许多人敬佩他。他的传记作者弗里德曼对他的缺点并不讳言。弗里德曼肯定了弗洛姆的写作能力。他说：“作为社会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弗洛姆能够用简单、直接的文字传递精神分析、伦理学、神学、政治理论、社会哲学方面的深刻思想。他1956年出版的《爱的艺术》，在全世界卖了2500多万册，他最深刻、最重要的著作《逃避自由》卖了500多万册。不管写的是什么主题，弗洛姆大部分著作的销量都超过100万册。”

弗里德曼说，弗洛姆对女性很有吸引力，在他年轻的时候尤其吸引比他年长的女性。他的第一任妻子弗里达·赖希曼比他大将近11岁。弗里达本来在格尼斯堡学医，“一战”期间对心理创伤产生了兴趣，在20世纪20年代初决定当一个心理治疗师。她和弗洛姆有着共同的学术兴趣，在性格上也很般配。弗洛姆想找一个人照顾

他，弗里达乐于承担这个角色。他们于 1926 年成婚，但这段婚姻慢慢地解体了。

跟阿多诺的矛盾导致弗洛姆被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解职，但弗洛姆在美国跟哥伦比亚大学的玛格丽特•米德等文化人类学家们成了好朋友，这扩展了他的视界。同时，他成了新弗洛伊德学派成员哈利・沙利文和卡伦・霍妮的同事。他的感情生活依然很丰富，依然对比他年长的女性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跟霍妮交往了很久，还有黑人舞蹈家凯瑟琳・邓翰。

在 80 年代初，《爱的艺术》成为销量排名第二的德文书，仅次于《圣经》。2005 年该书出版了 50 周年纪念版。弗里德曼说："近年，在情人节那天，哈佛大学的库普书店的橱窗里会摆上这本书，给那些生活不够丰富的人提供指导。" 但其实《爱的艺术》并不是性爱指南，它鼓励其读者去练习的爱更像是圣爱，或者自发的无私的世俗之爱，而不是性冲动。弗洛姆说，他才不会去写一本类似于《人性的弱点》、西方的《爱经》一类的书。但《爱的艺术》确实是一个励志手册。他跟书店里无数励志书有许多共同点。只不过它是为这样的读者而写的：他们想了解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认为当代社会过于推崇金钱和消费，认为爱是一门需要用知识努力去掌握的艺术。

弗洛姆说："坠入爱河是一种危险的误称。我们不是坠入什么，而是在他人那里认出自己，然后，通过感情、尊重和责任，我们努力教自己去表彰这一结果。一旦你明白了如何去聆听、欣赏和爱自己，你就能爱上别人，在聆听自己的内心时体会被爱者的内心。"

《爱的艺术》之所以畅销还跟弗洛姆的个人生活有关。弗洛姆的第二段婚姻过得很艰难，他和赫尼・古尔兰深爱着对方，但赫尼患有关节炎，长期遭受病痛折磨的她于 1952 年自杀，很快弗洛姆就开始跟安妮斯・弗里曼恋爱，二人在 1953 年 12 月成婚。安妮斯・弗里曼是弗洛姆的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这是一段漫长、快乐的婚姻，虽然安妮斯怀疑弗洛姆对她不忠实。1955 年《爱的艺术》出版，该书乐观、纵情的语调反映了弗洛姆快乐的心情。弗洛姆一直认为，一个真正能爱的人不仅爱他传统意义上的爱人，而且会爱所有人、爱生命本身。在《爱的艺术》中，他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如何缓解孤独感

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成员，但后来受到了阿多诺的排挤。阿多诺赞同马尔库塞对弗洛姆的评论，认为弗洛姆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改良派，以为他可以向病人和读者说明，不需要推翻当前的社会秩序，只需要调动自己内心的资源就能变得快乐。

弗洛姆努力融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弗洛伊德过于狭隘地只注重个人。在他看来，个人的性格既是弗洛伊德描述的天生心理冲动造成的，也是个人所处的文化背景造成的。马克思担心我们接受市场的支配而牺牲了一切，这是对弗洛伊德一个更加自然的补充。弗洛伊德说爱和工作是快乐的元素，但马克思在《詹姆斯・密尔笔记》中说人们的工作都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求，他们之所以珍视自己的所得，是因为它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关切。

弗洛姆说，本来人跟自然是一体的，在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之后，人就有了理性和感受能力。思想和情感既使人获得了独立，又令他们陷入了孤独。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孤独是天生的，弗洛姆则认为这是文化造成的。弗洛伊德说，性冲动的冲突意味着人天生会感到失落，感觉自己被抛弃，这只能通过心理分析来缓解。弗洛姆则认为，人类天生觉得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着，后来这种感觉遭到了社会环境的破坏。如果人们学习充分、自由地填满他们的自我，他们就会发现不再孤独，感觉自己有了陪伴。一旦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了伴，他就会待人和善。弗洛姆认为这是个人疏离感的唯一解决办法，现代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都提供不了个人实现的基础。自我实现就成了人们的一个不可承受的负担，所以许多人选择逃避自由。

对于弗洛姆的性格和治学方法，弗里德曼也坦率表达了他的看法："弗洛姆旺盛的精力反映的是他爱好享乐、不安定的性情。他举办的派对围绕着激烈的讨论、美食、无限供应的笑话和美酒展开。他写给第三任妻子安妮斯热烈、频繁、情不自禁的情书也是他的活力的表现。在听他最喜爱的古典唱片、品着白兰地、抽着雪茄时，他也获得了同样的快乐和满足。他曾在写给安妮斯的一封信中说，享乐时就要把谨慎抛到脑后。"

弗里德曼说，在感到苦恼时，弗洛姆有好多种排解手段。首先，他维持着规律的作息。每天先散步半小时，然后写作四小时，再冥想一个小时。匆匆吃过午饭之后，下午给病人看病、阅读写作材料或者口述信件。

其次，一旦确定了新书的主题，他立刻就精神抖擞地开始写。上来先找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对这一主题的观点。接下来复述他自己以前的说法，援引他早期的想法，而不是他人的批评或新的证据。他写得很快，但缺乏深度和变化。好在他早期的想法是他最深刻的想法。弗洛姆的著作经常围绕着二元对立来展开，如自由和独裁主义、爱与恨、对生命的爱（biophilia）和对死亡的爱（necrophilia）、占有与生存。这些二元对立令他的著作稳定、清晰，但限制了对对立双方之间的连续性和辩证发展的考察。

《我们是姐妹》：来自德国下莱茵区的家族小说

《我们是姐妹》的故事开始在主人公格特鲁德百岁寿诞的筹备中，同样年近百岁的大妹妹宝拉，和为之筹备的小妹妹凯蒂因此相聚，相处中扯出的回忆和正在经历的当下交错展开。

记者 ✎ 孙若茜



安妮·格斯特许森和她的作品《我们是姐妹》

这三位姐妹，并不是为小说情节虚构的人物，而都是作者安妮·格斯特许森的姨祖母。现实生活中，大姐、二姐都出生于19世纪，双双享年104岁，2001年去世的二姐宝拉刚好横跨三个世纪，而生命最短暂的妹妹凯蒂也寿享90。她们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制造的悲剧与苦难，承担不幸婚姻引发的轰动性丑闻，这三个交织在一起的漫长人生，有太多故事可讲，安妮的小说甚至用不着任何虚构来为之增色。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是姐妹》成为一部不折不扣的家族小说。

“我小时候有很长时间和姨祖母们一起度过，妈妈和姨妈们会经常讲起家族中这三位老人的故事，我当时就觉得很有吸引力。但是到了比较尴尬的地方她们就会点到为止：比如其中一位姨祖母在婚后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同性恋，再比如另一位姨祖母被搅进一桩离婚案，这些事在那个年代的下莱茵地区，被视作轰动性丑闻，甚至是犯罪。”安妮·格斯特许森1969年出生在这三位姨祖母所生活的德国下莱茵区的一个小村子里，长大后到多特蒙德大学学习新闻学，毕业后在很多家广播电台、电视台任记者、主持人。直到现在，这依然是安妮的第一职业。

因为职业，也因为对故事的了解总是缺少关键情节，安妮一直都没有写作的愿望。直到7年前，姨祖母离婚案的卷宗被当作遗产传到她手中，证言里的细节描写一一呈现在眼前，她才真正决定把她们的故事写成小说。经过3年的创作，当然，其中还包括不间断地在电视台做节目以及生了一个孩子，安妮的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2012年正式在德国出版，并在不久前被中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共同评选为“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三联生活周刊：家族小说，这种写作类型在目前的德语文学圈还会受到很大的关注吗？

安妮：因为我还是刚起步的作家，所以不能就此做出什么评价。但是，根据我从出版社听到的信息，现在德国文学中家族小说是非常受读者欢迎的。这背后有两个关键原因：第一，我们现在还都处在等级制度、父权传

统的社会中，原有的传统就是口口相传自己家族的故事。如今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三代同堂，而是各自生活在很小的家庭中，但是对原来代代相传的家族故事还是有心理需求。很多人都想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家族有什么样的故事，文学正好满足了这一点，这可能也是我的这部小说在德国取得成功的一个小秘密。

另外，家族小说中往往提到那一代人经历过的非常动荡的时代，历史上发生很多巨大事件，尤其在德国，她们刚出生可能还是皇帝统治的时期，之后又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有这样丰富经历的人现在的年龄都已经很大，几乎快死光了，所以就希望，也需要有人能赶在这一代人还没有彻底消失前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提醒后代，不要忘记这些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整个德国社会或者说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很强烈的兴趣，希望能通过文学来警示后代，不要再出现纳粹上台。作为集体回忆能够起到警示作用，这也是写家族故事的作家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说到读者对口口相传的故事的心理需求，是否因为这一点，你写作的语言才特别口语化？

安妮：这和我的另一个职业——电视台记者有关，面对电视提问我总是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尽量不用特别复杂的德语句式。

在故事向前推进过程中，我还特别注意语言的节奏，我是一个写得很快的快手，从来没有碰到过改来改去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气呵成地往下写，每次写完一段我都会大声地读一下，读的过程中就能注意到节奏。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语言风格，你认为家族小说和其他类型的小说最大区别在哪儿？

安妮：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像这本书里的主人公，人生已经足够精彩，只要写下来就是可以吸引人的故事。你能看到他们生活中也犯过错误，也会去纠正，一切吸引读者的元素都在他们真实的生活中存在，都经历到了，没有必要再经过我的虚构和加工。很多文学大家的小说都是虚构出来的，但我作为一个刚刚起步写小说的人，觉得自己是完全没有必要去虚构，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结构把它给写出来就行了。

三联生活周刊：因此这本书里的叙事结构是你特别在意的？

安妮：故事在说三个人筹备百岁的寿诞，一条线是说这个筹备过程，作为脊柱一样，穿插的另一条线就是回忆三个人一生中发生的事情，这两条线一直是交叉的，交叉点有时候是一件物品，有时候是谈话中提到的一件事。我要保证前后呼应，比如说这一章中宝拉是主角，频繁出现，那么下一章就会给她机会，讲她回忆到的事情，就像拍电影一样，镜头对准你，你就是主角，记录你的言行，基本是按照这个原则来组织结构的。但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刻意的安排，因为我对我要讲的故事特别地了然于心。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两次世界大战对主人公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但你似乎并没有强调战争对人生的左右，对这个在大部分德国文学中都不会绕开的主题没有给予过多的笔墨，为什么？你想传达更多的是什么？

安妮：战争，尤其是“二战”对于这三个人的命运有非常大的影响，包括这三个老太太100多岁的时候还盼着欧盟能成立，欧洲能统一，其实这和她们的战争经历有关系。但是我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我觉得我并不具备能力去描写一些真实的战争场面。

我有两个想要反映的主题，一个就是追求幸福。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在非常努力地追求幸福，事实上，尽管每个人都会有一方面很成功，却又总有一些其他的痛苦，你不可能百分百地得到想要的那种幸福。另一个主题就是宽容，就比如对待同性恋这件事情上，嫁给同性恋的宝拉，她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很恶心，但最终理解了她的丈夫，看到他为此受到了很多折磨，甚至很同情他。她觉得重要的是这个人本身，而不是他爱的是男的还是女的，这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的想法。很多事情现在来看是无所谓的，但在那时候确实是要命。

另外，德国民众都认为德国历史上最差的时间就是纳粹执政时期，其实纳粹上台前就有很强烈的种族倾向，民众普遍对别的种族，对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不够宽容。所以我也希望能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对待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在不同的时候看它们，得出来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很多事情不是绝对的黑与白。

还有就是其中可能涉及一些哲学问题，比如说，每个人究竟要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承担多少后果？比如说，大姐在战争中救的一个乌克兰人，在战后成了一名罪犯，强暴德国少女毁了人家的一生，就像农夫与蛇一样，在这件事情上，她要负多大的责任？其实每个人物身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故事有很浓重的地方色彩，下莱茵地区，能不能讲讲这个地方的特点对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影响？

安妮：城乡差别加上宗教影响，德国不同地区人的性格差异很大。像下莱茵地区，是基督教很严格的地区，而且非常小，当时可能也就600人，甚至还有更小的地区，有的村子也就30户人家。在这样的小村里生活，人的行为方式会受到很大影响，不像是大城市的个人主义，这里是集体主义，互相关系很密切，做事会考虑到别人怎么看我。在这样的村子生活，要符合这里的规范就会得到大家认可，一旦做了大家不能接受的事情，就会被清除出去，没有人接纳，日子就会变得非常难过。所以，整个地区的地貌、社会特点、交往方式都会影响到人，影响到命运。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晏博士对本文的帮助）

奶奶，走好！

文 左娟娟（上海） 图 陈曦



去年11月的第一个周日，爸爸在电话里告诉我："奶奶没有了。"

正在吃午饭的我心一沉，却并不感到意外，"哦"了一声，问了几句情况，安慰爸爸："奶奶97岁无疾而终，是喜事，我会回去参加葬礼。"我是奶奶带大的孩子，脑海里始终有这样的影像——雨天，我躺在摇篮里哭，奶奶急急从外面进来，收起黄油布伞，放在摇篮旁边，然后抱起我哄我，我安心地收声——分不清这是真实的记忆，或者仅仅是梦境。后来就记事了。从幼儿园起，每天两个水铺蛋是奶奶雷打不动给我做的早点。据说，吃鸡蛋会变得聪明，于是这一批批前仆后继牺牲的鸡蛋给了我强大的心理暗示，我会告诉幼儿园同学的家长，你家谁谁谁经常被老师批评，赶紧回去给他吃点鸡蛋。读书后，每次考了好分数，我也总觉得那是母鸡的功劳。

放学后，我常常站在奶奶身后，看她打南通长牌。等我再长大些，她就不打了，只是依旧喜欢看别人打。爸爸说，她怕输钱。我不太相信，奶奶对于我们儿孙辈，从来都是慷慨的，经常会给我们零花钱。在外读书工作后，我只要回老家，总会给她一两百块钱，自以为很有些"反哺"的意思。但每次给她，她一转身就要给我四五百块。惭愧自己像"钓鱼"一样，用小小的饵钓更大的鱼，于是后来便不再给钱，只是买些烟或者点心。奶奶爱抽烟，一次，我挑了二三十种花花绿绿不同品牌的香烟，每种一包，让妈妈带回去。听说，奶奶很喜欢，经常一溜排开，如同玩耍积木一样，反复把玩。

其实，去年"十一"长假回家，我已经有了预感。饭量变少，话变少，这都是接近生命历程终点的讯号。我去她的房间坐着，她听力微弱，我除了大声叫她奶奶，基本无话。看着她抽烟，看着她喝饮料，像对待孩子一样轻轻揉揉她已经松弛的面颊，心里想着，见一次，少一次。

奶奶很辛苦，生育了10个子女，年轻时不光要自己带孩子，还要忙着种田。奶奶也很有福，子女个个孝顺，过继给别人的几个，也跟身边长大的一样贴心。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爸爸是奶奶最小的儿子，奶奶选择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她一生劳作不休，90多岁还坚持自己手洗衣服，甚至帮家里烧开水、拖地，这些"危险动作"令我们担心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她胃口一直很好，95岁之前每顿总能吃满满一碗米饭。妈妈怕她舍不得吃菜，总不停地布菜、劝菜，啰嗦程度常遭到我和爸爸的"嘲讽"。妈妈还每天换着花样为奶奶准备早饭，包子、烧饼、大馄饨、小馄饨、面条、粥，配上豆浆、牛奶或酸奶，一周几乎天天不重样，为的是她能多吃一些。奶奶爱喝"营养快线"、爱吃冰激凌，于是家里总堆满了晚辈们送来的一箱箱的"营养快线"，冰箱里也总是被姑妈们塞满了冷饮。奶奶总是上午一只冰激凌，下午一只冰激凌，一直能吃到10月底。有一年除夕，奶奶让我清空冰箱里最后一只冰激凌。我摇摇头，太凉了。奶奶说，别放到明年。于是滴水成冰的天气，在没开空调的房间里，她把一只冰激凌迅速消灭，看得我佩服不已。

奶奶走的那一周，老家在修整厨房，奶奶去小姑妈家小住。中午小姑妈做了肉圆，奶奶胃口不佳，想迟些吃。在小姑妈的劝说下，奶奶吃了半只，说剩下的半只晚上再吃。谁能想到，那半只，奶奶再也没有吃下。

奶奶出殡的那天，我们送她最后一程。看着灵车缓缓经过一个个熟悉的路口，我仿佛觉得奶奶依旧在路上，在去看别人打牌的路上，在去看望某一个姑妈的路上。那个直直的身影，一年比一年显得驼，但那带着时代烙印的三寸金莲小碎步依旧稳健从容。

奶奶，走好！

本栏目投稿信箱：FRANKMW@VIP.SINA.COM


小巧简便、功能强大、时尚和高科技的融合
专属您的咖啡体验
PRIMADONNA S DE LUXE
意大利德龙
ECAM 26.455.M
全自动意式咖啡机
手机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
意大利德龙ECAM 26.455.M全自动意式咖啡机
自动一键式卡布基诺系统：只需将咖啡杯放置在咖啡流出口下方，轻轻一按即可享受一杯完美的咖啡。
创意之美：操作面板斜面仰角设计，方便操作。配备额外的专属传统打奶泡装置，安全硅胶材质，可亲身体验咖啡拉花的乐趣。
时尚之美：结合大胆利落的基础线条和纯正经典的意大利设计风格，体现非凡创意与创新格调。小巧而优雅的设计适合所有家庭。
独有自动卡布基诺系统
面板斜面仰角设计
配备专属传统打奶泡装置
www.delonghi.com.cn
服务热线：400 827 1668 或 800 988 1668
@意大利德龙DeLonghi
DēLonghi
Better Everyday

日日夜夜，完美清晰



A. LANGE & SÖHNE

GLASHÜTTE I/SA

德 国 朗 格

LANGE 1配备偏心时间显示和大日历显示，读时效果格外清晰。全新GRAND LANGE 1“LUMEN”在夜间同样清晰易读，除夜光刻度和指针外，首度搭载夜光大日历显示，在漆黑中散发光芒。为确保新一天的日历显示在午夜出现后依然发光，表盘的一部分以半透明蓝宝石水晶制成，即使日历数字盘藏于表盘下方，不可见的紫外线仍可穿过表盘，使日历数字盘吸收足够能量。**www.lange-soehne.com**

请前往探索朗格腕表系列：

上海朗格专卖店・淮海中路812号・电话：021 6323 2109